

#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

## 第九辑

*Information und Forschung über  
deutschsprachige Länder*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 编

顾 问 梅兆荣 顾俊礼  
主 编 殷桐生 刘立群  
副 主 编 姚晓舟 姚 燕 吴 江  
执行编辑 包葛耿 周海霞  
德语编辑 Michael Pielenz [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 目 录

## 采访精撷

-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3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李晓驷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12

## 新闻鸟瞰

- 外交新闻····· 于 芳 17  
 经济新闻····· 徐丽莉 24  
 媒体新闻····· 周海霞 28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史笑艳 32

## 热词诠释

- Putin-Versteher 和 Populismuskeule ····· 徐四季 39  
 Identitätsmanagement 和 Gesinnungsethik····· 关海霞 41

## 政治舞台

- 德国政治研究在中国····· 刘立群 47

## 外交观察

- 民粹主义的前世今生····· 吴兴唐 55  
 德国在欧洲的角色：未成熟而又不可或缺的领导者····· Michael Staack 62  
 2012—2017年中德关系回顾与展望····· 于 芳 74  
 默普会：观望中寻求出路的德俄关系····· 黄萌萌 80  
 欧洲和平秩序的重建：一个德国的视角····· 李 微 84  
 德波关系新动向····· 孙嘉惠 95  
 欧洲一体化中的德国和英国····· 李倩媛 105

## 经济视野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剖析欧盟 60 年来的主要问题与  
发展前景····· 殷桐生 117
- 德国福利制度改革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比较与借鉴····· 徐 清 125
- 欧洲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挑战——评 2016 年欧洲经济发展情况 ····· 梅 霖 132
- 2016 年德国经济发展评析····· 陈 扬 138
- 欧债危机期间果真存在欧元危机吗? ····· 卫仲佳 148

## 文教论坛

- 德国在华员工面对德中跨文化冲突时的回避型冲突风格····· 赵 倩 173
- 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徐丽莉 张 凯 184

## 科研环视

- 科研新动态····· 邹 露 193

## 大事记

- 德国外交经济大事记（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1 日）····· 李倩瑗 201

# Inhaltsverzeichnis

## Interviews

Interview mit MEI Zhaorong, dem chinesischen Ex-Botschafter in Deutschland.....	Die Redaktion	3
Interview mit LI Xiaosi, dem chinesischen Botschafter in der Republik Österreich .....	Die Redaktion	12

## News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Außenpolitik.....	YU Fang	17
Wirtschaft .....	XU Lili	24
Pressemeldungen .....	ZHOU Haixia	28
Politik, Gesellschaft, Kultur und Bildung .....	SHI Xiaoyan	32

## Modewörter und -sätze

Putin-Versteher und Populismuskeule.....	XU Siji	39
Identitätsmanagement und Gesinnungsethik .....	GUAN Haixia	41

## Innenpolitisches

Untersuchungen zur deutschen Politik in China.....	LIU Liqun	47
--	-----------	----

## Außenpolitik im Fokus

Populismus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WU Xingtang	55
Deutschlands Rolle in Europa: die unfertige und unverzichtbare Führungsmacht .....	Michael Staack	62
Rückblick und Ausblick auf die chine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2012-2017.....	YU Fang	74
Merkel-Putin-Treffen: Suche nach Auswegen bei den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	HUANG Mengmeng	80
Wiederaufbau der europäischen Friedensordnung: aus deutscher Perspektive .....	LI Wei	84
Neue Trends in den deutsch-polnischen Beziehungen.....	SUN Jiahui	95
Deutschland und Großbritannien im Kontext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LI Qianyuan	105

### **Wirtschaftliche Horizonte**

Sperriger Paß. Sagt nicht: Fest wie Eisen. Heute noch wird der Grat überschritten! – Analyse der Hauptprobleme der EU seit 60 Jahren und deren Zukunft .....	YIN Tongsheng	117
Reform des deutschen Sozialversicherungssystems und dessen Vergleich mit anderen EU-Ländern .....	XU Qing	125
Kommentar über die Herausforderungen bei der Erholung de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 2016 .....	MEI Lin	132
Analyse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2016 .....	CHEN Yang	138
Gab es tatsächlich eine Eurokrise während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	WEI Zhongjia	148

### **Kultur- und Bildungsforum**

Stile der interkulturellen Konfliktvermeidung bei deutschen Unternehmensangestellten in China .....	ZHAO Qian	173
Geschichte, Gegenwart und Zukunft der Verbindung von Berufsbildung und akademischer Bildung .....	XU Lili ZHANG Kai	184

### **Forschungsrundschau**

Neue Forschungstrends .....	ZOU Lu	193
-----------------------------	--------	-----

### **Das Wichtigste in Kürze**

Wichtige Ereignisse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01.11.2016-01.04.2017).....	LI Qianyuan	201
--	-------------	-----

采  
访  
精  
撷



#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 一、梅大使，今年是中德建交 45 周年。您参加了 1972 年中德建交的全过程，能否谈一下当时的情况，特别是谈判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好的。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 1972 年 10 月 11 日建交，建交公报是由双方外长在北京签署的，公报内容只有一句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于 1972 年 10 月 11 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这可能是中国同外国签署的建交公报中最简短的一个。但为了达成这个只有一句话的建交协议，双方在波恩进行了八轮会谈，历时一个多月。而通向这次建交谈判的道路更是漫长而曲折，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德国问题的复杂性有关。

二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曾被美、英、法、苏四个战胜国分区占领、管辖，全德事务由盟国管制委员会共管，柏林作为德国首都也被分区占领。1949 年，美、英、法占领区率先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随后苏占区也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德国由此分裂为两个德意

志国家。东柏林成了东德的首都，西柏林在两德统一前名义上仍处于西方三国占领之下，实际上由西德管辖，对外也由西德政府代表。对西柏林的法律地位，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争议。此外，两个德国在冷战期间分别属于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中国于 1949 年 10 月就与东德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西德当时不承认新中国，中、西德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状态。

1955 年苏联和西德建交后，中国多次发出希望与西德建立正常关系的信号，但西德方面未做出积极回应。1957 年，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主席冯·阿梅隆根率团访华，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民间贸易协定。1958 年，新华通讯社同德新社达成互派常驻记者协议，驻波恩新华分社便成了中国在西德的第一个常驻机构。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西德政界和经济界为利用中苏矛盾和开辟中国市场，出现了主张发展对华关系的声浪，从 1963 年下半年开始西德方面通过多种渠道试探中国的态度，导致 1964 年 5 月西德与中国在瑞士的首次官方接触。但在美国约翰逊总统的强大压力下，时任联邦总理艾哈德在访美期间公开宣布，不打算同中国建交和签订贸易条

约，也无意给予中国商业贷款或采取其他主动行动，遂使中、西德首次官方接触夭折。

1969年10月西德联邦议院选举后，组成了勃兰特—谢尔联合政府，开始推行同苏联和解、同东德接近、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的“新东方政策”。在这之前，勃兰特在上届政府中任外长时曾公开表示希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但在他接任联邦总理后却慑于得罪苏联，影响其“新东方政策”而确定了“先苏后华”的外交政策顺序，即先同苏联、东欧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然后才同中国建交。可见当年艾哈德中断与中国的首次官方接触是屈服于美国压力，此时勃兰特延迟同中国建交则受制于苏联。

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松动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以及西德同苏联东欧关系逐步正常化，以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为首的对苏强硬派提出了“联华制苏”的政策主张，西德各界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访华后，西德在野的基民盟主席团正式作出决议，要求联邦政府同中国建交，该党领导人之一、时任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不是后来任联邦总理的施罗德——本刊注）提出了访华愿望。所有这些，都对勃兰特政府形成强大压力，但当时勃兰特仍坚持要在西德—苏联条约批准后才同中国建交，而自民党主席、外长谢尔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第三国。得知中国政府已邀请施罗德于是年7月访华后，谢尔便决定委托施罗德促成两国建交。

1972年7月14—28日，施罗德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访华，周总理予以会见并就两国建交和国际形势同他交换看法，乔冠华副外长以外交学会副会长名义同他进行工作会谈。施表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成熟，谢尔外长已向他确认愿意随时应邀来华解决两国建交问题，勃兰特也赞成两国建交，

但主张应由两国驻第三国外交代表进行谈判，他不愿意成为“请求者”。周总理指出：西德与蒋介石集团一直没有建立关系，这应归功于阿登纳的远见，两国面临的不是关系正常化而是建交问题。既然西德各党都认为中、西德建交时机已成熟，双方可通过驻第三国外交代表进行协商，谈判地点可由谢尔外长确定。周总理并指出，中、西德建交好谈，只要写上双方同意自某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就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写，不写也可以。双方达成协议后，欢迎谢尔外长来中国访问。在同乔冠华会谈时，施罗德说明了西德政府现在愿意同中国建交的原因，主要是：美、日改变了对华态度；东方条约已批准，苏联不再是障碍；1973年西德要加入联合国，需要中国同意。

施罗德还说，为照顾勃兰特不愿意造成有求于中国的印象，他建议在他访问结束后由中国驻外使馆向西德驻外使馆做个愿意与西德谈判建交并表示。乔冠华当即指出这样做不妥。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由施、乔共同签署一个“内部谅解”，内容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获悉由德意志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博士表达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于两国早日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的愿望，并声明中国政府也有这一愿望。为此，应通过双方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1972年7月20日。”这是一个顾全双方面子，不使任何一方成为“请求者”的外交杰作，也为两国通过谈判达成建交协议铺平了道路。

上述“内部谅解”达成后，周总理指示当时在国内陪同施罗德访问的新华社驻波恩分社记者王殊返回波恩，先约见施罗德了解勃兰特政府的反应，然后约见谢尔外长确定谈判地点，并视情提交我方设想的建交公报，供德方选择。第一方案内容是中、西德两国政府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

系的原则，决定自1972年X月X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第二方案删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原则这个内容。施罗德返德后即向谢尔通报了同中方达成的“内部谅解”，谢尔为证实实施所谈的真实性，指示西德外交部政治司长冯·史塔登约见王殊予以确认，然后才于8月10日会见王殊，表示建交谈判在巴黎或波恩进行均可，王殊便递交了我方的建交公报两个方案，并表示，如在波恩谈，中方需要外交通信工具并派外交官和工作人员来波恩。谢尔表示，如在波恩谈，冯·史塔登将是德国政府的全权代表。

1972年8月12日，我驻东德使馆接到部里通知：授权王殊作为谈判全权代表，调使馆二秘梅兆荣作为王殊助理偕两名工作人员从柏林携收发报机赴波恩协助建交谈判，还增派王延义为驻西德记者。8月14日，我驻法使馆照会西德驻法使馆，通知授权王殊为谈判全权代表。8月15日，冯·史塔登约见王殊，同意谈判在波恩举行，并当场指示亚洲处处长贝伦顿给梅等三人发签证，8月16日入境，18日开始谈判，并说，谈判会很快，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谈判”。当天，贝伦顿即通知梅等三人签证可从西柏林警察局领取，但由于西柏林警察局是日15点以后和16日不办公，梅等三人只好于8月17日启程。

8月17日上午，我偕机要员和报务员携400斤重的收发报机乘一辆小面包车从东柏林悄悄驶入西柏林机场，办妥托运行李手续后，搭乘英航班机飞科隆。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保密的，主要防止苏联、东德获悉后干扰。根据事先约定，西德外交部派礼宾司使团科科长伦茨在西柏林机场迎接。由于我们互不相识，约定各持一份当天的德文《每日镜报》作为接头暗号。抵达科隆后，德国外交部派车协助我们把收发报设备运到波恩新华分社。下午报务员即去商店买了几根竹竿，在房顶

架起了天线，傍晚同北京试联络，一举成功。机要员从东柏林使馆带来了一个黑布小帐篷，在分社的阁楼里架起来以便于起草密电、译电和阅读电报，防止窃密。就这样，次日开始建交谈判的通信工具准备就绪。

8月18日，谈判在西德外交部举行。德方参加人员除冯·史塔登外，还有条约法律司长申克、亚洲处处长贝伦顿、德国问题处处长布莱希以及总务司长和女译员加莱丝；中方参加人员是王殊、梅兆荣、王延义和邢桂敏。谈判开始，王殊指出，西德方面没有台湾问题，谈判应能很快结束。双方谈判没有先决条件，主要就建交公报、谢尔访华及达成协议后如何发消息等问题交换意见。冯·史塔登先就建交公报表示基本同意我第二方案，但要删去“互相承认”一句。条法司长申克随即解释称：建交就包含互相承认，对此国际法专家们是没有争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未否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际法国家，也未听说过中国曾经否认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个国家。因此，写上“互相承认”是不必要的。德国法律专家有板有眼的严谨态度我是第一次领教。关于谢尔访华时间，冯·史塔登称可在9月底或10月下半月去北京，更确切地说是10月底，因为听说日本首相可能在9月底访华。王殊表示，9月份对中国是合适的。冯·史塔登却以坚定口吻回应说“不可能”，因9月份谢尔的日程已排满。关于发消息问题，冯·史塔登说，只发一则简短消息，说明举行了会谈并达成了协议。公报内容要等谢尔访华签字后才发表。接着，冯·史塔登突然称：下次会谈要讨论与互派大使有关的问题，即使馆职能和代表权问题。这时，我们预感到德方可能要我确认西德对外代表西柏林及其居民利益问题。

8月21日举行第二轮会谈时，双方在谢尔访华的时间问题上的立场都来了个180度转变。德方建议10月5—10日，我方则坚

持10月下半月，因为毛主席指示让田中先访华。双方争执不下，决定各自报告政府。这时，冯·史塔登又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中国驻法使馆的照会对王殊的授权是“进行”建交谈判而不是“完成”谈判，德国的国际法顾问们讲究“完善性”，认为还须补充“结束谈判的授权”。申克又补充称，他们在实践中区分“进行谈判的授权”和“结束谈判的授权”，如中国政府以适当的方式说明进行谈判的授权也包括结束谈判的授权，即包括草签谈判结果在内，就够了。这一插曲，使我再次体会到德国法律专家们的一丝不苟，但也深感德国法律专家们多么吹毛求疵。

谈到与建馆有关的问题，冯·史塔登提出，希望以适当方式确认西德代表西柏林和生活在西柏林的德意志公民的利益。并说，他同意中方的观点，即两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和双边问题，但联邦德国不得不考虑由于德国的特殊情况所产生的后果。西德在同外国建交时必须确认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问题，希望以适当方式加以肯定。王殊问，这个适当方式是指什么？冯·史塔登说，这正是需要商量的问题。他设想可以签一个议定书，内容还包括一些技术上的实施办法，比如使馆工作人员列入外交官名单等等。议定书不供发表，但根据德国《基本法》，必须向议会说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已取得一致。显然，德方不仅提出了意料中的西柏林问题，还提出了非外交官工作人员享受外交官的豁免权和特权问题。事后了解到，德方对我国法制不放心，想用这个办法保护其非外交官工作人员。对德方节外生枝提出这些问题，国内通过我驻法使馆照会德方：两国建交与西柏林的特殊情况无关，无需联系在一起，也不需要搞议定书，但“今后我们在处理有关的具体问题时，将会考虑到西柏林已形成的实际情况。”我方还向德方指出，非外交官工作

人员的待遇应与外交官区分开来。

8月24日第三次会谈时，冯·史塔登对我处理西柏林问题的回应表示“很满意”，但仍坚持要签议定书或者采取“德方在双方草签公报时重复中方表态，中方不予反驳”的方式。对此，8月28日第四次会谈时，王殊按国内指示作了三点表态，即：（1）双方商定建交谈判是无先决条件的；（2）西柏林问题同两国建交无需直接挂钩，如德方提出这样的问题，就等于提先决条件；（3）重申我在有关西柏林的具体问题上将按照西柏林已形成的实际状况处理。冯·史塔登表示：双方立场没有不可协调性，德方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提先决条件，对中方未同意搞议定书感到“失望”。接着他又说，中方想以声明代替议定书，如果这个印象正确，双方在事情本身上已接近了，只是在方式上还没有。为了加深中方对西柏林问题原委的认识，他请德国问题处处长布莱希详细介绍西德对外代表西柏林的法律依据，强调西柏林在政治、法律、经济、财政、社会、文化上同西德的“联系”是通过柏林协定得到西方三国和苏联认可的。

鉴于德方仍不放弃要求我就西柏林问题签书面文件，国内感到德方似乎产生了我急于求成的错觉，因而提高了要价，又考虑到谢尔已公开宣布将于10月访华签署建交公报，便指示我们把原定8月31日的下一轮会谈推迟到9月4日，并就下一轮会谈如何表态做了指示。9月4日第五轮会谈时，王殊按国内指示做了口气强硬的表态，指出：（1）德方曾表示谈判无先决条件，可能一次就谈完，现在却提出西柏林问题并坚持要搞议定书，对此我们感到意外；（2）尽管西柏林问题与建交无关，为使谈判顺利进行并照顾德方处境，我仍就西柏林问题做了明确表态，该问题实质上已得到解决；（3）如德方坚持要搞议定书，我们不得不问，德方是否认为这种方式对两国建交是必不可少的？如是，就

很难认为这与建交谈判不提先决条件的谅解相符；(4) 两国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双方对发展相互关系的愿望，只要双方都有这种愿望，这种问题就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建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冯·史塔登对我不接受议定书表示“遗憾”，但话锋一转又说，认识到双方对事情本身无对立意见，也考虑到中方表示说话算数，德方虽感到心情“沉重”，仍愿意采取如下处理办法，即在草签建交公报时由他把王殊的口头表态宣读一遍，以示记录在案，中方不予否定。当然，事先德方将把其记录稿以“非文件”形式交中方阅核。德方还将把新闻界问及此问题时的表态告中方，希望中方也不予反对。

当天下午，贝伦顿将德方整理的会谈结果记录稿交我，其中绝大部分正确无误，但在第五点西柏林问题上仍做了手脚，内称：“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我在会谈中阐述了柏林（西）和柏林（西）常住德意志人的利益如何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其驻外代表机构来代表。接着，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指出，在这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具体问题上将按照柏林（西）已经形成的实际状况来处理，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问题。”显然，最后一句话旨在造成我在西柏林问题上同西德没有利害冲突，歪曲了我方泛指两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的说法。此外，记录稿第三点还称，“双方大使馆‘成员’及其家属将在对等基础上享有按照国际法普遍准则和通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实践应有的地位，包括与此相联系的豁免权和特权”。德方故意把非外交官工作人员和外交官混为一谈，目的是要我国同意非外交官工作人员也享受“豁免权和特权”，这与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外交实践不符，且我们对此早已做了不能同意的表态。

双方商定9月13日举行第六会谈。但

9月8日，西德外交部翻译处处长库斯特勒突然约见我，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名的中文译法提出异议，还请了一位汉学家做顾问。库称，联邦政府非常关心把Bundsrepublik Deutschland同Deutsche Bundesrepublik区别开来。中国把联邦德国的国名译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符合德文原文，正确的译法应是“德国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是形容词，而德文原文是名词“德国”，按现在的中文译法，倒译过来变成了Deutsche Bundesrepublik。库的“论据”显然是对汉语无知的表现。我不得不严肃地向他指出：(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个习惯译法，已为人们熟知。(2) 这个译法是完全正确的。Deutschland当然可译为“德国”，但在这里“德意志”是更确切的译法。“德意志”不是形容词。(3) 要照顾各国语言的习惯和特点，译成“德国联邦共和国”在中国国名里是不通的。库斯特勒和那位汉学家搬出广州中山大学德语专业编的《简明德汉辞典》称，中国辞典也把Deutschland译成德国，而把“德意志”定性为形容词。我指出，这是简易辞典，注解不全，有时甚至不确切，不能以这个简易辞典为准。库接着说，中国报刊怎么写我们不管，但在正式文件中要写“德国联邦共和国”。为了照顾国名译文的准确性，有时可以牺牲语言。你的解释虽有道理，但不能排除混淆的可能，因为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东德国名的原文Deutsche是形容词。中方把东西德国名都译成“德意志”，这样联邦德国国名仍有可能被误译成Deutsche Bundesrepublik。我坚持不接受德方的诡辩。库于是改口说，如不能接受“德国联邦共和国”这个译法，也可考虑第二个方案，比如芬兰、爱尔兰、荷兰，中文里都把“land”译成“兰”，是否可以译成“德意志兰联邦共和国”？从口气看，对方似乎也认为这第二个方案并不理想或没有把握。

鉴此，我以坚定的口气指出：这样的译法不仅将推翻我们的正确译法，而且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要修改中国的历史文献。你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新问题，我将报告政府。

应当指出，德方关注其国名的中文译法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从60年代起，以乌布利希为首的东德领导开始放弃民族统一旗帜，强调德国分裂为两个德意志国家已不可改变并按此精神修改了东德宪法，在官方文件及报刊文章中一律不再用 Deutschland（德国）这个词。到70年代，昂纳克更提出了存在着两个德意志民族的概念，称西德是资本主义的德意志民族，而东德是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西德则竭力突出“德国”作为统一国家的整体概念，以维护德国重新统一的权利。所以，提出“德国联邦共和国”这个别出心裁的译法，就是要维护“德国”作为整体依然存在这个观念。这是当时东西德斗争的一个反映。国内肯定了我的即兴解释，还给我补充了一些论据，指出：（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根据中文的文法规律、特点和习惯所做的完全正确的译法。Deutschland可译为“德国”，也可译为“德意志”。例如 Neues Deutschland 即译为“新德意志报”而不是“新德国报”；（2）按中文习惯，国家名称中，国名均放在前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等，这里“中华”“美利坚”都是名词而非形容词。倒译时均须根据原文，绝不会混淆；（3）德方提出的两种方案均不能成立，首先中文国名里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国”字，其次如接受德方新译法，人们会以为出现了第三个德意志国家，从而将引起混乱。根据国内指示，我向贝伦顿做了进一步陈述。

9月13日第六次会谈如期举行。冯·史塔登首先通知我方：谢尔外长定于10月10日从纽约乘专机抵达上海，然后转飞北京。关于西德国名的中文译法，基于梅兆荣先生向库斯特勒和贝伦顿所做的说明，德方不再提出异

议，但希望中方在正式文件中使用外文时，按西德《基本法》和国际上习惯的写法来处理。对我方不反对“德方宣读记录、中方不予反对”这种方式表示“欢迎”，对我同意德方记录其他各点表示“满意”。随后提出暂时休会，以便对我方不同意非外交官工作人员享受豁免权和特权、要求删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问题”这句话以及不同意用“柏林（西）”而主张用“西柏林”或“柏林（西区）”这三个问题进行内部研究。休会后，冯·史塔登对我要求删去第五点最后一句话表示“遗憾”，但不再坚持；对我主张用“西柏林”或“柏林（西区）”表示不能接受，因为“西柏林”这个名称同习惯的国际用语相悖，而“柏林（西区）”是四大国之间的用语，且以存在“柏林（东区）”为前提；关于非外交官工作人员待遇问题，主张暂予搁置。对于德方力主使用“柏林（西）”这个名称问题，我们经研究后建议国内予以同意。经国内批准，于9月21日第七次会谈中答复了德方。

9月29日是最后一次会谈。主要任务是草签建交公报。值得一提的是，德方在正常情况下要请一位书法专家用艺术体手写公报内容，成为永存史册的艺术珍品。但当时我方在波恩无相应条件，公报还得送我驻东德使馆用中文打字机打印。而德方由于时间紧迫，同时为了显示对等，也放弃了艺术体手写的传统做法。草签结束后，王殊通知冯·史塔登，梅兆荣和两位工作人员将留在西德工作，希德方给予必要的待遇和方便。冯·史塔登表示欢迎，说梅等3人可为谢尔访华和建馆做准备工作。王殊为接待谢尔访华需提前回国。

但在谢尔外长抵京前，我们得知台湾地区驻波恩的地下代表机构计划在莱茵河畔一家饭店举行“双十节国庆招待会”，王殊回国前按国内指示向西德外交部进行了交涉，德

方以种种遁词进行搪塞。王殊回国后，我再次进行了交涉，并暗示这可能对谢尔外长的访华产生影响，德方于是采取措施促使台湾驻波恩代表处取消了这场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为建交谈判中未讨论台湾问题补上了一课。为核实该活动是否取消，我于10月10日当天悄悄去那家饭店进行了实地观察，发现门上贴了一个通告：“由于饭店不提供场地，10月10日的招待会取消。”

## 二、您是中国驻西德的最后一任大使，也是驻统一后德国的首位大使，您亲历了德国统一，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和感受。

德国的分裂和重新统一都是欧洲战后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作为中国驻德大使，我对柏林墙被推倒后两德关系的走向，特别是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自然给予极大的关注。德国重新统一需要解决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包括东西德之间要就实现统一的方式和步骤，如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取得一致，使两部分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制上以及社会保障上重新合二为一；特别是如何解除四个战胜国对德国作为整体和柏林的特殊权利和责任、统一后德国的联盟属性、确认德波边界的永久性以及苏军从东德撤离等问题。坦率地说，如此复杂而浩大的工程得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顺利完成，是我没有预见到的。在密切跟踪德国重新统一的过程中，我深感统一是东西德两部分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得以实现，却归因于当时有利于德国统一的所有必要条件同时存在，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巧合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对德意志人民谋求统一的愿望，中国一贯持同情、理解和支持的立场，这在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记得前总书

记胡耀邦1984年10月对访华的科尔总理说过，德国长期分裂是不堪设想的。但如何统一、采取什么方式和步骤，是你们自己的事。只要东西德两部分和睦相处，只要统一后能同欧洲各国和睦相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基于我国对德国统一问题所持的一贯立场，我是怀着祝贺德国人民的心情于1990年10月3日零时应邀参加德国领导人在柏林原国会大厦平台上向全世界宣告德国重新统一的大会和随后的庆典招待会的，但我的心情也是极其复杂的，因为正是宣告德国重新统一的联邦总统魏茨泽克第二天要在总统府会见达赖，而我在波恩无法约到德国总理府或外交部的相关官员进行交涉，因为主管官员都不在波恩。于是我寄希望于在这个庆典上见到德方负责官员。仪式刚宣布结束，我便疾步从草坪赶向招待会大厅，正好碰见科尔总理的外事顾问特尔切克紧随科尔急匆匆地在人群簇拥下过来，我便赶上去想和他说话，他却摇头摆手暗示不便接谈。失望之余，我只好在大厅里找别的官员，见到政府新闻发言人克莱因先生，便向他陈述了诉求，他对魏茨泽克此举表示强烈不满，说这是故意和科尔作对，但总统的决定无法改变。国内指示我要在凌晨一时前报回交涉结果，由于来不及去柏林办事处发电报，只好找街道上的投币式公用电话将交涉情况报告国内。当时我脑子里情不自禁地浮现一个问题：中国一贯支持德国统一，这位德国领导人却“过河拆桥”，助力达赖分裂中国？！

## 三、您作为中国驻德大使经历了中德关系最困难的时期，您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

我1988年6月赴任至1997年1月离任，除头一年两国关系发展比较顺利外，以后7年多时间日子一直不平静，我作为大使一直

处在风口浪尖。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三件事：

一是打破制裁。西方对我国实行制裁的借口是所谓人权问题，实质是想以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改变中国。如何批驳各种污蔑不实之词，阐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政策，确保两国关系尽可能正常运行，是当时的严峻任务。经过不懈的努力，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良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力增强，德国各界对我国了解增多，并受其实际利益驱动，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取消对华制裁，使中德关系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二是涉藏斗争。德国是西欧国家中在涉藏问题上第一个挑起事端的。早在1987年秋天，绿党女议员凯莉纠集25名议员在联邦议会通过了所谓的西藏问题决议。当时科尔政府不同意该决议内容，指示其驻华大使向我表明了政府立场，我作为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对该决议中的污蔑不实之词逐点进行了批驳。在我任驻德大使期间，德国政界就所谓西藏问题的挑衅愈演愈烈，几乎各党都有人掺和进来，其顶峰是1996年6月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公然要求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进行谈判，而时任德国外长在辩论中竟表态支持该决议内容，导致中方做出强烈反应，两国间部长级来往一度中断。后来德国外长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在联大向中国外长作了四点声明：确认德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解决人权问题分歧的途径应是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而不是进行对抗。在此前提下，两国关系才得以转圜。

三是打掉德国售台潜艇计划。1992年底、1993年初，台湾当局利用德国造船业危机，以提供大量民用订单为饵，诱使德国为台湾建造和出售10艘潜艇，德国时任经济部

长极力主张售台潜艇，危及中德关系政治基础。为打掉这一武器交易，我们根据国内指示，从联邦政府、议会各党团和有关州政府到有关造船厂及德国各大企业，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做工作，经过约3个月的努力，联邦安全委员会在科尔总理和德国外交部的支持下做出了不对台售武的原则性决议，使中德关系避免了重大挫折。

上面讲的是使我最难忘的几次充满险情和斗争的经历。但也必须指出，在将近9年的时间里，中德之间有过多次成功的高层互访，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取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若干个重大项目，我也结识了不少真诚的朋友，忘不了他们为推动两国互利合作所做的宝贵贡献。

#### 四、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德关系？

总的看，目前中德关系发展平稳、良好。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是相互重视的表现。两国贸易额占中欧贸易总额近30%，经济技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中欧关系中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两国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有共同认识，合作前景看好。中国一向从战略高度看待同德国的关系，认为两国在地缘政治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也不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纠葛；经济上各有优势，互有需要，可以相互补益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一个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和一个工业技术发达的德国对接发展战略，以共塑创新为指引，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其意义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当然，由于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各异，发展阶段也有差距，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和利益分歧是难免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差异和分歧，并加以妥善管控。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就是不要以意识形态画线，以政治制度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切忌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改变对方，这样做会伤害政治互信。二是合作共赢，摒弃零和思维。要以人类进步的视角欢迎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努力，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德国是巨大机遇，而不应想方设法阻

止中国成为所谓的竞争对手。三是独立自主决策，不受制于第三方。中国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原则，德国则深深扎根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联盟。特别在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等问题上，德国能否不受其联盟政策影响，是中国关注的重大问题。

#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李晓驷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 一、请您谈一谈您上任以来的初步感受

我于2016年9月出任第十二任驻奥地利大使，至今我主要是进行各方拜会，熟悉情况，尽快进入角色。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不论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都将成就新的发展奇迹。国际上对中国的发展既有支持，也有阻力。我国内外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对外交人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唯团结带领使馆全体同事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发挥外交一线作用，更好地服务国内发展，不负国家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而不敢有丝毫懈怠。责任和压力是我最大的感受。

## 二、请您谈一下当前中国与奥地利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各方面关系的情况

当前中奥关系发展良好。主要表现在：  
高层往来密切。奥前总统菲舍尔2010年和2015年两次访华，奥总理克恩2016年就

职前作为奥联邦铁路公司总裁访华。奥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奥外长等也于2014年访华。今年以来，中国农业部长、公安部副部长等访奥。5月奥交通部长将出席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两国议会、政党、地方也保持着密切交往与合作。

合作不断拓展。中国是奥第五大贸易伙伴，2016年双边贸易额超过72亿美元。奥650多家企业在华有900多个分支机构，约有1200个投资项目，投资存量20亿美元。中国约40家企业在奥投资5亿美元，去年又有12家企业在奥落户，在奥投资1.66亿美元，已连续3年超过1亿美元。

人文交流活跃。中央电视台已连续30年实况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国音乐团组访奥络绎不绝。今年4月维也纳交响乐团访华，10月维也纳爱乐乐团也将再次赴华巡演。中国在奥有2000多名留学生，奥在华有500名留学生。2016年中国游客在奥过夜数达95.9万，是奥在非欧盟国家中的第二大客源国。

发展前景广阔。奥地利地处欧洲中心，是连接东西欧的交通枢纽。“一带一路”不断延伸扩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加1”合

作机制日益成熟，为中奥合作带来很多机遇。奥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16加1”观察员国。中奥双方都愿深挖潜力，创新思路，探讨合作新的增长点，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 三、奥地利政治的特点有哪些？目前政党格局、民意方面情况怎样？

奥地利有相对成熟的西方政治体制，二战后基本上是大党社民党或人民党轮流带上小党联合执政或两个大党实行大联合执政，政局总体稳定。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发展及欧洲形势变化，奥政党格局出现一些新的动向。传统大党地位下降，被打上“民粹主义”标签的自由党影响不断上升，2016年底该党候选人差一点当上总统。目前自由党是国民议会最大反对党，近两年民调支持率一直在30%以上，高于社民党和人民党。舆论认为自由党有可能在下一届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目前各党都在厉兵秣马备战2018年大选，党派斗争趋向激烈。

### 四、去年奥地利经济发展如何？

在国际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影响仍存的背景下，2016年奥地利经济增长1.5%，低于欧盟平均水平（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7万欧元，在欧盟中排名第四。私人消费增长1.5%，较2015年（0%）有较大提升；实际投资增长3.7%，其中设备和建筑投资分别增长7%和1.6%；出口增长1.5%，进口增长1.9%。失业率为5.9%，低于欧盟平均水平（8.3%），位于欧盟第九位。通胀率为0.9%，高于欧盟平均水平（0.3%）。

奥经济也存在高度依赖出口、高福利、高负债等结构性问题，政府正努力推动改革，提高经济竞争力。预计2017年奥经济增长2%。

### 五、请您谈一谈奥地利外交的特点和对一些重要国际问题的立场

二战后奥地利宣布奉行永久中立政策，但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属于西方阵营。奥地利以欧盟为依托，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欧盟机构改革，主张加强欧洲边界安全，控制难民涌入。出于历史文化渊源及现实经济利益，奥高度重视与中东欧及巴尔干国家关系，是其中许多国家的第一、第二大投资国。

维也纳是除纽约、日内瓦外的联合国和诸多国际组织所在地。奥充分发挥优势，利用多边平台扩大外交影响，推动禁止核武谈判，为伊核等热点问题提供谈判舞台。今年，奥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将政治解决乌克兰等地区热点问题、应对恐怖主义和社会极端化等作为工作重点。

奥重视发展与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大国关系，重视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与中国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 六、您对高校德语学生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我想借三句诗与大家共勉。

第一句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语言是一门工具，重在使用。书本上的德语与现实的应用存在不小差别，德国、奥地利、瑞士德语也都有不同。我们要将学习和实践相结合，避免“哑巴德语”“中式德语”，为走出校园服务社会做好充分准备。

第二句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德语学生得天独厚，享有中华文化、德语文化两股源泉。语言学习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很多人说，学德语的人像德国人。严谨、认真、守

时是德语地区民族的优良品德，值得我们学习。同时，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钻研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我们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将从中终身受益。

第三句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德语国家总人口有一亿之多，并且

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创新能力强。近年来，中国与德语国家合作紧密、交流频繁，德语人才施展才华、实现发展的机会很多。希望同学们勤奋学习、打好基础，为中国与德语国家的交往及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

作者简介：李晓驷，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 新闻鸟瞰



# 外交新闻

于 芳

## 【外交人物】

2017年1月27日，原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部长。2017年2月12日，德国前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当选为第十二任德国总统，他自1991年进入德国政界，两度出任德国外交部部长，曾在多项民意调查中，被誉为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

2017年1月22日，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在《图片报》上发表了题为《大国也需要伙伴》的文章。文章称，一国更换领导人时，总会存在着对新领导人路线的不确定性和疑问。但在眼下这一全球失序的时期，特朗普当选总统意味着20世纪的旧世界最终成为过去时，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柏林墙倒下之后的1/4个世纪都成为历史。21世纪的世界秩序会发展成什么样，拥有多种可能。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德国将会寻求同特朗普政府的对话，并表明德国的立场、价值观和利益。德国将向美国

明确表示希望建立欧美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双边关系的日程上，最重要的任务包括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实现自由贸易、交流和开放的世界，共同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发展更紧密的充满信任的跨大西洋合作。尽管面对不确定因素，德国始终坚信美国会意识到大国也需要伙伴，并愿意和好伙伴、好盟友一起前行。

2017年3月1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美并首次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会谈。尽管特朗普拒绝同默克尔握手，默克尔仍然感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并在冷战期间、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上给予支持；也感谢美国总统对北约的重视，并称德国已计划最晚在2024年实现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此外，双方还就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乌克兰问题交换了意见。默克尔称此次会谈是一次非常好的、坦率的初次交流，期待德美继续保持对话，在很多问题上双方将深入咨询与合作。3月18日，默克尔和特朗普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关于特朗普执政风格、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德美在贸易上的共同之处、TTIP谈判等问题。

## 【为了欧盟的外交】

2016年12月4日，德国和希腊外长发表共同宣言，称德希关系富有悠久的传统，共同的民主、多元价值体系，共同的欧洲价值观和共同的欧洲命运，将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赋予他们共同应对挑战的责任。同时双方也认识到，两国关系在最近也经历了困难时期，决定一道制订行动计划，加强和深化两国政府间的合作。两国将在外交政策、欧洲政策、安全政策领域加强交流，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两国都受到难民危机的影响，因此，两国决定采取共同的欧洲移民和难民政策，就移民问题进行长期的双边对话。德国和希腊还将继续推进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以及在北约框架下的合作。两国还将通过具体的经济和技术合作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企业创新，加强在可再生能源、出口促进和旅游业的合作，让年轻人和长期失业者对未来抱有信心。两国行动计划包含四大支柱：一是政治合作；二是经济和技术合作；三是科学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四是社会层面的合作。

2017年1月27日到3月9日，德国外交部举行了主题“难民——巨大的挑战”的展览，展出了赫尔林德·奎布尔（Herlinde Koebl）的作品。赫尔林德·奎布尔在希腊、意大利和德国拍摄的照片展示出，到达欧洲的难民如何适应新的日常生活。展出内容还包括，德国外交部对危机地区的人们提供了哪些救援和帮助。

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发表了英国脱欧

演说之后，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于2017年1月17日表态，这是英国在脱欧公投七个月之后首次介绍脱欧计划，并称英国愿意和一个强大的欧盟保持积极而有建设性的友好关系。德国对此表示欢迎，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底线：只有当英国正式表示脱欧意愿时，才能开始脱欧谈判。加强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团结，维护欧洲统一市场的一致性，符合德国和欧洲的利益。<sup>①</sup>

1997年1月21日德国和捷克发表相互关系以及未来发展联合声明。2017年1月25日在其发布二十周年之际，德捷两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和伙伴关系。20年前签署的声明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历史阴影奠定了基础，使得捷克和德国能够发展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同时能让两国对历史和未来话题进行自由而充满信任的交流。这份声明创造了两种手段，来积极推动德国与捷克关系的发展：德国与捷克未来基金，德国与捷克对话论坛。而此前已存在的机制得到了加强：德国与捷克青少年交流协调中心，德国与捷克历史学家委员会。德国和捷克于2015年7月建立的德国与捷克战略对话，构成了德国与捷克关系的第三个支柱性机制。双边的战略对话使两国能在各专业部门之间进行交流，更好地理解共同面对的挑战，更有效地应对挑战。眼下欧洲深陷危机，只有相互信任才是团结一致的基础。德国与捷克之间的睦邻关系，是消除新老欧洲界限的基础，欧洲面临的危机需要欧盟成员国来共同应对，但睦邻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在所有事情上都持一致意见，而是在建设性合作中共同致力于寻求一致的解决方案，坚持发

<sup>①</sup>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zu britischen Brexit-Plänen, [http://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117-BM\\_Brexit.html](http://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117-BM_Brexit.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3.03. 2017.

展和深化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sup>①</sup>

2017年1月29日，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和荷兰外长昆德斯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竭尽全力打击恐怖主义。双方都认为，打击恐怖主义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在坚固的价值观基础上进行，同时不会因为国籍、来源地、宗教信仰来限制难民入境。<sup>②</sup>

2017年是德国和匈牙利签署友好条约25周年，两国外长于2月6日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和欧洲伙伴关系条约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在欧盟内部和在北约两国也进行着紧密合作。双方重申，高度重视在人权、基本自由、民主、法治国家基础之上实现欧洲统一的目标，共同致力于保障欧洲的富裕、安全和团结。为了应对欧洲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双方进行了多样的对话，在议会之间、政府之间、联邦州和地区之间进行密切交流，在人文领域也存在着广泛交流。德语国家之外唯一的德语大学就坐落在匈牙利。自1991年开始，每年都举行一次德国和匈牙利论坛，讨论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领域的各种问题。两国愿意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欧盟这一价值共同体、维护和平。<sup>③</sup>

2017年2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波兰，这是自波兰法律与公正党2015年上台

执政、德波关系趋冷之后，默克尔首次访问华沙。在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背景之下，这次访问备受关注，这是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以来两国之间最重要的一次高层会晤，尽管两国对未来有不同的愿景，但将在欧盟的框架下达成更好的共识。波兰是欧盟第六大经济体，也是中东欧最大的国家，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获益颇多。波兰同德国经济关系紧密，2016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000亿欧元，相当于波兰进出口总额的1/3，德国连续20多年保持波兰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近年来，波兰不满德国的难民政策，不按照欧盟安排接收难民，并在气候变化、能源政策、欧洲理事会主席连任等问题上同德国意见相左。德国《南德意志报》评论员施特凡表示，德波两国关系近年来变得紧张，但鉴于双方共同的利益，最终两国还是会走近，波兰经济上离不开德国，安全政策上更需要牢固的双边关系以应对微妙发展的美俄关系，波兰需要欧盟在安全防务外交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对德国而言，波兰是欧盟东部最重要的国家，德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波兰，也需要争取波兰在难民问题上的支持。此次访问波兰的最大目的就是重整欧盟，希望在3月欧盟罗马峰会上提出关于欧盟未来的主张时，

① Auswärtiges Amt: Erklärung anlässlich des 20. Jubiläums der „Deutsch-Tschechischen Erklärung über die gegenseitigen Beziehungen und deren zukünftige Entwicklung“ vom 21. Januar 1997, 27.01.2017,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125\\_gemErkl\\_CZE.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125_gemErkl_CZ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3.03.2017.

② Auswärtiges Amt: Gemeinsame Erklärung des deutschen Außenministers Sigmar Gabriel und des niederländischen Außenministers Bert Koenders, 29.01.2017,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sid\\_5AAD0320AC6F640F834B29D5123582B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129\\_BM\\_AM\\_NLD\\_gemeinsame\\_Erklaerung.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sid_5AAD0320AC6F640F834B29D5123582B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129_BM_AM_NLD_gemeinsame_Erklaerung.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3.03.2017.

③ Auswärtiges Amt: Gemeinsame Erklärung des deutschen Außenministers Sigmar Gabriel und des niederländischen Außenministers Bert Koenders 25 Jahre deutsch-ungarischer Freundschaftsvertrag: Gemeinsame Erklärung der Außenminister, 06.02.2017,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sid\\_5AAD0320AC6F640F834B29D5123582B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206\\_HUN\\_Freundschaftsvertrag.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sid_5AAD0320AC6F640F834B29D5123582B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206_HUN_Freundschaftsvertrag.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3-03.2017.

能够得到波兰的支持。

1992年2月27日，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不到一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德国的重新统一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都由欧洲安全结构所决定。当时的欧洲利用1989年的政治转折来推进整个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值此条约签署二十周年之际，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和捷克外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如今的欧洲已经和20年前大不相同，但对于自由的承诺却没有改变。欧洲的共同目标是，让欧洲更加强大，保障人权、基本自由、民主、法治国家等基本原则，并不断地消除经济和社会差距。鉴于目前全球化世界给主权国家带来的巨大影响，欧洲需要能够保护成员国的行动自由，2012年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既是肯定也是责任，欧盟将共同应对难民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经济关系，自条约签署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三国之间紧密的经济合作有利于欧洲统一，有利于创造更多财富以及维护稳定，一致希望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美好的欧洲。<sup>①</sup>

2017年2月27日，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出任外长后首次出访奥地利和意大利。对此出访他表示，欧盟从未遭遇过如此强大的内外部分解力量。在此次的访问中，他和奥地利、意大利两国外长就如何加强欧洲团结、如何让欧盟在未来更加团结等话题交换了意

见。三国外长都认为，欧盟在应对难民危机和移民危机问题等重大问题上应当采取统一行动，在成员国可承受的程度做出妥协。在奥地利，加布里尔和奥地利外长也就欧洲安全与合作话题进行了商讨，在德国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期间，奥地利在稳定乌克兰东部的停火状态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sup>②</sup>

2017年3月1日，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和法国外长艾罗发表了联合声明，介绍欧盟委员会白皮书对欧洲未来的构想。该白皮书与2016年9月14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欧盟形势发表的演讲一脉相承，在3月25日《罗马条约》签署六十周年之际激发了对欧盟未来更广泛的讨论，其目的在于为欧洲公民寻求明确而具体的发展目标。当前的欧洲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因此，德国和法国认为，一个更强大的欧盟能够更好地保护欧洲国家，同时也是未来最大的成就。具体表现为，要强化欧盟作为外交主体的角色，要通过共同防务政策保障欧洲公民的安全，为应对移民、难民流动创造一个稳定的合作框架，通过发展欧盟成员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来推动欧洲经济繁荣，实现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进一步实现欧洲货币联盟。欧盟不仅仅是一个共同市场，它的建立以共同的价值观、团结和法治国家为基础。对于推动欧洲一体化，德国和法国责无旁贷。<sup>③</sup>

① Auswärtiges Amt: Erklärung der Außenminister Deutschlands, Tschechiens und der Slowakei anlässlich 25 Jahre deutsch-tschechoslowakischer Nachbarschaftsvertrag, 27.02.2017,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227\\_CZE\\_SVK.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227_CZE_SVK.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2.03.2017.

②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Gabriel zu seinen Antrittsbesuchen in Italien und Österreich, 27.02.2017,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226\\_BM\\_Reise\\_Rom\\_Wien.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226_BM_Reise_Rom_Wie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2.03.2017.

③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Gabriel und französischer Außenminister Ayrault: eine starke Europäische Union für eine gute Zukunft,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301\\_EU\\_Weissbuch.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301_EU_Weissbuch.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2.03.2017.

2017年3月6日，在英国继续推动脱欧进程和欧盟即将迎来六十周年庆典之际，德国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非正式峰会，支持以不同步调推进欧盟一体化的“多速欧洲”概念。四国领导人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对目前欧洲一体化所面临的怀疑和厌倦情绪表示担忧，并一致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盟改革白皮书中提出的“多速欧洲”概念。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必须勇于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部分欧洲国家走在前列，发展速度略快于其他国家，欧洲目前正处于紧张时期，需要乐观精神和行动能力。此次峰会呼吁各成员国根据自身的接受程度，深化合作，推进欧洲一体化。<sup>①</sup>

2017年3月25日罗马峰会是推动欧盟发展的重要契机。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庆祝《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默克尔总理出席此次峰会。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共同签署罗马宣言，一起寻求欧洲的未来道路。各国一致认为，欧盟目前在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移民压力、保护主义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欧盟成员国愿意齐心协力应对挑战，为欧洲公民带来安全保障和新的机遇。默克尔认为，欧洲必须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边界，经济应当发展得更强，尽管各国发展速度有所区别，但都朝着一个方向迈进。在未来十年，欧盟应当继续推进前人已经开启的事业。<sup>②</sup>

## 【德中关系】

2016年10月1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钱洪山会见第三批德国青年外交官访华交流研修

班学员。中德青年外交官交流机制，自2008年建立以来，已有60余位两国青年外交官参与交流，为培育两国青年外交官间的友谊，促进两国外交部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6年11月3日，德国副总理兼联邦经济能源部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出席了中德经济论坛并致辞，此次有300多名企业家和政界代表来参加西博会，表明德国各界对中国西部和四川的浓厚兴趣，加布里尔表示，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很强，一定能为两地合作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同时也希望德国企业在中国能够获得更有利的投资环境。

2016年11月7日到9日在德国柏林举行了第十四届中德人权对话，对话的核心议题是中国和德国的人权发展状况。

2016年11月24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德国出席第七届中欧论坛汉堡峰会期间，会见德国时任外长施泰因迈尔。刘延东表示，当前中德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密切的高层交往不仅增进了政治互信，也有力推动了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与德方共同努力，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不断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2017年2月16日，德国外长加布里尔与中国外长王毅在G20峰会的外长会议中进行交流。会后他表示，他很高兴首次与中国外长王毅谈话，德国和中国之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并不仅仅存在于双边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也存在于两国人民的交往中。双方一致认为，在世界政治动荡时期，两国应该继续加强战略伙伴关系。此外，中德两

① 华夏经纬网，《德法意西举行四国峰会支持“多速欧洲”概念》，<http://www.huaxia.com/xw/gjxw/2017/03/5220552.html>，2017年3月7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3月7日。

② Merkel, Angela: Europa ist unsere gemeinsame Zukunft, (Zeit unbekannt), <https://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DE/Reiseberichte/2017-03-24-merkel-in-rom.html>, letzter Zugriff am 30.03.2017.

国都愿意进一步加强双边的经济关系，中国再次保证将会继续开放市场进行改革。德国外长加布里尔也请中国释放出清晰的信号，为在华外国企业提供公平待遇，如在电动车行业。中国有着宏伟的发展目标，德国企业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做出重要贡献。但联系中国和德国的并不仅仅是贸易，中德两国今天在公民社会和教育领域都进行着深入的合作，双方都愿意加强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交流，这对双方都十分有利。<sup>①</sup>王毅外长表示，今年是中德建交45周年，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年份，中方愿与德方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战略沟通，推动各类对话交流机制取得成果，希望德方继续在欧盟尽早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定书第十五条所作承诺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今年德国接力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中德作为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应在去年杭州峰会成果基础上加强二十国集团宏观政策协调，共同推动全球化再平衡，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德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德方愿以开放共赢的精神深化经贸投资合作，建设性地解决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德方愿意继续推动加快中欧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进程，支持扩大对华投资，欢迎中国对德投资。德方认为，欧中班列的合作项目是德中、欧中关系密切的具体体现，愿同中方一道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德贸易总额达1700亿欧元，中国首次超越美国和法国，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并且，中德经贸关系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

间。2017年3月24日，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东亚联合会上阐述了德国亚洲政策新思路，指出“亚洲是德国及欧洲未来的关键区域”，“未来全球问题解决的路径要经过亚洲”。他强调，德国对亚洲的重视程度不够，德国需要重新调整亚洲政策。德国外交部就新设亚太司，汇集部内所有亚太职能。德国外交部原本只有一个地区司即欧洲司，此次调整意味着德国政府将亚洲视为与欧洲同等重要。加布里尔提出了亚洲政策调整的四个主导思想：

强化自由贸易原则，促进自贸协定的签订，推进与中国投资协议的谈判，与亚洲国家贸易政策关系的构建应该成为全球化规则先导；

促进亚洲地区争端和平解决；

强化亚洲地区组织，加强亚洲在全球机构中的参与；

亚洲政策的新调整应当遵循全球价值。<sup>②</sup>

## 【关注全球和地区性问题】

2016年11月7日，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向联合国难民署承诺提供6100万欧元用于援助非洲的经济危机。

2016年11月30日，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和法国外长艾罗首次颁发人权奖，获奖者一共有15位，包括叙利亚志愿救援组织白头盔。

2017年2月13日，德国外交部部长加布里尔称，德国愿意支持伊拉克政府重新建设公共基础设施，以便使因恐怖组织而逃离的当地人能够重回家园。要将解放后的城市和

①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Gabriel nach seinem Treffen mit dem chinesischen Außenminister, 16.02.2017,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217\\_BM\\_CHN.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217_BM_CH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2.03.2017

② 王建斌：《德国外交部增设亚太司：新外长加布里尔亚洲政策新调整》，<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7-03/10395529.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3月30日。

地区迅速转变为和平、适合生活的环境，还需要大量的投入，比如有效的饮用水供应、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德国愿意在这方面给予支持。仅仅通过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恐怖组织及其活动，只有当人们在那些从恐怖组织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能够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时候，才能消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基于这种考虑，德国签署了一份框架条约，为伊拉克政府提供无条件贷款。

2017年2月14日，德国外交部部长加布里尔会见突尼斯共和国总理优素福·沙赫德（Youssef Chahed）。双方谈话的主要内容包括德国和突尼斯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地区性问题。

德国十分关注挑战全球的问题，希望借G20峰会和慕尼黑安全会议之机将这些重大问题提上日程。2017年2月15日，德国外交部部长加布里尔在波恩出席G20峰会的外长会议，他表示，外交政策包括的内容要远远超出危机管理。外长们协商的一致看法是，与其不断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如由

二十国共同消除矛盾发生的根源，致力于用和平方式预防危机和解决矛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目前的国际问题：恐怖主义、水资源短缺、避难和驱逐、人道主义困境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

2017年2月18日，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举行了外长会议。会后德国外长加布里尔表示，在会谈中，四国外长就不断升级的东乌克兰停火问题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四方都将利用自身的影响去落实2月15日三边联系小组达成的协定，即自2月20日起达成停火协议，去除该区域的重型武器，并交由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特别观察员来控制。四方还商定，在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持下，继续交换战俘。几周以后，四方将再次会谈以确定后续政治进程，但不实现停火、没有去除重型武器，就无法进入政治进程。<sup>①</sup>

2017年3月23日，德国外长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反“伊斯兰国”联盟会议时承诺，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提供2.35亿欧元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救援。

作者简介：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① Auswärtiges Amt: Außenminister Gabriel nach dem heutigen Treffen der Außenminister Deutschlands, Frankreichs, Russlands und der Ukraine am Rande der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18.02.2017,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218\\_BM\\_Gabriel\\_Normandieformat\\_Muesiko.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7/170218_BM_Gabriel_Normandieformat_Muesiko.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2.03.2017.

# 经济新闻

徐丽莉

## 一、德国经济总体情况

1. 2017年3月德国柏林经济研究所(DIW)的景气晴雨表显示工业发展开局良好。<sup>①</sup>景气指数在第一个季度攀升至107点,标志着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平均数达到0.6%,略高于2016年第四季度。

鉴于出口增长强劲,工业生产也明显扩张,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将保持适度增长趋势。服务业也将持续增长。物价水平增长幅度较大,将削弱购买力,导致零售业的销售额略有减少,特别是消费相关的服务业会受到影响。

国际环境中隐藏了巨大的风险:特朗普

总统上台后,美国经济政策的不明确性;欧洲一些重要国家的反欧洲政党站到了选举前台;英国脱欧谈判正在进行等因素使得德国的企业投资很有可能放缓。

2017年3月德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比2月增加了0.2%,消费者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增长率相较于2月的2.2%有所下降。其中蔬菜类的价格比2月下降幅度最大,达到11.7%,衣服和鞋子类的涨幅最大,达到8%。<sup>②</sup>

德国失业率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2016年第四季度失业率在5.7%—5.8%之间,2017年第一季度略有提高,一二月达到6.3%,三月为6%。<sup>③</sup>

2017年3月ifo研究所发布商业景气

- 
- ① (Verfasser unbekannt): „DIW Konjunkturbarometer April 2017: Deutsche Wirtschaft trotz zahlreichen Risiken – Industrie kommt wieder in Schwung“, [http://www.diw.de/diw\\_02.c.102177.de/forschung\\_beratung/daten/konjunktur\\_barometer/konjunkturbarometer\\_vom\\_29\\_maerz\\_2017.html](http://www.diw.de/diw_02.c.102177.de/forschung_beratung/daten/konjunktur_barometer/konjunkturbarometer_vom_29_maerz_2017.html), 29.03.2017, letzter Zugriff am 30. 03.2017.
- ② (Verfasser und Titel unbekannt):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amtwirtschaft\\_Umwelt/Preise/Verbraucherpreisindizes/Verbraucherpreisindizes.html](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amtwirtschaft_Umwelt/Preise/Verbraucherpreisindizes/Verbraucherpreisindizes.html), 30.03.2017, letzter Zugriff am 01. 04.2017.
- ③ (Verfasser und Titel unbekannt):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Indikatoren/Konjunkturindikatoren/Arbeitsmarkt/arb210.html>, (Zeit unbekannt), letzter Zugriff am 01. 04.2017.

指数<sup>①</sup>。工业显示出可信的商业前景，商业景气指数为 112.5 点。建筑业的产能利用率攀至新高峰，达到 78.6%。笼罩在建筑业上两个月的阴霾已经散去，3 月的商业景气指数好转。企业对目前的状况比二月份更满意，对未来 6 个月的发展更加乐观。而批发业的乐观主义减弱，零售业的商业预期降低。

2. 中国取代美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6 年，中德总贸易额以近 1700 亿欧元创下了新的纪录，中国所进口的德国商品总价值为 761 亿欧元，出口商品总价值为 938 亿欧元。贸易额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出口势头强劲以及德国对于中国商品需求的增加。德国与美、法两国的交易呈现贸易顺差，而与中国则有较大的贸易逆差。德国对外贸易协会（BGA）指出：鉴于美国新总统的保护主义计划，可以预见，在未来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会进一步扩展。

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法国，德法两国的贸易额为 1670 亿欧元，而 2015 年刚刚超越法国占据首位的美国在 2016 年降至第三位，双边贸易额近 1650 亿欧元。但美国依然保持着德国最大出口国的地位。2016 年有价值近 1070 亿欧元的德国商品销往美国，法国以 1010 亿欧元位列第二位。1961 至 2014 年法国一直占据德国最大出口国的地位，2015

年被美国超越。英国位于第三位，德国向英国出口价值 860 亿欧元的商品。同时，英国也是德国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顺差超过 500 亿欧元，美法以 490 亿欧元和 360 亿欧元分列亚军和季军。2016 年德国整体贸易顺差超过 2500 亿欧元。<sup>②</sup>

2016 年德国进出口均创新高。出口总额为 1.2069 万亿欧元。比上年增长 1.1%。进口总额为 9548 亿欧元，增幅 0.6%。

3. 德国柏林经济研究所（DIW）、慕尼黑 ifo 研究所、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哈勒莱布尼茨经济研究等研究机构于 2017 年初对世界、欧洲及德国的经济做出共同预测。<sup>③</sup> 预测结果是德国经济将连续五年适度增长。整体经济的产能利用率逐渐增大，生产能力也将超过平均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7 年的增长率将达到 1.5%（排除日历因素 1.8%），2018 年将达到 1.8%。失业率将从 2016 年的 6.1%，降低至 2017 年的 5.7%，2018 年将继续下降至 5.4%。消费者价格在 2016 年增长了 0.5%，2017 年的增长率将达到 1.8% 的高值，2018 年为 1.7%。公共财政盈余将有所减少。由于世界经济环境改善及欧元贬值，德国出口增长提速。

## 二、难民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 2017

① (Verfasser unbekannt): ifo Konjunkturtest März 2017, <http://www.cesifo-group.de/de/ifoHome/facts/Survey-Results/Business-Climate/Geschaeftsklima-Archiv/2017/Geschaeftsklima-20170327.html>, 27.03.2017, letzter Zugriff am 1.4.2017.

② Wurzel, Steffen: „China wichtigster Handelspartner“,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handelspartner-china-103.html>, 24.02.2017, letzter Zugriff am 20.03.2017.

③ (Verfasser unbekannt): „Aufschwung festigt sich trotz weltwirtschaftlicher Risiken: Gemeinschaftsdiagnose Frühjahr 2017“, in „DIW Wochenbericht 16 / 2017“, [http://www.diw.de/de/diw\\_01.c.100404.de/publikationen\\_veranstaltungen/publikationen/diw\\_wochenbericht/diw\\_wochenbericht.html](http://www.diw.de/de/diw_01.c.100404.de/publikationen_veranstaltungen/publikationen/diw_wochenbericht/diw_wochenbericht.html), 20.04.2017, letzter Zugriff am 21.04.2017.

年3月发布了题为“逃亡之后——通往就业的道路”的难民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情况的报告。<sup>①</sup>据估计2015和2016年共有120万难民涌入德国申请避难。2017年德国9%的登记注册找工作的人是难民或避难者，其中一半以上是叙利亚人。

报告指出难民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经验体现在：第一，劳动力市场状况是难民融入的重要因素；第二，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是长期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决定性因素；第三，加强语言促进措施是正确的；第四，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也是重点。

另外，报告对难民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提出了五点建议：

### 1. 改善融入管理框架

提高外国人管理局发放劳动许可决策的透明度，首先是通过系统整理相关数据；评估那些先锋项目在确定难民能力方面有效，并在联邦层面推行这些项目；观察最近降低避难申请者劳动力市场准入条件措施的实施情况及其对不同来源国已入德国籍难民的效果。

### 2. 加强各参与主体的合作

### 3. 为难民量体裁衣，提高融入措施的就业导向性

对于避难申请者和难民在语言促进方面制定的措施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高素质的难民；在融入课程的框架内提供关于

德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式及德国劳动习惯等方面的系统信息；继续支持雇主；扩大进修措施，特别是对那些素质相对较低的难民，并遵循长期导向的原则；加强与职业相关的语言促进措施，理想状态为在企业的环境中进行语言培训。

### 4. 确保法律不会阻碍难民融入劳动力市场

确保针对那些已开始在企业接受职业教育的难民的“3加2规定”在联邦范围内统一实施。

### 5. 在融入时继续保持公民社会原则

系统地大范围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指导项目。

## 三、行业、企业要闻

### 1. 大众公司盈利增长，工资下降<sup>②</sup>

2017年前三个月汽车市场的领导者大众公司在其家乡德国的销售量下降了4.3%，市场份额有所减少，但仍以18.4%的市场份额以及15.5万的销量位居德国汽车市场的首位。

2016年，尽管爆出“尾气门”事件，大众公司仍获盈利51亿欧元，销售额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2173亿欧元，销售量为1030万辆。“尾气门”事件也引起人们对高管薪酬的不满，已经辞职的前总裁Martin Winterkorn得到730万欧元的年薪。2017年2月大众公司的监事会决定改革管理者的薪酬标准。未

<sup>①</sup> (Verfasser unbekannt): Nach der Flucht: Der Weg in die Arbeit – Arbeitsmarktintegration von Flüchtlingen in Deutschland, <http://www.oecd.org/berlin/publikationen/nach-der-flucht-arbeitsmarktintegration-von-fluechtlingen-in-deutschland.htm>, 14. März 2017, letzter Zugriff am 28. 03.2017.

<sup>②</sup> Menzel, Stefan: Der Diesel verschwindet schneller, als wir glauben, <http://www.handelsblatt.com/unternehmen/industrie/automarkt-im-umbruch-der-diesel-verschwindet-schneller-als-wir-glauben/19616904.html>, 05.04.2017, letzter Zugriff am 05. 04.2017.

来公司总裁年薪将降至一千万欧元以内。其他董事会成员的最高年薪为 550 万欧元。

## 2. 汽车市场正经历突破——“柴油汽车消失的速度超过我们的预期”<sup>①</sup>

关于柴油发动机未来的持续讨论使得德国的柴油发动机销售数量减少。2017 年 3 月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柴油汽车的销售量明显下降，消费者对柴油发动机的信任降低。按照德国联邦机动车运输管理局（Kraftfahrtbundesamt KBA）的统计，柴油汽车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2.8%，占汽车总销售量的 40.6%，而这一数据在 2015 年秋季还是 50%。

柴油汽车销量明显下降的原因在于可能推行的柴油车禁行规定。例如：斯图加特市从 2018 年起，只要空气中的微尘含量超标，就要实施一些禁行措施，其中包括排放达不到欧 6 标准的柴油车。这样的禁行措施可能会在汉堡、慕尼黑、杜塞尔多夫等城市推广。因此，只要还没有出现吸引力较大的电动汽车，客户们就会转向购买汽油车。柴油车行业敲响了警钟。

汽车行业协会主席威斯曼指出：关于禁止行驶可能性的持续讨论使得开车人和购车人感到不安，但他强调最新的欧 6 标准的柴油具有干净和能耗低的特点。

## 3. 德国举办汉诺威国际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

2017 年 3 月 20 至 24 日德国举办汉诺威国际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本年度博览会以“数字经济——无极限”为主题，重点强调伴随数字化转换所带来的财富机遇，展示了数字化浪潮席卷经济和社会领域最切实可见的证据。展会的亮点包括：配备人工智能的小型公共汽车，能够回答乘客提出的问题；用于检测工厂及其设备的无人机；配备可持续性基础设施的智慧城市，能为居民提供各种新型服务等。日本是本届展会的官方伙伴国，派出 120 家企业参展。2017 年 3 月 19 日，德日政府联合签署《汉诺威宣言》，加强物联网与工业 4.0 领域的网络安全等 9 大领域紧密合作以联手推动第 4 次工业革命。

作者简介：徐丽莉，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sup>①</sup> Ebenda.

## 媒体新闻<sup>①</sup>

周海霞

### 一、中国向马克思故乡赠送雕像

德国媒体报道，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做出决定，在马克思 200 周年诞辰之际，接受中国赠送的高达 6 米多的马克思雕像。多家德国媒体就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媒体称，此前对这份来自中国的馈赠，特里尔各界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既有赞成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原因，另一方面有人认为雕像过高过大，影响城市美观。从党派分布看，社民党和基民盟 / 基社盟成员表示赞成，他们认为来自中国的馈赠是一份荣誉，同时该雕像预计会吸引更多中国游客的到来，因而也有益于特里尔市的旅游经济发展；而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则主要持反对意见，其出发点主要是对于中

国的政治偏见。最终特里尔市议会以投票方式决定接受该礼物：42 票赞成，7 票反对，4 票弃权。并且特里尔市政府还特意做了一个同等大小的木制雕像仿品，实地放置了一日，以便市民亲身感受雕像设置效果。德媒表示，接受雕像之后的相关具体事宜还有待进一步商谈。<sup>②</sup>

### 二、海航集团子公司收购德国哈恩机场事宜

海航集团子公司收购德国哈恩机场一事，受到德国媒体高度关注。2017 年 3 月初，海航集团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购得其所持哈恩机场 82.5% 的股份。德媒表示，此前也有一家中国企业曾与德方洽谈哈恩机场收购事宜，

① 本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② Vgl. Frasch, Timo: China verteidigt Statue als „freundliches Geschenk“, 15.03.2017,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inland/china-sagt-trier-haette-um-marx-statue-gebeten-14926083.html>, FAZ,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Vgl. ipp/AFP/dpa: Der riesengroße Marx aus China, 14.03.2017, <http://www.spiegel.de/kultur/gesellschaft/karl-marx-statue-in-trier-ein-geschenk-der-volksrepublik-china-a-1138653.html>, Der Spiegel,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Vgl. dpa/fin: Eine riesige Marx-Statue aus China, 14. 03. 2017, <http://www.zeit.de/gesellschaft/zeitgeschehen/2017-03/rheinland-pfalz-trier-karl-marx-statue>, Zeit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但2016年收购失败，疑因该企业具有欺诈行为。

关于此次哈恩机场收购一事，德媒的关注点之一在于海航收购哈恩机场后，现有工作岗位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有报道称，海航集团目前在该事情上没有明确表态，并称海航方面表示哈恩机场本就严重亏损，因而收购哈恩机场本身是要面临经济风险的。德国国内专家则认为，收购事宜很可能导致现有工作岗位受到冲击。同时，德媒指出，海航方面对于将来是否保留廉价航空公司Ryanair的业务，也没有明确表态。能够肯定的是，海航方面认为哈恩机场只有进行改革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同时海航方面表示，哈恩机场由于其位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是具有一定区位优势，因而计划将来对机场进行扩建。

根据德国媒体报道，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反对党（基民盟和选择党）对海航收购一事持批评态度，他们表示收购事宜可能会导致司法不确定性问题，以及认为收购事宜会产生高额的税费，以及导致工作岗位流失。

但是海航集团收购哈恩机场的交易并未真正完结，因为哈恩机场其余17.5%的股份持有者黑森州原计划向德国当地企业ADC责任有限公司转让所持股份，但是由于ADC公司临时发生股东变更，因而不得不推迟交

易时间，进而导致目前哈恩机场收购事宜再次处于停滞状态。交易何时进行，目前尚不清晰。<sup>①</sup>

### 三、中德经济关系上行预期及在华外国企业待遇问题

据德国媒体报道，欧盟商会的报告结果显示，外国在华企业担忧受到“不公正”待遇。该报告认为，“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目的在于提升中国本国企业的效率，并为先进工业领域和科技领域注入数十亿欧元的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国家又将起到突出的作用。报道声称，如果外国在华企业得不到更大的自由，欧洲在华投资将可能缩减。<sup>②</sup>

对于中国方面承诺将给予外国在华企业与中国企业同等的待遇，德国有的媒体持怀疑态度，但也存在更为乐观的声音。有报道称，根据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和普华永道近期发布的季度报告，有44位德国高管人士接受了访谈，其中2/3的受访高管都表示，鉴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基调，从中长期看，中德双边贸易必然会有所加强。报道称，从短期看，受访德国高管认为中国国际贸易额将会有所回落。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德国企业中，电子行业和机械制造行业的出口公司尤其担心他们在中国的业务量下

- 
- ① Vgl. dpa: Hahn-Investor aus China sieht Investitionsstau, 29.03.2017, <http://www.faz.net/aktuell/rhein-main/chinesischer-hahn-investor-sieht-investitionsstau-14948082.html>, Frankfurter Allgemeine Rhein-Main,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Vgl. jan/dpa: Verkauf von Flughafen Hahn perfekt (fast),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flughafen-hahn-rheinland-pfalz-unterzeichnet-kaufvertrag-hessen-nicht-a-1136948.html>, Spiegel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Vgl. (Verfasser unbekannt): Chinesischer Käufer sieht große Probleme am Flughafen Hahn, 29.03.2017, <https://www.welt.de/regionales/rheinland-pfalz-saarland/article163254817/Chinesischer-Kaeufer-sieht-grosse-Probleme-am-Flughafen-Hahn.html>, Die Welt,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 ② Vgl. dpa/ndo: Handelskammer bemängelt Diskriminierung europäischer Unternehmen, 07.03.2017, <http://www.zeit.de/wirtschaft/2017-03/china-industriepolitik-europaeische-unternehmen-diskriminierung>, Zeit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降，而消费领域、零售业和服务业则没有这种担心，这些行业的德国企业与中国的贸易额至少与上一季度持平，甚至有所增长。<sup>①</sup>

#### 四、德国 / 欧洲要求限制中国企业在德国 / 欧洲的并购行为

德国媒体涉华报道中与中欧 / 中德贸易相关的另一议题，则是德国 / 欧洲要求限制中国企业在德国 / 欧洲的直接投资。报道称，中资企业的并购行为让欧盟委员会十分担忧，因而计划针对所谓“违背市场经济规则”的并购案例实行否决权。媒体表示，欧盟委员会未来将对非欧盟国家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加强审查力度，并计划最迟在五月份出台相关草案。而欧盟委员会此举的原因主要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欧洲实施并购。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三国经济部长要求欧盟在更大范围内行使否决权，以保护欧洲高科技企业。据称，德国联邦经济部提交的相关文件表示，根据现行《对外贸易法》，德国政府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禁止外国投资者并购德国企业，特别是涉及军工技术或者安全技术领域时。但德国经济部认为，现有法律赋予德国政府的这些行为空间是不够的。

根据德国媒体报道，欧洲议会也给欧盟

委员会施压，要求欧盟委员会出台议案，抵制投资者的所谓“不公平”并购。近日，欧盟议会部分议员共同提交了一份议案，称当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威胁的时候，欧盟成员国虽然可以阻止境外投资。但是单纯的国家行政手段并不能保障竞争者们之间的公平竞争和相似的投资环境，因此欧盟需要更进一步地实施保护。他们的具体诉求是成立专管外国企业直接投资的欧洲委员会，负责对特别棘手的投资进行审核、检查和监控。尤其是在涉及交通、电信、健康卫生事业和水供给等事关战略利益的领域时，该委员会应拥有话语权。<sup>②</sup>

#### 五、两会议题：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军费开支预算增幅降低

中国两会动态是德国媒体涉华报道议程中必不可少的话题，今年的两会也是如此。尤其是对于中国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至6.5%左右，德国媒体予以高度关注。有报道认为，6.5%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低于以前，但也是很不错的，即使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6.5%，中国也依然位居全世界经济增速最高的经济体之列。并且报道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德国媒

① Vgl. Ankenbrand, Hendrik: Deutsche Manager erwarten mehr Handel mit China, 22.03.2017, <http://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agenda/deutsche-manager-erwarten-mehr-handel-mit-china-14936673.html>, FAZ,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Vgl. Ankenbrand, Hendrik: Pekings Versprechen, 16.03.2017, <http://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wirtschaftspolitik/kommentar-pekings-versprechen-14926509.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② Vgl. fdi/mik/dpa: EU will staatlich finanzierte Firmenkäufe verhindern, 27.03.2017,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eu-will-staatlich-finanzierte-firmenkaeufe-verhindern-a-1140563.html>, Spiegel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Vgl. mg/dpa-afx: EU-Kommission will Firmenkäufe aus China strenger prüfen, 27.03.2017, <http://www.manager-magazin.de/politik/europa/eu-kommission-will-firmenkaeufe-aus-china-strenger-pruefen-a-1140593.html>, Manager Magazin,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Vgl. Tauber, Andre: EU-Parlamentarier wollen Europa vor China schützen, 21.03.2017, <https://www.welt.de/wirtschaft/article163045836/EU-Parlamentarier-wollen-Europa-vor-China-schuetze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体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容忍低增长率，目的在于缓解债务负担方面获得更多行动空间。报道称，宽松的贷款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导致债务水平攀升以及房地产市场过热现象。<sup>①</sup>

中国军费预算的增长动态是德国媒体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的议题。此次关于中国两会的报道同样也如此。德媒称，中国2017年军费开支预计增长为7%，为2010年以来最低增幅。德媒同时表示，中国军备发展状况与美国的政策关联在一起，一旦中美之间关系紧张，中国政府会增加军费支出。德媒认为，此次中国降低军费开支增长幅度，是政府对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做出的反应。德媒揣测，面对目前的国际局势和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如

果不是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放缓，中国2017年的军费增长速度肯定不会如此之低。为了证明这一论断，报道称《环球时报》有文章提出，鉴于局势所需，中国军费开支预算增幅应至少为10%才行。<sup>②</sup>

同时，德媒表示，在全世界范围内，军费开支唯一高于中国的国家是美国，为前者的2.5倍之多。报道表示，尽管中国军费支出此次预计增幅只有7%，为20年来最低增幅，但是从军费预算绝对总量来说，此次军费规模则已经达到中国历史最高水平。

不过，与德国媒体一直以来关于中国实际军费支出的报道论调一致，此次依然有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军费问题，质疑中国实际军费支出增幅远高于7%。

作者简介：周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① Vgl. Lee, Felix: Die Grenzen des Staatskapitalismus, 6.03.2017, <http://www.zeit.de/wirtschaft/2017-03/china-wirtschaft-donald-trump-sorge>, Zeit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Vgl. Reuters/dpa/AP/suk: Chinas Wirtschaft soll schwächer wachsen, 5.03.2017, <http://www.zeit.de/politik/2017-03/china-volkskongress-li-keqiang-wirtschaftswachstum>, Zeit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② Vgl. AFP/dpa/Reuters/rav: China will Militärausgaben um sieben Prozent erhöhen, 4.03.2017,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7-03/volkskongress-china-militaeretat-steigerung-militaeretat>, Zeit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14.04.2017.

##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史笑艳

### 社民党总理候选人<sup>①</sup>

通过提名从布鲁塞尔回到德国的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作为总理候选人，社民党 13 年来第一次做好准备挑战多次连任的女总理默克尔及其所在的联盟党。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应该给政界带来新的活力，大家很想大声宣布，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士终于要开始承担责任了。然而，舒尔茨在论坛的表现及其在欧洲议会的做法却让人心生质疑。

舒尔茨主张在工资和税收方面更加公正、以鲜明的立场对待特朗普并且支持一个团结民主的欧洲，这些他都说到选民心坎里，选民们也纷纷对他表示感谢。现在，马丁·舒尔茨在自己的党内已备受爱戴。民意调查和党员人数的增加都表明，大家十分向往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民主党，即左翼全民党。这个政党不是进行自下而上的再分配，并将其粉饰成“现代经济政策”，就像当时格哈

特·施罗德的做法，而是勇敢地反对财产、社会影响力和发展机会方面的分配不均。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即便这些措施不足以让舒尔茨及其政党取得胜利，也会对民主大有益处。因为对于民主制度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多数公民都认为，所有稳固的政党都是支持有利于精英群体的相同政策的。这是把选民们推向各个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分子的一种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帮助特朗普在大选中取得了胜利。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不仅仅是在德国。

可是，马丁·舒尔茨真是一个合适的总理人选吗？在担任欧洲议会议长期间，这位总理府候选人并没有在支持税收公正、团结和民主方面作为带头人有任何出众的表现。尽管他很愿意做出如下指责，“一个小面包房在诚实地缴纳税金，而一个全球性的咖啡企业集团却把钱放在免税区里”，认为这样是不行的。然而，在卢森堡大型企业的税收交易被揭露之后，舒尔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

① Schumann, Harald: Ist Martin Schulz tatsächlich eine Alternative? 27.02.2017, <http://www.tagesspiegel.de/politik/spd-kanzlerkandidat-ist-martin-schulz-tatsaechlich-eine-alternative/19449140.html>, Tagesspiegel, letzter Zugriff am 10.04.2017.

容克联合一致，故意阻挠调查委员会的成立，以便让这位前卢森堡首相无后顾之忧。

在对待欧盟民主状态问题上，舒尔茨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当时，他一方面要求，“必须把欧盟委员会改建成一个真正的欧洲政府，并使之服从欧洲议会的监督。”另一方面，他眼看着这个议会在欧元国家的危机管理中逐步降级，却又毫不作为。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这“三驾马车”的专家治国论者采取的是“跨政府”行动，这些行动是背离所有民主监督的。他们在违反欧盟公约的情况下，实施了降低工资和废除劳动合同的措施。更为严重的是，虽然舒尔茨主张欧洲团结，可是他也支持德国联邦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大力推进的欧盟范围内的财政削减政策，而这项政策恰恰是欧洲分裂的根本原因。刚好，密歇根大学和洛桑大学的经济学家又再次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在这场危机中节省是多么不利的。他们的研究显示，如果没有在欧元区的五个危机国家进行强制性预算削减的话，这几个国家现在的经济会总共增长17%，而这个数字和这些国家负债率几乎是一样的。

政府支出在总体上调控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也以此调控国家的税收收入。只有德国人和德国的财政部长才坚信这样幼稚的信念，即治理一个国家可以和管理私人家庭预算一样。因此，他们宁可让基础设施破败不堪，由于缺少内需而保护其高无比的出口顺差，这样的出口顺差势必给其他国家带来赤字和负债。

这一切马丁·舒尔茨也清楚。但是，显然他对反对声音的畏惧要多过其愿望，因为凡是对朔伊布勒及其追随者的这些传统政策提出质疑的人都会被反对。然而，事情的关

键恰恰也在这点上。舒尔茨很喜欢说“犯错误不会有损声誉”，重要的是在意识到错误之后，去改正。舒尔茨的竞选胜利也将会带领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摆脱新自由主义的苦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新民族主义者也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 德国的性别角色分工

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这个节日起源于1911年3月19日在丹麦、瑞士、奥地利、德国和美国进行的女性示威集会。集会者主要要求给予女性更好的工作条件和选举权。

可惜到了21世纪，男女平等既没有在德国也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成为现实。自1918年以来，尽管德国的女性已经拥有了选举权，但是在议会中女性绝对只占少数（在巴伐利亚州议会中，只有30%的议员是女性）。男性和女性之间也仍然存在21%的工资差异，这一差异导致了养老金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女性在老年时期面临的贫困危机。<sup>①</sup>

目前，还没有哪个欧盟国家像德国一样始终保持着传统的男女角色分工，即男人赚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虽然，当今的女性接受过前所未有的良好教育，最终，大多数伴侣还是会遵从这种传统的角色分工，不管他们是否心甘情愿，在各联邦州这样的情况尤为普遍。在当前所有发达工业国家中，德国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程度是最高的，她们所面临的贫困风险也最为严峻。在德国，男性的收入平均比女性高出40%，他们的养老金比女性高出几乎60%，他们积攒下来的财产也相应更多。与此相反，约40%的单亲家长是贫困的，而这些单亲家长中90%是女性。父母津贴等家庭政策方面的措施也不会

<sup>①</sup> (Verfasser unbekannt): <https://www.muenchen.de/rathaus/Stadtverwaltung/Direktorium/Frauengleich-stellung/aktuelles/Internationaler-Frauentag.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5.03.2017.

给这种状况带来很大改变，因为这些措施被夫妻联合报税等法律拖了后腿。正是夫妻联合报税这样的政策使德国传统的男女角色分工根深蒂固。政策上不完善的后果可以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描述：身为女性，或者至少是身为妈妈，在经济上就是一种风险。通常当家庭破碎的时候，才是需要承担风险之时，而此时一切已经太晚了。

一项研究表明，约半数在 1962 年和 1966 之间出生的原西德女性将不得不靠每月低于 600 欧元的养老金生活。她们在生活上要么依赖其伴侣，要么很贫穷。她们女儿的境况也将不会有任何改善。

一直以来，在 82% 孩子小于六岁的德国家庭中，丈夫是主要的经济支柱。虽然现在大多数女性只是短时间为了家庭暂停工作，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母亲们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非全职工作的增长。在所有就业的母亲中，有 69% 没有全职工作，她们每周平均工作 18.5 小时。在欧洲范围，这样的工作时间是非常少的。在欧洲其他国家，她们每周要工作 25 小时或更多。

很多母亲也许只是把非全职工作视为一个过渡性解决办法，然而研究表明，她们重获全职职位是非常困难的。这样一来，63% 的 30 岁至 50 岁之间的已婚女性每月的净收入都低于 1000 欧元。与之相应，她们的养老金也较少。德国联邦家庭部一项研究结论指出，对于这些女性中“很大一部分人”来说，“在她们经历的风险和后果中，婚姻是加强其依赖性，并且危及其生存的”。相反，男性通常都在这段时间确定了其职业和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否已婚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以克

里斯蒂娜·费希特为例，在她收到的最新年度养老金通知单上写着：当她年老时，每月预计会得到 316.60 欧元的养老金。费希特女士和前夫以前是按照传统的家庭模式生活的：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她前夫作为个体 IT 顾问赚钱养家。现在，他们最小的儿子 18 岁了，他们的婚姻解体了，而费希特的账户空空如也。<sup>①</sup>

## 巴伐利亚州重新实施高级文理中学九年制 (G9)

2017 年 4 月 5 日基社盟州议会党团通过了州政府的教育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即将在今年秋季升入高级文理中学的四年级学生将会是重新实施高级文理中学九年制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但是，如果这些学生仍然想在就读高级文理中学八年之后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他们是可以跳一级的。

在基社盟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大家进行了多年的辩论。在 2004 / 2005 学年，时任州长基社盟的埃德蒙德·施托伊贝尔通过就读高级文理中学八年后参加毕业考试的制度 (G8) 之后，许多家长、学生和教育家们都要求重新实施高级文理中学九年制。高级文理中学八年制被人们批评为未经深思熟虑且操之过急的方案。现在，通过批准这项新的改革，党内关于应该如何对待这种持续批评的争论也告一段落。

高级文理中学九年制将会在 2018 / 2019 学年针对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开始实施。在推进这项政策的同时，基民盟也一致通过了针对所有学校类型的一揽子教育方案。在

<sup>①</sup> Dahlkamp, Silvia/Hülßen, Isabell/Müller, Ann-Katrin/Seith, Anne: Reden ist geld, in „Der Spiegel“, Nr. 3/14.1.2017, S.10-16.

接下来的几年中将总共创立 1800 多个额外的教师职位。高级文理中学会增加约 1000 名教师，其他的学校类型会增加 800 多名教师。尤其是在特殊教育学校将会设立新的职位。此外，还将会设立 150 个管理人员的新职位，从而减轻校长们的负担。

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社盟的霍斯特·泽霍费尔把这项改革方案称为历史性的“面向后代的决定”。在他看来，这一决定会对整个德国产生示范效应，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将这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他认为，学生们可以自愿在就读八年高级文理中学之后参加高中毕业考试是一项特别重要的规定。

通过相应的刺激政策，基社盟希望足够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级文理中学九年制。按照新的九年制规定，高级文理中学在下午讲授的课程将会显著减少。信息学将会成为必修课，其他学科也会得到相应加强。巴伐利亚州文化部长基社盟的路德维希·施班勒（Ludwig Spaenle）说：“现在的这项政策将会 25 年有效。”

过去，几乎所有的德国联邦州曾经一致同意实施高级中学八年制的国际标准。但是

之后，个别联邦州或者部分或者全部又回归了高级文理中学九年制。除了巴伐利亚州，下萨克森州也实施了高级文理中学九年制。在下萨克森州，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也同样可以跳一级，在完成八年高中学习之后参加高中毕业考试。在黑森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适用于自由选择制：通过家长投票表决，各个班级可以自己决定选择高级文理中学八年制还是九年制。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提供两种方案：高级文理中学八年制，其他学校类型九年制。在巴登-符腾堡州有 44 所中学是在九年之后进行毕业考试。在前东德的各联邦州则仍然继续规定就读高级文理中学八年之后举行高中毕业考试。<sup>①</sup>

巴伐利亚州在 15 年之后再次通过了高级文理中学九年制的政策，这项政策得到了巴伐利亚州教师联合会的赞赏。教师联合会主席米夏埃尔·施外戈尔（Michael Schwägerl）认为：“多出来的一年学习时间将会对学生有利，会带来极大的可持续性、知识强化的更多可能性，并且会进一步提升高级文理中学的教学质量。”<sup>②</sup>

作者简介：史笑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① dpa, AFP: Bayern führt G9 wieder ein, 05.04.2017, <http://www.zeit.de/gesellschaft/schule/2017-04/abitur-bayern-g9-reform-wiedereinfuehrung>, Die Zeit, letzter Zugriff am 10.04.2017.

② AZ/lS: Experiment gescheitert: Bayern kehrt zum G9 zurück, 05.04.2017, <http://www.abendzeitung-muenchen.de/inhalt.nach-15-jahren-experiment-gescheitert-bayern-kehrt-zum-g9-zurueck.a0a102f3-4ca5-4226-a61f-5b831a0904db.html>, Abendzeitung, letzter Zugriff am 10.04.2017.



# 热 词 诠 释



# Putin-Versteher 和 Populismuskeule

徐四季

## 一、普京理解者 ( Putin-Versteher )

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主流媒体和民众在如何看待俄罗斯和普京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甚至出现了看法截然对立的局面：主流媒体旗帜鲜明地亲美反俄，要求政府对俄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德国记者对于普京的厌恶充斥着他们的报道，从报纸、广播到电视节目，到处是对普京的攻击和丑化——因为在他们看来，普京是破坏国际秩序的恶人，是限制言论自由与打击国内异见分子的专制者；这和记者们从小接受的言论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然而，德国民众却对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是否还能把自己视为民主、自由与法治的代言人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从关塔那摩监狱、美国无人机对平民的杀害、美国国安局的窃听案和对斯诺登的追捕等事件看到了美国的言行不一；他们没有忘记德国也曾参与的科索沃战争以及美国与西方国家近年来对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认为西方现在对俄罗斯的批评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对此心生反感。除了普通民众之外，德国一些知名人士也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俄方的理解，认

为俄罗斯的行为是因为美国和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欺人太甚；但他们很快遭到了德国主流媒体的集体围攻，并被贴上了“普京理解者”的贬义标签。

德国的各个政治派别——从左翼到中翼再到右翼——都存在“普京理解者”，代表人物有：

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 ( Gerhard Schröder ) ( 社民党 )：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挚友关系；他强调，俄罗斯在整体战略上对德国很重要，而不仅仅是因为天然气供给。

女权主义代表爱丽丝·史瓦泽 ( Alice Schwarzer ) 为普京辩护，因为“这些天我们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事实歪曲”。

基社盟副主席彼得·高维乐 ( Peter Gauweiler ) 说，“我们支持同俄罗斯合作”；这里的“我们”包括整个基社盟。

北威州基民盟主席艾敏·拉舍特 ( Armin Laschet ) 抨击德国的“反普京民粹主义”。

选择党副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 ( Alexander Gauland ) 在外交政策文件中写道，俄罗斯“从未从失去其文明发源地‘神圣基辅’的痛苦中走出来”。

左翼党副主席萨拉·瓦根克内希特 ( Sa-

rah Wagenknecht) 认为, 是的, 普京的所作所为并不都对, 但德国的外交政策如果现在谴责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就是“虚伪的”。

联邦政府同俄罗斯、中亚和东部伙伴关系国家民间合作协调员格诺特·埃勒尔 (Gernot Erler) (社民党) 撰文要求: “停止攻击俄罗斯!”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君特·费尔霍伊根 (Günther Verheugen) 使用了普京的词汇, 将乌克兰新政府成员称为“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

## 二、民粹主义大棒 (Populismus-keule)

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 主张普通民众的权益, 相信普通大众的智慧。民粹主义针对精英主义, 认为掌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建立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 因此民粹主义者往往都是反精英和反建制的。民粹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对普通民众不利, 对统治精英有利, 因此也反全球化。

民粹主义一般在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国家会有较大发展。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只有通过选票才有可能改变他们反对的政府和政策。但也正因为如此, 民粹主义往往会被一些有野心的政治家所利用, 成为他们谋取个人利益的一种政治手段, 俗称“民粹主义大棒”。

这些政治家一般都有较强的个人魅力, 总是讲老百姓爱听的话, 并做出许多不切实际的承诺以求当选。有意思的是, 这些政治家往往本人是民粹主义者所反对的精英中的一员, 比如说像特朗普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这样的巨富, 但他们却能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这或是因为他们的经历能引起民众的共鸣, 比如说出身平民却取得了成功; 或是因为他们的成功让老百姓认为他们有能力解决问题; 或是因为老百姓只是在追星, 他们真正反对的不是精英, 而是自己不能成为精英。也正因为如此, 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 其政策主张只反映当时民众的心理状态和流行观点。

尽管民粹主义者反对全球化, 但这并不代表民粹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强调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 认为民族利益至上。从这点看, 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张更接近。英国脱欧支持者都说要“赢回英国”, 和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如出一辙。很多脱欧支持者并不反对自由贸易, 他们反对的是移民和难民,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受到了威胁, 而是他们感觉本民族 (种族) 的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了威胁。左翼政党一般都反对自由贸易, 但由于他们坚持公平正义的理念, 却不反对移民。这就是为什么, 英国右翼的保守党有很多人支持脱欧, 反而是左翼的工党支持留欧。

作者简介: 徐四季,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 博士。

# Identitätsmanagement 和 Gesinnungsethik

关海霞

## 一、Identitätsmanagement

Identitätsmanagement 简称 IDM，中文名为：身份管理。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国家的公民，家庭的成员，公司的员工，银行的成员等。这些身份通常是由不同 ID 在一定范围内的唯一性标识。在社会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相互介绍传递信任关系以外，一般会用不同的证书来证明所拥有的身份，例如身份证、员工卡/工作证、户口本、银行卡等。证书一般都难以伪造，避免了身份仿冒。但是，随着科技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一方面我们在网络上拥有越来越多的身份，比如 qq 号码，MSN 号码，BBS 用户名、电子邮件账号、博客名、微信账号等等；另一方面网络上的这些身份逐渐与现实中的身份有越来越多的关联和互动：网络上的账号可以关联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比如支付宝。因此，身份的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涉及公民隐私、财产安全、网络运营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与身份管理相关的网络侵权、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可以看出，现

有的身份管理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所谓的身份管理就是借助包含技术、运行和法律不同方面的系统和方法的组合，来完成的对于身份的各种操作，包括结构化生成、捕捉、句法表示、存储、加标签、维护、检索、使用和销毁。<sup>①</sup>

不管在现实世界，还是数字化世界里，身份管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根据 ISO/IEC JTC 1/SC 27/WG 5 A 框架对 IDM 的解释，“身份管理”包括：

- 个体的验证过程（包括选择性身份验证）
- 个体验证相关的信息
- 身份的安全管理

这些个体包括比如人、动物、仪器、物体、团队或组织等等。作为个体可能有多个身份，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 X.1252 文件，“身份管理”被定义为个体属性的管理（比如客户、仪器或供应者）。虚拟身份管理不是指让某人的身份合法化，更多的是以下相关内容：

- 使用范围（包括组织机构或同组织结构相关的范围）
- 身份的生命周期
- 含数据的媒体

①（作者不详）：《身份管理（IDM）策略思考》，<https://wenku.baidu.com/view/2dccbcbfa1c7aa00b52acbb1.html>，2009，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25日。

- 数字储存系统（比如目录、数据库等）
- 获取资源的义务、责任、特权和权利的角色联系
- 改变后的身份信息的管理和保护
- 身份的不同角色的分配和管理

用户在进行网络活动时，根据不同的访问类型，需要提交不同的用户身份信息（如用户的医疗信息、教育信息、收支情况、社会保险、税收数据等）。建立起完善的身份管理系统，可以有效地获取相关数据。通过对身份管理相关的网络活动进行分析、提炼，就可以得出一个国家宏观和微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也可以根据公民的税收情况，国家物流组成和流向等，得出我国社会经济构成，国防开支等信息。因此，建立身份管理系统可以有利于国家掌握总体经济情况。

对于企业而言，通过身份管理系统，企业或个人的网上交易行为的信用记录将被全面、准确的记录。从而使电子商务更加可靠，网络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另外，身份管理系统能够使物质或信息流动更加快速。对于企业来说，准确、及时地获取所需的信息和物质，是商业企业提高竞争力，降低经营成本的关键因素。建立安全的身份管理系统，物流和信息可以在各个环节都具备可追踪性。所以，建立身份管理系统可以让企业更好地展开业务。

身份管理系统的建立也可以为个人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身份管理系统的关联，自动为消费者提供，无需像以前那样，用大量人力支持。

## 二、Gesinnungsethik

Gesinnungsethik 是由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源于韦伯《学术与

政治》一书。Gesinnungsethik 是一个非常难以恰当翻译的概念。英文有将其译为 ethic of ultimate ends——终极目标的伦理；ethic of conviction——信念伦理；ethic of intention——意图伦理，等等。在中文中，现存的译法有三种，分别是李永炽的“心情伦理”，林毓的“意图伦理”以及高承恕的“信仰伦理”。目前较为通行的译法为“信念伦理”或“意图伦理”。所以，在这，我们采取了“信念伦理”这一译法。

信念伦理具体来说，其实是一种道德理论。它是根据行为人的行为目的和实现自我价值和原则的方式，来评价行为人的行为，它不会考虑这些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根据该理论，行为者只关心信念本身，只考虑善的动机，导致的后果只是上帝的安排，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徙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和这个概念相对立的则是韦伯提出的另一个理论——“责任伦理”。韦伯把政治家的伦理分为水火不相容的信念理论和责任理论。信念理论不考虑行为的后果，只考虑行为本身；而责任理论考虑行动后果的价值，从而将行动获得实现的机会以及结果一并列入考虑。韦伯非常推崇两者的结合，他说：“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为，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sup>①</sup>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别关键不在“行”上，而在“知”上。二者的区别在于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认识方式根本不同。“信念伦理”对于道德的认识是平直的，看待事物的眼光是直线式的，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信念伦理坚决相信常人的道德判断力，毫不犹豫地相信常规眼光，以为仅

<sup>①</sup>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16页。

凭“肉眼”（即常规之眼）就足以认清是非善恶（儒家所谓“道不远人”“伦常日用即是道”），以为只要确保天真纯朴之心就不难弄清何谓善何谓恶。

其实，韦伯关于 *Gesinnungsethik* 的论述的理解，不能执着于字面，而应透过字面上颇多抵牾的论述，发掘出他的真意所在。

作者简介：关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 政治舞台



# 德国政治研究在中国

刘立群

**【摘要】**从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中国学术界对德国政治的研究开始起步，尤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丰硕成果，涉及当代德国政治各个方面，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为中国的德国研究事业做出了有益贡献。研究德国政治对于了解德国、加强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各国交往十分重要。本文较全面介绍和梳理中国学术界对德国政治研究的概貌。

**【关键词】**德国政治研究 中国

## 一、基本情况

为纪念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45周年，笔者写有“德国外交研究在中国”一文（发表于《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第8辑）。本文则聚焦德国政治即内政研究在中国的成果。其中若干基本情况及一部分出版物与该文有所重叠，本文不再赘述。

从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中国学术界对当代德国政治的研究开始起步，尤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愈益丰硕的成果。迄今中国学术界共出版研究德国政治的学术专著20余部，学术论文共几十篇，涉及德国政治的各个方面，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有助于全面了解和准确理解德国政治体制、历届政府的政策主张以及德国各

党和各界的态度和背景。

在中国德国研究会出版的12部年会论文集中，对德国政治的研究成果占有一定比重。德国政治体制及其特点既有和西方其他国家政治体制相同和相近的一面，也有不大相同、较为特殊的一面，这与德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 二、学术著作

近30年多来，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政治的研究从无到有，不断扩展和深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以下对这些学术著作依次做简要介绍：

1. 钱端升著《德国的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62页）一书原由商务印

书馆于1934年初版，是著者庞大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成果，著者原计划把英、美、法、德、日、俄的政府合著成一本书。此书对德国宪政史和德国政治体制的架构与运转进行了较深入的阐述，尤其详尽考察了《魏玛宪法》这一德国宪法史上的里程碑。著者钱端升（1900—1990年）为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教育学家。此书共13章，分别介绍德国宪法史、德国人基本权利和义务、政党、魏玛共和国总统（书中把Reichspräsident一词音译为“莱希总统”）、政府、议会、法律及法院、联邦制度、各州政府、地方政府等。此书对于研究德国宪法史及魏玛共和国政治体制等有较大参考价值。

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48页）一书署名为“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版权页注明“内部发行”，此书是1972年与联邦德国建交后为了解其政治体制而编写的，是1949年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有关联邦德国政治的著作。该书共12章，标题分别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联邦总统；联邦政府及其总理；联邦政府各部；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法院；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联邦德国的政党和议会政治概貌；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附录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全文）。

3. 吕耀坤著《德国政治制度》（时事出版社，1997年，281页）一书介绍和论述了德国联邦制的由来与发展，德国的宪法——基本法产生的背景、内容、特点及历次的修改和补充，德国的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联邦总统和联邦政府的产生和职责，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其机构，德国的官员制度等，并对十六个联邦州和主要政党一一做了概述。

4. 吴志成著《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德国和瑞士》（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395页）

一书是俞可平主编的《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之一种，其中第1—7章题为“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第2—212页），各章标题为：1）联邦德国的概况与历史沿革；2）联邦德国政治制度的一般基础；3）联邦德国的行政制度；4）联邦德国的立法制度；5）联邦德国的司法制度；6）联邦德国的政党制度；7）联邦德国的公务员制度。附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节选）。

5. 顾俊礼著《德国政府与政治》（台北市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440页）一书是台湾大学李炳南教授主编的《比较政府与政治》丛书之一种（在大陆没有出版）。此书详尽介绍了有关德国政府及政治和司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共有13章。其标题分别为：1）德意志国家的建立与发展；2）德国的重新统一；3）德国宪法——《基本法》；4）德国议会——联邦议院与联邦参议院；5）联邦政府与联邦总理；6）国家权力的象征性代表——联邦总统；7）司法制度；8）联邦制中的地方政府；9）选举制度；10）政党与《政党法》；11）宪法体制中的利益集团；12）公务员制度；13）大众传播媒介与舆论调控。

6. 甘超英著《德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307页）是一部全面阐述和介绍德国议会制度的专著。本书共分八章，其内容包括：德国代议机构简史、国家政治制度概况、选举制度、联邦议院议员、议会的组织、联邦议院各委员会、联邦议会的职权等。

7. 辛蕾著《融入欧洲——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321页）一书主要从历史变化角度梳理德国一百多年来政治巨变，包括各时间段内的社会趋势、政治取向、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以及政治人物立场之间的互动作用，对德国从分裂到统一的原因及其如何融入欧洲进行了详尽剖析。三章标题分别为：战争与失国——民族主义的实践与教训（1871—

1949)；建设、整合与立国——民主的努力与收获(1949—1990)；一个正常的欧洲民族国家(1990—)；结束语题为“融入欧洲”。

8. 陈志斌著《德国政体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579页)一书全方位探讨德国的三大立国支柱即政党制、普选制和议会制, 附有很多表格及德文原文术语。全书共有9章, 标题分别为: 战后德国问题; 政治制度的基础; 政党制度; 选举制度; 议会制度; 政府制度; 司法制度; 联邦制; 大众媒介——第四种权力。此书为教科书体裁, 在每章后面附有“思考题”便于学生研读和思考。

9. 蒋劲松著《德国代议制》(全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一书详细阐述德国从公元911年到1934年政体的起源和演进, 主要围绕代议制的起源、形成和变革, 采用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书中内容涉及德意志第一帝国(962—1806年)的政体, 代议制的起源; 德意志邦联的宪法及政体; 德意志邦联前期第一次和第二次立宪大潮中出现的各邦宪法及其封建代议制; 1848年德国革命及法兰克福宪法; 普鲁士宪法及其封建代议制; 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1918年)宪法的制定; 俾斯麦宪法及其代议制的实施; 1918年11月革命及魏玛宪法的制定; 魏玛宪法及现代代议制的实施; 对德国二元立宪君主制的系统分析; 对魏玛议会制失败的经验教训做了多学科分析和阐述。

10. 崔英楠著《德国政党依法执政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 270页)一书从宪政的视角勾勒了德国政党产生比其他西方国家晚, 最后以政党政治重建的历史, 分析了德国政党政治的法制化现状; 论述了德国宪政体制和联邦宪法法院在德国政党政治法治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讨论了德国政党的宪法地位问题; 论述了德

国政党的权利、政党自由与政党平等宪政保障; 阐述了德国政党党内民主和政党公开的宪政体制; 最后探讨了德国政党财政问题宪政规制。

11. 王芝茂著《德国绿党的发展与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年, 223页)一书介绍德国绿党历史的发展变化和实践中的政策纲领演进及其相互关系, 揭示了绿党如何通过调整和革新自身的行动方式、政策纲领, 以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现实及新的要求, 实施和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第一章“德国绿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从运动党到执政”叙述绿党从新社会运动产儿到逐步迈入德国地方议会、联邦议会和欧盟议会的历程, 直至成为两届联邦政府执政伙伴。其他各章分别阐述德国绿党的绿色生态原则、经济社会外交科教等各方面政策主张以及其政策变化与党内斗争和现实政治关联等。

12. 邓红英著《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年, 247页)一书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角度研究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问题。该书认为, 民主德国长期回避和忽视民族利益是它最终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此书分五个阶段具体探讨了民主德国的德国政策的确立背景、政策内容及其演变历程, 深入分析了政策的实施效果, 并指出了民主德国的经验教训对世界及我国的启示。

13. 傅安洲、阮一帆、彭涛著《德国政治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0年, 328页)一书是傅安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德国政治教育及其对当代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借鉴价值研究”的最终成果, 全书共七章, 26万多字。德意志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较为彻底地清算了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 深刻吸取了惨痛教训。此书关注和系统研究德国如何通过构建国家政治教育体系来促进政治文化转型, 从而实现了民众思想

深处的深刻变化。各章标题为：1，封建君主专制时期的“国民教育”；2，魏玛共和国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3，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治教化”；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主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5，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的思想渊源与基本理论等。

14. 童建挺著《德国联邦制的演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293页）一书根据作者在德国收集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运用突出政治行动者作用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德国联邦制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机构设置及联邦与州在立法、执行及财税等领域的权力划分的变化及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联邦制怎样影响联邦和州政府与政党的政治活动者，以及他们怎样在政治实践中运用联邦制的制度规定或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从制度上改变联邦制的内容这三个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1949年到2009年德国联邦制的发展过程、原因及其影响，并对其发展动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5. 张千帆著《法国与德国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459页）一书是研究欧洲宪政和比较宪法的学术专著，是“西方宪政体系”丛书之一种。此书第一和第二章介绍法国宪政，第三章到第九章介绍德国，各章标题为：联邦德国的《基本法》与宪政法院；德国的联邦国体；法治国体下的三权分立和议会政府；政党国体和自卫民主；社会国体下的经济自由；德国《基本法》的人格与权利保障；联邦德国的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16. 刘立群著“德国政治文化：当代概观”作为邝杨、马胜利主编《欧洲政治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一书第四章（第158—208页）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德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涉及德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和基本特点、战后两个德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极左翼和极右翼政治亚文化、生态运动与和平主义运动、民族认同

与融入欧洲等诸多内容。

17. 李骏阳著《德国的统一（1989—1990）》（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174页）。1990年10月3日，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给欧洲各国造成深重灾难的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完整的主权国家。此书作者当时在柏林经济学院研修一年，亲身经历了德国统一的全过程。此书叙述了此过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反映了当时德国人民尤其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老百姓所经历的巨大变迁和喜怒哀乐，再现了真实的历史场景。

18. 顾俊礼编著《列国志德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版）一书第二章“历史”（第51—96页）主要介绍德国的政治发展史，第三章“政治”（第97—160页）介绍德国政治及司法体制的基本情况。

19. 黄蕊著《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92页）。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大党，自二战结束后，它开始了一个系统有效的政党现代化过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改革路径。本书从德国社民党的重要纲领更替，政党组织嬗变，不同时期执政比较，政党的社会经济政策转型，政党与社会组织、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调整，全球化对政党的影响这六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挑战、相应的政策调整以及自身发展历程。

20. 阮一帆著《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发展历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249页）一书研究德国政治教育国家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两德统一前的发展史，以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为背景，以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建立、发展为线索，围绕其组织机构的演变、政治教育工作方式的变化以及重大政治教育主题的变更三个主要方面，探讨该机构自1952年成立起到1990年两德统一近40年的成败得失，探究了政治教育在

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转型与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若干部研究欧盟绿党的著作也涉及德国绿党,包括郇庆治著《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东国著《绿党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等。

若干部研究欧洲社民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著作也都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包括:刘成、马约生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缘起与演进》(重庆出版社,2006年),郇庆治著《当代欧洲政党政治——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史志钦著《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何秉孟、姜辉、张顺洪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与德国、瑞典学者对话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等。

迄今已出版多部有关德国政治家的传记著作,尤其是默克尔总理的传记,其中既有中国人编写的,也有翻译的;此外关于德国政治领域还有多部译著,本文均暂不介绍。

对德国政治的介绍及研究成果还体现在两个系列年度研究报告中:1)《欧洲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和中国欧洲学会共同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自1997年起至今每年出版一部。2)《德国发展报告(蓝皮书)》(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从2012年起至今每年出版一部。

### 三、研究重点及热点问题

对德国政治研究的论文数量要比对德国外交研究的论文少很多,这主要因为德国政治问题主要是德国自身内部的事务,不像其外交政策对我国及世界的影响那么大,受重视程度因此较低,此外也与德国政治体制变化很少、热点问题不多有关。迄今国内学术界对德国政

治研究的重点及发表的部分论文如下:

1.对德国政治体制研究的论文有:“浅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体制特点”(连玉如)、“德国联邦制改革与欧洲整合深化”(辛蕾)、“德国现行选举制度及其特点”(蒋锐)、“德国联邦议院党团法律制度研究”(程迈)、“论德国联邦议院议席分配制度与选举平等原则”(祝捷)等。

2.对德国各届政府执政情况研究的论文有:“德国大联合政府执政中期评述:从和谐走向冲突”(王广成)、“德国大联合政府的政策走向”(顾俊礼)、“2005年德国大选结果的经济、社会视角剖析”(丁纯)、“黑红联盟的形成”(童天齐)等。

3.对德国政党问题的研究始终是对德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方面,论文有:“略论联邦德国政党体制的演变”(顾俊礼)、“德国政党力量的消长与政党格局的重组”(李乐曾)、“1995—1996年德国政党形势回顾与展望”(郭小沙)、“绿党与红—绿联盟”(顾俊礼)、“联邦参政后的德国绿党”(俞小萱)、“世纪之交的德国政党态势与2002年大选前瞻”(李乐曾)、“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张文红)、“德国盗版党的兴起及其影响”(杜卫华、蒋颖)、“从各党竞选纲领看(2013年)德国大选”(李微)、“从2014年州议会选举看德国东部政党格局的变迁”(伍慧萍)、“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由‘纲领党’到‘选举党’的转型”(王存福)、“德国左翼党与2015年希腊债务危机”(陈弢)、“演讲制度主义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变迁”(薛松、柏兴伟)等。

4.有关德国政治文化及社会思潮研究的论文有:“论德国当代政治文化若干特点”(刘立群)、“对德国处理历史问题的几点思考”(孙恪勤)、“德国极右翼势力问题探究”(刘立群)、“新世纪以来德国文化的发展特点与趋势”(胡春春)、“德国极右翼势力的现状、

成因及影响”(杨云珍)、“德国与二战阴影”(殷桐生)、“经济危机以来德国社会思潮的新动向”(杨云珍)、“政治的社会心理环带——评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殷桐生)、“民族认同意识与社会自知意识交织下的民主德国人对德国统一的心态”(殷桐生)等。

5. 有关难民和移民问题的论文有:“德国移民法草案的推出及其经济与社会原因”(池正杰)、“战后欧洲移民问题及移民政策趋势分析——兼论德国在欧洲移民政策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陈南雁)、“德国难民危机政策探析”(黄萌萌、刘立群)、“难民危机对于德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伍慧萍)、“德国难民政策的历史与现状”(唐旻)、“穆斯林移民在德国及其社会融入”(胡雨)等。

6. 对政治家介绍和研究的论文有:“德国第一位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王剑南)、“逆时代潮流而思的现实政治家俾斯麦”(包向飞、刘靛)、“约阿希姆·高克——从牧师到总统”(潘天宇)等。

7. 有关德国军事方面的论文有:“面向 21 世纪的德国军事改革”(沈国梁)、“德国如何看待战争手段”(于芳)等。

#### 四、结 语

迄今国内对德国政治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并要继续努力。关于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笔者提出以下若干思考。

1. 德国基本政治体制有和其他西方国家基本相同的一面,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文

化背景,也有其较为特殊的一面。此外,尽管自战后以来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相当稳定,变化很少,但毕竟还是有一些改革变化。这些都需要不断研究。此外,还要研究德国政治体制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例如德国议会选举的 5% 门槛即参选政党必须获得至少 5% 选票才能进入议会这个规定目前已经被多个中东欧国家采用。

2. 德国政党在德国政治中起着核心作用,对德国政党研究是德国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迄今研究最多的是社民党,其次是绿党,而对基民盟和基社盟以及自民党这几个重要的传统政党则缺少专门而深入的研究。除了需要继续研究主要政党及其政策变化以及政党格局的变化等问题之外,近些年出现若干新党,包括昙花一现的“盗版党”、目前势头较猛的“德国选择党”,还有其他若干历史较长的极右翼政党等,也都需要认真细致地加以研究。

3. 需要加强对德国政治文化广泛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政治文化堪称政党生存及政治家活动的土壤,对政治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不大相同,同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德国政治文化有其一系列特有之处,对其内政乃至外交政策都产生很大影响。

4. 需要加强对德国学术界政治理论及政党理论等问题的介绍和研究。德国是思想家的国度和理论的国度,德国的政治理论具有哲理性强的突出特点,与英美的经验主义、行为主义为主要特点的政治理论有较大不同,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外交观察



# 民粹主义的前世今生

吴兴唐

**【摘要】**从英国公投脱欧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全世界掀起“民粹主义浪潮”。现代民粹主义的崛起给世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涉及各大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涉及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命运如何发展等重大课题。因而需要全方位地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民粹主义 反建制 精英政治

世界掀起“民粹主义浪潮”，给世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民粹主义反建制、反精英政治、反全球化。全球化有正能量和负影响，对全球化要有准确的认识。全球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种问题，主要祸根在于新自由主义。美国要把全球化变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国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创建者、贡献者和改革者。中国提出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格局，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赏。

从英国公投脱欧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全世界掀起“民粹主义浪潮”。现代民粹主义的崛起给世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涉及各大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涉及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命运如何发展等重大课题。

民粹主义是一个含糊和宽泛的概念，包含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治

国执政理念，不同的产生根源。而且，民粹主义既是思潮、理论，现在又是一些政党的政纲和一些国家的执政理念。因而需要全方位地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和研究。

## 一、民粹主义的起源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理论和社会运动，最早起源于19世纪60到70年代的俄罗斯。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展，但小生产仍占优势。一些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身穿农民服装，到农民中间去宣传他们的革命思想，企图发动农民起来推翻沙皇统治。他们认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而不是无产阶级，只有发动农民组织“村社”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他们认为历

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群氓”只能追随英雄人物。他们主张采用个人恐怖手段取得政权。“民粹派”在当时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们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民粹派”在遭受沙皇政府镇压后，蜕化为富农利益的代表，同沙皇政府妥协。

列宁揭露了“民粹派”的“人民之友”的伪装，从思想理论上深刻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的世界观、政治纲领、经济观点和斗争策略。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兴起后民粹主义就销声匿迹了。

在工业发达的欧洲国家，当时的民粹主义影响微乎其微。当时欧洲流行的思潮是带有某些民粹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一个典型例子是巴枯宁。巴枯宁最早是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后来在德、英、法、意等国进行社会活动，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一套理论观点被称为“巴枯宁主义”。“巴枯宁主义”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陷于破产的小私有者的恐慌心理和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现代民粹主义从思想体系上来说，同古典民粹主义有传承关系。但现代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同现代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因而同古典民粹主义又有原则区别。

现代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三反”：反建制、反精英、反“政治正确”。民粹主义反建制，就是要改变或颠覆现行政治体制，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规则。但民粹主义的反建制，并不是要推翻西方民主制度，只是“在制度内造反”。

现代民粹主义另一特征是反全球化，把西方国家制度上产生的弊端，和国际上的贫富差距等统统归咎于全球化。民粹主义利

用“信息化”，用网络直接诉诸民众，对其兴起了重要作用。民粹主义提出的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确系现实问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由“精英集团”组成的传统政党，以“政治正确”自居，热衷于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所谓“轮流执政”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换汤不换药，全然不顾民众的诉求。民粹主义的出现，政党格局发生变化，应引起传统政党的反思，正视现实问题，调整其战略和政策。

## 二、全球化的正能量和负影响

民粹主义以反全球化为旗帜。他们把经济危机、债务危机、产业空心化、失业增加、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收入下降、发生难民潮，都一股脑儿归咎于全球化。因此正确认识全球化就十分必要。

### 对全球化的“界定”

全球化的范围应确定在经济领域，即“经济全球化”，而不能扩展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应定义为：经济活动和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性市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经济全球化对政治和文化当然会有影响，但不能任意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西方政界和学者把经济全球化扩展到“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是别有用心。

所谓“政治全球化”，就是西方国家企图将“全球西方化”，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下，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价值观、政治和经济模式以至生活方式。这就是对全球进行“民主冲击波”，就是对转型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颜色革命”。“政治全球化”理论依据之一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推行者提出“国家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

权论”，主张“取消国家”，组织所谓“世界政府”。目的是把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国家统统置于西方统治之下。“文化全球化”被西方和第三世界左翼学者批判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冷战结束后成为左翼学者的热议课题。例如，佩查斯（James Petras）在1993年写的《20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西方统治阶级对它的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把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和目的。”

右翼民粹主义有种族主义色彩，拒绝多元文化。而多元文化是客观存在。文化多元性是基本历史知识和世界现实。

人类文明发源于地球的多个地域。起源时间各异，起源地域各不相同。人类经过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由于各个文明发源地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不同，特别是受气候的影响，生存条件各异，进入文明时期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部落），带有各不相同的特色。所以可以说，人类文明从开创时期起就是多元的，具有多样性，而不是单一的。

世界文明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史，文明发展同社会发展相伴而行。

在七千年的发展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经过各种形式的冲突和交融，一步步走向新的更高的文明。这就形成了现今世界的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文明多样性。英国学者汤因比（Toynbee）归纳为23种文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The Multicultural Planet）归为8种：欧洲文化、北美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俄罗斯文化和东欧文化、印度和南亚文化、中国和东亚文化。从大的系统来说，有的中国学者把世界文化分

为四大系统：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美文化。再往大的方面归纳则可分为东方文明（文化）和西方文明（文化）。

## 对全球化的正能量和负影响的评判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顺应了时代之潮流。经济全球化出现负面影响是由于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在作怪。不能否定全球化，同时也要正视出现的问题，把全球化推向更有活力、更加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使各国人民共享全球化的成果。民粹主义指出全球化产生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但由此而全盘否定全球化是不对的。

经济全球化在最近20年内，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10年，推动了全球科技和经济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不仅发达国家得利，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得利。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也是在这个时期。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性就是自私和贪婪，全球化所获得的成果和财富大量流向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少数人手中，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加之大搞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同时，发达国家将某些产业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赚取利润的大头。而西方国家的统治者把本国的就业问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抢了饭碗”。

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发展中国家是做出贡献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化进程，对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不公正和不平等进行了制约，并提出了使全球化向健康和公正方向发展的方案。G20就起了这个作用。

## 民粹主义风潮同反全球化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原则区别

两者从思潮上来说有相似点，但在目标上是有区别的。反全球化运动是伴随着全球化发展而生成的，被认为是“新社会运动”，所谓“新社会运动”就是指不同于传统的劳工运动和先进政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这种“新社会运动”最早和最典型的是20世纪中期发生在西欧的学生运动。有人认为，反全球化运动承继了“68学生运动”。

1999年12月美国西雅图风暴拉开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之后，反全球化运动成为新兴的国际抗议示威运动，年年发生，斗争矛头指向推进全球化或地区一体化的大型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性会议。200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全球75个国家都发生了反全球化抗议活动。反全球化运动起始时采取大规模示威游行，街头斗争，并以暴力对抗为主。

2001年7月意大利热那亚的抗议活动，将反全球化运动推向高潮。抗议活动主要针对在热那亚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7月20日，八国首脑会议开幕当天，12万示威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八国首脑会议三天时间，示威活动毁坏汽车83辆、打劫商店41家、银行34家。

热那亚抗议活动高潮之后，反全球化运动进入低潮，内部发生分化。主要分为激进派和改良派。改良派主张“非暴力”，参加社会论坛讨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综合征”的病因，表示要“为全球社会正义、经济公平、民主、消除外债等目标而奋斗”。改良派占了优势。

反全球化运动是反对精英政治，对议会政治、政府机构、政治家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主”产生种种问题，存在“民主赤字”现象，而且这既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国际层面。反全球化运动议题

还包含失业、人权、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争取和平等，要求全球公正和民主参与。这些同现代民粹主义有相同和相似点。

但现代民粹主义同反全球化运动有很大区别。反全球化运动参与者有左翼、右翼、民主运动、社会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的各派各系，但左翼力量占优势。而民粹主义虽然也有左翼参与，但右翼甚至极右势力占有优势。特别是欧洲一些民粹主义政党，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对外来移民采取排斥和仇视的态度，反对社会多元化，反对多元文化，反对欧洲一体化，鼓吹极端民族主义。

## 三、罪魁祸首是“新自由主义”

美国推进经济全球化是以“新自由主义”为设定的政治目标，大力输出西方核心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因而产生全球化的种种弊端。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主要应归咎于“新自由主义”。

### 1. “新自由主义”的四面旗帜

“新自由主义”的四面旗帜：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金融化。战后，西方大国为了恢复经济，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放弃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要求由政府进行“需求管理”，解决需求不足和投资不足，用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在战后30年取得了显著成就。欧洲、美国和日本实现了新的经济飞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实行了“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这种市场经济除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

调控外，还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公平公正”为发展目标，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在所有制问题上主张股份公司相互控股；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共同决定权”，出资者同职工代表进行共同管理。“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虽在阿登纳任联邦德国总理时推行，但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烙印，因而为西欧国家所普遍采用，称为有别于美英模式自由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由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把“新自由主义”引为国策。“新自由主义”有各种派别，但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金融化是其基本特征和理论。

**自由化：**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反对“福利国家”政策。控制货币发行，抵制通货膨胀。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有必然的联系，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计划是同民主对立的，政府作用要尽可能地缩小。工会影响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私有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使经济活动得到充分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并逐步形成市场规模和市场调节机制。私有制还能保证政治自由的实现，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

**市场化：**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经济人”就是指“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人们利己本能和天性。“经济人”在利己本性的指导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

导，会“自然均衡”地形成“市场机制”。市场本身具有足够的竞争性，来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而不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只有市场的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才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市场的作用除在经济领域外，还应将其作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社会领域。

**金融化：**在“新自由主义”的催动下，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美国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萎缩。美国金融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超过了制造业，之后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末期，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在美国经济中占了20%的份额，而制造业为14.5%。到2004年，金融公司的利润在全美国占了接近40%。美国金融大佬特别贪婪敛财，以“钱赚钱”方式，疯狂投机。而另一方面，一批批工厂倒闭，实体产业不振，使千百万劳动者陷入失业和贫困的深渊之中。如果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来看，可以说，美国已发展为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或称金融帝国主义。

## 2. 美国要把经济全球化变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冷战之后，美国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要在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美国的国际战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的国际活动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进行的。美国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思想渗透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使我们看到“美国因素”在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从拉美开始进行全球的“民主化”“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苏联解体、东欧改制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发生的。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

作用的。作为外因，就是从美国吹过来的这股“新自由主义”之风。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时期，邀请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改革方案”，于是搞了一个“休克疗法”，即全面私有化。发起这场“全球民主化第一战役”的，正是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齐名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和实施者美国总统里根。美国“不战而胜”，里根立第一大功。因而，美国“全球民主化第二战役”的发起者布什要盛赞里根。作为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赖斯也有功劳，于是当上了国务卿。

这股风也吹向西欧。西欧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当时，西欧国家的重要经济领域都有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控股企业，“新自由主义”之风一吹来就全部私有化了。1998年2月，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推动下，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德国（社民党）总理施罗德是积极支持者，发表了“施罗德-布莱尔文件”，把“第三条道路”推向西欧。“第三条道路”是想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搞折中，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因而也可以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冲击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但是“第三条道路”并未成功。随着克林顿、布莱尔和施罗德的下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破产。

“小布什”总统以“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发起“全球民主化的第二战役”。发动伊拉克战争，除石油利益外，主要是要把伊拉克作为“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样板，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向伊斯兰地区推行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亚发起“颜色革命”，扶植反政府的“民主派”，进行舆论宣传和“街头革命”，推销“新自由主义的药方”。

#### 四、现代民粹主义和国际秩序

现代国际秩序是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联合国为主体，同时还有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战后设置的国际机制机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保障，是同世界经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

特朗普从反全球化出发，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机构设置，特别是对WTO采取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为他实施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开道。

现代的国际秩序确实有缺陷，主要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但问题的产生恰恰在于美国。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提出它的“世界新秩序”，就是企图实施一种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组建西方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联盟”。美国还一度试图以G7来代替联合国，结果未成。美国的“世界秩序”遭到中国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中国是现代国际秩序的贡献者，同时也主张进行改革，但不是推倒重来。

同国际秩序相联系的，就是全球治理问题。全球治理并不是“政治全球化”，而是人类面临共同的经济与生态等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协调合作进行治理。但现实是，这种全球治理已经缺失。

全球治理提出于冷战刚结束，国际形势激烈变动，国际力量重新组合之时。最早是由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德国政治家勃兰特，连同帕尔梅、布伦特兰、尼雷尔和卡尔松等，经过几次开会讨论，于1991年发表一份“关于全球安全与管理的斯德哥尔摩倡议”。1992年，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了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天涯成比邻》，阐明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价值。此后，对“全球治理”基本处于理论学术讨论阶段。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又被热议

起来。对“全球治理”众说纷纭，西方政界和学者要把“全球治理”往“改治全球化”和“西方核心价值观”方向上拉。

中国提出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和平、开

放、公正、合作和共赢、共享为目标，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构建包括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中国的主张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赞誉。

作者简介：吴兴唐，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 Deutschlands Rolle in Europa: die unfertige und unverzichtbare Führungsmacht<sup>①</sup>

Von Michael Staack

Die Europäische Union befindet sich in ihrer schwersten Krise seit Jahrzehnten. Diese Krise betrifft nicht nur einzelne Politikbereiche, sondern ihr Selbstverständnis, ihren Zusammenhalt und ihre Führungsfigur. Zu Beginn des Jahres 2016 hatte Deutschlands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noch die Auffassung geäußert, dass es ein großer Erfolg wäre, wenn die EU am Ende des Jahres so dastehen würde wie zu Jahresbeginn: „Die Fliehkräfte in Europa sind so groß, dass wir ... gemeinsam hart arbeiten (sollten), damit wir in einem Jahr ... noch dieselbe EU finden, wie wir sie heute haben.“<sup>②</sup> Diese Hoffnung erledigte sich spätestens mit der Entscheidung einer knappen Mehrheit der britischen Wähler vom 23. Juni 2016, die Europäische Union verlassen zu wollen (BREXIT).

Damit optierte erstmals ein Staat dafür, seine Teilnahme an dem als irreversibel konzipierten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sprojekt zu beenden. Der BREXIT wird die Union bis zum voraussichtlichen Austritt Großbritanniens im Jahr 2019 beschäftigen und politische Energien binden. Doch außerdem muss sich die Union mit weiteren Krisen auseinandersetzen:

Der Zusammenhalt der Gemeinschaftswährung Euro bleibt bedroht: die Griechenland-Krise ist nicht gelöst, in anderen Euro-Ländern wie Italien zeichnen sich neue Probleme ab und die seit 2012 verfolgte Stabilisierungs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könnte die Grenzen ihrer Wirksamkeit erreichen.

Die Ukraine-Krise ist vorübergehend eingedämmt, aber nicht gelöst; die Konfrontation

---

① Dieser Aufsatz erscheint im *Blaubuch 2017* des Europa-Instituts der Chinesischen Akademie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CASS).

② Frank-Walter Steinmeier, Rede des Bundesaußenministers zur Eröffnung der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am 16.2.2016,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Reden/2016/160213\\_BM%20Begr%C3%BC%C3-Fung%20MSC.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Reden/2016/160213_BM%20Begr%C3%BC%C3-Fung%20MSC.html) (16.11.2016).

mit Russland besteht fort; über die Europäische Nachbarschaftspolitik Richtung Osten wird strittig debattier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hat sich zwar weitgehend abgeschottet gegen den Zustrom von flüchtenden Menschen, aber die Ursachen der Flüchtlingskrise bestehen fort und das Konzept einer *Festung Europa* wird deshalb nicht erfolgreich sein.

Die Umbrüche in der Arabischen Welt haben die Instabilität in dieser Region erhöht, ohne dass (möglicherweise mit Ausnahme Tunesiens) auf mehr Partizipation und Wohlstand gerichtete Perspektiven vor allem für die jüngere Bevölkerung erkennbar sind.

Alle Versuche, den Bürgerkrieg in Syrien zu beenden, sind bisher gescheitert. Die 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spielen in einem Konflikt, der sich in vielfältiger Weise auf die Sicherheit Europas auswirkt, nur eine zweitrangige Rolle.

Populistische Parteien vor allem von rechts, aber auch von links, haben sich binnen weniger Jahre in nahezu allen EU-Staaten als einflussreiche politische Kräfte etablieren können. Der Populismus von rechts stell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grundsätzlich in Frage. Während Rechts- und Linkspopulismus innenpolitisch Koalitionsbildungen erschweren, komplizieren sie auf EU-Ebene die Verständigung auf gemeinsame Lösungen.

Dem Führungspersonal in den meisten Mitgliedsstaaten der EU fehlt es an überzeugenden Zukunftsprogrammen, an politischem Charisma oder an persönlicher Glaubwürdigkeit – oder an allem zugleich: Europa befindet sich in einer Legitimitätskrise demokratischer Führerschaft.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und den Regierungen der wichtigsten EU-Mitglieder gelingt

es vor diesem Hintergrund nur noch eingeschränkt, gemeinsame Problemlösungen in der Union herbeizuführen.

Als Folge dieser Krisen ist die Handlungsfähigke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nur bedingt vorhanden – in einer Zeit, in der gemeinsames Handeln erforderlich ist, weil nationalstaatliche Antworten keine Lösungen darstellen. Für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EU-Mitglieder stellt sich nicht die Frage nach nationalstaatlicher oder nach europäischer Relevanz, sondern nach europäischer Relevanz oder nationalstaatlicher Irrelevanz. Auch als internationaler Akteur ist die EU beschädigt.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 hat sie sich deshalb für eine engere Anlehnung an die NATO und die USA entschieden – eine Option, die mit dem Beginn der Präsidentschaft von Donald J. Trump zumindest in Bezug auf die USA nicht mehr weiter verfolgt werden wird. Eine schleichende Erosion der Integration kann ebenso wenig ausgeschlossen werden wie ein mittel- bis langfristiger Zerfall der Union bzw. die Rückentwicklung zu einer Freihandelszone mit reduzierter politischer Kooperation. Eine Bewahrung des Erreichten – darin ist dem deutschen Außenminister ausdrücklich zuzustimmen – stellt gegenwärtig noch die beste Option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EU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dar.

Die Kr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edroht auch die Handlungsfähigkeit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und den Stellenwert Deutschlands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stellt das herausragende Ziel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dar und ermöglicht zugleich deren internationale Wirksamkeit. Ungeachtet seiner beachtlichen Wirtschaftskraft als viertstärkste Volkswirtschaft der Welt (nach den USA, China und Japan) und seiner Reputation als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 der eine regelbasierte internationale Ordnung befürwortet und den Ausgleich unterschiedlicher Interessen global und regional durch eigene Beiträge unterstützt, sind die Handlungsmöglichkeiten des Nationalstaats Deutschland begrenzt. In einer zunehmend globalisierten und multipolar strukturierten Welt fehlen ihm die Ressourcen, um alleine entscheidenden internationalen Einfluss auszuüben und mit Machtzentren wie den USA, China oder künftig vielleicht auch Indien zu konkurrieren. Die Einbindung Deutschlands in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erweitert seinen außenpolitischen Handlungsspielraum entscheidend. Auf internationaler Ebene wird es als *die* bzw. eine Führungsmacht der EU wahrgenommen und sein Einfluss dadurch gestärkt.

Deutschland ist aber auch der *Stabilitätsanker*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urch seine materiellen Ressourcen, durch seine innenpolitische Stabilität und durch seine Verlässlichkeit als Befürworter der Integration stärkt es die EU gerade in Krisenzeiten. Diese Funktion Deutschlands is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noch wichtiger geworden, weil sich sein engster Partner Frankreich wirtschaftlich und politisch in einer schweren Krise befindet und seine traditionelle Mit-Führungsrolle nur partiell auszufüllen vermag. Durch ein schwaches Deutschland, das mit innenpolitischen Problemen beschäftigt ist und seine internationale Verantwortung nicht wahrnimmt, würden die Handlungsfähigke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d ihre Fähigkeit zur internen Verständigung empfindlich beeinträchtigt. Deutschlands Funktion als Stabilitätsanker würde aber auf

Dauer erst recht überdehnt, wenn es die Union allein führen sollte und wollte. Eine solche unilaterale Führungsrolle würde von den meisten Partnern auch nicht akzeptiert. Für eine solche Rolle wären außerdem die Ressourcen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 militärisch, diplomatisch) nicht ausreichend. Ebenfalls entspricht sie nicht dem Selbstverständnis Deutschlands von seiner Rolle in der EU. Wenn es aber – wie in der Euro-Krise – in eine mehr unilaterale Führungsrolle gedrängt wird, agiert es eher als *unfertige Führungsmacht* denn als Hegemon. *Führung gemeinsam mit anderen* – gemeinsam mit Frankreich, mit den europäischen Institutionen, mit Italien, Spanien und zukünftig auch wieder mit Polen – bleibt als Rational deutscher Europa- und Außenpolitik ohne vernünftige Alternative.

Aus deutscher Sicht ist die Einbindung des Landes in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eine herausragende Erfolgsgeschichte.<sup>①</sup> Das Eintreten für dies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gehört seit den 1950er Jahren zu den zentralen Grundlagen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Als Folge dieses Integrationsprozesses wurde zwischenstaatliche Gewalt als Mittel der Konfliktaustragung überwunden und es konnte sich zunächst im Westen, nach der Überwindung der Spaltung Europas 1989/90 auch in der Mitte und im Südosten Europas eine *Friedensgemeinschaft* herausbilden. Ungeachtet aller gegenwärtigen Probleme ist die Rückkehr militärischer Gewaltanwendung zwischen den Mitgliedern der EU heute ausgeschlossen. Im Rahmen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wuchs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nach der Zäsur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zu

---

① Vgl. Michael Staack, Die Auß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ers. (Hrsg.),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Studienbuch, 5. Auflage, München 2012, S. 213-269.

einem gleichberechtigten Mitglied zunächst des europäischen und dann auch des internationalen Staatensystems heran. Dadurch erwarb sie sich – trotz einiger fortbestehender Vorbehalte bei europäischen Nachbarn – ein Vertrauenskapital, dass die deutsche Vereinigung (1990) überhaupt erst ermöglichte. Nach der Wiedergewinnung der deutschen Einheit sorgte die von Deutschland aktiv betriebene Vertiefung der Integration dafür, dass die territorial und von der Einwohnerzahl her größer gewordene, nach der weitgehenden Bewältigung der Einigungsprobleme auch wirtschaftlich erstarkte *Regionalmacht* Deutschland eine europaverträgliche Größe blieb. Zu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 trat schließlich das Ziel hinzu,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ls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 handlungsfähigen Akteur bzw. als eigenständigen Pol in einer zunehmend multipolaren Welt zu etablieren. Diese Funktion und Aufgabe kann keiner der Nationalstaaten der EU aus eigener Kraft erfüllen.

Die Einigung Europas wurde seit der westdeutschen Staatsgründung von allen im Deutschen Bundestag vertretenen Parteien unterstützt. Über einen langen Zeitraum hinweg, und ganz besonders unter der Kanzlerschaft des nach seiner Amtszeit zum „Ehrenbürger Europas“ ernannten Helmut Kohl (1982-1998), verstand sich die CDU – mehr noch als die SPD – als *die* deutsche Europapartei. Als außenpolitisches Fernziel wurde der Zusammenschluss Europas in einer Föderation angestrebt: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 Erst nachdem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n seinem Urteil über den Maastricht-Vertrag zur Gründung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1993) die Erhaltung eines substan-

ziellen Kerns deutscher Staatlichkeit als finale Schranke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benannt, also ein vollständiges Aufgehen Deutschlands in dieser Integration abgelehnt hatte, rückten die CDU/CSU bzw. die von ihr geführte Bundesregierung von diesem Fernziel ab. Ebenso wie SPD, FDP und Grüne (und, mit Einschränkungen, die Linkspartei) trat die CDU/CSU auch weiterhin für eine inhaltliche Vertiefung der EU ein. Nachdem das von der rot-grünen Bundesregierung unter Führung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s und seines Außenministers Joschka Fischer nachdrücklich vorangetriebene Projekt eines *Vertrags über eine Verfassung für Europa* (2005) an Volksreferenden in Frankreich und den Niederlanden gescheitert war, trug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wesentlich zum Zustandekommen des Lissabon-Vertrages (2007) bei, mit dem die Zusammenarbeit in der Union nach der großen Erweiterung um zehn Mitgliedsländer (2004) gestärkt werden sollte.

Diese *europäische Grundorientierung*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wurde im Kontext der seit 2009 heraufziehenden Euro-Krise erstmals seit der deutschen Vereinigung wieder in Zweifel gezogen.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s Erstarren nach den Krisen der 1990er Jahre hatte „die Dominanz des Landes in Europa in nachdrücklicher, aber auch in gefährlicher Weise bestätigt und noch ausgeweitet: Durch die wirtschaftliche Suprematie Deutschlands auf dem Kontinent, so wird befürchtet, könnten alle anderen Staaten in ein Abhängigkeitsverhältnis geraten, das sich dann auch ins Politische verlagere.“<sup>①</sup> Die deutsche Bundesregierung wurde für ihre Politik in der Euro-Krise kritisiert, weil sie die

① Ulrich Herbert,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2014, S. 1245.

ökonomische Macht ausschöpfte, um ihre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schen Vorstellungen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urchzusetzen. So warf der Vorsitzende der französischen Sozialisten, 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 der deutschen Regierung vor, sie habe bei ihrer „Sturheit“ im Eintreten für härteste Reformen die Hilfe vergessen, die Deutschla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durch seine europäischen Nachbarn empfangen habe (Marshallplan 1947, Schuldenschnitt 1953, Zustimmung zur Wiedervereinigung 1989). Sei das nun alles vergessen, so Cambadélis, wo Berlin wieder „stark und mächtig“ sei?<sup>①</sup> Deutschland wurde aber auch kritisiert, weil es (bezogen auf die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zu wenig Führung zeigte. „Deutsche Macht fürchte ich heute weniger als deutsche Untätigkeit“, erklärte der damalige polnische Außenminister Radoslaw Sikorski in einer vielbeachteten Rede am 28. November 2011 in Berlin. Deutschland, so Sikorski, sei die „unverzichtbare Nation“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sup>②</sup>

Die 1990 scheinbar definitiv beantwortete Frage nach der Einbindung Deutschlands in Europa, nach einem *deutschen Europa* oder einem *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 war auf die politische Agenda zurückgekehrt. Dieses *Dilemma* besteht fort: Ohne Deutschland als Stabilitätsanker und Führungsmacht kan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nicht funktionieren, aber eine zu starke deutsche Führungsrolle provoziert Widerstände und untergräbt den Zusammenhalt der Union. Deutschland muss dieses Dilemma in seiner Europapolitik berücksichtigen, wenn es seine Führungsrolle erfolgreich

ausüben will. Dazu ist eine Überprüfung seines Führungsstils, aber auch politischer Inhalte erforderlich. Wie konnte es soweit kommen? Für die tiefgreifende, strukturelle Krise der Union lassen sich drei Hauptursachen identifizieren:

*Erweiterung ohne Vertiefung:* Seit dem Jahr 2004 is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von 15 auf 28 Mitglieder gewachsen. Diese Erweiterung war von Deutschland, das sich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der Beitrittskandidaten aus Mittel- und Osteuropa verstand, nachdrücklich unterstützt worden. Mit seinem gleichzeitig verfolgten Ziel, die gemein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z.B. in de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zu vertiefen und die Entscheidungsprozeduren und Institutionen der EU anzupassen, um deren Funktionsfähigkeit zu erhalten, war es nur bedingt erfolgreich. Die Europäische Union wurde schließlich erweitert, ohne dass eine tiefgreifende Reform und Vertiefung stattgefunden hat. Als Folge dieses Defizits wurden Entscheidungsprozesse komplizierter. Zugleich nahm die Bedeutung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ab, während sich der Europäische Rat der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als zentrales Forum der Kompromissfindung über alle wichtigen Fragen durchsetzte. Diese Schwerpunktverlagerung von der *Gemeinschaftsmethode* bzw. Integration zum *Intergouvernementalismus* wurde auch von Deutschland – unter seinen Kanzlern Schröder und Merkel – unterstützt. Außerdem wurde die Kohärenz der Union durch erhebliche inhaltliche Positionsdifferenzen zwischen alten und neuen Mitgliedern beeinträchtigt. Die polit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Kulturen und

---

① „Stimmen und Stimmung“. Der Tagesspiegel, 18.7.2015, S. 2.

② „Deutsche Macht fürchte ich heute weniger als deutsche Untätigkeit“, <https://dgap.org/de/node/20029> (15.11.2016).

Präferenzen der neuen Mitglieder aus Mittel- und Osteuropa sowie aus Südeuropa unterscheiden sich teilweise erheblich von dem inhaltlichen Konsens, der die bisherige, westeuropäische EU bis dahin geprägt hatte. So ist in vielen dieser Staaten die Demokratie teilweise noch nicht gefestigt, trennende Nationalismen bestehen fort,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Lasten der Vergangenheit hat noch nicht oder erst ansatzweise stattgefunden und Wertvorstellungen z.B. in Bezug auf Ehe und Familie sind eher traditionell geprägt. Der Prozess der Zusammenarbeit in den Institutionen der Union und der transnationale Austausch haben alte und neue Mitglieder enger zusammengeführt. Dieser Prozess ist aber noch nicht abgeschlossen und in einigen Staaten wehren sich politische Mehrheiten gegen eine Fortsetzung.

*Desintegration durch Neoliberalismus:* Die Überwindung des Krieges als Institution, die Aussöhnung durch Zusammenarbeit und die Förderung der wirtschaftlichen Prosperität bildete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die Grundlagen für das Gelingen des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sprojekts. Wirtschaftliches Wachstum und ein im weltweiten Vergleich einzigartiger Standard sozialer Sicherheit gehörten zu den Erfolgsbedingungen dieses Entwicklungsmodells. Das *Europa des sozialen Ausgleichs* wurde seit den 1980er Jahren zunächst von den Verfechtern des angelsächsischen Kapitalismus attackiert, bevor – seit den 1990er Jahren – die ökonomische Globalisierung die zunehmende Erosion dieses Modells beförderte. In der Konkurrenz mit neuen Märkten

wurden gesteigerte Unternehmensgewinne und verbesserte Standortbedingungen als wichtiger angesehen als gesellschaftlicher Zusammenhalt. Durch die Osterweiterung der EU erhielt diese Politik einen nochmaligen Entwicklungsschub, denn dort hatte sich der Neoliberalismus nach dem Bankrott der Planwirtschaft noch deutlicher durchgesetzt als im Westen Europas.<sup>①</sup> Nicht nur liberale und konservative Parteien, auch die Sozialdemokratie unterstützte diese Politik, etwa mit der Politik des *Dritten Weges* von Großbritanniens Premierminister Tony Blair, welche auch Bundeskanzler Schröder zeitweise übernahm. In den Institution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wurde dieser neoliberale Kurs schon seit den 1990er Jahren von der Kommission vertreten und ganz besonders konsequent in der zehnjährigen Amtszeit von Kommissionspräsident José Manuel Barroso durchgesetzt. Die Union vertrat zwar deklaratorisch gelegentlich die Forderung nach einer sozialen und ökologischen *Gestaltung der Globalisierung*, in der politischen Praxis wurde dieses Politikziel aber vernachlässigt: außer- und innerhalb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ls Folge dieser Entwicklung haben Einkommens- und Vermögensunterschiede zugenommen, Leistungen des Wohlfahrtsstaates wurden reduziert und der soziale Zusammenhalt in vielen Gesellschaften ist beschädigt oder erodiert.

*Währung ohne Wirtschaftsraum:* Die *Euro*-Währung wurde 2001 eingeführt, ohne dass die teilnehmenden Staaten zu einem Raum zusammengewachsen waren, dessen ökonomische Leistungsfähigkeit einigermaßen kongruent war.

① Vgl. Philipp Ther, Die neue Ordnung auf dem alten Kontinent. Eine Geschichte des neoliberalen Europa, Frankfurt am Main 2014.

Dieses Risiko war den Konstrukteuren der Währungsunion um Helmut Kohl bekannt. Für sie hatte aber das politische Ziel unbedingten Vorrang, die Gemeinschaftswährung zu Beginn des neuen Jahrhunderts zu etablieren. Damit sollte der Einigungsprozess Europas unumkehrbar gemacht werden. Aus dem Einigungsprojekt wurde ein knappes Jahrzehnt später eine ganz anders aussehende Wirklichkeit: der Euro hat die Länder der Euro-Zone und die EU insgesamt eher gespalten. Marktünstig finanzierte Staatsverschuldung in einigen Ländern (vor allem Griechenland), nach Renditemöglichkeiten suchende Kapitalströme in anderen Staaten resultierten in einer Währungskrise, die bis zur Gegenwart latent anhält. Durch die Weltfinanzkrise 2007/2010 wurde sie noch verstärkt. Als Gegenleistung für seine Bereitschaft, den Euro durch großangelegte Rettungsschirme zu stabilisieren, verlangte Deutschland eine Politik der Austerität, mit der ein Abbau von Staatsverschuldung, eine weitere Einschränkung von staatlichen Leistungen und damit eine Konsolidierung der Staatshaushalte erreicht werden sollte. Dieser Kurs wurde vor allem von Deutschland durchgesetzt, aber von vielen anderen EU-Mitgliedern in Nord- und Osteuropa unterstützt. Ob die Stabilisierung des Euro auf diese Austeritätspolitik zurück zu führen ist oder auf die 2012 erfolgte Ankündigung von Mario Draghi, Präsident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alles Erforderliche zu tun, um die Euro-Währung zu erhalten, bleibt umstritten. Tatsächlich hat die Sparpolitik ohne ausreichende Wachstumskomponente die als Folge des Neoliberalismus eingetretenen Wohlstandsverluste breiterer Schichten der Bevölkerung nochmals

verstärkt und die Unterstützung der EU damit weiter untergraben.

An der Entstehung dieser drei Krisenursachen hat Deutschland mitgewirkt. Außerdem haben Bundes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und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dem Ansatz des *Intergouvernementalismus* (Führung der EU durch die Kooperation der nationalstaatlichen Regierungen) gegenüber dem Ansatz der *Supranationalität* (Führung durch die Institutionen der Gemeinschaft, insbesondere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regelmäßig den Vorrang gegeben. Deutschland trägt demnach eine Mitverantwortung für die Kr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eren Folgen seine eigene Politik quer durch verschiedene Bereiche inzwischen negativ beeinträchtigen. Im Verlauf der Euro-Krise wurde Deutschlands Rolle als *unfertige Führungsmacht* besonders deutlich.<sup>①</sup> In den Anfängen der Staatsverschuldungskrise Griechenlands (2009) weigerte es sich, eine aktive Führungsrolle zu übernehmen. Das änderte sich im Frühsommer 2010, als die Griechenland-Krise die Stabilität des Euro zu gefährden drohte. Deutschland setzte nun seine Stabilitäts- und Austeritätspolitik durch, ohne die sozialen Kost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Folgen hinreichend abzuwägen. Dieses Verhalten wiederholte sich bei der neuerlichen Zuspitzung der Griechenland-Krise 2015. Das Land konnte in der EU und im Euro-Währungsraum verbleiben, musste aber Sparauflagen akzeptieren, die von vornherein nicht erfüllbar waren. Faktisch wurde Griechenland durch die verschiedenen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schen Maßnahmen dazu gezwungen, seine Souveränität a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bzutreten. Die ökonomische

---

① Vgl. Michael Staack, *Deutsche Außenpolitik unter Stress*, Opladen/Berlin/Toronto 2016, S. 29-38.

Dominanz Deutschlands in der Krise rief Widerstände und ansatzweise Gegenmachtbildungen hervor, durch die der Zusammenhalt der Union erheblich belastet wurde. Zeitweise agierte die deutsche Bundesregierung als ein Hegemon mit beschränkter Integrationsfähigkeit.<sup>①</sup>

Die 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in der Flüchtlingskrise ha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weiter in die Krise geführt und die Führungsrolle Deutschlands bzw. insbesondere der Bundeskanzlerin beeinträchtigt. Das geschah nicht intendiert, doch hätte die deutsche politische Führung – insbesondere die Kanzlerin – die europapolitischen Folgen ihres Handelns stärker berücksichtigen müssen. In den 1990er Jahren hatte Deutschland maßgeblich das Dubliner Abkommen (1997) mit herbeigeführt, nach dem Asylanträge grundsätzlich nur noch an den Außengrenz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gestellt werden konnten. Zur Durchsetzung dieser Politik wurde sogar das Grundgesetz geändert und das Asylrecht für politisch Verfolgte eingeschränkt. In der Folge wurde Flüchtlingspolitik zu einer Herausforderung vor allem für die südlichen Mitgliedsstaaten der Union, die – unterstützt durch die EU – primär mit einer Abwehr- bzw. Abhaltestrategie antworteten. Diese Politik wurde als Folge des Bürgerkriegs in Syrien und des Staatszerfalls in Libyen seit 2011/12 zunehmend untergraben. Die Flüchtlingsströme wurden zu groß und die sie begleitenden humanitären Katastrophen zu zahlreich, um die bisherige Abwehrpolitik erfolgreich fortsetzen zu können. Außerdem widersprach diese Politik den normativen Ansprüch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uch in dieser Phase unterließ es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geographi-

schen Hauptzielländer der Flüchtlingsbewegung (Spanien, vor allem Italien und Griechenland) zu unterstützen. Diese Einstellung änderte sich erst im Verlauf des Jahres 2015 angesichts weiterhin zunehmender Flüchtlingszahlen. Als Reaktion auf eine erneute Schiffskatastrophe mit etwa 800 Todesopfern im April 2015 verlangte die Bundeskanzlerin eine veränderte Flüchtlingspolitik, die eine Bekämpfung der Schlepperbanden als wirtschaftlicher Profiteure der Flüchtlingsnot, bessere Antworten auf die Fluchtursachen sowie eine größere Bereitschaft zur Aufnahme von Flüchtenden beinhaltete. Diese neue Politik war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nicht mehrheitsfähig.

Bundeskanzlerin Merkels Entscheidung vom 4. September 2015, die deutschen Grenzen für Flüchtlinge zu öffnen, war humanitär nicht nur gut begründet, sondern tatsächlich alternativlos. Die Europäische Union und ihre Führungsmacht Deutschland hätten in ihrem Anspruch als Werte- und Friedensgemeinschaft völlig versagt, wenn sie eine Zurückweisung der Flüchtenden zugelassen hätten, wie sie vom ungarischen Premierminister Viktor Orban geplant worden war. Aus der Einzelfallentscheidung wurde aber ein Zustand, der fast ein halbes Jahr andauerte, etwa eine Million Flüchtende nach Deutschland führte, die Integrationsbereitschaft des Landes auf die Probe stellte und zu erheblichen innenpolitischen Kontroversen führte, auch innerhalb der Regierungskoalition. Der Bundesregierung gelang es nicht, die Mehrheit der EU-Mitglieder zur Aufnahme von mehr Flüchtenden zu veranlassen. Weil eine europäische Lösung ausblieb, entschied sich die kleine Gruppe der Deutschland unterstützenden Staaten, insbesondere Österreich und Schweden,

① Vgl. Hans Kundnani, *The Paradox of German Power*, London 2014.

zur radikalen Begrenzung ihrer Aufnahmebereitschaft. Dieser Haltung schloss sich faktisch auch Deutschland an, nachdem die sogenannte *Balkanroute* durch Mazedoniens Grenzschießung gesperrt worden war. Die 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wurde durch drei Motive bestimmt: (1) Eine humanitäre Katastrophe sollte verhindert werden. (2) Es sollte Zeit gewonnen werden, um eine (bessere) Flüchtlingsaufnahme in den Herkunfts- oder Transitländern vorzubereiten. (3) Außerdem sollten die Regeln des Europäischen Binnenmarktes, der u.a. die Freizügigkeit des Grenzverkehrs beinhaltet, aufrecht erhalten werden. Völlig zu Recht wurde befürchtet, dass eine Grenzschießung durch Europas wichtigste Handelsnation zu einem Dominoeffekt und schlussendlich sogar zur Desintegration des Binnenmarktes hätte führen können. Die Schließung der Grenze zwischen Griechenland und dem Nicht-EU-Mitglied Mazedonien und das Flüchtlingsabkomm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mit der Türkei reduzierte die Zahl der Flüchtenden drastisch, ohne die zu Grunde liegenden Probleme zu lösen. Die politischen Folgen für die Union, für Deutschland und dessen Führungsrolle sind gravierend.

Die Europäische Union verharret in einer Abwehrpolitik gegenüber Flüchtenden, die weder problemadäquat ist noch ihrem normativen Anspruch genügt. Der Ausbau einer *Festung Europa* entspricht aber dem politischen Willen einer deutlichen Mehrheit der Regierungen ihrer Mitgliedsländer. Deutschland sieht sich durch die Integration von mehr als einer Million Schutzsuchenden herausgefordert. Innenpolitisch führte die Aufnahme einer so großen Zahl von Flüchtenden in so kurzer Zeit zu einer grundsätzlichen Infragestellung einer humanen Asylpolitik. Auch die Durchsetzung eines prinzipiell notwen-

digen Einwanderungsgesetzes zur Ermöglichung von mehr legaler Migration wurde erheblich erschwert. Schließlich hat sich das Parteiensystem grundlegend verändert: mit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konnte sich erstmals in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geschichte eine rechtspopulistische Partei mit teilweise rechtsextremer Anhängerenschaft erfolgreich etablieren. Europa- und außenpolitisch wurden Deutschland die Grenzen seiner Gestaltungsfähigkeit aufgezeigt. Die deutliche Mehrheit der EU-Mitglieder, vor allem in Mittel-, Ost- und Südosteuropa, war keinesfalls bereit, dem neuen Kurs von Kanzlerin Merkel zu folgen. Auch die deutsch-französische *Entente* fiel in ihrer Führungsfunktion weitgehend aus. Deutschland war in der EU zwar nicht isoliert, aber die Anzahl seiner Partner blieb äußerst überschaubar. Das stellte hauptsächlich eine Reaktion in der Sache dar, teilweise aber auch einen Reflex auf die deutsche ökonomische Dominanz in der Eurokrise. Außerdem wurde die Bundesregierung kritisiert, weil sie in der Krise des Jahres 2015 Solidarität von den Partnern einforderte, in den Vorjahren aber selbst nicht bereit gewesen war, solidarisch gegenüber diesen Partnern – wie Griechenland und Italien – zu handeln, die bis dahin die Hauptlasten der Flüchtlingsbewegung zu tragen hatten. Die Fragmentierung und beginnende Desintegration der EU schritt in der Folge weiter voran. Deutschland konnte seine Führungsrolle nur noch eingeschränkt wahrnehmen. Deutlich beschädigt wurde auch die über Jahre gewachsene persönliche Führungsrolle der deutschen Bundeskanzlerin. Auch innenpolitisch setzte eine Erosion ihrer Kanzlerschaft ein.

Eine weiter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bedeutet die Wahl von Donald J. Trump zum Präsidenten der USA.

Trump hat die bisherige Roll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als (wohlwollender) Hegemon einer liberalen Weltordnung zur Disposition gestellt. Er hat den BREXIT unterstützt und lehnt den Freihandel ebenso ab wie eine liberale Einwanderungspolitik. Seine Devise des *America First* wendet sich direkt gegen internationale Kooperation und *Global Governance*. Positive Äußerungen zum Projekt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sind von ihm nicht bekannt. Sein Erfolg stärkt, direkt und indirekt, alle ähnlich eingestellten Parteien und Strömungen in Europa. Erst ansatzweise in organisierter Form, aber wirkungsmächtig bereits in ideeller Gestalt besteht so etwas wie eine rechts-populistische *Internationale* mit transnationalen Vernetzungen. Welche Agenda der neue Präsident genau verfolgen wird, wird sich frühestens nach seinem Amtsantritt abzeichnen, wenn er seine zentralen Projekte vorgestellt und wichtige Personalentscheidungen getroffen hat. Seine bisherigen Stellungnahmen waren zu ungenau, um daraus ein außenpolitisches Programm ableiten zu können. Einige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ie europäische und deutsche Politik sind aber schon sichtbar geworden:

Eine starke Europäische Union als Partner der USA ist nicht vorgesehen. Nach George W. Bush (in seiner ersten Amtszeit) wird Trump der zweite Präsident sein, der das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rojekt nicht grundsätzlich unterstützt.

Donald Trump hat die Sicherheitsgarantien der USA für ihre Verbündeten – auch in der NATO – in Frage gestellt. Selbst wenn er diese Äußerungen nicht wiederholt, werden Zweifel an der bündnispolitischen Zuverlässigkei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bestehen bleiben. Es zeichnet sich bereits ab, dass seine Wahl zu einer engeren verteidigungspolitischen Kooperation europäischer

Staaten führen wird.

Als Kandidat hat sich Donald Trump gegen Verträge und Vorhaben ausgesprochen, di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esonders wichtig sind: das neue Klimaschutz-Abkommen, das Nuklearabkommen mit dem Iran, den Freihandel.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und nachrichtendienstlich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n USA und ihren europäischen Partnern dürfte fortgesetzt werden. Neue, beide Seiten verbindende inhaltliche Projekte sind derzeit nicht absehbar.

Trumps außenpolitische Ankündigungen sind diffus. Er hat handelspolitische Strafmaßnahmen gegen China angekündigt, das er maßgeblich für die Probleme der US-amerikanischen Volkswirtschaft verantwortlich macht. Für den russischen Präsidenten Putin und dessen Politik äußerte er mehrfach Sympathie. Bundeskanzlerin Merkel hat er wegen ihrer Flüchtlingspolitik scharf kritisiert.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e Stetigkeit und Berechenbarkeit sind von einer Trump-Administration erst einmal nicht zu erwarten. Setzt sie das Motto *America First* auch außenpolitisch um, könnten sich die Beziehungen mit anderen weltpolitischen Machtzentren deutlich verschlechtern und internationale Krisen zuspitzen, für deren Management aber Kooperation erforderlich wäre. Das gilt auch für die Wirtschafts- und Handelspolitik.

Trumps Ideen, sein Auftreten und sein politischer Stil stellen ein politisches Kontrastprogramm zu den Werten und Zielsetzungen dar, denen sich Deutschland und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Mitglieds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verpflichtet fühlen. Ein überzeugtes Eintreten für eine *regelbasierte internationale Ordnung* ist ebenso wenig erkennbar wie der Respekt vor zentralen Menschenrechten, vor allem der

Menschenwürde. Aufgrund Deutschlands internationaler Rolle als *responsible global citizen*, insbesondere als Konsensmacht, die für Interessenausgleich eintritt, könnte es sich innerhalb des Westens zum Gegenpol des Trump-Amerika entwickeln. Die seit 2014 vermehrt erhobene Forderung nach der Übernahme größerer *internationaler Verantwortung* dürfte insofern nach der US-Präsidentschaftswahl eine zusätzliche Bedeutung gewinnen. Allerdings sind die deutschen Ressourcen – ökonomisch, diplomatisch-politisch, militärisch – begrenzt und die Übernahme einer solchen Rolle nur im Verbund mit weiter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Erfolg versprechend.

Die nächste Bewährungsprobe steht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mit der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schaftswahl im April und Mai 2017 bevor. Auch wenn die deutsch-französische *Entente* allein in der Regel nicht mehr ausreicht, um die Europäische Union zu steuern, so bleibt sie doch als Vorbedingung für diese Steuerung unverzichtbar. In der Europapolitik verfolg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oft unterschiedliche Zielsetzungen. Kompromisse zwischen beiden Staaten geben deshalb nach wie vor verständigungsfähige Politikoptionen für die anderen EU-Mitgliedsstaaten vor. Mit einem Sieg von Marine Le Pen und ihrem rechtspopulistisch-rechtsextremen *Front National* wäre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Partnerschaft die Grundlage entzogen. Le Pen will ihr Land aus der Union führen; ihre Konzepte sind in keinem Fall mit der Politik der jetzigen Bundesregierung vertretbar. Nach dem BREXIT und ohne Frankreich wäre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m Ende; jedenfalls als relevanter weltpolitischer Akteur. Und ohne den engsten Partner kann Deutschland seine Führungsrolle in der EU auf Dauer nicht sinnvoll ausüben.

Die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belegt, dass als Antwort auf große Krisen mehrfach eine Verdichtung der Zusammenarbeit oder sogar ein großer Integrationschritt erfolgte; zum Beispiel mit dem Binnenmarkt-Projekt der 1980er Jahre, das der *Euro-Sklerose* der 1970er folgte. Das ist auch gegenwärtig nicht völlig ausgeschlossen, obwohl die Fragmentierung der Union weit vorangeschritten ist. Der Außendruck durch eine Trump-Administration und durch Putins Russland könnte eine neue *Selbstbehauptung Europas* befördern, bei der sich eine Staatengruppe innerhalb der EU stärker zusammen schließt. Die Zahl der mehrheitsfähigen Projekte ist begrenzt. In der Folge der BREXIT-Entscheidung hab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die Initiative ergriffen, um die – intergouvernementale – Kooperation in der *Verteidigung* zu stärken. Nach der Wahl Trumps sprachen sich die Außen- und Verteidigungsminister trotz britischer Opposition für dieses Vorhaben aus. So sollen ein permanentes Hauptquartier für militärische und zivile EU-Einsätze geschaffen, ein gemeinsames Sanitätskommando errichtet, die Transportkapazitäten gebündelt und die Zusammenarbeit bei Satellitenaufklärung und Rüstungsprojekten verstärkt werden. Ein weiteres europäisches Kooperationsprojekt könnte in einer verstärkten *sozialen und ökologischen Gestaltung der Globalisierung* bestehen einschließlich eines großen Programms gegen die Jugendarbeitslosigkeit in der EU. Dafür fehlt es derzeit in den meisten Mitgliedsstaaten jedoch an politischen Mehrheiten.

2017 könnte zum Schicksalsjahr für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als solche werden. Derzeit erscheint es eher unwahrscheinlich, dass es soweit kommt. Scheitert Europa dennoch, dann ist das auch ein Desaster für die deutsche Außen-

politik. Sie würde ihre wichtigste internationale Handlungsebene verlieren und damit auch einen wesentlichen Teil ihrer weltpolitischen Gestal-

tungsfähigkeit. Deshalb bleibt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das wichtigste Ziel der deutschen Politik.

**Autor: Michael Staack, Prof. Dr. an der Helmut-Schmidt-Universität/Universität der Bundeswehr Hamburg und ist Ko-Direktor des Instituts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 2012—2017 年中德关系回顾与展望

于 芳

【摘要】今年是中德建交 45 周年，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德政治互信加强，双方继续政府间磋商、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等诸多交流机制；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共同倡导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中德人文交流成果丰富，将在建交 45 周年之际开展系列活动，促进中德民众的相互了解。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桥梁作用，增强中德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和了解。

【关键词】中德关系 互访 经贸关系 人文交流

中德两国自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保等领域进行着日益深入的交流与合作，2016 年中国成为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德关系稳定发展并支撑和推动着中欧关系的发展。在当前欧洲深陷多重危机、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抬头的德法大选年，中德关系的稳定和提升不仅仅关涉中德两国人民的福祉，更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大国关系重组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起着重要作用。

自 2012 年中德两国庆祝建交四十周年后，2013 年至今既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新一届政府任期，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第三届任期。中国和德国分别经历了政府的更新换届，双边关系实现了延续和拓展，

并在不断深化和提升，逐步迈向成熟。

## 一、领导人互访频繁，促进政治互信

2013 年 5 月底，李克强总理上任后首次出访亚欧四国，德国是其中唯一的欧盟国家。在短短两天时间里，李克强总理与默克尔总理多次会晤，磋商中德合作的思路与重点，以及有关国际问题的看法，意在深化中德战略伙伴关系、保持两国总理年度会晤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各层次的磋商交流，密切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在中德工商界午餐会上，李克强以“中德携手、共创未来”为题发表演讲，向德国工商界人士阐述了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和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指出要借助中国“新四化”的东风来

深化中德和中欧合作的新主张。2013年9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默克尔总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明确阐述了中德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指出中德两国应当充分利用2011年创建的政府磋商机制和诸多双边战略对话机制，加强高层交往，不断提升政治和战略互信，强化伙伴和机遇意识，减少双边合作的阻力。2013年的高层互访为此后的中德合作设定了思路和指导原则，奠定了基础。

2014年中德两国高层互访频繁。3月底，习近平主席出访德国，在柏林会晤了德国总统高克和总理默克尔，以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政策与和平发展观为主题在科尔伯基金会发表了重要演讲。双方发表《关于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德期间，习近平还与作为中德文化桥梁的汉学家和孔子学院代表进行座谈，并会见少年足球队球员和教练。7月初，默克尔总理第七次访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晤，围绕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展开讨论。默克尔总理在清华大学进行了有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讲，在成都参加中国（四川）-德国新型城镇化合作论坛开幕式并致辞。10月中旬，李克强总理率领大型中国政府和经济代表团赴德国，同德方举行了第三轮政府磋商，范围涵盖20多个中德合作具体领域，出台《中德合作行动纲领：共塑创新》为中德两国未来中长期合作指明了方向，全面深化落实3月底习近平访德期间提出的“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

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和2014年的访德成果，在2015年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德两国领导人继续保持互访和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推进互利共赢合

作。2015年3月，马凯副总理赴德出席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和中国合作伙伴国活动，并主持首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德，推进中德反恐、执法安全和警务合作；7月，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以及若干名部长访华；10月，默克尔总理实现任内第八次访华，与中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合作共识，访问期间双方签订航空、金融和高端制造等商业协议24份，总金额达270亿美元；此次访华期间，默克尔公开表示“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认为中国经济将转变结构，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为双边合作提供巨大机遇；12月，王毅外长赴德开启首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

2016年，中德两国高层的互访和沟通依旧密切，这对加深相互了解、拓展和创新合作内容起了重要作用。德国总统高克3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起双方的特别关注。众所周知，这位总统基于其在前民主德国的经历，对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成见、偏见常有流露。中方对高克总统此访给予了高规格接待，中国领导人同他进行了坦诚、深入的对话。在访问北京、上海和西安期间，高克同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就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考察了解。访问结束后，来自不同方面的反映表明，此访增进了高克对中国真实情况的了解，特别是中方的坦诚、耐心和度量让他或多或少有所触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sup>①</sup>

同年6月，默克尔总理对中国进行第九次访问，与李克强总理共同主持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此次政府磋商发表了含有42条共识的《联合声明》，明确了今后两国扩大和深化合作的方向和领域，体现在和双方签署的

<sup>①</sup> 梅兆荣：《2016年中德关系回顾》，[http://news.ifeng.com/a/20161215/50422593\\_0.shtml](http://news.ifeng.com/a/20161215/50422593_0.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5月7日。

24项协议之中，成果斐然。中德两国在此次磋商中坦率深入地就存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些问题包括：双方伙伴关系的基础；双方企业合作中的“对等原则”；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德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能就分歧进行磋商，意味着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成熟。10月，G20杭州峰会期间，默克尔总理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晤，达成不少共识，中国支持德国办好2017年的G20汉堡峰会。11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赴德国出席第七届中国中欧论坛汉堡峰会及两国人文交流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习近平主席特使身份访德，出席首届中德伊斯兰极端主义专业对话，两位领导人分别与德方商定建立高级别人文对话机制和高级别安全对话机制。同月，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偕企业家代表团访华，参加中国西部地区博览会，该活动对促进中德经贸、投资合作有积极意义。

2017年4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出席第三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默克尔高度评价中德关系取得的积极进展，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委派经济能源部长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双方都愿进一步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通过中德战略合作带动国际合作，通过中德关系的稳定对冲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sup>①</sup>

## 二、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在经贸合作领域，伴随中国工业化、信

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确定，中德合作的重点在2013年加强了制造业和信息通信技术、农业和城镇化、经贸和财政金融领域的合作。中德之间建立了中德农业合作部长级对话机制，促进现代农业和食品安全的合作；建立两国“财长+行长”财金对话，启动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建立德国中国商会和投资促进机构，积极推动中德合作进入“快车道”和“提速期”。

德国作为欧洲的第一大经济体和中国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早已互为彼此重量级贸易伙伴。2012年中德双边贸易额已达到近1611亿美元，到2016年中德双边贸易额增长到1698.7亿欧元（约合1862.6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15.6%，中国首次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德国投资达到新高度，约合121亿欧元，是2015年的13倍还要多，2016年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了45次并购，项目数量和金额都创下新高。中资收购德企56家，大大超过2015年的37家。<sup>②</sup>中德两国合作努力奉行互利共赢公平竞争政策，为中欧关系的发展和欧洲经济的复苏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消除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中欧经贸合作的顺利开展，尤其在解决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和无线通信设备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和征反倾销税方面，中德两国领导人一再强调通过对话协商来避免中欧“贸易战”的爆发，使得矛盾最终得到妥善解决，从而为未来中欧解决贸易冲突和推进经贸合作提供了积极有效模式。

高数额和深入广泛的多元化经贸合作，也对原有中德和中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

① 外交部：《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王毅》，[http://news.ifeng.com/a/20161215/50422593\\_0.shtml](http://news.ifeng.com/a/20161215/50422593_0.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5月7日。

② 参见欧洲时报：《2016年德国吸引中国直接投资再创新纪录》，<http://www.oushinet.com/ouzhong/ouzhongnews/20170207/254298.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5月7日。

出了新要求。目前，架构中欧商品无障碍运输桥梁的渝新欧班列已全面运行，连接着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两端的中德两国，全程1.2万公里，运输时间约17天，比海运节约1/3时间，比空运降低2/3成本，由此也使得德国产品直销中国的成本大大降低，进一步促进了中德贸易发展，并对周边国家与地区产生辐射作用。

2014年10月的《中德合作行动纲领》中出现“工业4.0”这项德国新工业化计划，旨在通过依托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将资源、信息、物品和人进行互联，以建立与中国工信部此前出台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年）》不谋而合，中德双方通过创建新的对话机制，推动两国工业转型计划的战略对接，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2015年双方决定，为“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建立部级协调机制，同时建立政府合作机制来协调中德企业开展面向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德国参与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助力中国经济转型。

### 三、人文交流成新亮点

在人文科教领域，中德文化关系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合作领域不断扩大，成果丰富。2012年至今两国依次举办了“中国文化年”“中德语言年”“中德创新年”“中德青少年交流年”，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加强民众之间的相互认知和了解。迄今在中国约有20万人在学习德语，近70所高校设立了德语专业，100多个中小学参加了德国外交部发起组织的“学校——塑造未来的伙伴”活动。在德国，每年各类学汉语人员总数约3万人。25所高校开设汉学或中国及东亚研究专业，汉学专业在校生约有3000人。德国高校汉语师范专业建设始终走在欧洲各国前列。

始建于2006年的德国孔子学院目前已经在全德开设18所。随着两国人民往来日益频繁，孔子学院的作用日益突出，进一步推广了在德国的汉语教学，也增进了德国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理解。2016年8月默克尔总理亲自出席了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院的揭幕仪式，这是首家以中国为特色的孔院，也是西方国家政府首脑首次出席孔院揭幕式，同年运行的英格尔施塔特孔院由奥迪汽车公司参与建设，开创了孔院与跨国企业合作的新模式。

2015年德国图书版权输出到中国的共有1514种，居于首位。2016年2月中国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历史上首次在中国德国主流院线同步上映。此外，中德两国还签署了三个不同层面的足球合作协议，分别由国家体育总局与德国内政部、中国足协与德国足球职业联盟、中国教育部与德国足协等三方签署，将带来德国足球的成功经验，推动中国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足球成了两国之间的纽带。

德国游客赴华的人数也呈不断增长的趋势。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5年入境的德国游客总数为454,859人，在中国的主要客源国中排名第12位。到2012年入境的德国游客总数已经增长为65.96万人，比上年增长3.5%，在中国的主要客源国中排名依旧为第12位。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2016年4月份曾表示，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大出境游客源国，中国来德国旅游人数在四年内已翻番。随着中国游客数量的增多，受到金融和债务危机影响的德国旅游业和零售业大打“中国牌”。德国一些大商场包括公共设施还增设了中文服务。法兰克福机场专为中国游客设立免费中文导购服务，机场还推出中文版的APP程序。

2017年，中国将在德国举办贯穿全年、覆盖全德的系列文化庆祝活动，涵盖中德两

国音乐、戏剧、舞蹈、创意设计、文学、电影等多个艺术门类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春节庙会、电影展映、焰火晚会、“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并行世界——中国当代艺术展”、萨尔国际音乐节、汉堡芭蕾舞节等项目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展示创新、自信的当代中国形象。中德两国还为文化创意产业搭建合作平台，通过举办讲座、报告会，推动优秀作品翻译等方式，持续推动中德在思想领域的交流和对话。<sup>①</sup>

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指出，中德唯有在民众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建立互信，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人文交流作为中德交流的第三大支柱，将成为今年中德关系的亮点领域。

#### 四、中德关系前景展望

从国际形势来看，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等问题频发，新型大国的“责任压力”增大，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崇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使得大国经济竞争更为激烈。中德两国同为全球贸易和投资大国，在推进全球治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上有着共同追求。<sup>②</sup>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力图连接亚洲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推动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德国积极参与该项倡议，成为欧盟国家中为亚投行出资最多的国家，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中德两国将继续进行外

交与安全战略对话，在国际和地区危机，气候、环境、能源与资源安全、国际发展合作等全球挑战上保持频繁交流合作，并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国家组织和机构框架内开展更紧密的协调与合作，在共同的全球责任中尝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中德两国已经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能源、环保等诸多领域建立起约70多个对话机制，高层沟通密切，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然而，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形势、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文化背景与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要消除彼此的误解和疑虑，首先需要增加对对方的了解和认知。2014年3月底和10月中旬访德前夕，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在德国主要报刊发表了题为《中德携手合作造福中欧和世界》和《让开放创新引领中德合作》的署名文章，积极阐述中德作为“两个经济奇迹创造者”携手并进的重要性与贡献，向德国民众介绍中国的最新发展，诠释中德合作的核心与意义。“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中国在对德合作中积极倡导的基本合作理念，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是共同目标。

从顶层推动双边合作，是中德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sup>③</sup>但是要真正实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还需要进一步夯实中德关系的民意基础，增加两国民众之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对中德两国来说，当前中国企业在德投资加大，德国人因为对中

① 尉红琛：《合作·友谊·共赢 2017中德文化关系迎来新发展》，[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wenhua/201702/t20170215\\_800087321.html](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wenhua/201702/t20170215_800087321.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5月7日。

② 中国新闻网：《中国驻德大使：中德合作共同致力于世界稳定和自由贸易》，<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7-02/10087929.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5月7日。

③ 梅兆荣：《2016年中德关系回顾》，[http://news.ifeng.com/a/20161215/50422593\\_0.shtml](http://news.ifeng.com/a/20161215/50422593_0.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5月7日。

国缺乏了解而产生恐慌，需要双方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建立相互信任，缩小差异，扩大共同点，唯其如此，才能够实现合作共赢。

在这一过程中人文交流将发挥着独特的桥梁作用，将为中德关系的稳定发展增添新的动力，推动中德关系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 默普会：观望中寻求出路的德俄关系<sup>\*</sup>

黄萌萌

【摘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7年5月2日在索契会见了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是德国总理两年来首次访问俄罗斯，这与默克尔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1月有余，德国媒体与部分学者分析认为德俄关系能否突破以往窠臼取决于美俄关系能否缓和，美国在德俄关系中是一只“隐形”的第三方重要力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美俄领导人正式会晤前与普京见面展现出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务实性。尽管德俄现有分歧较大，两国关系还未出现实质性转变，但已呈现出发展态势。即使德国政界在乌克兰问题以及叙利亚战争中所阐释的外交目标基于西方民主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因素的考虑，然而一旦美俄关系出现转圜，德国也会及时抽身，避免被动式反应导致在国际政治中出现“措手不及”的状态。

【关键词】德俄关系 默普会 俄美关系

## 一、“晴转阴”的德俄关系

冷战结束后，德俄双方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德国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扮演着利益调节者的角色，是俄罗斯在欧盟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1998—2005年施罗德政府时期德俄关系处于政治互信的蜜月期。默克尔第一届政府时期，由于执政伙伴社民党外长施泰因迈尔奉行“开明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在“价值观外交”之外顾及俄罗斯现实利益，

德俄关系总体上较为稳定。但从2009年第二届默克尔政府开始，俄罗斯与德国的价值观分歧日渐严重，德国媒体对于俄罗斯车臣局势的负面报道以及对于俄罗斯逮捕示威抗议者的指责导致双方政治互信骤降。而普京从2007年后开始在外交政策上疏离西方，批评西方在格俄战争、科索沃独立、部署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北约和欧盟东扩等事件上罔顾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与西方渐行渐远并伴随着德俄与美俄关系的趋冷。2013年

\* 本文精要版已在《世界知识》2017年第11期发表。

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令俄罗斯与美欧积聚多年的恩怨一触即发，而叙利亚战争中美欧统一战线加重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即使德国在上述危机中一直与俄罗斯保持沟通，希望通过对话促使美欧俄之间达成妥协，但近年来德国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减弱，在乌克兰危机中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安全威胁，与美国一道对俄实施多轮制裁，德国作为俄罗斯的“理解者”以及西方与俄罗斯之间调解人的地位下降，乌克兰危机与叙利亚战争成为德俄之间仍未化解的心结。

事实上，默克尔与普京之间从未形成真正的政治盟友关系，这与默克尔的东德出身，对俄罗斯有着自始至终的戒心密切相关。德国媒体调侃二者的关系时说道，即使德俄领导人交流时毫无语言障碍，但默克尔对待普京却从未拥有像她和奥巴马那般的信任感。虽然德国与俄罗斯政界在国际危机中保持协商与沟通，但在乌克兰危机中，欧俄双方均将乌克兰入欧或是入俄势力范围视为各自底线，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公投进一步激发了德国和欧盟对俄战略的疑虑与恐惧，波罗的海及中东欧国家要求欧盟对俄实施强硬外交政策也给德国带来压力。2014年欧盟对俄制裁逐步升级，从停止欧俄经济协定谈判到限制俄罗斯高官入境以及最终的经济制裁，俄欧之间的地缘战略空间争夺夹带积蓄已久的政治疑虑成为德俄关系恶化的催化剂；在叙利亚战争中，德国致力于在美、俄以及中东各方势力之间进行多边调解，但是欧盟追随美国的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政策目标令德俄关系降入冰点。

## 二、来自第三方“隐形重要力量”的信号

作为西方秩序的挑战者——特朗普胜选成为美国总统为德国政界与民众始料未及，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与德国所主张的多边主义、欧洲认同、全球治理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产生背离，德美关系走向面临较大变数。冷战结束后，尽管跨大西洋联盟在国际事务与国际危机中不时出现政治龃龉与目标分歧，但考虑到欧盟在安全政策以及情报领域对美国的依赖性依然较强，在重大事件上保持协调成为美欧双方长期以来的共识，为此，欧盟与德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也在寻求美国的支持与理解。奥巴马时代，欧盟对俄制裁拥有美国的背书，但是面对特朗普上台前后透露出的与俄缓和的信号，德国与欧盟如何应对成为政界亟须准备的功课。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员约瑟夫·布拉姆尔（Josef Braml）在5月初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说道，如果特朗普在“通俄门”事件上面临的内政压力减少，那么美国对俄政策可能会发生迅速转变。2017年4至5月间的俄美外长互访为美俄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释放出妥协与合作的积极信号。在俄外长拉夫罗夫到访美国之前，特朗普突然宣布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扫除了对于“通俄门”事件开展持续调查的最大障碍，特朗普与拉夫罗夫就叙利亚“冲突降级区”、乌克兰问题、俄涉嫌干涉美国大选问题及改善两国关系等话题进行会谈，这为特朗普计划于2017年7月在德国汉堡G20峰会上会见普京创造条件。此外，作为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是埃克森美孚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持有公司大量股票，与俄罗斯石油界巨头关系密切。对俄制裁开始后，埃克森公司无法继续开采西伯利亚油井，公司损失多达10亿美元，因此蒂勒森是反对因乌克兰危机制裁俄罗斯的先鋒人物。俄罗斯方面对于特朗普接见拉夫罗夫表示出“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美国在不久前因叙政府涉嫌使用化学武器而向叙利亚发射59枚

战斧式巡航导弹，美俄关系实质性缓和由于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仍充满了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双方政界已经释放出希望改善关系的愿望。

德国嗅到美俄关系可能出现的缓和信息，默克尔会见普京实际上是为德俄关系破冰之旅打下前站。倘若美俄关系并未出现预期缓和，这对于德国外交政策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毕竟德国多年来以美俄之间的中间人和调解者自居，符合其“文明力量”的外交角色定位，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外交斡旋发挥超越自身实力的国际作用。无论是乌克兰危机中德国力主促成的《明斯克协定》还是在叙利亚战争中德国时任外长施泰因迈尔与美俄外长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进行的多次会谈，德国的外交斡旋作用都为美国和俄罗斯所尊重。普京接见蒂勒森时表示遵守《明斯克协定》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出路，蒂勒森也认为结束美国对俄制裁的前提是俄罗斯遵守《明斯克协定》，并在执行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 三、德国对俄政策的务实性

长期以来德俄关系体现了德国“与价值观相关联，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方针”。德国的对俄政策中不乏民主和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因素，德国对于普京打压国内反对派的做法以及基于“民族国家时代”的“强权政治”地缘战略多有不满，这与德国和欧盟多年来所追求的“后民族国家时代”基于“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多极国际秩序不符。但是，无论是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所主张的“开明现实主义”外交理念还是学界对于德国“贸易国家”的角色定位都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德国外交政策的务实性占有重要一席。长期以来，德国对俄政策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欧洲的安全与稳定需要俄罗斯的参与，而非将其排斥在外甚

至与其产生对抗。因此，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德国一直是俄罗斯合法利益最为重要的西方支持者，俄罗斯也将德国视为其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北约、欧盟或是G7峰会俄罗斯均被纳入其中。然而，这一切随着克里米亚“入俄”以及支持乌克兰东部武装而结束。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在美国、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俄罗斯之间进行调解时奉行“强硬与对话相结合的双重战略”，一方面主张政治解决方案，在欧盟内部以及和跨大西洋盟友之间进行利益调解，促进西方与俄对话，重启明斯克停火谈判；另一方面，德国与欧盟跟随美国对俄实行经济制裁，防止乌克兰东部进一步分裂导致欧洲不稳定加剧。然而，尽管在乌克兰问题上德国、美国和俄罗斯都坚持执行《明斯克协议》，但在执行上仍有很多分歧。欧盟坚持在实现停火后立即将乌克兰与俄罗斯东部边境控制权转交至乌克兰政府军，之后进行地方选举；俄罗斯坚持东部武装力量应在选举后才向乌政府军移交部分而非全部的边境控制权。

德国对俄务实性的外交政策与德俄之间密切的经贸往来息息相关，经济制裁为双方均带来巨大损失。特别是在能源领域，2013年德国35%的天然气和40%的原油从俄罗斯进口，在俄德企多达6200家，与对俄出口相关的工作岗位约为40万个，制裁后德国对俄出口减少了14%。波罗的海与东欧国家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比例是德国的两至三倍，但是由于德国国内的天然气使用率比例远高于波兰与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因此德国面临的压力远大于东欧国家，而且欧盟的能源独立计划在中期内很难达成。尽管如此，东欧国家还期望从德国那里获得部分天然气储备援助。此外，欧盟对俄制裁并未达成美欧的预期目标，反而令俄罗斯人民更加团结，即使遭受货币贬值与经济下滑也普遍支持普京对欧的强硬政策，在叙利亚问题上欧洲人

低估了俄罗斯的不妥协决心和抗压性。

其次，德国政界、经济界与社会对俄态度向来不统一。德国政界分为“亲俄派”和“反俄派”。前总理科尔、施密特都认为德国对俄的疑虑过重，欧盟率先越过了乌克兰作为俄欧之间地缘缓冲地带的红线。德国前外长即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则主张与俄沟通和谈判，兼顾欧俄双方利益，避免俄罗斯与欧洲进一步疏离。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前总统高克对于俄罗斯的不信任较重，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更是主张北约在欧洲东部边界加强军事存在。德国经济界则较为担忧对俄制裁会导致两败俱伤，缓和或者结束制裁符合德国企业的利益。在德国媒体与政界的影响下，近年来德国民众对于俄罗斯的印象较为分裂，2016年初，认为德国与俄罗斯是盟友或者战略与经济合作伙伴的民众比例为42%，与认为俄罗斯是德国战略与经济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关系的43%的比例基本持平。但是德国人显然比美国人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更加灵活。美国皮尤民调显示，近60%的美国人认为美欧对俄的经济制裁不够强硬，而30%的德国人认为制裁太过强硬，35%的德国人认为制

裁措施适当。

最后，德国务实性外交政策考虑到德国在中、美、俄大国关系中的战略布局。如果美国缓和对俄政策，德国很可能积极促成俄罗斯重新加入G7、恢复俄与西方在和欧安组织等国际机构内的合作，摆脱对俄孤立政策，如此也突显了德国的欧盟领导地位以及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目前，美欧均意识到“不进则退”，多年来的对俄制裁，与俄交恶促使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合作，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关系令美国开始考虑缓和对俄关系。即使德国政界与学界大多视特朗普为西方秩序的挑战者，但在中短期内，德国政府在安全事务上仍然指望与美国保持协调，如若美俄关系朝积极方向发展，这将是德俄关系转圜的最佳契机。即使德俄之间面临着乌克兰与叙利亚问题的挑战，德国政界也一直与俄罗斯保持往来与对话，高层之间的提前接触也为德国对俄政策的灵活转变留有余地。但也应看到，俄罗斯在涉及欧洲重要安全利益的乌克兰问题上如何执行明斯克协议，仍是欧洲以及美国取消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重要条件，必将构成德俄关系转圜的重大障碍。

作者简介：黄萌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 欧洲和平秩序的重建： 一个德国的视角

李 微

**【摘要】**2013年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就国际法规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双方进入关系僵持、甚至对抗时期。而由于乌克兰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欧洲区域问题，作为欧盟“发动机”的德国，开始在乌克兰危机中主动承担斡旋和调解的责任。在此过程中，德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尤其在克里米亚危机中的行为，现存欧洲和平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如何在双方互信基础达到冷战后最低点的严峻情况下，共同磋商，重新建立欧洲和平新秩序，是当务之急。在上述背景下，本文从理论上界定了“欧洲和平秩序”的定义，回顾了冷战后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过程，以及探讨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欧洲和平秩序建构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本文认为，冷战后的“欧洲和平秩序”是以《巴黎宪章》为起点，但在现实政治操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北约和欧盟为主导机构、以大西洋共同体价值观为指导理念、以东扩为推广模式的多边化安全合作机制。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并未成为该和平秩序的平等建构者，而是逐渐被边缘化了。乌克兰危机的出现，则是俄罗斯对这种制度安排不满的集中爆发，形成了对原有和平秩序的结构性挑战。如何在“包含俄罗斯”的情况下，重构欧洲和平秩序，是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所面对的关键性问题。

**【关键词】**欧洲和平秩序 乌克兰危机 德国 俄罗斯

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入紧张相持期。克里米亚事件后，西方国家更是对俄罗斯口诛笔伐，认为俄的行为是对国际法的严重破坏，是不尊重乌克兰主权、试图分裂乌克兰、破坏地区稳定的做法。相反，俄罗斯方面则称，克里米亚通过自决脱离乌克兰，正符合西方国

家所鼓吹的“人权”价值观，国际社会理应予以尊重。简而言之，双方针对乌克兰危机所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俄罗斯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规范”，是一个“合法性”问题。

与此同时，虽然引发了国际法层面上的全球性探讨，乌克兰危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区域问题。美国在不同场合表示，乌克兰事

件属于欧洲问题，欧洲应作为主导力量解决这场危机。而在欧洲层面的探讨中，尤其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德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冷战后一直在建构中的欧洲和平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如何在双方互信基础达到冷战后最低点的严峻情况下，共同磋商，重新建立欧洲和平新秩序，是当务之急。

2014年12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世界报周日版》的采访时指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最终目的在于，重新树立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而由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进犯和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作为，这个目标迟迟未能实现。”<sup>①</sup> 时任德国外长的施泰因迈尔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乌克兰危机“使欧洲和平秩序岌岌可危，我们现在必须阻止欧洲的重新分裂（neue Spaltung）”<sup>②</sup>，“我们遇到了冷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危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为损害了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sup>③</sup>，“数十年以来建立起来的互信在短短几个月内丧失殆尽”<sup>④</sup>。

认为“乌克兰危机威胁到了欧洲和平秩

序”的不仅仅是德国政界，2014年以来，德国学界从此次危机出发，探讨“欧洲和平秩序的重建”的文章不断见诸笔端。学者普遍认为，“乌克兰危机使原有的欧洲和平秩序受到了持续冲击，北约、欧盟和欧安组织现在必须建构出一个新的和平秩序，并在与俄罗斯合作，而非排除俄罗斯的情况下重建该秩序”<sup>⑤</sup>。

上述德国政治家和学者提及的“欧洲和平秩序”，主要指的是欧安会于1990年11月在巴黎克莱贝尔特别首脑会议上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中所宣告的“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和平秩序和安全秩序”<sup>⑥</sup>。该宪章同时认为：“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告结束”，欧洲已经进入“民主、和平和统一的新时期”<sup>⑦</sup>。

乌克兰危机表明，这样的欧洲和平秩序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实现。欧洲不但未如巴黎宪章的设想实现整体欧洲的安全，而是形成了“以北约为首的强势西方”、“弱势的俄罗斯及其势力范围”和“缩小的中部欧洲”（schrumpfendes Zwischeneuropa）<sup>⑧</sup>格局。这

① Vgl. Welt am Sonntag: Verlässlichkeit ist ein sehr hohes Gut, <https://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DE/Interview/2014/12/2014-12-07-merkel-wams.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7.12.2014.

② Vgl. Malzahn, C.C./Mülherr, Silke/ Sturm, Daniel Friedrich: Europäische Friedensordnung steht auf dem Spiel,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34378688/Europaeische-Friedensordnung-steht-auf-dem-Spiel.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6.11.2014.

③ Vgl. Europäische Friedensordnung bewahren,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4/12/2014-12-05-ukraine-russland-putin-red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5.12.2014.

④ Vgl. Steinmeier, Frank-Walter: Rede von Außen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eim 21. OSZE-Ministerrat in Basel, letzter Zugriff am 04.12.2014.

⑤ Siehe: Major, Claudia / Puglierin, Jana: Eine neue Ordnung: Der Ukraine-Konflikt stellt die Weichen für Europas Sicherheit, in: IP Magazin, 2014(11/12), S. 62-71. Müller, Harald: Konturen einer neuen europäischen Friedensordnung, in: ZfP, 2015(3), S. 306-322. Voigt, Karsten: Europäische Friedensordnung: Interessen und Ziele Deutschlands, Russlands und der USA, in: IPG, 2010(2), S. 131-136.

⑥ Siehe: Schwarz, Wolfgang: Der Westen & Russland - Zum Diskurs, <http://das-blaettchen.de/2015/10/der-westen-russland-zum-diskurs-15-34290.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6.10.2015.

⑦ 陈乐民：《“冷战”后的欧洲若干问题》，载《西欧研究》，1992年，第06期，第27—29页。

⑧ Siehe: Müller, Harald: Konturen einer neuen europäischen Friedensordnung. I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2015(3), S. 311.

样的格局是随着美国主导的北约安全框架东移而逐渐形成的，与美国希望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愿望相符，但并不完全符合德国对于欧洲和平秩序的设想。因德国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一部分，认为一个繁荣稳定的俄罗斯是实现欧洲和平的前提条件。上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就已经使德国意识到，没有俄罗斯的合作，欧洲大陆上的和平和稳定难以实现；现今乌克兰危机的事实也证明，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对于维护德国的东面外部安全环境至关重要。因此，俄罗斯问题对德国设想下的欧洲和平秩序而言，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如何在包容俄罗斯的前提下“重建欧洲和平秩序”，是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所面对的关键性问题。

## 一、何为“欧洲和平秩序”

尽管乌克兰危机后，“重建欧洲和平秩序”的命题在德国反复被提及，但值得指出

的是，在表述上，德国政界和学界不同人士所使用的概念是有所出入的。德国政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表述是“欧洲和平秩序”（Europäische Friedensordnung）<sup>①</sup>，少数情况下也使用“欧洲安全秩序”（Europäische Sicherheitsordnung）<sup>②</sup>，或者将“欧洲安全秩序”和“欧洲和平秩序”并列，作为同义词使用<sup>③</sup>。

德国学界使用的表述更为广泛。Herald Müller称之为“欧洲和平秩序”，Claudia Major称之为“欧洲安全秩序”，Karsten Voigt同时使用“欧洲和平秩序”和“欧洲安全秩序”，而Michael Berndt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则一直使用“欧洲安全架构”的表述。<sup>④</sup>

尽管使用的表述有所不同，最终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但德国政界和学界在对乌克兰问题发表意见时，普遍赞成下述观点：

乌克兰问题实际上是俄罗斯问题；

俄罗斯在乌克兰事件中的作为破坏了冷战后德国设想并努力建构的欧洲和平秩序

① 参见上文所引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关于“欧洲和平秩序”的论述。此外，德国政府官方新闻发布会上也使用了“维护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这样的表述（Vgl: Europäische Friedensordnung bewahren, unter: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4/12/2014-12-05-ukraine-russland-putin-rede.html>, 05. 12. 2014.）。

② 例如欧洲议会副主席、FDP党派议员 Alexander Graf Lambsdorff 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作为违背了欧洲安全秩序的基本原则”（Vgl: Ukraine-Konflikt ist militärisch nicht zu gewinnen, unter: <https://www.liberales.de/content/ukraine-konflikt-ist-militaerisch-nicht-zu-gewinnen>, 03.02.2015）。此外，施泰因迈尔也于2014年12月9日在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的讲话中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为损害了欧洲安全秩序中的基本原则”（Vgl: Europäische Friedensordnung bewahren, unter: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4/12/2014-12-05-ukraine-russland-putin-rede.html>, 05. 12. 2014.）。

③ 例如德国驻比利时大使 Rüdiger Lüdeking 在接受报纸采访时，先后称乌克兰危机应使冷战后建构“欧洲安全秩序”和“欧洲和平秩序”重新被审视（Vgl: Lüdeking, Rüdiger: Der Ukraine-Konflikt – die Bewährungsprobe für di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ordnung, unter: <http://www.brussel.diplo.de/contentblob/4733218/Daten/6306410/NamensartikelUkraineKonflikt.pdf>, 20.01.2016）。FDP 联邦委员会在2015年1月19日针对乌克兰事件做出的决议中也称，“俄罗斯的合作对于一个稳定的欧洲和平和安全秩序是不可或缺的”（Vgl: Beschluss des Bundesvorstands der FDP, Berlin, 19. Januar 2015）。

④ Vgl. Berndt, Michael: Die „Neu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Sicherheit in, für und vor Europa?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7.

(或者安全秩序、安全架构);

重新建构欧洲和平秩序是解决俄罗斯问题的可持续性出路;

必须在与俄罗斯合作,而非排除俄罗斯的情况下重建欧洲和平秩序,“边缘化”俄罗斯是不可取的。

再细致探究相关言论或著述,笔者发现,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表述,但德国政界和学界对于乌克兰事件中,被俄罗斯“破坏”掉的欧洲和平秩序的实质性内涵有着高度一致的认知:

## 1. 秩序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

无论是被称为“秩序”,抑或是“架构”,所指的都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Institution)。这种制度通常拥有一个社会目标,由“稳定的、被重视的、循环发生的行为规范”<sup>①</sup>所构成,并能够在一定的共同体(community)中为在其中生活的个体行为进行管理,通过调整行为准则的方式来影响个体行为和意图<sup>②</sup>。制度是有层次的,也是有范畴的。层次上而言,可以区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范畴上而言,则可以区分为“国际制度”“区域制度”“国内制度”等。

“国际秩序”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建构一种由国家所构成的社会(a society of states),或者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并在这个社会中实现特定的行为目标,如维护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外部主权以及追求和平等。同时,要像广义的社会

一样,限制暴力、信守承诺以及尊重财产所有权。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可以通过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和大国管理等方式来进行维持<sup>③</sup>。例如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便是一种通过大国管理方式所维持的国际秩序。随着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该秩序也就失去了有效性。

## 2. 和平秩序是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制度

“和平秩序”(抑或“安全秩序”“安全架构”),指的是一种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制度。它指明国际社会的行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行为体都会尊重该准则。树立和平秩序的目的在于:规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使它们之间的立场差异(Positions-differenzen)不致升级为武力对抗。和平秩序应孤立出个别国家间的动武情况,并应当帮助尽快重建二者之间的和平状态<sup>④</sup>。因此,国家是“和平秩序”所针对的主要行为体,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则是“和平秩序”的主要社会目标。

“欧洲和平秩序”指的是被欧洲国家所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是一种区域性国际关系制度。而按照制度本身的特征,欧洲和平秩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其首要社会目标是什么?它针对的共同体区域在哪里?它能规范的行为体包括哪些?为了执行这种制度,并在过程中符合其社会目标,能使用的工具有什么?因此,Michael Berndt认为,要回答“如何建构欧洲安全架构”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四个问题(见图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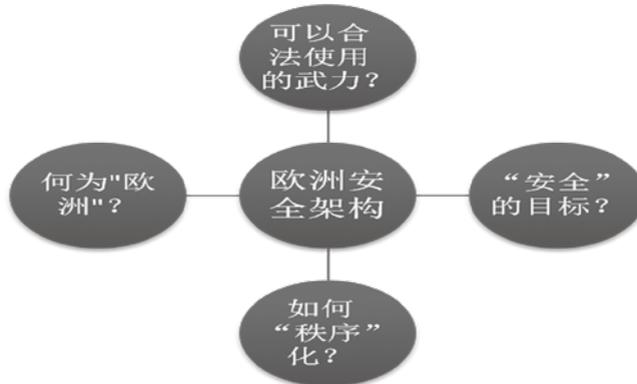
① Vgl.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PDF). In: World Politics, 17 (3): S. 394.

② Vgl.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ocial Institutions, , letzter Zugriff am 06.05.2016.

③ 钟准:《内战、干预与国际秩序》,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3期,第79页。

④ Vgl. Müller, Harald: Konturen einer neuen europäischen Friedensordnung, S.307. I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2015(3), S. 306-322.

图表 1<sup>①</sup>:



### 3. 建构新的“欧洲和平秩序”

欧洲和平秩序（安全秩序、安全架构）是一种规范欧洲各国，以维护欧洲整体和平为主要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导、管理、约束欧洲各国国际行为的区域制度。从冷战结束后，德国就在积极参与建构这种新秩序，但乌克兰事件使目前为止所形成的制度进展受到了结构性挑战。导致德国政界和学界开始反思该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呼吁应当“重建欧洲和平秩序”。

为了客观探讨未来欧洲和平秩序的建构路径，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冷战后欧洲和平秩序的理念和建构模式进行梳理，以探讨乌克兰危机之前，欧洲和平秩序的背景、进程和暂有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在原有的欧洲和平秩序框架下，为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分歧和对立，为何俄

罗斯问题会成为欧洲和平秩序建构中的结构性难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应当如何“重建”欧洲和平秩序，以解决这一难题。

## 二、冷战后：对欧洲和平秩序建构的尝试

二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出台相应的“和平条约”，而是形成了“人为的、反自然的、非法的”世界和欧洲的分裂<sup>②</sup>。在这种分裂和对抗的局面下，形成了高度武装的世界两极格局，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威慑下的长期和平”状态<sup>③</sup>。在冷战期间，世界格局是较为清晰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以德国为中心点分割了世界，双方意识形态高度对立，通过结盟、军备竞赛和核威慑等手段客观上避免了第三

① Vgl. Berndt, Michael: Die „Neu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Sicherheit in, für und vor Europa?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7, S. 132.

② Kuroпка, J.: Nachkriegsordnung - Friedensordnung: Zur Frage der „Ergebniss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und der Stabilität in Europa (PDF), [http://www.kas.de/wf/doc/kas\\_3527-544-1-30.pdf](http://www.kas.de/wf/doc/kas_3527-544-1-30.pdf), letzter Zugriff am 21.05.2016.

③ 汉斯·冈特·布劳赫等：《全球化和环境挑战：21世纪的安全观重构》，张晓萌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年1月，第1页。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社会秩序角度来说,其规则的制定者(美苏两国)、执行方式(结盟、军备竞赛、核威慑)和主要目标(扩大势力范围、力图压制对方)这些基本函项是相对固定的。与此同时,由于世界上形成了压倒性的两极争霸格局,欧洲区域也被这个国际秩序所支配,尽管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在不断试图探索欧洲特有的和平秩序,但成效不大,且无法脱离两极格局的固有思路。

冷战结束之后,欧洲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原有两极格局的崩塌、欧洲新兴国家的出现、俄罗斯的转型、欧洲地缘上的分裂局面被彻底改变、同时也源于冷战期间西欧国家在新型国际关系上的探索,欧洲开始致力于建构特有的区域和平秩序。

在这个和平秩序建构之初,欧洲人还沉浸在欧洲统一的喜悦中,提出了一个持中间立场的承诺,即欧洲政治与安全架构接纳俄罗斯,俄罗斯也承诺愿意被纳入,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1990年11月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sup>①</sup>。但很快,这个“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和平秩序”就被证明是不现实的:美国为首的北约并未因为华约的解散而走下历史舞台,反而逐渐开始转型、扩大,主导欧洲安全事务;欧洲在经济联合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政治和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停滞不前,欧安会沦为论坛性质的安全事务讨论平台,影响力低下;俄罗斯地缘优势一再被挤压,在欧洲逐渐被边缘化,欧洲大陆上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和平框架”<sup>②</sup>。

这种美国主导下的欧洲非对称和平秩序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到了极大挑战。这出于

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 1. 欧洲精英对“欧洲模式”具有世界先进性的认知

尽管欧洲战后秩序一直受到美国主宰,但西欧国家也在探索独有的欧洲模式。在国际关系层面上,欧洲学者和政治精英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尝试改变各国边界的性质,以促进资本、人口、商品和观念的自由流动<sup>③</sup>,同时建立“规范性”价值,试图通过机制和法理的力量规制欧洲秩序,乃至影响全球安全格局。在欧盟区域内部,这一理念被广泛接受,欧盟内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区域社会,遵从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基本实现了没有战争、不动用武力、国家边界稳定等和平秩序所要求的主要目标。他们因此相信,这种模式具有可移植性,应该在全欧范围内进行推广,甚至影响世界。因此,虽然从现实上,欧洲同意北约的东扩,但这一方面是由于北约东扩从客观上能够塑造传播欧洲价值的地缘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欧洲在安全防务事务上对北约的依赖性,这并不代表欧洲同意美国的传统安全理念,即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以达到遏制俄罗斯的目的。事实上,欧洲人更感兴趣的,是转变俄罗斯的价值观,共同建设欧洲模式的和平秩序;欧美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价值认知差异: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越性是赢得冷战的关键因素,是80年代的军备竞赛将苏联推向失败的边缘,但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西方国家能在冷战中获得最终胜利主要源于欧洲的自我

① R. 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51页。

② 同上。

③ 伊万·克拉斯蒂夫,马克·莱昂纳多:《破碎的欧洲秩序之梦》,袁超编译,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23日,第007版。

由理念和传统<sup>①</sup>。这就导致了欧洲人在充分依赖北约提供的安全保障之余，从未放弃欧洲自身安全机制的建设。

## 2. 俄罗斯的崛起和因此导致的认知改变

冷战的非对称性终结，使西方的机制和理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把俄罗斯及其对新世界秩序的诉求放在一边<sup>②</sup>。这种诉求在冷战刚刚结束时，被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的需要遮掩下去了，但从未真正消失。在俄罗斯转型之后，又重提该诉求，这就向现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和平秩序提出了挑战。

## 3. 全球战略重点的转移

尽管欧洲一直都只是美国拥有利益的众多地区之一，或许都不是最重要的区域<sup>③</sup>，但在目前全球战略重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域转移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显得更加明显。欧洲有理由担心，美国不把欧洲的安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考虑，甚至为了获取其他区域的利益而牺牲欧洲的稳定与和平。例如目前就有不少欧洲媒体认为，欧洲难民问题根源上是美国的战争政策所导致的，美国为了维持它在中东的利益，罔顾周边国家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sup>④</sup>与此同时，美国则批评欧洲在安全防务方面毫无投入。

## 4. 安全环境的复杂化

目前，国际安全格局远未成型，新型威胁层出不穷。单一的美国和北约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所有类型的国际冲突。仅就乌克兰事件而言，俄罗斯在事实上帮助了克里米亚的独立和并入俄罗斯，但由于俄罗斯采取了非传统的支援形式，而未发动传统战争，北约也不能做出任何实质性行动。目前为止，以德国主导的谈判、多边合作、经济制裁、国际仲裁机构介入等危机处理方式才是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更重要手段。

因此，在安全防务层面主要依赖美国和北约之余，欧洲人也在以自己的理念同时建构更为错综复杂的欧洲和平秩序。并逐渐形成了以“相互交织的机制”（interlocking institutions）为核心要素的新型和平秩序<sup>⑤</sup>。在这种“相互交织的机制”模式下，转型后的北约占据主导地位，而欧洲则在更加“欧洲相关”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而为了能够达到“欧洲人解决欧洲事”的目的，欧洲先后在政治实践中建立了不同功能、不同目标的安全机构（例如西欧联盟、欧安会、欧盟内部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等）。但事实上，上述机构目前为止都不具备实质性的危机解决能力，欧洲事务依然需要依靠北约解决，欧洲人建立的组织只具备辅助性或者论坛性作用。

① 伊万·克拉斯蒂夫、马克·莱昂纳多：《破碎的欧洲秩序之梦》，袁超编译，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23日，第007版。

② R. 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54页。

③ 伊万·克拉斯蒂夫、马克·莱昂纳多：《破碎的欧洲秩序之梦》，袁超编译，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23日，第007版。

④ Vgl. Weiland, Severin: Die USA und die Flüchtlinge: Eine Supermacht versteckt sich,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syrien-usa-muessen-mehr-fluechtlinge-aufnehmen-a-1051444.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7.09.2015

⑤ Vgl. Berndt, Michael: Die „Neu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Sicherheit in, für und vor Europa?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7, S. 128.

这种理念和现实的差异导致了欧洲所设想的“相互交织的机制”正在往“相互妨碍的机制”(interlocking institutions)方向发展<sup>①</sup>：北约和欧盟相关机构共存于建构中的欧洲和平秩序框架下，却欠缺明确的功能或者地理分界，拥有在很多层面上都相互重叠的任务目标。在执行同一个任务时，不同机构经常派出来自同样几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或维和部队，但彼此间并不存在正式规范的信息共享、安全保障或合作模式。<sup>②</sup>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也存在许多批评的声音，但直到乌克兰事件之前，“相互交织的机制”依然是欧洲和平秩序的制度建设方向，以美国主导，欧盟国家为辅的跨大西洋联盟也依然是欧洲和平秩序的核心建构者和规则的制定者。而在这种和平秩序框架中，俄罗斯一再被边缘化，它被动地接受西方国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无法实现自己的秩序诉求，外交空间逐渐被挤压。有学者甚至指出，冷战中存在的东西分割线并没有消失，只是东移了，乌克兰危机则再次引发了隐形“分界线”的移动<sup>③</sup>。

针对这次东移，俄罗斯做出了强烈反应，欧洲和平秩序因此受到冷战以来最大挑战。它不但挑战了欧洲和平秩序的重大合法性来源文件，而且究其实质，这还是俄罗斯与几乎所有西方对手之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它将影响欧洲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权力转移和格局重构<sup>④</sup>。

### 三、欧洲和平秩序中的“俄罗斯问题”

如上所述，乌克兰危机说明，欧洲和平秩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描述的那样，国际秩序的活力在于合法性与权力的动态平衡。而“当平衡被打破，限制消失，国际社会出现了代价高昂的声索和难以和解的竞争对手时，混乱就会随之而来，直至一个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为止。”<sup>⑤</sup>

俄罗斯经过冷战后将近1/4个世纪的努力，仍然无法融入现有的欧洲——大西洋安全结构体系之中，它过于庞大和独立，难以成为“大西方”(an expanded West)的一个部分<sup>⑥</sup>。但它同时也不甘于被边缘化，有着建构欧洲，乃至全球新秩序的诉求。而原有欧洲和平秩序自身的局限和矛盾在遇到外部挑战时被凸显出来，也开始反思应如何构建新的和平秩序，以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俄罗斯问题。2015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便以“崩塌的秩序，不情愿的保护者”为主题，将乌克兰危机视为对后冷战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其主要要解决的就是俄罗斯对旧秩序的挑战问题。

综合来看，俄罗斯的行为对现有欧洲和平秩序造成了如下关键性挑战：

#### 1. 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合法性之争

乌克兰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和媒体纷纷谴责俄罗斯破坏了欧洲和平秩序的基本原则，以及战后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前者主要

① Ebd. S. 131.

② Vgl. Weisbrode, Kenneth: EU and NATO: Interlocking or interlocking?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eu-and-nato-interlocking-or-interlocking>, letzter Zugriff am 01. 05. 2009.

③ 戴启秀：《乌克兰危机对德俄关系及全球格局的潜在影响》，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2期，第112页。

④ 冯绍雷：《乌克兰危机长期延续的原因和影响》，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2页。

⑤ R. 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47页。

⑥ 同上，第48页。

指《新欧洲巴黎宪章》中所确定的“欧洲国家边界的不可侵犯”、“对欧洲国家主权的尊重”和一个“民主、和平、团结的新欧洲”，后者则主要指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中所规定的不使用武力，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以及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中所保障的乌克兰独立和领土完整<sup>①</sup>。在西方国家看来，俄罗斯的行为违反了冷战结束以来不以武力改变边界的形式规则，因此使西方国家所致力建设的合作性欧洲安全秩序的基石受到破坏，开启了欧洲内部对抗和不稳定的新时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表明，只有当西方国家制定的秩序和规则没有侵犯俄罗斯的原则利益时，俄罗斯才会予以遵守，一旦与其基本安全利益相悖，俄将不予置理。俄罗斯不愿失去在后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在欧洲和平秩序层面，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所追求的秩序目标是不相符的，因此，西方国家有理由认为，即使乌克兰危机最终缓和，一旦有类似情况出现，俄罗斯还将做出相同的选择：对现有秩序提出挑战，以实现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新秩序诉求<sup>②</sup>。因此，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属于“修正原则的国家”<sup>③</sup>。

针对这种看法，俄罗斯方面则认为，西方国家目前所建构的欧洲和平秩序，本身就是对冷战后初期设想的一种修正，是与《巴黎宪章》中所规定的“一个民主、和平、团结的新时代”有着本质区别的。俄罗斯为摆

脱冷战所做的努力，没有在制度安排上得到认可，众多的理念，如建立欧洲安全议会等新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管控潜在冲突等，都未能落实。西方国家以“建构新欧洲和平秩序”为幌子，实际上是在促使西方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占领空间，以实现“大西洋一元主义”，使欧盟成为欧洲主导性的政治机构，北约成为首要的安全机构，大西洋共同体的价值观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sup>④</sup>。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所谓的“规范性工程”（das normative Projekt des Westens）不过是一种“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试图为整个世界代言”，一种“历史性的狂妄”，它不是建立在“更高的道德标准”，而是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之上。

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界定国际秩序的修正国家和现状国家。也不能由于美国和欧洲是当前主流欧洲和平秩序的制定者，俄罗斯是崛起国，就认为俄罗斯一定是修正主义。因为全球或地区性的霸权势力也有可能借助其实力优势，进一步改变现状，使其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sup>⑤</sup>。冷战后欧洲和平秩序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乌克兰事件前所建立的欧洲和平秩序，以及其未来潜在的发展方向无疑有利于美国和欧盟，但它与冷战刚刚结束时，《巴黎宪章》中所规定的欧洲整体和平规划并不完全一致。俄罗斯并未成为欧洲和平秩序的平等建构者，只成为大

① 吴志成：《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秩序的影响》，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22页。

② Vgl. Major, Claudia / Puglierin, Jana: Eine neue Ordnung: Der Ukraine-Konflikt stellt die Weichen für Europas Sicherheit, S. 62-63,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vember/Dezember 2014, S. 62-71.

③ 在国际秩序的语境下，修正主义国家指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受到现状的阻碍和压迫，从而要求条约、边界和领土变化，以便重新分配权力的国家。它相对的概念是现状国家，即对现行国际制度满意的国家。（钟准：《内战、干预与国际秩序：重新审视乌克兰冲突》，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3期，第79页）

④ R. 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51—54页。

⑤ 钟准：《内战、干预与国际秩序：重新审视乌克兰冲突》，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3期，第79页。

西洋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随着俄罗斯的崛起，它的诉求越来越难以被忽视。因此，乌克兰事件究其实质，是对冷战后欧洲地区的原有安全制度设计的一次拷问，是欧洲和平秩序未来发展前景的分水岭。建立一个新的、对俄罗斯具有吸引力的欧洲和平秩序，已经成为欧洲安全日程上的核心工程<sup>①</sup>。

## 2. 和平秩序的实现路径之争

乌克兰危机中所凸显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欧洲和平秩序的各保障机构中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在面对俄罗斯时被尖锐化了：针对这样一场完完全全属于“欧洲事务”的危机，美国认为，应当由欧盟作为主导力量。此外，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更多使用非传统军事力量，而北约的优势在于传统军事力量，对于混合性危机应对能力不够<sup>②</sup>；而由于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与欧盟国家利益太过息息相关，欧盟内部对如何应对乌克兰事件意见并不统一，造成行动力低下、政策执行不坚定且几乎不可能采用军事手段的局面；欧盟与俄罗斯经济上的联系和交流并未实现“以经贸促变化”（Wandel durch Handel）的既定目标，反而是欧盟国家在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依赖使欧盟的经济制裁效果大打折扣，“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从俄罗斯的角度而言，由于俄对于欧盟和北约的信任早已大打折扣，俄本身的传统现实主义安全观也更认可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因此，俄更愿意与国家，而非机构打交道。因此，到目前为止，真正在乌克兰危机解决过程

中起到实质推动作用的只有国家间政治谈判，且主导谈判的国家除事件直接参与国外，均为全球或地区强国。无论是欧盟、欧安会，还是北约，在该过程中均只起到了次要作用。

综上，根据赫德利·布尔所提出的国际秩序的五种维持方法论，乌克兰事件的解决目前依靠的主要是传统外交和大国管理的方式，而非欧洲所设想的，在国际法和区域秩序框架下，基于多边机制共同合作解决。事实上，就连德国这个最为强调多边秩序的国家，在面对俄罗斯时，都更多采取国家首脑间一对一交流，以及国家间互访和谈判等传统双边外交模式。有学者指出，乌克兰危机使得国际事务中的“再民族国家化”（Renationalisierung）倾向抬头<sup>③</sup>。而这对于目前在军事力量和安全驻防上已经完全弱化的欧盟国家来说，是一种危险的趋势。如何设法加强欧洲团结，明晰各安全机构和国家层面的分工，使冷战后建立起来的欧洲多边和平机制不至因为乌克兰危机而从根本上被动摇，是俄罗斯给欧洲和平秩序提出的另一深层次问题。

## 3. 欧洲和平秩序建构者内部矛盾的凸显

乌克兰危机实质上是俄罗斯从外部对原有大西洋模式的欧洲和平秩序提出的一次挑战，但它却同时将大西洋盟友间本身存在的矛盾摆到了台面之上。这其中包括欧美矛盾，也包括欧盟内部的矛盾。例如就有学者认为，在面对俄罗斯时，美国和欧盟的秩序建构目标是不一样的。欧盟国家更害怕俄罗斯为欧洲带来安全威胁，因此更希望能够通过与俄

① 马克·伦纳德，伊万·克劳斯提夫：《让欧盟团结·让俄罗斯后帝国化·让土耳其欧洲化》，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5月3日，第015版《多极化欧洲的幽灵》。

② Vgl. Major, Claudia / Puglierin, Jana: Eine neue Ordnung: Der Ukraine-Konflikt stellt die Weichen für Europas Sicherheit, S. 67-68,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vember/Dezember 2014, S. 62-70.

③ Ebd. S. 67.

罗斯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维系欧洲和平。尽管北约和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对于欧洲秩序的存续至关重要，但它同样也威胁到欧洲的内部整合<sup>①</sup>。与此同时，即使在欧盟内部，中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针对如何应对俄罗斯的问题也有千差万别的回答。

此外，俄罗斯对于战略多元主义的呼唤对原本占主导地位的大西洋共同体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世界新兴力量的权力重构诉求，也造成了原有秩序利益既得体内部的反思。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所谓的“规范性工程”不过是一种“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试图为整个世界代言”，一种“历史性的狂妄”，它不是建立在“更高的道德标准”，而是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之上<sup>②</sup>。这种观点虽然只占少数，但乌克兰危机后，对俄罗斯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西方政治精英应当反思自身做法的欧洲人不在少数<sup>③</sup>。

#### 四、小 结

欧洲和平秩序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为了顺应新的全球及欧洲国际环境及政治的变化，由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行为体逐步建构起来的、规范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以实现欧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区域社会原则。它以《巴

黎宪章》为起点和初始设计方案，但在现实政治操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北约和欧盟为主导机构、以大西洋共同体价值观为指导理念、以东扩为推广模式的多边化安全合作机制。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并未成为该和平秩序的平等建构者，而是逐渐被边缘化了。

乌克兰危机的出现，说明原有欧洲和平秩序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一个以俄罗斯为敌，或者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欧洲和平秩序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和设想。但与此同时，欧洲安全框架的现实情况表明，德国不可能摆脱北约和美国的影响而独自肩负重构欧洲和平秩序的责任。因此，德国一方面不放弃与俄罗斯的对话和交流，一再强调，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重筑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互信是解决冲突的最终途径，并致力于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对话和合作机制，探讨和发展双方共同利益，谨慎处理关键性地缘政治矛盾，以实现和平共赢；另一方面，利用德国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扮演“中立的声音”，以“斡旋者”的形象出现，充当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后苏联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络人。一旦德国能够缓解，甚至解决美俄、欧俄之间的矛盾，则德国就能拥有主导欧洲安全框架建构的筹码，并最终实现其设想中的欧洲和平秩序。

作者简介：李微，北京科技大学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 
- ① 伊万·克拉斯蒂夫，马克·莱昂纳多：《破碎的欧洲秩序之梦》，袁超编译，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23日，第007版。
- ② Augstein, Jakob: Auferstehung West?,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augstein-kolumne-auferstehung-des-westens-in-der-ukraine-krise-a-965390.html>, Spiegel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21.4.2014.
- ③ 李微：《德国眼中的俄罗斯形象》，载《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德国与欧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9—103页。

# 德波关系新动向

孙嘉惠

**【摘要】**2017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波兰，普遍认为这是冷战结束后德波领导人之间最重要的一次会晤。在欧盟面临内外压力 and 多重危机的局面下，德国和波兰在欧盟事务上的合作重要性凸显。然而，在欧洲理事会主席连选问题、“多速欧洲”、能源政策、难民政策等欧盟重要问题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则不仅意味着德波双边关系的新挑战，也会对欧盟的未来产生影响。德波在这些方面实现妥协，达成共识对欧盟的未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鉴于波兰执政党保守和疑欧的外交思维，近期内双方恐怕仍需在磨合中调整关系。

**【关键词】**德国 波兰 欧洲一体化 危机

2017年2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波兰，这是自波兰新政府2015年秋上台后德国总理的首次来访，被普遍认为是波兰加入欧盟后，甚至是冷战结束以来德波领导人最重要的一次会晤。邻国间领导人的国事访问能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度，本身就已经显示出目前德波之间关系的微妙：对于有疑欧疑德传统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组建的新政府而言，德国在波兰的重要外交伙伴中排序次于北约、美国、英国和东欧国家，仅被看作是波兰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国。波兰新政府推行的司法和媒体新政策在波兰国内和欧盟内部都引发了对于“民主倒退”的担忧，德国对此表达的质疑也激起了波兰方面的激烈反应。而波兰总理在履新三个月之后才访问德国，也印证了德波关系的趋冷。在欧盟面临多重危机、

德波在欧盟事务诸多问题亟待协调立场的情况下，德国总理的这次访问自然被寄予厚望。访问期间默克尔同波兰总理希德沃、波兰总统杜达及波兰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卡钦斯基进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欧盟、英国“脱欧”、移民、气候变化、安全政策，尤其是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改革以及在北约框架下加强合作等议题。两国都强调德波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和共同利益的存在，但也没有掩饰分歧。而德波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将对欧盟未来的发展起重要的影响作用。

## 一、当前欧盟形势下的德国与波兰

当今的欧盟面临内外压力：从内部来看，欧债危机的影响尚存，欧盟总体经济疲软，

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考验欧盟的团结和接纳力，欧盟本土恐怖主义活动猖獗，英国脱欧带来一系列政治影响以及对欧盟未来的怀疑；从外部来看，乌克兰危机尚无转机，叙利亚危机久悬未决，俄欧关系未归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欧美关系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危机下的欧盟急需采取措施应对，而作为欧盟创始国的德国和中东欧国家的领头羊波兰将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尤其值得关注。欧盟事务一方面可以是德波双方深化合作的机遇，而另一方面，在具体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却也意味着双边关系面临的新挑战。加之荷兰、法国和德国大选接踵而至，极右党派是否会对欧盟的政局产生何种影响尤为引人担心，2017年将将是欧盟历史上十分关键的一年。

自欧盟2004年第五次扩大以来，波兰一直被视为欧盟的“优等生”，在政治、社会改革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方面也表现突出，曾是欧债危机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欧盟国家。作为欧盟第六大经济体，波兰以其3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3800万人口成为所有中东欧国家中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在维谢格拉德集团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波兰是中东欧各国中唯一一个既有国家实力，也有政治抱负，在欧盟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sup>①</sup>自2007年图斯克政府上台后，波兰政府扭转此前卡钦斯基兄弟执政时期波兰疑欧反德的外交倾向，重新缓和与德关系。然而，由于波兰国内不满公民党的自由经济执政理念导致波兰的贫富分化等原因，法律与公正党在2015年秋波兰的议会

大选中获得全胜，在参众两院都赢得绝对多数，成为自上世纪末波兰社会转型后首个可以单独组成政府执政的政党。波兰政府履新后迅速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其中的《宪法法院法》和新的《媒体法》备受国内外质疑。在内部，波兰民众游行示威，抗议“民主倒退”。而欧盟也对此反应激烈，将其看作是对欧盟基本价值观的挑战，并针对波兰民主情况启动调查。然而，欧洲理事会“威尼斯委员会”（欧洲法治民主委员会）对要求波兰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后的效果仍不满意，甚至提请各成员国考虑是否动用对波兰采取惩罚措施。欧洲议会议员建议，欧盟成员国首脑有必要在欧盟峰会上就波兰的内政问题展开探讨，由于欧盟的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观已被质疑，所以波兰不应以“不应干涉内政”的理由来反对。但波兰不为所动，反而回应：“欧盟委员会应该负责欧洲理事会指派的任务，不要插手成员国的内政事务。”<sup>②</sup>于是波兰就与欧盟关系紧张。

作为欧盟的创始国，德国一直是欧洲一体化最积极的倡导者，同时也是欧盟内经济实力最强的工业国。在克服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以及英国脱欧后关于欧盟前景的讨论中德国政府积极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在科隆集体性侵事件、巴黎恐袭事件影响下经历了认同、质疑、批评等几重舆论转折。如今，随着难民危机的局势逐步控制，德国民众对默克尔及其所在的联盟党的支持率也在经历起伏后重归高位。<sup>③</sup>此外，工业4.0新战略带来的效果初显，尤其是过去

① 朱晓中：《波兰的“民主后退”和欧盟的两难选择》，载《世界知识》，2016年，第8期。

② Vgl. Jarczyk, Henryk: Streit zwischen Polen und EU: „Beinahe wie einen Feind behandelt“, 21.02.2017,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polen-verfassungsgerichtsreform-101.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③ Vgl. Ehni, Ellen: Gelassenheit - trotz der Anschläge, 13.04.2017,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deutschlandtrend/index.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一年间德国经济发展成果喜人，实现了近几年来经济的最高年均增长。欧盟的双发动机德法两国今年面临大选，其结果将直接影响欧盟的未来。相对法国大选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言，德国极右政党进入政府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德国已经成为欧盟的稳定之锚。

## 二、德波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加强与德国的合作符合波兰的利益：首先，德波之间经济关系密切：2016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000亿欧元，相当于波兰进出口总额的1/3，德国已经连续20多年保持波兰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其次，欧盟发展的现状的确要求德波合作。自从加入欧盟以来波兰收益颇丰，如今有200多万波兰人在欧盟其他国家生活和工作，且欧盟是波兰的投资主要来源地，波兰自然不希望欧盟出现问题而使自身利益受损。<sup>①</sup>为保持波兰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势头、促进欧盟的发展，与德国的合作不可或缺。再次，乌克兰危机阴影下德波更需要在欧盟的安全防务、外交政策方面密切合作，波兰自身安全的保障离不开与欧盟伙伴加强协调。最后，借助德国在欧盟内的影响力，波兰可以通过双边合作以及“魏玛三角”等机制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提高在欧盟舞台和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在目前欧盟面临巨大风险的情况下，德国发挥稳定作用是欧盟的希望所在。

而另一方面，德国也迫切需要在欧盟内部寻求密切的合作伙伴，波兰可以成为很好的选择：在英国脱欧、法国经济低迷、南欧国家还未从债务危机中复苏的现实情况下，波兰是德国最应该争取的欧盟内的合作伙伴，

也几乎是唯一兼具政治抱负和实力的中东欧国家；此外，自1991年全面开启正式的和解进程以来，德波关系走过了26年，经历了帮助波兰加入欧盟的德波关系黄金时期和2003年伊拉克危机开始到2007年图斯克政府上台之间的关系低谷期，逐渐回暖的德波关系需要注入新的动力。而促进欧洲一体化这一项目可以更加巩固德波和解的成果，使双方在磨合中增加互信，使德波关系不再只局限于现实利益本身，不再轻易受历史情绪所感染，而由共同的未来愿景指引。德波之间在维持欧盟统一市场、保护欧盟安全、刺激青年就业等方面存在广泛共识，以及其背后的双方在防务政策、边界安全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可以成为双方在欧盟内合作的必要基础。

## 三、德波在欧盟事务中的分歧

尽管在官方表态中德波双方都同意在欧盟内加强彼此合作的必要性，但双方在有些问题领域存在明显分歧，且对于“加强欧盟”的具体理解并不相同，近期内德波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欧洲理事会主席连任风波

在2017年3月欧盟春季布鲁塞尔峰会上，曾于2007—2014年担任波兰总理的图斯克成功连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任期将延至2019年。在欧盟27国均对图斯克的连任投赞成票的情况下，波兰投出了唯一一张反对票，且此前在欧盟内部多次阻止图斯克再选，并以退出欧盟罗马峰会相要挟。波兰政府反对的理由是图斯克破坏了欧盟领导人的“中立性”原则，干涉波兰内政；图斯克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却对德国等主要欧盟成员国唯

<sup>①</sup> 管克江，冯雪珺：《德国总理华沙之行被认为是波兰入盟以来两国间最重要的访问：重塑欧盟，德波两国加紧“对表”》，载《人民日报》2017年2月10日，第21版。

命是从，没有代表波兰人民的利益。而欧盟各国认为，图斯克并没有偏袒和代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这正是其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称职的体现。此外，在欧盟面临多重危机的局面中，各成员国都不愿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寻求另外的合适人选。<sup>①</sup>在欧盟内部，波兰引起多国的不满，处于孤立状态，图斯克获得连选无异于给波兰的一记耳光和外交失败。在《罗马条约》60周年签字仪式上，波兰总理签字时无人鼓掌。而波兰指责德国强迫其他国家选择支持图斯克，波兰外长瓦什奇科夫斯基称：“众所周知，欧盟已经被柏林控制了。”<sup>②</sup>波兰政府将这次外交失败看作积极维护波兰利益的努力，因为德国在欧盟内部一家独大并非好事。<sup>③</sup>这反映出波兰对德国欧盟政策的不信任，以及对其会控制欧盟、为己所用的担忧与怀疑。

本国国民能够当选欧盟最高决策机构负责人并获得连任这一对多数国家而言堪称殊荣的事，却在图斯克自己的祖国波兰遭到反对。这背后有多重原因：首先，卡钦斯基及法律与公正党和图斯克及其领导的自由派公民纲领党间的政治对立由来已久，前者十分反对后者亲欧、亲德的外交立场，指责其出卖波兰利益，对德国态度谄媚。其次，2010年4月时任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等波兰政要乘坐的飞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机场坠毁，他的双胞胎兄弟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

（现任法律与公正党主席）指责图斯克领导的时任波兰政府缺乏彻底调查事故原因的意愿，并认为这是俄波两国高层串通炮制的一场“阴谋”。所以在2015年秋赢得大选之后，新政府就重启对该事件的调查。2017年3月，波兰国防部长马切雷维奇对图斯克提出“叛国罪”指控，指责其在对这起空难事件中存在处置不当之嫌。最后，另有分析指出，除了党派政治斗争和“私人恩怨”的新仇旧恨之外，法律与公正党对图斯克的指责是在预先做铺垫，以防图斯克按公民纲领党的意愿在欧盟任期结束后重归波兰政坛，以党派总统候选人身份冲击2020年的波兰大选。<sup>④</sup>这就解释了波兰为何不惜以在欧盟内被孤立为代价而进行反对。

## 2. 应对难民危机

2015年9月，以叙利亚小难民在海滩上遇难的图片触动整个西方世界为转折点，欧盟各国就难民危机的应对展开讨论，态度具有显著的国别特征。尽管面临巨大压力，德国作为最主要的接纳国家，成为欧洲国家接纳和安置难民的典范。<sup>⑤</sup>德国期待别国能够共同承担接收难民的责任，而随着科隆跨年夜集体性侵事件及难民与接收地居民的冲突等问题，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在德国国内遭到质疑。以巴黎恐袭事件为代表的欧洲本土的恐袭活动引发了欧盟层面急剧的舆情变化，

① Vgl. Schöberl, Sebastian: Polen gegen Tusk: Auf dem Weg zur politischen Ohrfeige, 09.03.2017,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tusk-ratspraesident-101.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② EURACTIVE.com: Tusk bleibt – Polen poltert, 10.03.2017, <https://www.euractiv.de/section/wahlen/news/tusk-bleibt-polen-poltert/>,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③ Vgl. Zeit Online: Strafanzeige gegen Donald Tusk, 22.03.2017,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polen-jaroslaw-kaczynski-regierung-blog>,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④ 环球时报：《欧洲理事会主席遭波兰“叛国”指控，被指与俄串通炮制“阴谋”》，<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3/10358936.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17日。

⑤ 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进程、特征及近期发展前景》，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欧盟决定向各成员国摊派难民接收名额的做法遭到中东欧国家的抵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称这是默克尔强加给欧洲的“道德帝国主义”。<sup>①</sup>起初，时任波兰政府接受欧盟的安排，德国对波兰的支持表示感谢。2015年秋政府换届后，新任波兰政府虽不赞同，但仍决定履行前任政府承诺的难民接收义务。然而，在2015年11月巴黎恐袭事件后，波兰政府决定拒绝欧盟的难民政策安排。波兰议会认为，难民和移民政策的主权必须在民族国家手中，但同时宣布愿意为难民来源国和其邻国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在之后的波捷政府磋商会议、维谢格拉德四国峰会等诸多场合，波兰与其他中东欧国家协调共同立场，联合声明拒绝接受欧盟摊派名额。而在2016年7月法国尼斯再次发生恐袭事件后，波兰内政部长布莱查克表示，恐袭的原因在于欧盟内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和“政治正确”所致，因为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无法融入是一个事实。欧洲价值观、波兰的基督教文化和难民所代表的伊斯兰文化无法共存。如果波兰没有经历政府换届，那么将会在前届公民党和农民党政府的领导下犯西欧国家一样的错误，接收数千名难民。难民问题必须通过加强欧盟外部边界才能得以解决。<sup>②</sup>波兰总统杜达强调，中东欧国家都认同欧洲是各个民族国家的欧洲，鉴于欧洲的历史，各国追求自由、自决、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在希腊的欧盟移民事务议员向欧盟抱怨不应当拒绝接受从希腊和意大利来的难民，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要求欧洲理事会不对不接受难民的欧盟国家采取措施的背景下，2017年3

月28日，波兰总理再次批评目前欧盟的难民政策，并强调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将不会接受欧盟在此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波兰防长称，各中东欧国家的共同点是基督教文化、民族国家重要性、苏联占领的历史和二战德国的侵略历史。因此，对于这部分欧洲国家而言，面对的威胁既来自俄罗斯，也来自欧盟对民族国家的质疑和否定，而难民潮带来的恐怖主义是一大威胁。

波兰和德国在难民危机的应对政策方面的立场不同有多重原因：首先从总体上而言，波兰对欧盟的多元文化融合政策持否定态度。波兰深受天主教影响，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难以兼容，并不具备与异教文化打交道的传统。而德国则长期鼓励宗教间兼容并包的不同宗教间的共处，有与多元文化交往的经验。其次，相比德国较强的经济实力而言，波兰毕竟在财力上相对弱势，无力支付接收大量难民的经济和财政支出。第三，有过二战经历的德国，其历史背景要求它承担更多救助难民的责任<sup>③</sup>，这已是深入德国政治文化的价值观要求。而波兰则不具备这个因素，更强调民族国家利益和本国公民的权益。最后，德国在欧盟内部呼吁摊派名额的行为本身招致波兰反感，明确表示对德国“家长作风”的反对。而“为了波兰人民的利益”反对德国、反对欧盟的立场又可以使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的形象更加积极正面（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民粹主义的影响）。

### 3. 能源与气候政策

“能源联盟”最初由时任波兰总理的图斯

① 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政治影响的双重分析》，载《德国研究》，2016年，第1期。

② Vgl. Deutsches Polen-Institut Darmstadt: Chronik 5. Juli 2016- 5. September 2016, in: Polen-Analyse Nr.186, S.13; Deutsches Polen-Institut Darmstadt: Chronik 6.-19. September 2016, in: Polen-Analyse Nr.187, S.11, <http://www.laender-analysen.de/polen>,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③ 郑春荣：《德国在欧洲难民危机中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载《同济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克提议，他强调欧盟国家间在欧洲能源政策和能源安全供给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尽管德波在能源安全问题上面临相似的挑战，但却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

首先，德国是欧盟内倡导新能源的先驱和领导者，决定放弃核能，着力增加能源结构中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比重，这一立场以德国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实力为前提。德国也长期致力于呼吁欧盟伙伴进行类似改革。而波兰首先对于核能的利用持不同看法，不仅不打算放弃，甚至还在考虑新修核电站。且煤炭等传统能源对波兰的能源体系至关重要，推广可再生能源所要求的技术条件和资金条件对于波兰来说都较难承受。第二，波兰看好页岩气的推广和使用，而德国则对其产生的环境后果担忧而持怀疑态度。不过，上述分歧都还只是德波各自民族国家对能源供给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双方在天然气管道北溪项目上的分歧则对欧盟产生影响：早在2005年俄罗斯能源公司Gazprom和德国能源巨头E.ON签订合同时就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激烈反对，波兰外长西克尔斯基还将其比作“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因为这一穿越波罗的海海底的管道绕开了波兰、乌克兰等陆上邻国，一方面使它们损失管道过境的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丧失与俄罗斯在能源问题方面的谈判砝码：未来俄罗斯更可以在不影响向德国等西欧国家输送天然气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切断对这些中东欧国家的能源供给。所以，当

2015年这一项目的二期“北溪2号”计划一出，就遭到了再次的强烈抗议。在德波领导人的多次会晤中，波方表达了对“北溪2号”的怀疑态度，认为该项目政治意味浓厚，破坏了欧盟的团结，与能源联盟的目标背道而驰。2016年3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9个欧盟成员国联合致信欧委会主席容克，反对德俄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称其会损害中东欧的能源安全，使它们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性有增无减。<sup>①</sup>虽然德国国内也就这一管道引发的邻国抗议、环境问题和较高的造价等原因有所质疑。然而，针对波兰等国的反对声音，德国政府的回应认为这一项目的德俄合作纯属经济性质与动因，并没有针对陆上邻国的政治意味。<sup>②</sup>8月底，美国副总统拜登也明确表态反对“北溪2号”，认为“北溪2号”将使欧洲更加依赖俄罗斯的能源。<sup>③</sup>

这一立场的分歧原因首先在于德波对能源政策的视角不同：波兰更注重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的能源霸权持恐惧与警惕态度；而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则更多的是从经济收益和实用性的角度考虑；其次，由于德波对与俄罗斯（尤其是在能源方面）合作的态度和立场不同。这一案例明确反映出，对德国而言，在能源政策方面的利益及与俄关系比与波兰加强关系或维护欧盟的团结性更重要。<sup>④</sup>而与在国家安全领域特别重视国家主权、拒绝其他欧洲国家在反导体系问题中有参与权

① 商务部驻波兰经商参处：《欧盟9个成员国致函欧委会反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http://pl.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3/20160301280609.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17日。

② Vgl. Heinrich, Andreas et al: Analyse: Auf einem Weg zur gemeinsamen EU-Energiepolitik? Debatte über Energiesicherheit in Polen und Deutschland, 04.11.2016, <http://www.bpb.de/internationales/europa/polen/236684/analyse-auf-dem-weg-zu-einer-gemeinsamen-eu-energiepolitik-debatten-ueber-energiesicherheit-in-polen-und-deutschland>,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③ 李增伟：《“北溪2号”遇阻凸显欧盟分歧》，载《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日，第21版。

④ Vgl. Jäger, Thomas/Dylla, Daria, 2008: „Deutschland und Polen: Die europäische und international Politik“, 1. Aufl. ed.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S.27.

的立场不同，波兰在能源政策方面认为多边机制和组织更能为其提供和保障安全，故致力于呼吁各国以共同的欧盟能源政策为导向，支持北约发挥能源联盟的作用来多边地规制能源供给的安全。

#### 4. 对“多速欧洲”的态度

德波间的另一显著分歧体现在对欧盟未来的设想及对待“多速欧洲”的态度上。2017年3月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会全会布鲁塞尔峰会上公布了英国“脱欧”后欧盟未来的白皮书，其中对2025年“27国欧盟”提出了五种设想。<sup>①</sup> 欧洲议会、成员国议会、地方政府和公民团体将对这几种设想展开讨论，最终欧洲理事会在201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前拿出行动方案。而所谓“愿者多做”正是指此前德、法、意、西四国在2017年2月初马耳他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表示出对“多速欧洲”的一致赞同立场。

“多速欧洲”，前称“双速欧洲”，是指在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为克服成员国利益和偏好的差异，允许部分国家选择性参加一体化的特定进程，或由核心国家先行在某一领域启动深化一体化的政策、待条件成熟时其他国家参与其中的政策模式。”<sup>②</sup> 在这一设想中，有意愿的国家可以在防务、货币、税收等领域加速推进一体化，其他国家可以选择不参与。作为欧盟创始国、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德国对英国脱欧的反应是再次

提出“多速欧洲”方案。2017年3月25日召开的欧盟罗马峰会上，默克尔表示：“多速欧洲绝不意味着共同欧洲的不存在。我们在这儿明确表示：我们要朝同一个方向努力，有些东西是绝对无法放弃的。”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指出，目前欧盟事实上已经存在多速的现实——不与欧盟区重合的申根国和欧盟27国中只有19个国家加入的欧元区。“多速”的原因在于，不能因为等最慢的国家而使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停滞不前。<sup>③</sup>

但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对“多速欧洲”的提法反应激烈，担心被排挤于欧盟的核心之外及被边缘化。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四国总理在华沙发表联合声明，称不会同意这样的分隔。<sup>④</sup>

然而，目前波兰政府的一些举动却已显示出逆转前任政府的欧盟政策和脱离欧盟的倾向：加入欧元区是波兰加入欧盟后承诺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另一重要步骤，2010年科莫洛夫斯基当选总统时表示将争取波兰在5年内加入欧元区。<sup>⑤</sup> 然而，随着欧债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欧元区的吸引力下降，波兰停下了加入欧元区的步伐。现任波兰总理希德沃明确表示，“我的政府绝对不会推动波兰加入欧元区”。另外，虽然波兰也支持建立欧盟共同安全外交政策（GASP）和欧盟共同安全防务政策（GSVP），但是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在波兰的优先排序中仍是美国和北约居于首位。这一方面与波兰的亲美传统有

① 人民网：《欧盟白皮书提出“27国欧盟”的五种设想》，<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302/c1002-29119506.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

② 王展鹏：《英国脱欧公投与“多速欧洲”前进》，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4期。

③ Vgl. Meyer-Feist, Andreas: EU-Gipfel: Feiern ohne Feierlaune, 25.03.2017,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eu-gipfel-rom-103.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④ 新华网：《多速欧洲前路坎坷》，载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7-03/10/c\\_136118147.htm](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7-03/10/c_136118147.htm)，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

⑤ 马细谱，李少捷（主编）：《中东欧转轨25年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78页。

关,另一方面,波兰认为只有北约和美国有军事实力帮助其抵御可能的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乌克兰与俄罗斯军事冲突的背景下,2016年夏北约华沙峰会决定每年在波兰和波罗的海轮流驻扎1000名士兵,2017年内还将向波兰增派3500名士兵。<sup>①</sup>波兰对此十分欢迎,因为俄罗斯对波兰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被视为是对北约的进犯,北约的集体防御足够为波兰提供所希望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波兰防长宣布波兰将在未来3-4年中逐渐从欧洲军团(Eurokorps)<sup>②</sup>撤回波兰士兵,同时将放弃一直致力于成为正式成员国的计划,保持联系国的地位。这一做法目的是为了减轻在北约的军事行动压力,反对党批判说这种做法会将波兰从欧盟中心带离。<sup>③</sup>

在罗马条约签订60周年前夕,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等人联合致信波兰现任总理希德沃,对其对抗和怀疑欧盟政策的立场表示担忧,因为这会导致波兰的政治边缘化,将被德国等能够决定欧洲一体化未来的国家所孤立。瓦文萨等前波兰领导人认为,在全球化挑战和威胁加剧的背景下,许多问题只有在欧盟层面才能得到解决,现任波兰政府有必要考虑推行负责任的欧盟政策。欧盟的倒退将意味着无法应对如今全球化形势下的挑战。<sup>④</sup>

有媒体报道称,法国国民阵线领导者勒庞如若赢得法国大选,将会联合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一起反对欧盟并寻求退出,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主席卡钦斯基驳斥了这一说法,称“如同我们和普京没有共同点一样,波兰也与勒庞没有共同点”。<sup>⑤</sup>整体上而言,波兰并不会像英国一样考虑退出欧盟。英国脱欧后,波兰政治精英认为有必要对欧盟进行改革,对欧盟条约做出改变。卡钦斯基认为,“更多的欧盟”这一理念不能够结束现有的危机,而应该在加强民族国家角色基础上出台一个统一欧洲的新概念,保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使民族国家的机制、议会在超国家层面的决策过程中得到加强。<sup>⑥</sup>

现任波兰政府对于“多速欧洲”和欧盟未来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担心被边缘化,于是从表态上坚决反对“多速”的提法;但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单独的立场或联合中东欧国家反对欧盟决策的做法,事实上也恰恰是“多速欧洲”的例证。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危机倒逼欧盟采取措施,而后德、法、意、西等欧盟国家重提“多速欧洲”,表现出进行变革、挽救欧盟的决心。不过,德国和波兰对于欧盟“变革”的理解和设想不同:前者提倡有意愿有实力的国家在让渡主权、进一步融合方面快速先行;而后者则注

① Vgl. Zeit Online: Polen zieht Soldaten aus Eurokorps zurück, 28.03.2017,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7-03/europaeische-union-polen-eurokorps-soldaten-abgezogen>,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② 欧洲军团是1993年成立的由德国、法国、西班牙、卢森堡和比利时等国军队组成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成为欧盟防务的核心,波兰一直致力于成为正式成员国。

③ Vgl. Deutsches Polen-Institut Darmstadt: Chronik 21. März - 3. April 2017, in: Polen-Analyse Nr.198, S.14, <http://www.laender-analysen.de/polen>,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④ Vgl. Ebd., S.13.

⑤ Vgl. Deutsches Polen-Institut Darmstadt: Chronik 7.-20. März 2017, in: Polen-Analyse Nr.197, S.12, <http://www.laender-analysen.de/polen>,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⑥ Vgl. Korniyuchuk, Andriy: Analyse: Polnische Überlegungen zu Europa, 05.10.2016, <http://www.bpb.de/internationales/europa/polen/234989/analyse-polnische-ueberlegungen-zu-europa>, letzter Zugriff am 17.04.2017.

重强调民族国家作用和地位，实际上是满足于部分的、有限度的一体化。波兰政府不惜在欧盟中被孤立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希望在欧盟内保持波兰的民族国家特征，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另一方面，拒绝融合、频频“捣乱”却只会适得其反，让波兰在欧盟内部被孤立。究其原因，是波兰对待欧盟的矛盾态度，没有明确理智而可持续的欧盟政策。

#### 四、总结与展望

现任波兰政府更看重欧盟的共同市场，对于深化欧盟的政治合作兴趣不大，并没有明确的欧盟政策，对欧盟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惧怕被德国等欧盟国家架空，图斯克连任风波、反对“多速欧洲”等事件反映出其对德国及其欧盟政策深深的不信任，坚持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独立性；另一方面，欧盟对波兰意义重大，波兰也并不希望欧盟真正瓦解，并致力于在欧盟内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和地位，成为与德法等大国真正平起平坐的力量。这一矛盾的深层根源在于，对于一个历史上多次被周边列强瓜分、123年在欧洲版图上不存在的波兰而言，民族国家主权来之不易，意义重大。

尽管“多速欧洲”遭到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的反对和警告<sup>①</sup>，但这有可能会成为欧盟未来发展的模式，是法、德、意、西等国在英国脱欧后及一系列危机下所做出的反思和回应，即通过增强灵活性来应对由成员国特征和利益的异质性所导致的欧盟问题，提高效率，推动有意愿和有力量国家在融合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远。尽管这一局面并

不会马上实现，欧盟未来具体采取的妥协方案也仍在酝酿中，但不失为目前形势下欧盟通过变革以求生存的一个出路。如果欧盟依旧理想化，一味强调团结，就难免自己束缚手脚。尽管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对此表示反对，但却也没有能力和理由扭转这种局势。在“多速欧洲”的未来，德波之间仍然存在合作空间和可能性，通过沟通和对话了解和解决分歧、协调立场尤其重要。

同时，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中坚力量及德波关系和解中的发起方，德国应该学会理解波兰的诉求及其背后的原因，不应不切实际地期望波兰做出与自己国力和意愿不相符的改变。例如在大力推广新能源、放弃煤炭的使用方面，波兰毕竟与德国国力、财力不同；在主权让渡问题上，波兰自然与具有“后民族国家”特征的德国也有不同的感知和意愿。此外，鉴于波兰惧怕被德国等欧盟核心成员国架空的心理，在欧盟的决策中尽可能地纳入波兰，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具体落实起来也需要德国的外交家发挥智慧和创造力，例如1991年由德国外长根舍发起的德法波“魏玛三角”这一创造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不应忽视的是：在能源问题上德波的不同立场与对俄关系有关；在安全问题上，德波对于依靠美国力量的分歧也与对美关系的传统有关；而波兰对于德国在欧盟独大的惧怕也来源于其自身的历史经历。这些历史记忆所造成波兰惧俄、亲美、疑德印象的淡化和转变本身都需要时间。

2017年对欧盟而言是尤其关键的一年，核心成员法国和德国均将分别举行大选，而前者由于民粹政党势头正劲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国民阵线的勒庞赢得大选，法国

<sup>①</sup> 商务部驻欧盟使团经商参处：《图斯克反对欧盟四大国的“多速欧洲”方案》，<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m/201704/20170402546169.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

很可能会按其竞选纲领中所承诺的一样逐步就退出欧元区和欧盟举行全民公投，而这几乎意味着欧盟的瓦解。虽然目前看来这一局面真正出现的几率并不大，但是多次“黑天鹅”事件下，当今的国际政治局面难以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

英国脱欧事实上已经给欧盟的形势及整个欧洲的政治生态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法国脱欧的情况得以避免，欧盟 27 国将会重新调整欧盟前进的方向和方式。波兰深知欧盟，尤其是其共同市场对波兰的重要意义，因此将不会走像英国一样脱欧的道路。在新的局势下，波兰作为德国在欧盟中重要伙伴的地位有机会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在波兰现任执政党和总理期间，波兰强调民

族国家立场、游离于欧盟边缘、打擦边球以求为波兰谋利的局面不会有大的改观，像在图斯克执政期间的波兰积极配合德国的局面却不大可能出现。德波关系不会一帆风顺，将会伴随在某些问题上的摩擦，甚至某种程度上关系的倒退，但不会出现根本分歧或对德波关系的否定。鉴于波兰执政党保守和疑欧的外交思维，近期内双方恐怕仍需磨合中调整关系。而波兰对德国的怀疑心理则仍需要时间来克服。欧洲理事会主席连选问题、“多速欧洲”、能源政策、难民政策等欧盟重要问题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则不仅意味着德波双边关系的新挑战，也会对欧盟的未来产生影响。德波在这些方面实现妥协、达成共识对欧盟的未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作者简介：孙嘉惠，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 欧洲一体化中的德国和英国

李倩瑗

**【摘要】** 欧盟如今深陷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离心力加大，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三重危机叠加，加之英国脱欧，让欧盟的发展前景扑朔迷离。本文拟在“文明力量”理论、退出以及发声机制以及“离岸平衡手”概念的基础上从历史原因分析德国和英国现今的欧盟政策。对欧盟来说，无论是颠覆“欧洲的德国”而使“德国的欧洲”成为指导原则还是欧盟“离岸国”英国最终通过全民公投脱离欧洲，这两个极端发展都对欧盟的发展并无益处。在欧盟多重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欧盟是顶住危机继续向前发展还是在危机中分崩离析，德国在欧盟中的作为和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内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欧盟的出现和发展是一种进步，欧盟机构对于民主、人权、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融合等目标和价值的重视是一种进步，欧盟走向倒退实则是一种退步。

**【关键词】** 德国 英国 欧盟 文明力量理论

欧盟如今深陷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多重危机，离心力加大，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三重危机叠加，加之英国脱欧公投的临近，让欧盟的发展前景扑朔迷离。欧债危机远未平息，青年失业率增高，右翼党派在全欧洲都有势力和影响增大的趋势，难民危机让欧盟内部产生了信任危机。加之近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es Konsortium investigativer Journalisten，简称ICIJ）发布的《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和由此带来的权贵避税丑闻让英国、冰岛等国的领导人陷入信任危机，欧盟的邻国或毗邻地区，

如乌克兰、叙利亚等国相继发生战乱和不安定因素和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以及申根国和欧盟各国对难民自由流动的不同意见，欧盟相对薄弱的安保力量，恐怖袭击在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相继发生，让坚持“自由、民主、和平”等价值观的欧洲陷入了冷战后最大的危急时刻。难民危机更是暴露出欧盟各国政策协调性的严重不足，欧盟并非“用一个声音”说话。此次难民危机体现了欧盟必须考虑欧盟层面和国家层面解决方案的平衡。

在欧盟深陷危机之际，分析欧盟的两个重要国家，即德国和英国的欧盟政策就显得

尤为重要。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后以及冷战后，德国和英国在此方面的立场经常相去甚远，这经常也是两国矛盾产生的中心原因。本文拟在文明力量理论、退出以及发声机制以及“离岸平衡手”概念的基础上从历史原因分析德国和英国现今的欧盟政策。

## 一、“德国文明力量理论 2.0 版”、退出和发声机制以及“离岸平衡手”

由于德国和英国的欧盟政策成因复杂，笔者在理论分析部分使用了几组概念来分析，其中德国文明力量理论主要用来分析德国的欧盟政策，而退出发声机制和“离岸平衡手”的概念主要用来分析英国的欧盟政策。

### 1. “德国文明力量理论 2.0 版”

1992 年，毛尔教授及其课题小组从对国家角色期待的角度出发开展“文明力量”理论的研究<sup>①</sup>。“文明力量”主要强调承担这一角色的国家非军事强权的状态，以及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非军事手段。“文明国家”的外交理念主要包括三个核心内容：首先，提倡采取非武力的方式（如协调、对话、谈判等）解决冲突，并致力于将武力解决冲突的方式降到最低点。第二，赞成加强国际法以及多边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第三，促进国际关系的文明化。<sup>②</sup>

2015 年，毛尔教授撰写并发表了《在外交部“反思 2014”项目结束后的德国外交政

策：文明力量 2.0？》一文，对该理论进行了发展<sup>③</sup>。他认为德国外交以文明力量为导向的基本方针并没有很大改变，只是在个别领域中有所调整。他认为，德国应在欧盟内发挥领导作用并在欧洲充当美国在欧洲曾扮演的“善意的霸主”（wohllollender Hegemon）的角色。德国的领导风格应该表现为：1）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利益和目标；2）有建构的意愿并且发展可行的行动战略；3）通过寻找伙伴国并与其联合共同开展灵活外交；4）在多边组织中寻求解决方案；5）在寻求多边组织框架内的解决方案时也需要充分调动自身优势资源。德国外交遵循“三不原则”即绝不重蹈覆辙、绝不单打独斗和政治手段解决先于武力解决（never again, never alone, politics before force）。德国作为文明力量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它在欧盟内能否成为领导型力量的关键因素。

本文认为，毛尔教授受到康德观点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彻底的反思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晚年著作《永久和平论》<sup>④</sup>中认为，战争只不过是自然状态之一种可悲的、以武力来肯定自己权力的必须手段。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建成的共和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联盟结合的中心点，使得它们可以与之联合，而且遵照国际权力的观念来保障各个国家的自由状态，并通过更多方式的结合来扩大。

文明力量理论是德国政治学家通过对二战和欧洲大量战争的反思得出的具有德国式

① Maull, Hanns W.: Zivilmacht Deutschland. Vierzehn Thesen für eine neu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in: Europa Archiv, 1992, No. 10, S.269-278.

② 于芳：《德国的国际角色与外交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③ Maull, Hanns W.: Deutsche Außenpolitik nach der “Review 2014” : Zivilmacht 2.0?, i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2015, No. 3, S. 323-341.

④ 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思辨思维的理论。

## 2. 退出和发声机制以及“离岸平衡手”

阿尔伯特·赫希曼在《退出、发声和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退化的回应》一书中曾就组织退化和复原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在他看来，一旦组织制度出现退化，其成员产生不满，组织成员可以采取两类基本策略来促进组织制度的复原：发声（voice），即在组织内部表达意见，寻求组织领导层做出相应的改变；退出（exit），即从组织中脱离，来迫使组织做出必要的改变。与此同时，他也分析了两种策略的混合运用，认为退出的可能性有助于强化发声机制的有效性。<sup>①</sup>英国此次以脱欧公投相逼，就是希望欧盟能够接收其改革建议，即通过退出的可能性来强化其发声机制。

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了“离岸平衡手”<sup>②</sup>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分析了英国和美国依据其地缘优势在历史上用来掌控大陆国家的行为。英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基本上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拥有更大的潜在权力，但英国并未将其丰富的资源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实力并试图控制欧洲。大国的最终目标是获得地区霸权，并组织相匹敌的竞争对手在全球不同地方的崛起。本质上，获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在其他地区扮演着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不过，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但

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

从历史上来看，自英国建立海上霸权后，欧洲大陆就是英国和欧陆列强角逐的主要场所，英国通过均势原则左右欧陆均势，在欧陆局势趋于稳定后，又通过实行孤立原则，保持行动自由。孤立原则和均势原则是英国近代同一对欧基本外交方针的两个方面，孤立原则又是维持均势原则的条件之一。<sup>③</sup>虽然二战后英国丧失了“离岸平衡手”和奉行孤立主义的能力，但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它在费尽周折加入欧共体后仍然认为自己是欧盟的“离岸国”，仍对欧洲一体化充满怀疑。

## 二、试析德国欧盟政策产生的历史原因及“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

### 1. 德国欧盟政策产生的历史原因

德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出现相对英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要晚。现代德国发展的优势是位于欧洲交通的十字路口，有利于德国和东、西、南、北欧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广泛的交流，把整个欧洲的发展汇成一片，这不仅对德国本身有利，也对整个欧洲的发展非常有利。但这种地理位置也给德国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正如俾斯麦所说：“上帝已经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位置，我们的近邻不允许

① 阿尔伯特·赫希曼：《退出、发声和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退化的回应》，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第23页。

②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262—297页。

③ 洪邮生：《试论英国对欧孤立主义传统》，载《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30页。

我们在只求苟存的泥潭中打滚。”<sup>①</sup> 欧洲某些国家和地区之间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就会迅速蔓延到德国，甚至会使德国变成矛盾和冲突的焦点。这种劣势使各种资源极为丰富的德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未能很好地发展。同时，英、法、俄等欧洲大国都不愿看到中欧出现一个强大和统一的德国。德国处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包括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斯拉夫文明等在这里交汇碰撞，不断产生冲突和紧张。<sup>②</sup> 从德国的历史经验和地缘角度来看，一个和平的欧洲对德国非常重要。

二战后，阿登纳从政治和战略角度出发，坚定地融入欧洲（欧共体），目的是通过让渡部分主权换取德法和解，谋求恢复联邦德国完全主权并实现两德未来统一，而且也是为了创建一个不同于传统欧洲均势的欧洲安全共同体结构。<sup>③</sup> 美国学者汉里德和奥顿写道：“把经济力量变为政治力量，把政治要求变为经济要求，这些做法使德国人由于不能把政治要求变为军事和战略语言的不利条件得到了补偿。”<sup>④</sup> 政治和安全因素在欧洲一体化动力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可或缺，在许多场合，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市场逻辑是在符合相应的政治逻辑的情况下起作用的；所不同的是，市场逻辑需要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偏好的趋同而达到让渡主权的共识，政治逻辑则是基于它们出于安全和政治考虑的共同意愿而并不

要求其政策目标的必然一致性。<sup>⑤</sup> 欧盟给德国提供了扩大在欧洲影响的机会，通过一体化德国政治和战略地位空前提高。

## 2. “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

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政治家埃贡·巴尔（Egon Bahr）在其1998年出版的《德国的利益》一书中对德国的国家利益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德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利益”和“重要利益”<sup>⑥</sup> 三类。德国生死攸关的利益是保证整个欧洲的稳定；而保证欧盟深化和扩大以及保持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则是德国极其重要的利益。德国的核心利益有两根支柱，即欧洲的共同利益和跨大西洋合作。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定位不同，德国更倾向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战略定位。除了地缘战略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德国的硬实力并不强，而其作为文明力量希望可以建立一种军事实力不发挥关键作用的制度体系。用二流的军力来实现永恒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均富。<sup>⑦</sup> 2005年默克尔政府《联合执政协议》首次将欧盟政策置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前，强调欧盟政策的重要性<sup>⑧</sup>。

德国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是欧洲的稳定与安全。统一以后的德国地理位置、经济与安全利益结构都决定了任何国际危机都会直

① 陈晓律：《1500年以来的英国与世界》（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之一），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5页。

② Kitchen, Marti: *Germa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36.

③ 洪邮生：《绪论：欧洲国际关系演进的现实逻辑与价值取向刍议》，载《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现实逻辑与价值取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5页。

④ W.F. 汉里德，G.P. 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5页。

⑤ 洪邮生：《绪论：欧洲国际关系演进的现实逻辑与价值取向刍议》，载《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现实逻辑与价值取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6页。

⑥ Bahr, Egon: *Deutsche Interessen*, Karl Blessing Verlag, 1998, S. 24-25.

⑦ 李倩媛：《对德国外交中利益与价值观因素关系的解析》，载《德意志文化研究》第七辑，第84页。

⑧ 联邦政府：《2005年联盟条约》，2005年，第146页。

接而深刻地触动它的利益，德国对国际体系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德国具有一定的“后民族国家”特性，即向欧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希望建立超国家的管理体制，把各国自身的利益从一种竞争状态引入合作过程中。“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是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1953年的讲话<sup>①</sup>中谈到的：“欧洲统一的障碍来自欧洲其他民族对德国纯正目的的怀疑和对德国霸权企图的恐惧；在他们看来，德国的升级与活力将会重现霸权企图，这是无法掩饰的。因此，德国新一代年轻人的使命是明确一致地宣示自己的愿望：不要一个德国的欧洲，而要一个欧洲的德国。”德国作为欧洲的领导力量表现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以及德国的经济治理模式（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作为欧盟内的典范模式等方面。从某方面来说，“德国的欧洲”是一种客观存在，德国一直是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起冲击作用的势力。德国对欧洲的冲击作用主要是它在面积狭小、国家众多的欧洲地缘政治的中心地位决定的。坚持“欧洲的德国”是原则问题，而“德国的欧洲”是具体操作。<sup>②</sup>或者也有学者将德国在欧盟的定位称为“在德国化的欧洲内欧洲化的德国”<sup>③</sup>。

诚然，德国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建构力量”，尤其是施罗德和默克尔执政以来，德国政府更加坚定地以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进行外交活动，他们在欧盟内更倾向于使用政府间的途径进行斡旋，即跟成员国进行自由

谈判，而并非使用一体化联盟方法，即通过欧盟机构来解决。这也招致一些欧盟国家的诟病。

### 三、试析英国欧盟政策产生的历史原因及英国脱欧公投

#### 1. 英国欧盟政策产生的历史原因

英国从未试图直接支配欧洲，而是依靠其军事力量在欧洲之外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帝国。英国两面靠洋，地理上由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隔开，这使它事实上不可能征服和控制所有欧洲国家。英国采用了离岸平衡策略（offshore balancing strategy）。正如艾克·克罗爵士（Sir Eyre Crowe）在著名的1907年关于英国安全政策的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通过将其力量投入到反对最强大的那个国家的政治独裁一方来把英国的长期政策与维持（欧洲）平衡画上等号，这几乎成为一个历史的真理。”<sup>④</sup>

一方面从英国的外交传统来说，英国对欧洲大陆始终采取所谓平衡外交的手段，英国长期以来对欧洲大陆外交的原则是避免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权对其产生威胁。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们同欧洲在一起，但不是其组成部分，我们对它感兴趣并同它联系交往，但不能被并入或同化。”

英国能够在近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与它的区位优势是有一定关系的。不列颠群

① Mann, Thomas: Ansprache vor Hamburger Studenten, in: „Gesammelte Werke“ Band 10: Reden und Auf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1990, S.402.

② 连玉如：《“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问题新考》，载《国际政治与德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③ Roo, Ulrich: Deutsche Außenpolitik,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0, S. 216.

④ Crwoe, Eye: 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France and Germany, Jan.1, 1907, in: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vol.3.

岛是一个地理位置极为独特的地区，它既能受到欧洲大陆文明进步的影响，又不至于随时受到大陆强权的直接控制。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给英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基础。在历史上，英国面对欧洲诸国的角力，可以很巧妙地使自己置身事外，并且在新的机遇面前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内部关系。<sup>①</sup>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外交的传统底蕴非常深厚，其全球视野宽广，政治经验成熟。在历史上，英国常能敏锐地抓住国际政治的根本趋势，并抢占先机加以适应。近代以来，英国在复杂的欧洲政治斗争中纵横捭阖，灵活转换敌友关系，准确把握战略时机，成为欧洲头号殖民强国。时至今日，英国外交仍然继承着视野开阔、灵活务实的传统。<sup>②</sup>在卡梅伦政府上任之初，英国曾提出“特色鲜明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着眼于求变的方针。当德国、法国还在为欧盟的未来绞尽脑汁的时候，英国内部已有清醒的战略认知和政治共识，把外交重点转向新兴国家。

美国学者 W.F. 汉里德和 G.P. 奥顿在分析英国与欧共同体关系时写道：“英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在感情上与欧洲大国分离开来的习性。英国人有一种隔绝的心理状态。他们把欧洲看作要么是无足轻重的假日旅游的理想场所，要么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军事冲突的发源地。这种分离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是文化和历史上的。”<sup>③</sup>

孤立原则和均势原则是英国近代同一对欧的基本外交方针的两个方面，孤立原则又是维持均势原则的条件之一。<sup>④</sup>因此，英国反对将欧洲共同体以及后来的欧盟建设成为具

有某些超国家特质的组织，主张建设一个基于独立主权国家联合基础之上的欧洲。保持英国高度的政治独立性并积极融入欧洲市场，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拒绝进一步出让国家主权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相背离。所以，英国无论从地理上来说还是从历史传统或心理上来说，都可以说是欧盟的“离岸国”。

## 2. 英国脱欧公投

英国虽然于 1973 年加入欧共同体，但因长期奉行孤立原则，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特别是其深化一直持怀疑态度，至今未加入欧元区 and 申根区，而且是欧盟 2011 年 12 月峰会上唯一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强化财政纪律新条约的成员国。首相卡梅伦出于多重考虑并迫于国内和党内压力公开表示将举行脱欧公投。2015 年 9 月上旬难民危机爆发后，英国民众脱欧呼声更加高涨。2016 年 2 月 20 日，卡梅伦在内阁会议后表示，英国“脱欧”公投日期定为 2016 年 6 月 23 日。最终公投结果为同意脱欧 51.9%，共 1570 万人，脱欧派以微弱优势取得了公投胜利。

欧共同体成员国身份一直在英国存在政治上的争议，欧盟代表了对英国国家主权和威斯敏斯特议会主权的持续且与日俱增的威胁，而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要求成员国让渡其部分主权，这也挑战了英国传统的“议会主权”（根据英国经典“议会主权”理论，在英国宪政体制内，英国议会具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法院不能对议会立法提出质疑、更无权加以审查，而议会多数党执政的内阁须对议会负

① 陈晓律：《1500年以来的英国与世界》（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之一），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4页。

② 周鑫宇：《英国对华政策新思维》，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63—76页。

③ W.F. 汉里德，G.P. 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95—296页。

④ 洪邮生：《试论英国对欧孤立主义传统》，载《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30页。

责，从而构成“议会主权”的完整形式<sup>①</sup>。

自二战结束以来，关于欧洲共同体/欧盟的事务就成为英国政府内部最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其欧盟政策在英国国内也比在欧盟其他成员国更加饱受争议。自从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台后英国的欧盟政策有了很大变化，而且他2013年在布卢姆堡的著名讲话也是英欧关系转变的重要标志。2015年11月，卡梅伦正式向欧盟提出改革方案，并表示如果欧盟对英国的四个改革目标“充耳不闻”，他将不排除英国通过举行公投脱离欧盟的可能性。这四个改革目标分别为：1) 确保欧洲共同市场对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2) 增强欧盟的竞争力，减少对成员国经济的束缚；3) 允许英国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增强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力；4) 控制欧盟进入英国的移民，减少对欧盟人口自由流动原则的滥用。

卡梅伦选择这个时间戳到欧盟的痛点。欧洲现在有经济问题、难民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等多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英国在此时提出要求，如果在这个危急时刻英国退出欧盟，会让欧盟在地缘政治、国际经济与贸易以及财政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在如今欧盟存在的意义受到怀疑时，会对欧洲一体化建设起到极坏的示范作用。

2016年2月18—19日召开欧盟春季峰会，其中英国脱欧与否是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及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就英国改革提案再次进行紧张商讨。卡梅伦此次布鲁塞尔的艰难谈判之旅主要受到了来自东欧方面的阻力。欧盟希望卡梅伦谨慎评估利弊。2月19日，欧盟宣布与英国达成改革方案：欧盟将《马斯特里赫特

条约》中单一货币条款修改为“承认欧盟内部存在‘多种货币’”。

在主权方面，欧盟明确承诺英国可以不参与欧盟条约中“越来越紧密联盟”目标的实现。在争议最大的限制欧盟成员国公民享受英国社会福利待遇问题上，欧盟提出了“紧急制动”方案，即“当英国公共服务或社会安全出现严重危机时”，欧盟将限制成员国公民享受英国的社会福利待遇。

在欧盟谈判取得初步成果后，2月20日，卡梅伦在内阁会议后表示，英国“脱欧”公投日期定为2016年6月23日，他领导的英国政府建议选民在公投中选择留在欧盟。2016年2月22日，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表示支持英国退出欧盟。同日，英镑兑美元大跌2.4%，创下201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跌至一英镑等于1.4070美元，创下2009年3月以来新低。2月23日，英国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领导人罗伯特森表示，如果英国退出欧盟，苏格兰将要求就独立问题再次进行公投，以保障自己在欧盟中的位置。他认为欧盟成员国身份是苏格兰居民留下的重要原因。同日，英国近200家企业在《泰晤士报》发表联名信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它们认为脱离欧盟将阻碍投资，影响就业，让英国陷入经济危机。伦敦自由的金融交易环境及其进入欧洲市场的便利地位正是吸引来自新兴国家在这里设置分支机构的主要原因。英国与欧盟的出口和进口总额约占其进出口总量的50%，略低于法国、德国和波兰的占比（2015年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从德国的进口份额占其总量的14%，位居第一，向德国出口的份额占其总量的10%，仅次于美国（UK Trade Info 2015）。从经济角度来说，退出欧盟对英国绝不是最佳选项。而且正如前

<sup>①</sup> 洪邮生：《欧洲国际关系的演进——现实逻辑与价值取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83页。

文所说，英国政府主要希望以脱欧公投迫使欧盟能够接收其改革建议，即通过退出的可能性来强化其发声机制。

默克尔曾在卡梅伦再次当选之前对其提出警告，不要向疑欧主义者轻易妥协，也不要轻易承诺进行全民公投。但是在默克尔过去十年的执政经验中，她学到了不要随意试图操控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发展。默克尔在2015年12月17日强调：“德国无论如何都希望英国可以是强大的欧盟内积极主动的伙伴国。不仅英国自己受益于其欧盟成员国身份，失去英国的欧盟其重要性也将明显下降。如今欧洲的国际挑战前所未有的，在这一时刻英国留在欧盟内更将重要。在很多领域英国都是德国的天然伙伴。欧洲的基础是经济稳定，在此基础上才能应对其他所有的挑战。”<sup>①</sup>因此联邦政府现在力求让卡梅伦和欧盟就英欧关系进行充分的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欧盟改革方案中也有符合德国国家利益的内容，如推动欧盟内部市场的自由化。两国在打击跨国犯罪、环境治理、推动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方面也有共同利益。卡梅伦在布卢姆堡讲话中谈道：“正如默克尔总理曾经说过的，欧洲用全球占比7%的人口数创造出了25%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且还需要支付全球社会福利支出的50%，理所当然欧洲必须继续努力维持其繁荣局面和生活方式。”<sup>②</sup>这也说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是两国的共同目标。

## 四、在欧盟深陷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多重危机时，德国和英国将何去何从？

### 1. 欧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

欧洲联盟的成立与发展，是欧洲历史中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标志，其核心特征是主权国家与超国家机制的共存与互动。但如今欧盟的离心力增大，各国之间的不同声音增多，欧洲民族思潮活力增加，政府间解决方案大有取代联盟解决方案的势头。

欧盟是一种外形轮廓不确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借鉴了邦联、联邦以及传统国际组织等相关元素的政治制度，欧盟在自身的合法性方面尤其面临特别多的困难，会对公共政策和合法性的传统框架，即国家提出挑战。<sup>③</sup>其公民参与度并不高。

### 2. 德国和英国在欧盟发展过程中的目标并不相同

对英国来说，欧盟更多的是负责单一市场的国际机构，从利己主义的角度来看能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对德国来说，欧盟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准联邦政治实体，通过在欧盟发挥作用其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欧盟给德国提供了扩大在欧洲影响的机会，通过一体化德国政治和战略地位空前提高。英国则选择不得不融入欧洲，它在很大程度上担心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德国作为“文明力量国家”应通过寻找伙伴国

① Rinke, Andreas: Die letzte Europäerin,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März/April 2016, S.16-24.

② 卡梅伦：布卢姆堡讲话，<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eu-speech-at-bloomberg>，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1月4日。

③【法】奥利维耶·科斯塔，【法】娜塔莉·布拉克：《欧盟是怎么运作的》，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92—293页。

并与其联合共同开展灵活外交并在多边组织中寻求解决方案，由于倡导政治解决优于武力解决，欧盟这样的多边组织对德国外交政策尤为重要。英国的孤立使其越来越难以对欧洲事务施加自己的影响，更不用说像近代那样通过“离岸平衡手”来制衡欧陆了。

欧洲各民族以欧盟为构架的融合决不会是一个十分顺利的过程。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是在共同经历过风雨乃至灾难的基础上形成的。欧洲民族思潮依然具有活力，是对欧盟的考验，是某种以原有民族主义在多元化基础上融合而产生一种欧洲超民族主义的前兆。民族主义只是人类从个人主义走向世界主义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过渡身份。<sup>①</sup>

对欧盟来说，无论是颠覆“欧洲的德国”而使“德国的欧洲”成为指导原则，还是欧盟“离岸国”英国最终通过全民公投脱离欧洲，这两个极端发展都对欧盟的发展并无益处。在欧盟多重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欧盟是顶住危机继续向前发展还是在危机中分崩离析，德国在欧盟中的作为和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内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作为地区一体化的榜样，“多样性中的统一”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思想传统，也是当前欧洲深化一体化进程和应对诸多挑战的基本原则。作为欧盟中两个表现迥异的大国，英国和德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欧盟政策体现了欧盟的多样性，但这一多样性究竟能否形成统一，究竟是欧盟

发展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今后欧盟的发展和走势也会给出明确的答案。

## 五、结 论

笔者认为，欧盟的出现和发展是一种进步，欧盟机构对于民主、人权、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融合等目标和价值的重视是一种进步，欧盟的五个核心规范，即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sup>②</sup>推动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虽然欧盟目前面临严重危机，以德国和英国为例，欧盟各成员国对欧盟的态度迥然不同，英国脱欧已定，但如果欧盟走向倒退实则是一种退步。

一个卓有成效的国际秩序，其制度化和法制化程度尽可能高及有效的多边主义表现形式对整个欧洲和平发展乃至世界和平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欧盟对于其成员国来说不仅是狭隘的经济合作平台和载体，更是促进各国多方面合作的重要平台。发展至今日，欧盟绝不仅是经济联盟，欧盟定期举行的首脑峰会和部长级会议使得各国政策可以很好地协调。“用一个声音说话”意味着成员国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多地参与各类国际事务，但同时可能需要让渡部分主权，这可能又会触及某些国家，如英国的底线。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更好地贯彻辅助性原则，在成员国层面和欧盟层面找到平衡，也是欧盟改革亟须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作者简介：李倩媛，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① 陈晓律：《1500年以来的英国与世界》（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之一），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21页。

② Manners, Ian: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02 No.2, p.242-244.



# 经济视野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剖析欧盟 60 年来的主要问题与发展 前景

殷桐生

【摘要】欧盟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年头，评价一下 60 大寿的欧盟，适逢其时。剖析之后，令人浮想联翩，真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欧盟还远不到退休的年龄。本文以这一指导思想为红线，着重分析欧盟这一新体制的建立和缺失，研究欧盟问题的根本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多种错位上，剖析当前民粹主义对欧盟生存的威胁，对容克提出的欧盟发展的五种选择进行评价，并提出欧盟今后发展的建议和展望。

【关键词】欧盟 60 年 新体制 民粹主义

1957 年 3 月 25 日法、德、意、荷、卢、比六国在意大利罗马签署了《罗马条约》，1967 年建立了欧共体，1993 年 12 国欧共体变成了 12 国欧盟。2017 年 3 月 25 日，在和平、自由、安全和福利的大旗下，在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乐曲声中，27 个成员国的代表在原地庆祝《罗马条约》签署 60 周年，并签署了《罗马宣言》。欧盟终于走过了 60 年。

60 年一甲子是中华民族最早、最大的发明创造，说明万物 60 年一轮回；六十而耳顺是中国泛指人成熟度的一句熟语：Life begins at sixty 是一句英文谚语；60 又常常指（女性）

退休之年。综合这些国故经纶来评价一下 60 大寿的欧盟，适逢其时。剖析之后，令人浮想联翩，真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如卢森堡首相贝特（Xavier Bettel）所言，欧盟还远不到（女性）退休的年龄（reif für die Rente）。

## 一、欧盟的成绩与错误

关于欧盟的成绩与错误国内外媒体的论著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都不算为过，本文实在无力再加以赘言，但概括一下还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可列入成绩的主要有：建立了新的区域一体化模式，保持了60年的西欧和平，发展了经济，引进了欧元，通过7次扩大达到了28个成员国，消除了成员国边界，实行了四大自由，建立了宽泛的福利制度，推行了各类共同政策。

应列入错误的主要有：制度缺陷，（近十年）危机频发（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希腊危机、乌克兰危机、恐袭危机、难民危机、（极）右翼崛起危机、英国脱欧危机，可总称为精神危机——Sinnkrise——和生存危机），经济发展停滞，甚至下降，市场失灵，决策过程拖沓，治理体制衰微，欧洲身份感缺失，民心暗淡等等。

成绩与错误相比，显然错误不能压倒成绩，五五开似乎也难以服众，应该说，成绩还是主要的。

## 二、新体制的建立和缺失

二战结束后，整个欧洲大地战痕累累。然而人类是顽强的，当他们还在面对战争的现实时就已经思考着未来：是重振民族国家的旧业，是建立民族国家的邦联，还是打造全新的超国家联邦，就成了人们思考的中心议题。

古往今来世界各个地区、邻国之间成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已经难以胜数，计有优惠区、自贸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共同市场组织、经济联盟、经货联盟、区域经济联盟等等。而近期流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与举步维艰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本应是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经济一

体化举措；如果加上政治性、军事性的联盟，形式就更多了。二战后的欧洲人又该如何取舍呢？

1951年这个闷葫芦终于被打开了，法、德、意、荷、卢、比决定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这一超国家的一体化组织，1957年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这两个超国家组织。1960年1月4日英国与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在斯德哥尔摩签订《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公约》，即《斯德哥尔摩公约》，从而在西欧出现了两大经济集团，其发展方向颇为引人注目。

1965年，美国国际政治学家戴维·卡莱欧（David P. Calleo）在其《欧洲的未来》这部著作中及时提出了欧洲发展的四种模式：美国的大西洋式欧洲、布鲁塞尔的联邦式欧洲、由民族国家构成的邦联式欧洲和无政府主义的欧洲，或者叫作不属于任何人的欧洲，从而拉开了西欧的联邦和邦联发展之争。<sup>①</sup>

今天，历史已经翻过了70多个春秋，人们已经可以拿得出一个几乎无人能够否认的结论：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发展来说，最重要、最成功、最有效的地区一体化的典范，并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外交、科技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区域性组织，莫过于欧洲联盟及其前身欧共体了。它在体制建设上的巨大成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 1. 冷战时期，联邦形式首先从经济领域取得突破

随着卡莱欧思想的日益扩大和传播，人们已经愈来愈看清楚，西欧出现的两大经济集团正在奉行不同的发展理论，沿着不同的

<sup>①</sup> 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

发展方向前进：联邦主义或邦联主义。尽管法国的戴高乐上台后曾一度高唱应建立“祖国的欧洲”论调，欧共体依然坚决从经济领域突破，沿着联邦的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回顾历史，人们可以看到，在呼吁欧洲统一的历程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由侧重文化到侧重政治、侧重军事（拿破仑和希特勒），再到侧重经济的演变轨迹。值得指出的是，侧重政治同样也未见成效。这是因为统一必须要以转移一国主权为代价，而这正是当时的统治者所不容的，用卢梭的话来说，因为“他们的本质都是贪婪、好斗”，他们的权力“既不允许分裂，也不容许限制”，而经济却不失为一个突破口。恩格斯当时就敏锐地指出：“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sup>①</sup>

西欧当时的现实正是如此，联邦主义者看得很清楚，欧洲的出路在于搞联邦，但要想把欧共体一步搞成一个联邦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做长线战略考虑，从经济上首先突破，再扩展到其他领域。欧洲第一公民让·莫内说得好：“任何形式政治间的合作都将是毫无出路的。同时我也很清楚，有人对这个带根本变化的法国建议是疑虑颇多的。然而，请不要忘记，我们到这里来开会是为了建立一个欧洲共同体。这样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是为今后建立欧洲联邦铺平道路。”但他也冷静地指出：“是否应该听取某些人的意见，立即进入联邦阶段呢？我看不行，而且行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也都觉得不要操之过急，应该沿着经过艰苦奋斗所开辟的广阔道路前进。”<sup>②</sup>

毋庸置疑，无论是方向还是策略，欧共体当时都是对的。在与英国为首的奉行建立由民族国家构成的邦联式欧洲的“欧自盟”竞争中，奉行布鲁塞尔联邦式欧洲的欧共体胜出。1973年竟然连作为“欧自盟”领头羊的英国也偕同其亲密伙伴丹麦离开了该组织而投入欧共体的怀抱，该组织的其他重要成员也逐渐步其后尘，一一进入了欧共体的行列。但在政治上，欧洲联邦主义的成果却寥若晨星，政治一体化几乎成了一纸空文。

## 2. 冷战后时期，联邦形式冲出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展

冷战之后，欧共体的超国家权力有了重大而迅速的发展。经济领域的超国家机构普遍建立和运转，政治上的民族国家至上观念迅速向联邦主义转变，超国家机构的机制和联邦主义的职能逐步建立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联邦形式迅速冲出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展，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 欧共体变为欧洲联盟，建立了一系列超国家机构，扩大了其职能和权力，在体制上越来越体现出联邦制的明确发展方向，参加联盟的国家必须根据条约的规定将部分国家主权让渡给欧盟，欧盟成了在主权国家之上享有一定治理权的超国家机构；

2)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签订，确立了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双重多数表决法”，大大限制了成员国可以行使否决权问题的范围，拟定并通过了许多具有宪法品格的规定；

3) 实行比较一致的共同政策（特别是签证、避难、移民等政策），引入申根机制，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47页。

② 宋全成：《欧盟体制的演变与未来》，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5期，第172—177页。

行了四大自由和“欧洲公民身份认同”制度；

4) 加强了欧盟各机构的民主机制和运行机制，把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合作纳入欧盟的统一框架中，建构了政治联盟的雏形；

5) 设立了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提高了超国家机构的权威代表角色；

6) 建立了欧元区，设立了欧洲央行和央行体系，使用统一货币。成员国将最重要的货币主权让渡给了欧洲央行；

7) 提高了欧洲议会的权力。

至此，欧共体完成了自身的根本转变，大大提高了超国家性质，并向着超国家的联邦制方向发展。

### 3. 体制的缺失

欧洲联盟的体制，是一种独创的邦联+联邦体制。这是一种既非主权国家也非一般性国际组织的过渡体制：各成员国仍然发挥着民族国家的作用，但欧盟已拥有超越各成员国部分主权的具有联邦性质的一整套机构、立法与职能，但它们还是不完备的，是过渡的。这种不完备和过渡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体制缺失。

这突出表现在它还缺乏民族国家的不少重要体制。在《马约》规定的欧共体的三大支柱中，欧共体事务领域联邦性质最为突出，但仍然没有一个全面的财政政策；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司法、内政事务这两个领域则基本上还是邦联色彩：如没有宪法，没有受联盟直接领导的军队，没有能“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通常外交与安全政策，没有全面治盟理政的法律体系和完善、便捷、权威的表决制度。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里，主

权让渡的增大仍然受到民主赤字和欧洲认同滞后的重大制约<sup>①</sup>，主权让渡、民主和认同这三大联邦制要素无法科学均衡地得到发展。

这种体制的缺失显示了欧盟的过渡性质，它既能继续前进，达到联邦的目标；也有可能倒退到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我们当然十分乐见欧盟的体制越来越体现出联邦制的性质和特征。

### 三、欧盟的问题关键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多种错位上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运用这一武器来分析欧盟的问题犹如洞若观火。欧盟近十年来危机不断，主要原因盖出于此。<sup>②</sup>

欧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超国家组织，是一个由不同生产力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组成的综合体。它有自己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也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但都十分微小和脆弱。然而加上所有成员国的这一结构却又十分庞大，于是在这里就呈现出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甚至是畸形的矛盾关系。各类危机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欧盟既缺乏完全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缺乏与其经济基础完全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存在脱离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及脱离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包括一般民族国家不存在的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

欧盟一贯重视紧缩，这使其经济不仅得不到较快的增长，反而遭到抑制。欧盟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仅不去推动生产力和经

① 牛海彬：《欧盟治理的变量与困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7期。

② 殷桐生：《德国经济通论》第八章，第三节，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济基础的健康发展，反而加以抑制，使欧盟实体经济生产力的增长极其缓慢，甚至倒退。然而生产力最终一定会突破旧的生产关系，并建构成适合自己的新的生产关系。此次，法国挺身而出高举增长的大旗与以德国为首的紧缩派对垒，并形成旗鼓相当之势就是这一突破的写照。

欧盟的综合生产力（即各国生产力的总和）和经济基础是强大的。与此相对的是，欧盟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却是微弱的、不健全的，因而也就没有制约虚拟经济和债台高筑的机制和手段。于是虚拟经济和借贷资本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不已，结果陷入金融危机，产生主权债务危机。

在欧盟的 28 个成员国中生产力的发展大相径庭，经济基础也是千差万别，富国、穷国泾渭分明，却都在使用着统一的生产关系：共同货币政策，统一的债务、赤字、通胀和利率标准。由于欧盟是富国掌大权，这些政策和标准自然主要是迎合富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利益，而给穷国则带来巨大的困难。特别突出的是，当单个国家债务过高的时候，它不能上调利率，也不能让货币贬值。例如希腊欠债，本来可以采取货币贬值的办法来应对，现在不行，因为希腊已经失去了货币主权；欧盟应对债务危机，本可以采取限债或保增长的办法，现在也不行，因为欧盟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而在如同欧盟这样经济一体化程度不够的情况下，单一货币极易造成“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马太效应”。

在一个民族国家，即便其实行联邦制，中央的权威仍然大于地方，而欧盟正相反，成员国的权威实际大于欧盟，形成了一个倒二元体制。欧盟不仅远不具有各成员国的全

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甚至已经立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经常受到成员国的挑战，形成主权与超国家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例如欧盟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大多占到本国对外贸易的大部分，一成员国的贸易顺差自然意味着另一成员国的贸易逆差，于是欧盟便立了一个贸易顺差不得超过 6% 的法规，而德国就是不执行。这就是说，欧盟还多出了一个一般民族国家没有的、本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另一个成员国以及欧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矛盾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矛盾，那就是欧盟上层建筑内的矛盾。在欧洲理事会、欧盟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之间矛盾不断，内斗迭出，大大制约了欧盟上层建筑的行动能力，欧债危机中的这一表现便是很好的佐证。

#### 四、欧洲民粹主义威胁着欧盟的生存

民粹主义最早起源于 19 世纪 60、70 年代的俄罗斯“民粹派”。现代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反建制、反精英、反主流政治（特别是全球化），欧洲民粹主义则除此之外还反欧盟、反欧元、反申根、反北约、反移民，并依此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据统计，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选票中的比例已经翻倍，左翼民粹主义的比例与过去相比更是高达 5 倍。如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平均席位已经升至 13.7%，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升至 11.5%。<sup>①</sup>

近时期来，欧洲民粹主义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经济不振、危机不断、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及难民大批涌入，而各国领导层不仅不听平民百姓的呼声，反

①（作者不详）：《名粹主义为何令西方陷入困境》，载《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

而视民为敌，从而造成“水欲覆舟”之势，其主要攻击对象便是欧盟。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日前在《外交》杂志刊文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界主流未能倾听和解决民众的担忧，新兴政治力量就会煽动恐惧和偏见，致使民粹主义抬头。”加之美国带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的特朗普出人预料地当选美国总统和反映英国平民百姓要求的“脱欧”成为现实以及2017年欧盟数个成员国将举行大选，这就大大推动了欧洲民粹主义的浪潮。

欧洲的这一浪潮主要由各国的右翼政党来代表，其中有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德国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荷兰的前富图恩名单党和荷兰自由党、匈牙利的“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瑞典民主党，独立希腊党，挪威进步党，英国独立党。其主要政治观点是：

## 1. 反对欧洲一体化，竭力要通过大选夺取国家政权，脱离欧盟

法国民调机构 Ipsos 在欧洲的五大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中对民粹主义做了调查，在这五国中，受访者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均达到60%以上，在西班牙甚至达到89%。也同样是在西班牙，民众对例如欧盟这样的国际制度持有的怀疑态度最高，达到77%。<sup>①</sup>

于是他们便极力要通过大选来夺取国家政权，脱离欧盟，推倒欧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成功地否决了总理伦奇的要修改宪法的公投，坚决要求意大利从欧盟那里夺回

主权，并提出就脱离欧元区举行公投，认为“五星运动”是一场席卷西方的反建制普遍浪潮的一部分；奥地利自由党叫板社民党和人民党执政联盟要取而代之，荷兰自由党踌躇满志要上台执政，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则公开宣布她十分期待大选获胜，登上总统的宝座，进行脱欧公投。

就在特朗普就任同一天，欧洲主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头目在德国科布伦茨市聚会。德国和欧洲主要媒体纷纷对此次右翼政党大规模聚会表示担忧，并称其意图是“瓦解欧盟”。勒庞在演讲中声称，民族国家最终将会回归，2017年将是欧洲大陆“觉醒的一年”。<sup>②</sup>

## 2. 反欧元

他们大肆宣扬欧元危机，要抛弃欧元，认为欧元对于欧元区各国的竞争力是灾难性的，它夺走了汇率贬值工具并创造了一个通缩环境，加重了债务负担。勒庞还扬言，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意识到欧元对经济发展的遏制，倘若自己当选，将引领法国退出欧元区，启用新货币。<sup>③</sup>至于德国选择党正是依仗反欧元起家的。

## 3. 反对向欧洲移民

近几年来，随着叙利亚和阿富汗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大批难民进入欧洲，给当地带来很大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据统计，2015年全球有2.5亿移民和6500万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欧洲接受的移民最多，高达7600万。<sup>④</sup>荷兰自由党领袖吉尔特·维尔德斯公开发表反伊斯兰言论，甚至

① 夏莹编译：《面对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欧洲为何选择了前者？》，载《欧洲时报》，2017年。

②（作者不详）：《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民族和自由欧洲大会瓦解欧盟为主题？》，载《钱庄金融》，www.51829.com，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5日。

③ 吴刚：《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增强》，载《人民日报》2017年4月17日，第22版。

④ Zakaria, Fareed：《民粹主义为何令西方陷入困境？》，载《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

扬言“没收《古兰经》，取缔清真寺”<sup>①</sup>。德国选择党则猛烈攻击默克尔政府的接收难民政策，导致针对中东难民和外来移民的暴力事件大幅上升。

#### 4. 支持英国脱欧

英国脱欧结果公布不久，欧洲各右翼民粹主义头目纷纷通过媒体表达自己极度的喜悦心情。英国脱欧运动领导人之一、独立党主席法拉奇在媒体上写下“欧盟败了，欧盟死了”，并要求英国政府尽快开始脱盟谈判。荷兰自由党领导维尔德斯在媒体上写下了“再见了，布鲁塞尔”、“荷兰将是下一个”。法国国民阵线领袖勒庞则表示“英国退欧是自由的胜利”，并希望能在法国举行类似的脱欧公投。丹麦人民党主席达尔在媒体上指责欧盟夺走了民族国家的权利，而现在要付出代价。德国选择党指出，正是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导致英国离欧而去。该党图林根州议会党团主席赫克则认为，德国民众大多数也想摆脱欧盟奴役，因此也应该举行退出欧盟的全民公决，英国人通过脱欧“离开了集体癫狂之路”。<sup>②</sup>

#### 5. 反对精英统治，反对精英主导的欧盟领导层

民粹主义反对政治生活中的精英主导。它们认为，“在当今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发展越来越精英化，精英集团国际化，精英集团利益化，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均被利益集团和大资本家所绑架，而大众则被抛弃，他们只能默默地用选票说话”<sup>③</sup>，为“被遗忘

的普通人”发声。特朗普2016年4月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治理几十年来一小撮精英的破坏性统治的唯一解药，是大胆地注入民意。人民是正确的，统治精英阶层是错误的。”在奥地利总统选举中，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向其竞争对手亚历山大·范德贝伦挑战时就说：“你的背后是上流社会精英，而我有人民与我同在。”<sup>④</sup>

其实，这一态势在欧洲已经延续了多年，基本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欧盟精英阶层依仗平民百姓不懂他们的政见而放手大胆推行自己的政纲；第二、平民百姓对精英阶层的政见如不懂则说“NO”，以示反对，否决欧盟宪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第三、平民百姓选出自己的代言人同精英阶层抗争，以改变其政纲。特朗普上台就是明证。

#### 6. 分析

面对席卷而来的民粹主义，欧盟领导层的态度十分关键。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勇气，要挺起腰杆，团结一致，接受挑战，决不能保持沉默，畏首畏尾，无所作为。如北约前秘书长夏侯雅伯就认为：“面对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欧洲政治主流却保持沉默，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和采取反制措施，导致问题越发严重。”欧洲议会议员希尔薇·古拉德表示：“问题不在于英国是否脱欧，而在于我们是否因此丧失捍卫欧盟的勇气。”布鲁塞尔智库“欧洲之友”秘书长吉尔斯·梅里特强调，在众多危机面前，团结协作是欧盟继续前行的唯一出路。<sup>⑤</sup>近期，由于欧盟领导和媒体的日益强硬，欧洲民粹主义已经开始降温，法

①（作者不详）：《盘点2016 | 欧盟：民粹主义乌云笼罩》，载中青在线，2016年12月29日。

②（作者不详）：《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被打了“鸡血”》，载环球网，2016年6月28日。

③ 史志钦：《民粹主义何以在欧美愈演愈烈》，载《人民论坛》，2016年5月27日。

④ 张伟：《新闻分析：民粹主义风潮冲击欧洲》，载新华网，2016年12月5日。

⑤ 鞠辉：《欧盟：民粹主义乌云笼罩》，载《中国青年报》2016年12月22日。

国的“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等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下降，甚至是大幅度地下降，奥地利自由党和荷兰自由党则分别在总统大选和众议院大选中落败。

其次是需要冷静地分析。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其主张大多反映当时民众的心理状态和现实观点，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其形成、发展和演化往往很容易受到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也会蔓延成汹涌的波涛，对欧盟形成巨大的威胁。

再次是需要看到牢骚、愤怒之中有真理。欧洲民粹主义发展到如此规模，至少说明欧盟和不少成员国领导只重精英阶层的利益和意见，淡漠了芸芸众生的冷暖和痛痒；也说明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经济没有搞好，辜负了人民的希望和期待，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拿出改革的方案，以逐步缓和事态，继而再一步步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 五、对容克五种设想的评价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上公布了关于英国“脱欧”后欧盟未来的白皮书，书中提出2025年“27国欧盟”的五种设想，要听取各成员国的意见。一是“延续”：成员国将根据欧盟现有的路线，专注于实施和升级各项积极的改革议程；二是“只作为单一市场”：成员国无法在很多政策领域达成共识，只能专注于深化单一市场；三是“愿者多做”：欧盟将允许那些有意愿的成员国在一些特定领域深化一体化，如国防、内部安全、税收等；四是“少但高

效”：欧盟将只专注于一些特定政策领域的一体化，撇开其他领域；五是“抱团做更多”：成员国将推进所有领域的一体化，共享更多权利、资源和决策。

容克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六十而耳顺”这一教义的，但却感到如今欧盟成熟了，可以听得见各种意见和建议了。

首先应当肯定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发展的关键时刻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总体选择方案，并愿意听取各方的意见。

当前的欧盟重病缠身，继续现有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必然招致人们的进一步反对和抵制，当然也治不好病；至于还要加码“抱团做更多”更不可思议，“抱团”就很难，“做更多”就更不易，那只能是今后条件成熟时的方案；而倒退回去，只搞单一市场，只搞关税同盟，甚至散伙，那是更没有出路，甚至是更没有出息；看来，虽说目前还有分歧，但欧盟应采取的理性方案当属“愿者多做”，也就是“多速同行”方案，当然也要兼顾“少但高效”原则。

欧盟已经走过了60年的路程，有过辉煌，也有过暗淡；登上过巅峰，也跌入过低谷，但总是能重复着“前进——危机——再前进”的轨迹。最近各国的表态也显示了这一趋势：全体27个成员国均表示，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绝不后退。“欧洲晴雨表”最新的民调更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数据支撑：66%的人完全赞成欧盟是一个稳定的地区；81%的人支持欧盟的“四大自由”；70%的人支持欧元。据此，我们亦衷心希望此次欧盟也能同心同德，克服暂时的艰难险阻，渡过难关，把欧洲一体化的大业继续胜利地进行下去。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德国福利制度改革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比较与借鉴

徐 清

**【摘要】**21世纪初以来，德国进行了与时俱进的福利改革。在劳动力市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家庭政策领域，德国的改革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区别。通过对比不同的改革模式，有利于加深认识、相互借鉴，共同应对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德国 福利制度 改革

欧洲不仅是福利国家的发祥地，而且也是世界上福利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但各个国家的发展历史、进程、福利模式以及特点都不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福利国家，尤其是西欧的福利国家相继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压力。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范围内资本自由流动以及税收竞争的加剧，劳动力成本制约了福利国家的竞争力，高福利制约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国家主权债务上升使政府行动和政策空间收缩，结构性失业率攀升，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结构发生改变，这些问题和挑战几乎在每一个福利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改革成为福利国家近十几年来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词。通过对

比德国和其他欧洲福利国家的福利模式和改革路径，可以对德国福利制度的改革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 一、劳动力市场：德国“哈茨改革”与丹麦“灵活保障”模式

1993年，丹麦的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的10.2%，此后持续下降，在2002年只有约4%，创造了就业奇迹。其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实施了“灵活保障”模式，也就是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慷慨的福利保障的结合，此外还有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三者构成了所谓的“金三角”格局<sup>①</sup>。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sup>①</sup> 杨伟国，蔡为民：《丹麦的灵活保障制度：“金三角”模式及其借鉴》，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主要体现在较少对员工的解雇进行保护，直到1989年，丹麦的雇主都可以不用支付任何补偿而解雇员工。从国际上来看，丹麦的员工解雇政策不仅在欧盟，与全球100多个国家相比也属于灵活度非常高的<sup>①</sup>，这种解雇的灵活性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加快，人们也因此经常变换就业岗位，每年会有约1/4的就业者更换工作。就业岗位的变动也很快，每年也会有约1/4的岗位被取消或被新设置出来。慷慨的福利保障是指在失业时能够得到收入的保障，最高可以领取到相当于之前工资的90%作为失业金，时限为4年。丹麦的失业保险是自愿参加的，全国37家失业保险机构，主要由工会根据不同的行业和职业进行组织管理。约有80%的员工参加了失业保险，如果没有参加，失业时可以申请社会救济<sup>②</sup>。参保缴纳的保费不与收入挂钩，但会根据就业的状况分成不同的档次，非全职就业者要比全职就业者交的低。虽然表面上看失业保险是缴纳保费的保险形式，但国家给予了大量的财政支持。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失业者必须参加“激活计划”，即接受培训、教育等，地方劳动部门要与每一个失业者制定针对个人的行动方案，促进失业者能够尽早重新就业。“灵活保障”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平衡好灵活性与保障性，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又是平衡好前两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要正确评价“灵活保障”模式必须与实

施前的状况进行对比：第一，在员工解雇保护方面几乎没有变化，一直延续着很弱的解雇保护政策。第二，领取失业金的时限是逐步减少的，改革前，失业者几乎可以无期限地领取失业金<sup>③</sup>。到1994年，失业金的领取时限减少到7年，1996年减少到5年。1999年减少到4年，但必须在失业1年后参加“激活计划”。可见，失业金的领取时限不断缩短，领取条件不断趋紧。第三，劳动力市场政策从消极走向积极。改革前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失业时的生活，改革后则主要在于支持失业者重新就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2001年之前主要是教育和再培训，而2001年之后则主要是加强介绍工作的力度和增强使失业者接受新工作的激励。在丹麦，失业金与社会救济金虽然没有合并，但已经处于同一管理层面之中。综上所述，对于丹麦本国而言，灵活性一直都存在，保障性实际却是下降的。但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其失业保障水平仍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丹麦失业率的下降应当归功于福利保障的相对减少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对比丹麦的“灵活保障”模式与德国的“哈茨改革”，可以看出一些相似性。失业保障都有所削减，都采取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劳动力市场是否灵活。虽然学术界对员工解雇保护与就业率的高低是否存在联系具有争议，但放松员工解雇保

① 成新轩，于艳芳：《丹麦灵活保障模式的运行效果探析》，载《中国软科学》，2010年S2期。

② Bogedan, Claudia: Mehr als Flexicurity. Lehren aus der dänischen Arbeitsmarktpolitik, in: Seifert, Hartmut/Struck, Olaf: “Arbeitsmarkt und Sozialpolitik Kontroversen um Effizienz und soziale Sicherheit”, 2009, S. 271.

③ Braun, Thorsten: Flexibilität und soziale Sicherung in Dänemark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aktiver Arbeitsmarktpolitik und Weiterbildung, in Ute Klammer und Katja Tillmann, Flexicurity: Soziale Sicherung und Flexibilisierung der Arbeits- und Lebensverhältnisse, 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Qualifikation und Technologie 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 2002, S. 637-680.

护确实可以缩短失业者的失业时间，提高再就业的速度。当人们讨论是否可以将丹麦的“灵活保障”模式推广到德国的时候，要避免所谓的“摘樱桃”行为，即为了证明观点的正确而有意选择一些证据或事实，却对另外一些证据或事实视而不见这句话看不懂<sup>①</sup>。不能说如果德国放松了员工解雇保护就是“灵活保障”了，因为在失业保障制度上，德国与丹麦是完全不同的，德国是法定的失业保险，而丹麦虽然实行的是自愿的失业保险，实际却是政府税收支持的失业保障，失业保障支出的约70%由政府承担。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引入“灵活保障”，就必须放松员工解雇保护，并改革失业保障制度<sup>②</sup>。因此必须明确，德国国内不少经济学家要求放松员工解雇保护并不表示他们是要求实行“灵活保障”，也不表示他们是基于丹麦的成功经验而主张放松员工解雇保护的。“灵活保障”只可能在“金三角”的格局中才能成功，鉴于德国的自身特点，“灵活保障”模式在德国很难复制。丹麦可以在较低的员工解雇保护和较高的失业保障水平两方面中取得平衡，那么德国可以寻求在一个较高的员工解雇保护水平和中等水平的失业保障之间取得平衡，也就是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可以说，德国也取得了成功。当然，如果放松一些员工解雇保护，可能会形成进一步的“帕累托改进”，即中等水平的员工解雇保护和中等水平的失业保障相匹配的效果也许更好。

## 二、医疗保障：德国“俾斯麦模式”与英国“贝弗里奇模式”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由于英国福利国家制度是以《贝弗里奇报告》为蓝本构建的，因此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被称为“贝弗里奇模式”。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英国福利国家的实践与《贝弗里奇报告》存在明显区别，贝弗里奇提出的社会保险制度正是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采用的福利制度，而英国福利国家的最显著特征则是以税收为基础的充分的社会服务<sup>③</sup>。

英国全民医保的特点主要有：第一，不论是否就业以及收入的高低，每个人均可免费获得医疗服务，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第二，国家主要通过税收为医疗保障筹资。个人如果需要享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则自费或参加私人医疗保险。第三，国家是医疗保障体系的管理者，公立医院是医疗服务的最主要供给者，私人医疗服务的占比很小。比较德国医疗保险的“俾斯麦模式”与英国医疗保障的“贝弗里奇模式”可以看出，两种模式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俾斯麦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医疗保险的资金压力较大，由于医疗保险缴纳的保费与工资收入挂钩，这就导致医疗保险体系的资金状况与经济增长和就业情况紧密联系。同时，保费增加了工资的附加成本，不利于创造就业。“贝弗里奇模式”因为是税收筹资，受到严格的预算约束，所以医疗开支与其他福利国家相比处

① 江时学：《国际问题研究如何避免“摘樱桃”》，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2日。

② Peter, Waltraut: Dänemarks „flexicurity“ – kein Vorbild für Deutschland, IW-Trends – Vierteljahresschrift zur empirischen Wirtschaftsforschung aus dem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öln, 34. Jahrgang, Heft 2/2007, Deutscher Instituts-Verlag, 2007.

③ Harris, Jose: Enterprise and Welfare Stat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ume 40, 1990, S. 175-195.

于较低水平。该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其根本原因是医疗系统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sup>①</sup>当然，医疗开支相对较低也是原因之一，在英国候诊常常要等待很长时间，动手术有的则要等待一年以上，这反映了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增加床位，以及薪酬没有吸引力导致医护人员的紧缺<sup>②</sup>。英国的医疗保障改革也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布莱尔首相在1997年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增加政府的医疗开支预算，提高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虽然施罗德和布莱尔对福利国家的政治立场相近，但德国和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完全不同。第一，从医疗保障体系的竞争来看，德国加强的是各医疗保险机构之间的竞争，而英国则是加强各医疗机构的竞争<sup>③</sup>，这与两国医疗保障不同的筹资模式相关。第二，从医保体系的筹资来看，德国增加了个人筹资的份额，而英国是增加了政府财政的医疗支出，这表明两国都在沿着原有的模式进行改革，没有出现跨越不同模式的改革。必须明确的是，德国社民党提出的“全民保险”与英国的全民医疗保障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都是为全体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但实现的方式和途径大不一样，“全民保险”仍然是“俾斯麦模式”的社会保险。

德国“俾斯麦模式”与英国“贝弗里奇模式”是欧洲福利国家医疗保障的典型模式，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两种模式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因此只有不断地进行改革。有一点可以确定，个人在医疗保障中承担的

责任将会增加，这既表现在，无论在德国还是英国，个人自付的份额会上升，也表现在健康领域的理念变化，疾病的预防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医疗保障制度可持续的重要一环，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此而努力。

### 三、养老保险：德国“里斯特养老金”与瑞典个人名义账户和积累账户制

1999年，瑞典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开始实施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前，瑞典的养老保险由三根支柱构成：第一根支柱被称为公共养老金体系，是由大众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组成。大众养老金具有普惠性质，每一个在瑞典住过三年的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养老保障，筹资来源主要是政府税收，养老保险的保费收入作为补充，筹资模式是现收现付制。补充养老金同样也采用现收现付制，它的给付和收入与参保时间挂钩。第二根支柱是企业养老金。第三根支柱是私人补充养老金。而改革主要是针对第一根支柱的，公共养老金体系被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保障养老金，替代原来的大众养老金，只针对没有收入和低收入的人。第二层次是收入养老金，也就是个人名义账户养老金。第三层次是基金养老金，即积累账户养老金。改革的核心就在于引入了个人名义账户制和积累账户。个人账户是用于资金积累制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就业期间缴纳的保费存入个人账户，退休后该账户的资金就成为领取养

① 丁纯：《世界主要医疗保障制度模式绩效比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159页。

② Döring, Diether/Dudenhöffer, Bettina/Herdt, Jürgen: Europäische Gesundheitssysteme unter Globalisierungsdruck Vergleichende Betrachtung der Finanzierungsstrukturen und Reformoptionen in den EU 15-Staaten und der Schweiz, HA Hessen Agentur GmbH, Report Nr. 689, 2005, S. 74.

③ Bandelow, Nils C.: “Der Dritte Weg in der britischen und deutschen Gesundheitspolitik: Separate Reformpfade trotz ideologischer Nähe?”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reform”, 53 (2007), Heft 2, S.127-145.

老金的依据和来源。但瑞典改革引入的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即缴纳的保费只用于在该账户进行登记，保费收入仍然以现收现付的模式用于支付当前的退休金，而账户里并没有资金积累下来，因此是一个名义上的账户。而积累账户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制，而且是强制性的。雇主与雇员一共缴纳工资收入的18.5%作为养老保险的保费，其中16%转到个人名义账户，2.5%转到资本积累制的基金养老金账户。瑞典个人名义账户和积累账户制的实质就是，外层都已经是资本积累制的架构，内部却仍然按照现收现付制运行，但存入该账户的保费成为将来计算领取养老金多少的一个依据，另一个则是完全的资本积累制。通过这样的改革，瑞典将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转换为现收现付制与资本积累制并存的混合制筹资模式。

对比瑞典的基金养老金和德国的“里斯特养老金”就可以发现，虽然两者都是资本积累制，但存在很大的差别。首先，基金养老金是每一个参保人都必须要缴纳保费的，而“里斯特养老金”是自愿参加的。第二，基金养老金由于其强制性而没有国家的政策促进措施，而“里斯特养老金”则可以享受国家的资金或税收支持。第三，两者在各自国家养老保险体系内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基金养老金属于国家制定的公共养老体系，而“里斯特养老金”则是私人养老的范畴<sup>①</sup>。第四，基金养老金是每一个人为自己积累养老金，且只有2.5%转入该账户，分配功能较小。而“里斯特养老金”一方面使低收入者

和高收入者从再分配中得到优惠，因为低收入者能够得到国家更多的资金支持，高收入者从税收优惠中则获益更多；另一方面，由于“里斯特养老金”是非强制性的，因此也限制了养老体系的再分配功能。第五，瑞典养老保障中的第一层次，即保障养老金的水平较高，再加之基金养老金的强制性特点有助于增强家庭成员的经济独立性和自主性，而德国养老保险的基础保险<sup>②</sup>相对瑞典而言比较薄弱，加上“里斯特养老金”是自愿参加的，这就导致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女性更多地依赖于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其个人的经济自主性较低<sup>③</sup>。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德国和瑞典的养老保险体系都呈现从现收现付制向混合制的转变，所不同的就在于法定养老保险是否已经引入资本积累制。德国的资本积累制只限于私人养老领域，而瑞典已进入法定养老领域。从这个角度上讲，瑞典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但从国家的支持力度上看，“里斯特养老金”则领先于瑞典的基金养老金。瑞典的做法在于强制，德国在于激励，对于实行资本积累制的初期可谓各有千秋。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瑞典的个人名义账户的作用，虽然是以资本积累制之名行现收现付制之实，但它有利于增强工作的积极性。因为进入名义账户的保费越多，积分就越高，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也就越高<sup>④</sup>，从而起到了资本积累制个人为自己的养老承担责任的激励效应。从德国和瑞典的改革可以明确，混合制的筹资模式已是时代的趋势，但究竟在法定养老领

① Haupt, Marlene/Kluth, Sebastian: “Das schwedische Beispiel der kapitalgedeckten Altersvorsorge – Ein Vorbild für Deutschland?” Vierteljahrshefte zur Wirtschaftsforschung, DIW Berlin, 02.2012, S.213-230.

② 本质上讲并不是养老保险，而是一种社会救助，针对那些领取的养老金不够维持生活的情况。

③ Köppe, Stephan: “Mainstreamkonvergenz und Geschlechterdifferenz Die deutsche und schwedische Rentenreform im Vergleich”, Zeitschrift für Sozialreform, 53 (2007), Heft 2, S.165-190.

④ 房连泉：《瑞典名义账户养老金制度改革探析》，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6期。

域还是在私人养老领域得以实现则需要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而定，也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 四、家庭政策：德国“男性主导”的家庭模式与北欧“女性友好”的家庭模式

北欧国家的家庭政策堪称欧洲乃至世界的典范。总体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北欧国家进行过两次家庭政策的改革。70年代的改革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为父母在孩子出生后提供休假；二是通过立法提供幼儿看护服务。改革是在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以及幼龄孩子的母亲就业的背景下实施的，反映了北欧国家要求性别平等的社会主张得到广泛认同，女性地位显著提高。正是在70年代末，丹麦、挪威和瑞典通过了性别平等的立法。芬兰于80年代末也完成了立法。90年代的改革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父母假期中给父亲预留一部分时间，即“父亲份额”，以此要求父亲也承担一些照顾孩子的责任，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二是给那些选择自己在家照看孩子，不送孩子去公共看护机构的父母发放看护补贴。但这一政策引发了争议，瑞典在实施的当年即取消了该项政策<sup>①</sup>。

北欧国家对家庭政策都非常重视，但侧重点还是有差异的。从通过增加公共看护机构来促进女性就业的角度来看，丹麦和瑞典的政策力度最强。在激励父亲照顾孩子方面，瑞典的“父亲份额”高达两个月，这一假期

的利用率瑞典也是最高的。引入看护补贴的芬兰和挪威支持家庭自己照看孩子，实际上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传统的家庭妇女模式。但总的来看，北欧国家的家庭政策是偏向于“女性友好”的，尤其是瑞典的家庭政策最有助于推动性别平等。“女性友好”的家庭政策其成效也相当明显，北欧国家的女性就业率和人口出生率都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

对比德国和北欧国家的家庭政策就不难发现，虽然德国的家庭政策已发生“范式转变”，但与北欧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德国传统的“男性主导”的家庭模式需要进一步向“女性友好”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变，家庭政策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对家庭自主权的干预，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实现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政府的家庭政策也不是一项财政支出政策，而是投资政策。对家庭的财政投入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其次是政策目标的转变，应当从致力于家庭负担的再分配和平衡转变为可持续的家庭目标，即促进性别平等、家庭和就业的平衡兼顾、提高人口出生率等。最后是政策措施的转变，通过德国以及北欧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出，家庭政策的措施主要是为家庭提供资金、时间和服务，但对于看护补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看护补贴虽然赋予家庭选择权，但往往都是由母亲承担起在家照顾孩子的责任，导致对女性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芬兰和挪威在引入看护补贴后，女性就业率都有所下降<sup>②</sup>。因此，不论是德国还是北欧国家都需要在促进性别平等的道

① Ellingsæter, Anne Lise/ Leira, Arnlaug: Familienpolitische Reformen in Skandinavien – Gleichberechtigung der Geschlechter und Wahlfreiheit der Eltern, in: “WSI Mitteilungen” 10/2007, S. 549.

② Beninger, Denis/Bonin, Holger/Clauss, Markus/Horstschräer, Julia/Mühler, Grit: Fiskalische Auswirkungen sowie arbeitsmarkt- und verteilungspolitische Effekte einer Einführung eines Betreuungsgeldes für Kinder unter 3 Jahren, Zentrum für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forschung, 2009, S. 84.

路上再接再厉，而德国就更需要坚定“范式转变”的方向，以积极的家庭政策支撑起福利国家的未来。

通过对比德国与其他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可以看出，福利模式的差异和趋同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劳动力市场领域，分歧主要在于灵活性的把握程度，即是否需要减少员工解雇保护，短期内看，这种差异不会消除。医疗保障领域由于体制差异明显，

转换的可能性不大，“俾斯麦模式”与“贝弗里奇模式”将长期并存。养老保险领域呈现向混合制筹资模式趋同的态势，以及法定退休年龄普遍延迟的趋势。家庭政策领域都在加强协调家庭与就业的关系，促进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很明显，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高度趋同，而在就业与医疗方面，各国仍将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发展现实，选择改革的路径和方式。

作者简介：徐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 欧洲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挑战 ——评 2016 年欧洲经济发展情况

梅 霖

【摘要】2016 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继续温和复苏，失业率下降，物价指数上升，但成员国经济发展呈现分化。欧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突出，债券收益率下降，融资环境改善，信贷增长企稳。受能源低价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影响，欧元下跌，客观上促进出口增长。但欧洲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低利率环境使部分成员国债务上涨，银行业风险增大，英国脱欧和多国大选存在的政治风险上升，特朗普经济政策给欧洲经济增添不确定性。结构性问题是阻碍欧洲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欧央行呼吁成员国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尽快落实结构性改革，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

【关键词】欧盟 欧元区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财政紧缩政策

## 一、欧洲经济温和复苏，成员国之间存在差异

2016 年欧洲经济实现危机后连续第三年增长，欧盟 28 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 14.82 万亿欧元，同比增长 1.9%，欧元区 19 国 GDP 达 10.70 万亿欧元，同比增长 1.7%。欧元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内需拉动的，其中个人消费支出贡献最大，占 GDP 增长的 1%，公共消费支出贡献 0.3%。2016 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投资涨幅达 0.2 个百分点，但受 6 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影响，最终仅实现了微弱

的增长。同样增长乏力的还有进出口，欧元区 2016 年出口同比增长仅有 0.3%，纵观整个欧盟 28 国更是同比下降 2.43%，同时欧元区和欧盟进口分别下降了 2% 和 1%。欧盟贸易顺差同比下降了 222 亿欧元，值得庆幸的是，欧元区 19 国均实现了贸易顺差，额度达 2719 亿欧元，同比增加 13.9%。同时，欧洲就业市场情况继续改善，欧盟 28 国失业率从 2015 年 9.4% 下降至 8.5%，欧元区 19 国也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青年失业率分别下降了 1.6% 和 1.4%。2016 年欧洲仍处于通缩压力下，虽然 12 月受能源价格上涨带动，消费者物价

指数（CPI）创下三年新高，同比增长 1.1%，但欧元区全年通胀率仅 0.2%，仍低于欧央行制定的通胀目标。

虽然过去一年中欧洲经济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成员国间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在年度鉴定报告<sup>①</sup>中将欧元区 19 个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分为三类：1）经济现状超过危机前、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就业市场良好的国家。德国是其中之一，2016 年德国 GDP 上涨 1.9%，失业率由 2015 年 6.4% 下降到 6.3%，12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达 55.6，达三年来最高。同属这一类的国家还有波罗的海三国、曾经的重债国爱尔兰、马耳他以及斯洛伐克。2）欧元区内经济情况居中的国家。首先是产能仍明显不足但近期发展态势良好的国家，包括西班牙、卢森堡、荷兰、斯洛文尼亚。曾经的重债国西班牙经济同比增长 3.3%，12 月服务业 PMI 为 55.0，优于市场预期的 54.8，不过略低于前值的 55.1，呈现连续 38 个月扩张的趋势。其次是经济发展迟缓但产能尚可的国家，以法国为例，2016 年 GDP 增长 1.1%，PMI 虽然有所增长，但仍徘徊在 50 左右。属于这一类的国家还有奥地利和比利时。3）剩余欧元区国家属于第三类：仍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产能低下，增长潜力不足。意大利经济仍比 2008 年危机前低 8%，希腊更是低 26 个百分点。此外，葡萄牙、塞浦路斯和芬兰也远落后于第一类国家。<sup>②</sup>

欧元区以外，英国经济不同于预期，并未遭受脱欧公投结果的严重打击，在过去一年实现平稳增长，四个季度环比增长分别为 0.2%、0.6%、0.5% 和 0.7%，全年 GDP 增长 1.8%。各项数据显示，英国消费者信心指

数明显上升，出口增长强劲，物价回升。然而脱欧公投仍对英国乃至欧洲金融市场造成了极大影响。公投结果一出，英镑暴跌 1800 点，创下 30 年以来最低，全年累计跌幅 17%，虽然年底经历了小幅回升，但下行风险依然较大。

## 二、货币政策是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据观察，现阶段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sup>③</sup> 2013 年欧洲经济虽然走出了自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不断衰退的阴影，但经济复苏依然乏力。2014 年下半年以来，欧元区通胀率不断走低，通胀预期持续恶化，欧央行此前推出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argeted 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s, TLTRO）以及私人部门资产购买计划收效甚微，加之油价暴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导致欧元区通货紧缩压力进一步增大。2015 年 1 月，欧央行宣布推出欧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Quantitative Easing），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9 月，计划每月购买 600 亿欧元的成员国内债和机构债券。2016 年 6 月，欧央行进一步扩张资产购买计划，每月购债规模从 600 亿增至 800 亿欧元，期限延至 2017 年 3 月，并将购买欧元区内非金融企业发行的投资级公司债。2016 年 12 月 8 日，欧央行宣布将资产购买计划延长至 2017 年 12 月，且到期后可再延长。

量化宽松政策对金融市场产生明显的刺激作用。首先，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融资环境改善。国债收益率下降能拉低市场收益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刺激资金进入企业债市场，使企业发债融资成本降低、发

①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der Sachverständigenrat）：年度鉴定报告 16-17（Jahresgutachten 16-17），2017 年。

② 同上。

③ Der Sachverständigenrat: Jahresgutachten 16-17, 02.2017. S. 71.

行量增加。<sup>①</sup> 2015年8月3日,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0.611%、0.93%、1.769%和1.953%,2016年8月3日,上述四国国债收益率分别为-0.041%、0.182%、1.216%和1.084%,均下降超过0.5个百分点。<sup>②</sup> 其次,银行信贷是量化宽松的重要传导渠道,当国债收益率降低,金融机构就会发放更多贷款或配置更多风险资产,从而刺激经济增长。<sup>③</sup> 2015年下半年以来,信贷增长开始企稳,尤其是住房信贷在2016年增长了3%。<sup>④</sup> 最后,量化宽松政策可通过释放流动性、推高资产价格以及货币贬值、提升进口商品价格等渠道抬升通胀水平。<sup>⑤</sup> 2015年12月,欧央行宣布降低存款利率10个基点至-0.3%,截至2016年11月底,欧央行共通过新一轮资产购买计划向市场注入约1.477万亿欧元流动性。2015年第一轮欧版QE实施以来,欧元进入快速贬值通道,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增加,但这种作用易受外需乏力等多种因素影响。2016年上半年欧元对美元逐步走高,并于5月达到全年高点1.1536,不过下半年受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大选结果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影响震荡交投。

此外,欧洲经济的回暖还部分得益于能源价格下跌以及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因素。第一,由于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动荡的政治形势,石油价格从2015年起一路走低,从而影响欧元贬值,也客观促进了石油进口国的欧元区国家经济。不过能源价格下降,会进一步加

剧欧元区通胀率低迷,短期的刺激效应恐不会持续益于经济复苏。第二,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超然地位,美联储加息会影响世界经济,一方面会降低以美元进行海外投资或者进口的成本,带动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增加短期产出;另一方面会使全球资金回流美国,其他国家市场上本国货币增加,货币贬值压力加大,债券收益率下降。<sup>⑥</sup> 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公布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美元利率正常化加之欧央行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美元走高欧元贬值,使得欧洲市场更有竞争力。2016年12月15日,美联储再次宣布加息。欧元区12月制造业PMI达到54.9,创2011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同时应注意到,欧洲主权债券收益率受到影响继续下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增加,从而影响一些成员国的需求和购买力。

### 三、欧洲经济复苏仍面临诸多挑战

可以说,欧央行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然而,成员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造成欧元区经济疲软的根本原因,因此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面临的问题。<sup>⑦</sup> 根据巴克莱银行研究报告,欧洲量化宽松的政策效力仅为美国的1/3,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资产购买计划面临众多约束。<sup>⑧</sup> 欧央行为了控制风险,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设定了所购买的政府债券需要满足的以下

① 王信,王哲:《欧央行量化宽松政策评析》,载《中国金融》,2016年,第19期,第78页。

② 数据来源:全球经济数据网, <http://www.qqjjsj.com>,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15日。

③ 王信,王哲:《欧央行量化宽松政策评析》,载《中国金融》,2016年,第19期,第78页。

④ Ifo: Schnelldienst 24/2016, 22.12.2016. S.39.

⑤ 魏民:《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效果与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97页。

⑥ 周睿:《美联储加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载《亚太经济》,2016年,第6期,第22页。

⑦ 魏民:《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效果与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0页。

⑧ 王信,王哲:《欧央行量化宽松政策评析》,载《中国金融》,2016年,第19期,第78—79页。

条件：一是债券的收益率不能低于存款利率；二是购买一个成员国的债券总额不能超过该国总发债额的 1/3；三是购买每个成员国债券的份额占购买的全部债券的比例不能高于该成员国在欧洲央行的出资比重；四是不能购买企业债券。这就导致，一方面成员国可能面临无债可买的窘境。量化宽松实施以来，成员国国债收益率开始走低，“英国脱欧”更导致投资者为规避风险大量购买欧元区国债，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降。根据规定，许多成员国可买国债即将达到上限。另一方面，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承担了大部分资产购买计划，这些国家债券利率已经很低，继续下行空间有限，且欧央行这一货币政策在德国等国不受欢迎，影响了量化宽松政策的扩大和效果。

其次，存在欧债危机重燃的风险。<sup>①</sup>在欧元区低利率环境下，一些国家借机扩大借贷，同时一些国家降低财政紧缩程度，从而导致欧洲债务增加。根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第三季度，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等六个成员国债务超过本国 GDP 的 100%，希腊债务更是高达 167.9%，各大评级机构也纷纷下调了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评级。2016年欧元区债务占全年 GDP 的 90.1%，而在危机爆发前仅为 60%。<sup>②</sup>

最后，欧元区银行业风险增大。2016年欧洲银行业承压较重，38家欧洲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服务指数下跌 24%。<sup>③</sup>欧洲银行业仍面临盈利能力不足、资本缺口严重和不良贷款攀升等问题。原因为：第一，负利率的实

施侵蚀了银行业短期借贷成本和长期借贷成本之间的利润，<sup>④</sup>近期，瑞银集团、德意志银行和渣打银行利润均下降超过 50%。第二，欧洲银行坏账问题严重，如意大利银行的坏账率高达 17%，不良贷款规模占欧元区的 1/3。第三，“德银危机”可能引发银行业系统性危机。美国司法部就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问题对德意志银行开出 140 亿美元罚单，处于亏损且遭受英国脱欧重创的德银没有充足资金应对危机。虽经谈判双方达成 72 亿美元的和解，但本次危机可反映出一些欧洲银行涉及高风险领域。根据德银 2013 年的年报显示，德银当年的衍生品持仓超过 75 万亿美元，是德国 GDP 的 20 倍，欧元区的 5 倍。<sup>⑤</sup>一旦银行业危机爆发，将严重影响欧盟的经济局势。

除经济因素外，欧元区政治风险不断上升，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第一，如果说英国脱欧结果造成对欧洲经济的短期冲击仅仅是拉开序幕，英国脱欧谈判这场好戏在 2017 年 3 月 29 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向欧盟递交“脱欧”信函时才正式上演。根据欧盟法律，脱欧程序一旦启动，有关各方须在两年内完成谈判。两年的脱欧谈判中，英国将尽可能减少脱欧所付代价，而欧盟则会给英国开出“天价”账单，以防成员国形成脱欧的“多米诺效应”。脱欧谈判的过程和结果必将对英镑、欧元造成相应的影响，成为欧洲经济复苏的不确定因素。第二，欧洲右翼政治势力上升，一体化陷入困境。2015 年 6 月丹麦中右翼联盟取得大选胜利；2015 年 12

① Der Sachverständigenrat: Jahresgutachten 16-17, 02.2017. S.58

② Ebenda.

③ 王灏晨：《2016年欧洲经济形势分析及2017年展望》，载《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2期，第91页。

④ 同上。

⑤ 搜狐财经：《愈演愈烈的德意志银行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2016年9月30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16日。

月, 玛丽莲·勒庞领导的右翼国民阵线在法国大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大胜; 2016年3月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进入多个州议会; 2016年5月奥地利右翼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成为总统热门人选…… 2017年是欧元区的大选年, 其中包括3月荷兰众议院选举、4月法国总统大选、9月德国联邦议院大选和时间未确定的意大利议会选举等。右翼党派均喊着脱欧、反移民的口号, 如果其上台执政, 将存在欧元区分崩离析的风险。第三,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上任。他在竞选中主张降低税收、振兴美国制造业、重新修订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等。上任首日, 他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这就意味着美欧“跨太平洋投资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TIP)很可能也将搁浅。美国长期以来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也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缺乏有效配合

一国的经济政策主要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两条腿, 由于欧元区在制度设计上呈现一种不完全的经济货币联盟状态, 欧央行制定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成员国制定各自独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得不到

有效配合。这也是产生欧债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 当一国债务达到一定程度后, 本应将其利率升高、货币贬值, 但欧元区使用统一货币, 当单个成员国债务过高, 无法采取相应的上调利率、让货币贬值的货币政策, 最终债务危机爆发。为应对欧债危机, 成员国就“治标”还是“治本”、推行财政紧缩政策还是经济增长政策产生了分歧。

德国一直极力主张“治本”, 采取财政紧缩措施。根据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货币中性论”, 货币供给的增长只会影响价格水平, 不会影响实际产出水平, 货币量的增减只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化, 而不会带动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货币主义认为, 短期来看, 由于实际利率与实际工资的下降, 货币量增加有望产生扩大生产与提高就业的效果。但是, 一旦所出现的价格上扬被经济主体认识到并纳入工资与利润额的计算中, 就会使生产与就业水平下滑到原来的状态。这样增长的货币量就没有影响到实体经济。<sup>①</sup>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 德国政府和央行对欧央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持反对意见。在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 德国坚持治本、坚持立法、坚持结构改革, 突出表现在“欧洲学期”<sup>②</sup>“六部立法”<sup>③</sup>“财政契约”<sup>④</sup>“两部立法”<sup>⑤</sup>等重要举措上。

德国坚持以紧缩来应对欧债危机既是出

① 殷桐生:《德国经济通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第659页。

② “欧洲学期”: 2011年1月, “欧洲学期”正式实施, 每期6个月, 以尽早发现成员国财政问题, 尽快采取干预措施, 争取尽早解决问题。

③ “六部立法”(Six-Pack): 2011年9月, 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 包含6项欧盟立法措施的提案。其中包括改革《稳定与增长公约》, 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60%的成员国必须以每年5%的比例削减其债务。

④ “财政契约”: 于2012年3月2日经25国(捷克和英国除外), 2013年1月1日生效。主要内容包括规定政府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0.5%, 政府债务应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

⑤ “两部立法”(Two-Pack): 2011年11月23日,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加强欧元区遭受财政稳定严重困难或面临威胁的成员国经济与预算监管条例》和《关于监管和评估欧元区成员国预算计划草案并确保其纠正超额赤字的共同规则条例》。

于自身经验，也是受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理论的影响。首先，20世纪德国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生灵涂炭，且遭遇到两次恶性通货膨胀劫难，从而形成了德国民众怕战争、怕通胀的特殊心理。因此，联邦德国建国以来始终强调稳定，并把通胀目标值控制在1%以内。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实行了更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推行“债务刹车”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其次，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认为，执行财政紧缩政策不仅可以减少政府负债，还能刺激总需求，从而对经济产生扩张性影响。这与凯恩斯主义紧缩会导致需求下降的传统观点不同，主要基于以下论断：一是如果理性经济主体认为当前的财政紧缩会让自己免受今后更为强烈的紧缩冲击，那么消费者会减少其预防性储蓄而增加消费，从而产生正财富效应；二是财政紧缩可以降低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国债收益率与市场实际利率也会随之降低，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也就会相应增加；三是政府支出会在实施紧缩财政政策后减少，从而推动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增加，政府对内支出减少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迫使工会降低工资要求，单位劳动成本就会下降、利润增加，从而刺激就业、投资和产出的增长。<sup>①</sup>

虽然上述理论不无道理，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另一面，即所谓非凯恩斯效应只能在非常严格的前提下实现。所以，“标本兼治”，既促短期增长也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将财

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配合，才是促进欧洲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之道。显然，欧洲已认识到“一条腿”走路的危险。2016年12月8日，欧央行举行了当年最后一次议息会议，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欧元区各国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采取迅速和有效的措施落实结构性改革。德拉吉表示，这将有助于使欧元区面对全球经济冲击时更具韧性。<sup>②</sup>

总体来说，2017年欧洲经济将继续实现增长，随着石油价格的回升以及欧央行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政策，欧元区通胀水平将保持温和上涨，在经济发展和通胀水平上涨的背景下，失业率将进一步下降。但与此同时，增长下行风险依然存在，2016年低油价和美联储加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难以维持，部分成员国债务压力增大，银行业风险加剧以及政治风险上升，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挑战。值得高兴的是，所担心的右翼政党上台的情况并未在奥地利总统选举和荷兰大选中出现，法国民粹主义政党总统候选人勒庞的热度也在下降，目前不会出现欧元区解散的悲剧。据欧盟委员会预期，欧元区2017年GDP将增长1.6%，2018年增长1.8%；欧元区通胀将从2016年的0.2%升至2017年1.7%和2018年的1.4%。欧洲能否最终实现稳定的增长和持续的经济复苏，还要看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以及成员国的结构性改革情况。

作者简介：梅霖，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① 殷桐生：《德国经济通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61—662页。

② 凤凰财经：《欧洲央行宣布延长量化宽松 欧元区增长前景困顿》，2016年12月9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09/15065748\\_0.shtml](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09/15065748_0.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16日。

# 2016 年德国经济发展评析<sup>①</sup>

陈 扬

【摘要】在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2016 年德国经济总体表现依然较好：全年 GDP 实现 1.9% 的增速，通胀率偏低，4360 万的就业人数及 6.1% 的失业率为德国统一以来的历史最佳水平；对外贸易顺差和国家财政盈余再创历史新高；就业规模扩大、内需强劲、建筑投资增速是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劳动市场向好、实体经济稳健、市场预期乐观、低位油价及欧元贬值是主要利好因素。然而，以劳动结构及增长要素结构为代表的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了德国经济生产潜能的提高。对此，政府宜切实推进结构性改革措施并适时调整经济政策，审慎应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及欧盟多重危机等国际和地区经济环境风险。2017 年德国经济有望延续 2016 年的良好基本面。

【关键词】德国经济 影响因素 结构性问题 改革

## 一、2016 年德国经济发展及趋势

### 1. 经济延续稳健增长

从 2013 年黑红大联合政府执政之始，后危机时代的德国经济逐步走出复苏阶段，经济运行总体更趋良好，特别是 2016 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9%，<sup>②</sup> 实现了自 2011

年来的最高增速，超出年初 1.7% 的预设目标和 1.3% 的潜在增长，德国由此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发达国家。具体来看，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一、二季度分别增长 1.9% 和 1.8%，第三、四季度涨势均回落至 1.7%，波幅较小。稳健的经济增长主要受私人及政府在消费和建筑投资提高上的双向拉动，而就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则成为经济增长续航的原动力。据

① 如无特别标注，本文数据来源为德国专家委员会发布的《2016/2017 年度鉴定报告》(Jahresgutachten 2016/17) 及德国经济能源部发布的《2017 年度经济报告》(Jahreswirtschaftsbericht 2017)。

②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amtwirtschaftUmwelt/VGR/Inlandsprodukt/Tabellen/Gesamtwirtschaft.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7.04.2017.

专家委员会预计，2017年德国经济有望实现1.4%的增速。该增长预期虽低于2016年增速，但这并不表示德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而是基于日历因素导致的工作日锐减效应。<sup>①</sup>

## 2. 就业形势更为乐观

2016年德国劳动市场的发展更趋活力：从业者共计4360万，创两德统一以来的新高，同比增长1%，比2005年新增400多万就业者。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及健康等社会福利部门，生产性制造业的就业也略有扩大。德国失业情况亦不断得到改善：未从业率由2015年的4.3%降至3.9%，而270多万的登记失业人数及6.1%的失业率均为德国统一以来的历史新低。其中女性失业率低于男性约1个百分点；20岁以下的青年人失业率处于3.5%—5%的区间内，为欧洲最低，更多女性、年长者和低收入者等困难群体得到安置。不过，劳动力成本的改观不甚明显，实际每小时单件劳动成本下降0.2%，降幅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

良好的就业形势，表明默克尔政府在推进“2010议程”的基础上采取的增加短时工职位、缩短必要工作时间等结构性措施效果得以进一步显现，就业水平得以全面提升。2017年就业和劳动市场将延续这一乐观态势：预计在核心服务业及第二产业将新增就业320万人；4380万的从业总数将创2005年来的第11次新高；鉴于新增移民失业者数量将有所扩大，失业率下降的趋势将得到遏制，并稳定在6%上下。

## 3. 通胀偏低，物价趋升

2016年德国通货膨胀率经历了从上半年

缓慢回落到下半年强势反弹的阶段性发展：受年初能源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通胀率降至4月份的-0.1%，此后不断上扬至12月份达1.7%。年均通胀率为0.5%，自2011年来首次超出去年同期（2015年为0.3%），通胀率的走高趋势显现。核心通胀率稳定在1.2%，接近历年核心通胀率的平均值。总体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对通胀率的刺激效应并不明显。

低位徘徊的通胀率主要源于能源产品的价格颓势，但能源价格对通胀率的影响不及2015年——食品及房租价格的强势走高、易耗品价格的适度上涨抑制了通胀率的进一步走低。不过，国际能源价格仍是德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的决定性因素。依据原材料交易所的期货报价，2017年度原油价格将升至56美元每盎司，远超2016年同期值。加之未来国内市场供给收紧、产能开工率走高以及汇率价格趋稳等预期，2017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将明显上扬至1.6%。核心通胀率和私人消费领域GDP平减指数或将缓慢上行，但国内需求市场活力将延续。

## 4. 内需强劲，政府驱动力加大

2016年德国国内需求继续上一年的增长活力，国家消费的强势上涨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尤为引人注目。2016年德国总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9%，比2011—2014年间的平均贡献率高出一倍。其中，德国实际私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2.0%，与去年同期持平，其增长的贡献率由2015年的1.1%下滑至0.9%；而国家消费支出同比增长4.2%，对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至0.8%，远高于2011—2014年间维持的0.2%及2015年实现的0.5%。

排除货币政策效应，国家消费的提高主要源自难民融入及护理保险等领域政策的

<sup>①</sup> Der Sachverständigenrat: Jahresgutachten 2016/17,02.2017, S.81.

扩大支出。鉴于在相关社会福利领域政策投入的可持续性，2017年德国消费将继续走高。私人消费的上涨主要得益于就业岗位的大量新增及有效薪资的提高，私人居户实际可支配收入由此提高。此外，低通胀率也进一步刺激了消费者的购置欲望，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2017年私人消费将继续受强劲内需推动而增长，相关领域的GDP平减指数将缓慢上行。<sup>①</sup>

## 5. 对内、对外投资增速提振

排除价格因素，2016年德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6267亿欧元，同比增长2.5%，比去年同期提高0.8%；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0.5%，高于去年0.2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主要得益于私人居户和政府建筑领域投资的“突飞猛进”：难民融入、私人住房、聚集区建设等领域需求的推动使建筑投资实现了3.1%的增速，高出去年2.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其他领域的投资上行较为乏力，设备投资实现增长1.7%，远低于2015年3.7%的增速。

长期以来，外向型制造业企业为私人部门的投资主力。受出口乏力因素的影响，2016年企业投资增速整体低于去年同期，但低息利率以及“工业4.0”倡议的政策性拉动对制造业企业的投资亦起到提振作用。较为可喜的是，尽管替代性投资仍然为企业投资的主要动机，但也有更多企业致力于增进扩大性投资<sup>②</sup>。此外，政府投资增长更为瞩目：2016年联邦政府公共投资达361亿欧元，超

出2013年执政初期投资额的三成。近年来，联邦政府致力于在遵守0.5%结构性赤字目标的基础上，逐步放开财政政策，财政收入盈余将用于改善企业创新及市场环境、提高科研投入、推动“工业4.0”及“高技术战略”等核心领域。

投资去向方面，德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及制造业部门。欧债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景气的复苏、制造业部门的产能提高以及低利率等良好的融资条件成为相关领域投资提振的主要利好因素；同时，德国企业对外投资额也在不断扩大。据德国工商总会的调查显示，2016年初仍有47%的制造业企业致力于继续扩大海外投资，而有3/4的企业仍将欧盟锁定为重点投资对象区域。未来，欧元区将继续作为最受德企青睐的投资目标地，其次是中国<sup>③</sup>。

2017年设备投资总额有望增长1.7个百分点；出于应对难民危机及新移民融入等问题，加之私人住房的需求持续上涨，政府及私人在建筑领域的投资将加快走高，预计实现1.9%的增速；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日趋回暖，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将加大设备投资力度，提高扩大性投资比例，以适应有所增长的国内外市场需求。

## 6. 对外贸易企稳，活力显退

2016年德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量再创新高：其中商品进口总额为9546亿欧元，同比增长0.6%；商品出口总额12,069亿欧元<sup>④</sup>，同比增长1.1%。对外贸易顺差达2522

① Der Sachverständigenrat: Jahresgutachten 2016/17, 02.2017, S. 70.

② DIHK: Industriekonjunktur 2016/2017: flaches Wachstum in herausfordernde Umfeld, DIHK-Industriereport, 12.2016, S.14.

③ DIHK: Umfrage-Auslandsinvestitionen in der Industrie 2017, 04.2017, S. 3.

④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amtwirtschaftUmwelt/Aussenhandel/GesamtentwicklungJahr.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5.04.2017.

亿欧元，同比增长 3.2%，顺差总量再创历史新高。但对外贸易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84.4%，为近五年来进出口值<sup>①</sup>的最低<sup>②</sup>。同时，对外贸易增速也有不同程度的放缓，特别是出口贸易增长更显疲态：2016 年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3.4%，低于去年 5.5% 的增长率；2016 年出口总贸易额仅实现 2.5% 的增长，远低于 5.1% 的去年同期水平，净出口甚至拉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1 个百分点。相比于消费和投资领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渐显乏力。值得注意的是贸易条件指数（Terms-of-trade）的改善：2016 年该指数（以 2010 年为基准年）为 106.3，是近 15 年来的最高值。

进出口产品去向方面，相比于金融和欧债危机前，欧盟内部大市场占据德国对外贸易份额的大半壁江山有所缩水：其中 2016 年德国对欧出口贸易占比 58.6%，低于危机前的 63%；进口贸易占比 57.9%，略低于危机前水平。可见，后危机时代德国对欧出口产品比例，与从欧进口产品比例的差距缩小。此外，德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出口贸易占比有所下降，同欧元区外国家间的贸易分量有所提高<sup>③</sup>，特别是中东欧国家作为德国出口市场的地位更加重要——德国对其出口贸易占比甚至超过德国对华出口<sup>④</sup>。

具体来看，需求拉动确保了德国进口贸

易的增长延续。就出口贸易而言，一方面，扩张性货币政策带来的价格竞争力优势为其持续提供增长动能；另一方面，欧元区及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的缓慢复苏、国际贸易的疲软增长、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风险性增加等因素减缓了德国对外出口贸易增速。此外，贸易条件指数的改善主要基于年初油价暴跌带来的影响。鉴于未来油价的上涨预期，贸易条件指数带来的价格竞争力优势将不可持续，该指数预计 2017 年将下降 0.7 个百分点。此外，鉴于内需拉动加强、能源价格提升和汇率趋稳等因素，今年进口增长将快于出口增长，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增速将放缓。

## 7. 国家财政盈余，公债率创新低

2016 年德国政府第三次实现财政盈余的增收：其中，财政收入为 14,114 亿欧元，同比增长 4.18%；财政支出为 13,877 亿欧元，同比增长 4.03%。237 亿欧元的财政盈余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 0.8%<sup>⑤</sup>，这一比例为近五年来最高。扩大的财政收入主要源于就业扩大带来的收入及财产所得税增长（6.5%）及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的增加（4.6%），而财政支出的增长则主要源自先为给付（Vorleistungen）及社会福利领域的实物支付增长<sup>⑥</sup>，其中难民融入及社会保险为重点支出领域。此外，政府债务存量及国债率逐年稳步下降，2016

① 即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②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Indikatoren/Globalisierungsindikatoren/Tabellen/01\\_02\\_03\\_44\\_VGR.html](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Indikatoren/Globalisierungsindikatoren/Tabellen/01_02_03_44_VGR.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5.04.2017.

③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Indikatoren/Globalisierungsindikatoren/Tabellen/09\\_VGR.html](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Indikatoren/Globalisierungsindikatoren/Tabellen/09_VGR.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7.04.2017.

④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Jahreswirtschaftsbericht 2017, 01.2017, S.69.

⑤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amtwirtschaft-Umwelt/VGR/Inlandsprodukt/Tabellen/EinAusStaat.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7.04.2017.

⑥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17/02/PD17\\_063\\_813.html](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17/02/PD17_063_813.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7.04.2017.

年国债率<sup>①</sup>由2015年的71.2%降为68.25%。除难民融入推动的劳动市场及教育政策投资外,为更好应对数字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联邦政府将加大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2017年政府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额将达128亿欧元,预期同比增长25%;此外,联邦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增资40亿欧元用于扩建宽带网络。

## 二、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 1. 劳动市场向好

乐观向好的劳动市场是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源泉。无论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提速、国内需求的高涨,还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盈余的扩大,德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基本面均得益于就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提升以及失业状况的有效改善。除从业人数和失业率等宏观数据外,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德国人均及每工时的劳动力成本均有所回落;同时,劳动生产率<sup>②</sup>的逐年稳步提高,使德国的人力资本要素优势更为突出。

### 2. 实体经济稳健

具备强大竞争力和创新实力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向好的不二法门。2016年德国经济景气指数由第一季度的100.0攀升至第四季度的105.5,正是主要得益于制造业产能在第三、四季度的强劲增长。<sup>③</sup>长期以来,政府、

经济界、科研界和社会各界的稳扎稳打与齐力贡献之下,德国工业得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科研和创新产出的核心和主导部门:在产业结构变革中的近20年来,德国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维持在22%—24%,这一比例居各发达国家之首,亦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2016年德国生产型制造业的从业人数为1053万人,并将继续保持增长。此外,由于企业加大了替代性投资力度并适时增进扩大性投资,2013年来德国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2016年甚至出现开工过度的现象。与此同时,实力雄厚的制造业也促进了服务业的多元发展。而生产型服务业、健康产业、技术导向型的文化和创意产业比重的不断提高,既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也进一步刺激了市场需求的扩大,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创新升级保驾护航。

### 3. 价格、货币等资金因素

国际经济环境的有利条件主要体现在低位油价、欧元贬值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三方面。低位油价和欧元贬值一方面使通胀率处于低位;另一方面则直接降低制造业内能源依赖型企业的成本及居民实际消费成本,从而进一步提振私人投资和消费,原油价格与欧元汇率同德国外向型经济的增长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自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初,原油价格暴跌至每桶30美元以下<sup>④</sup>。低位油价形成了德国2016年2%的经常项目收支盈

① 国家债务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② 以从业者每工时的产能为单位。

③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https://www.diw.de/de/diw\\_02.c.102177.de/forschung\\_beratung/daten/konjunkturbarometer/konjunkturbarometer\\_vom\\_29\\_maez\\_2017.html](https://www.diw.de/de/diw_02.c.102177.de/forschung_beratung/daten/konjunkturbarometer/konjunkturbarometer_vom_29_maez_2017.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8.04.2017.

④ 吴侨玲:《国际油价下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载一财网, <http://www.yicai.com/news/4740102.html>, 2016年1月17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8日。

余；2016年全年欧元兑美元汇率下跌了将近3%<sup>①</sup>，欧元的持续贬值同样扩大了德国的对外出口优势。此外，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回落、国家财政盈余的扩大同样对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增资扩资活动产生明显刺激作用，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 4. 稳定乐观的景气与市场预期

尽管2016年一系列国际和地区性“黑天鹅”事件频现，消费者、企业及相关金融机构对德国经济前景总体保持看好，英国脱欧公投成功、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任总统等不寻常事件对市场信心的短期不利影响甚微。据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统计，2016年德国商业气氛指数（Geschäftsklimaindex）虽然经历了先降后升、再跌再涨的两次阶段性波动，但在第二、第四季度指数的强势拉动下，企业对市场整体预期好于去年同期。其中2016年12月的指数为111.0，为2012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sup>②</sup>。此外，需求上扬使得2017年第一季度的商业气氛指数继续走高，其中3月份112.3的指数为2011年7月以来的最高值<sup>③</sup>。企业更为乐观的整体预期，将为投资、需求和就业的进一步扩大奠定基础。

### 三、德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改革建议

对于当前德国经济的向好发展形势，德

国专家委员会却敲响了警钟：始终未被深层触碰的结构性问题正侵蚀着德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并成为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的强大阻力。对此专家委员会强调，实施结构性改革已刻不容缓。鉴于当前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激增，政府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稳健的经济基数优势和增长活力，趁热打铁推进改革，以提高经济效能和抗风险能力。以下将重点就劳动市场结构及增长要素结构这两大问题进行展开。

#### 1. 劳动市场结构——长期性失业固化、劳动力供需失衡

德国劳动市场的从业人数及失业率等宏观面数据虽然可喜，但该领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却长期制约着德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实现质的突破。一方面，基于产业和经济结构转变产生的大量结构性失业加剧了劳动需求过剩的态势：一直以来，结构性失业中的长期失业现象未被有效克服，且劳动力市场僵化导致的薪资低流动性（niedrige Lohnmobilität）加重了长期性失业的固化态势<sup>④</sup>，随之固化的还有财产及收入分配不均及扩大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劳动供给同样存在缺口：职业技术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不能满足诸多高规格部门的人才需求，高技能、高素质人才储备不足。

此外，难民危机导致大量新增合法避难者及合法移民，为劳动力融入、协调劳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带来更大挑战，更何况新增

① 龙舞：《欧元兑美元收回部分升幅，欧元2016年全年下跌3%》，载汇金网，<http://www.gold678.com/C/20161231/201612310515381850.html>，2016年12月31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8日。

② ifo Institut: <https://www.cesifo-group.de/de/ifoHome/facts/Survey-Results/Business-Climate/Geschaefts-klima-Archiv/2016.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8.04.2017.

③ ifo Institut: <https://www.cesifo-group.de/de/ifoHome/facts/Survey-Results/Business-Climate/Geschaefts-klima-Archiv/2017/Geschaeftsklima-20170327.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8.04.2017.

④ Der Sachverständigenrat: Jahresgutachten 2016/17,02.2017, S.3.

移民尚无法切实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隐患：一方面，从数量上，德国每年需要 40 万至 50 万的移民才可以维持目前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缺口<sup>①</sup>，当前年均 20 万的移民显然无法满足要求；另一方面，占据移民多数的难民群体无法在短期内胜任高技能工人或其他服务业的工作。

为解决劳动市场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提高潜在就业率，改善收入和财产分配不均，长期来看应将重点放在提高核心生产要素优势、保障市场有效竞争、提高劳动市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功能性措施的实施上，弱化福利性的干预措施（如引入全行业的普遍最低工资等）。具体应继续提高劳动市场的灵活度及雇员的资质水平，改善收入和财产的流动性；为更好地促进机会均等，应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政策，提高教育制度的透明度和灵活度，推进学前教育的义务化以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现代化；改革企业的养老保险支付政策，取消企业和私人两级的双重付费<sup>②</sup>，降低中小企业和低收入者负担。针对新增移民的涌入，政府更应贯彻有针对性的教育和融入政策，尤其重视从数量和质量上提高低工资行业的劳动力吸纳和融入潜力；依据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提高退休年龄上限。此外，调整税收政策来提振企业创新和投资的积极性尤为必要。政府应重点改革企业税（不考虑自有资本基础上的税率）、遗产税以及收入所得税的征税机制，降低“冷累进”（Kalte Progression）带来的隐性税收负担，从而真正实现

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双重发展目标。

## 2. 增长要素结构——总投资疲软成“顽疾”

内需（私人和国家消费）、总投资（库存变化及基本建设总投资）、进出口值是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三驾马车”<sup>③</sup>。长期以来，德国经济的这三驾马车未能并驾齐驱，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严重失衡。即便是在投资增速显著提升的 2016 年，投资疲软现象亦并未得到实质扭转，投资疲软的“顽疾”未消。以 2016 年的数据为例，对于 1.9%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私人消费的贡献率为 1.1%，国家消费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8%，进出口值带来 0.1% 的负增长，而总投资的贡献率为 0.1%<sup>④</sup>，虽高于去年同期 0.3 个百分点，但与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相比仍然过低。

对此，政府应继续转变“重稳定、轻增长”的经济发展思维，同时注重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一方面，联邦财政盈余的持续扩大为加大公共投资提供了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在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时，宜采取审慎态度，在维持现有债务率目标的基础上，同各联邦州及乡镇一级做好协调，有针对性地增进有效投资。其中，特别是一些服务于经济效能提升的交通、网络、数字化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和创新环境、扩大投资及创新区位优势、提高科研投入、资助中小企业及社会福利政策等关键领域应

① 冯迪凡：《老龄化带来隐忧，难民能否填补德国空缺》，载《第一财经日报》，<http://www.yicai.com/news/4682723.html>，2015年9月9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8日。

② Der Sachverständigenrat: Jahresgutachten 2016/17,02.2017, S.37.

③ 殷桐生：《德国经济通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48页。

④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17/01/PD17\\_010\\_811.html](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Servic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17/01/PD17_010_811.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0.04.2017.

作为投资和增资的重点。

## 四、德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潜在挑战

2016年的德国经济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匍匐前进，特别是对外出口受到了较大冲击。其中，一些挑战或风险对德国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具备短期性，而另一些冲击带来的消极效应却可能长期持续，对此应予以准确把握。

### 1.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有限且不可持续。2016年德国虽然实现了超出生产潜能的经济增长，但实际贷款额和投资增长却较为迟缓。专家委员会表示，德国国民经济存在的开工过剩很大程度上是由过低利率造成的，长期来看这将增加经济过热、生产要素错误分配、价格机制失灵等风险。对此，政府应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予以调和，特别要注意降低国债率来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通过采取相应的结构性措施提高宏观经济增长潜能和抗风险能力。

### 2. 欧盟多重危机及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欧债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民粹主义和疑欧势力等多重地缘和政治风险交织，再度给欧盟经济蒙上阴影——除直接经济损失外，欧洲一体化面临

的重重困境挫伤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扩大了政府危机处理的开支，对有效需求和投资的增长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作用。

与此同时，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缺失致使欧元区经济的整体开工不足，潜在增长率低下。此外，欧元区经济旧疾未了，新病不断：一方面，自2015年债务减记协议达成以来，希腊债务依然居高不下，甚至有“爆炸性”增长的风险<sup>①</sup>，债务重组谈判也屡陷僵局；另一方面，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财政整固效果不佳，国债收益率屡创新高<sup>②</sup>，银行资本率始终未得到有效改善，意大利修宪公投的失败进一步激化了其银行重组风险，整个欧元区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依旧堪忧。近年来，德国对外贸易中的对欧份额，特别是对欧元区国家的份额已有所下滑。长期来看，欧元区尚未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将继续对德国与欧元区的双边贸易产生抑制作用。

### 3. 国际经济环境的新旧隐忧

首先，地区性危机对德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不利影响仍在持续。以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欧盟对俄制裁为例：2015年底，欧盟表示将对俄制裁同《明斯克协议》的落实情况挂钩，并将对俄制裁延长至2016年7月31日，随后又决定将其再次延长至2017年1月31日。在此影响下，2015年德俄双边贸易额降至520亿欧元<sup>③</sup>，比2012年减少53.8%；2016年双边贸易额进一步走低，其中2016年1—

① 栾雪：《希腊债务问题再现波折 风险担忧情绪蔓延》，<http://www.cnforex.com/comment/html/2017/2/9/cf71f2947bfc37f22a5f0a6b05eef7f0.html>，2017年2月9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9日。

②（作者不详）：《欧债收盘：债券发行量将激增，葡萄牙国债收益率创近一年新高》，载汇通网，[https://www.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DetailInfo&docId=5614806](https://www.Chinastock.com.cn/yhwz_about.do?methodCall=getDetailInfo&docId=5614806)，2017年1月6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10日。

③ 新华社：《德经济部长赞成逐步取消对俄经济制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5/26/c\\_1118935549.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5/26/c_1118935549.htm)，2016年5月26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9日。

8月份德国对俄出口同比下跌17%，俄罗斯下滑成为德国第13大出口伙伴国。

其次，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及区域金融市场的波动为德国对外经济的走向又添新变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迟缓并长期陷入结构性低迷<sup>①</sup>。而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经济政策导向及英国脱欧谈判结果的不确定性，以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浪潮，巴西、印度、土耳其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风险均可能给德国对外贸易增量和结构带来更大的冲击。

鉴于德国经济对欧盟外市场的依赖度加大，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对德国贸易的不利影响不容小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向“内需拉动、质量增长”的转变，已对德国制造业的出口及对外投资带来一定冲击。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是德国在海外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而销往中国的德国汽车制成品已从2010年的17%下降到2015年的14%，汽车零配件比例则由7%上升到11%。对于双边贸易在产业链及生产要素配置优势的角色转变与调整，德国需加以合理应对。

## 五、结 语

2016年德国经济总体表现较好：1.9%的经济增速创近五年来的新高；通胀率处于0.5%的低位水平，物价稳中有升；4360万的就业人数及6.1%的失业率为德国统一以来的历史最佳水平；国家财政盈余和对外贸易顺差再创新高，作为欧元区“火车头”的德国经济影响更为明显。

良好的经济表现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更为强劲的内需及新增就业的推动之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进一步拉动私人 and 政府消费；同时，私人 and 政府投资明显提振，建筑投资成为增长的重点领域；德国产业结构发达，以汽车制造、电子电器、化工及机械制造为支柱的制造业部门抗风险能力较强，订单量持续走高，保障了出口增长的延续。此外，稳定乐观的市场预期、国家财政盈余、低位油价及欧元贬值等因素共同助推德国经济的稳健上行。

与此同时，结构性问题的搁置已然危及德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制约其更高增速的实现。2017年初，德国联邦经济能源部出台以“实现德国和欧洲的包容性增长”为题的年度经济报告，彰显其致力于落实更加健康的经济发展理念的决心。而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真正将改革的“心动”化为“行动”，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专家委员会表示，政府应首先从战略上充分意识到相关领域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重视劳动生产率及增长潜能疲软、投资和创新区位优势不足等问题，并充分调动经济界、科研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行动力，一方面稳固和深化既有措施成果；另一方面应就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时、果断、坚定地迈出新的改革步伐，从而确保德国在信息化、数字化和人口老龄化走向新阶段的世界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鉴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德国经济能否续写并扩大其在增速和结构平衡方面的优势，同样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应对外部各类不稳定因素：长远来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不利于经济实现稳健和可持续发展；欧洲一体化遇阻、欧元区

<sup>①</sup> 范黎波，施屹舟：《理性看待和正确应对“逆全球化”现象》，载《光明日报》，[http://www.cssn.cn/zx/201704/t20170402\\_3474697.shtml](http://www.cssn.cn/zx/201704/t20170402_3474697.shtml)，2017年4月2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4月6日。

经济疲软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无疑会影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英国脱欧谈判结果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转型，对德国今后对

外贸易战略的调整构成更多挑战。对此，德国政府应通过切实推进结构性改革措施、适时调整经济政策来提高宏观经济的增长潜能和抗风险能力。

作者简介：陈扬，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 Gab es tatsächlich eine Eurokrise während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Von Wei Zhongjia

【 Abstract 】 Seit der Einführung des Euros ist er sofort zur zweitwichtigsten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 geworden, obwohl seine Einführung sehr umstritten war. Besonders der Ausbruch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hat viel Kritik am Euro hervorgebracht. Und die Schuldenkrise wurde sogar als „Eurokrise“ bezeichnet. Jetzt ist die Schuldenkrise gewissermaßen unter Kontrolle, so dass objektiv und rational diskutiert werden kann, ob der Euro als Währung als Hauptgrund für die Schuldenkrise gelten kann oder nicht. Der Text analysiert die Rolle des Euros während der Schuldenkrise, um festzustellen, ob sich der Euro auch während der Schuldenkrise im Krisenzustand befand und wie man den Zustand sowie die Perspektiven des Euros im internationalen Kontext einschätzen soll.

【 Schlagwörter 】 EU-Schuldenkrise Eurokrise Geldfunktionen

## Einleitung

Schon 7 Jahre nach der Einführung des Euros gerieten viele Länder in der Eurozone in eine schwere Staatsschuldenkrise, die schnell eskalierte und zu einer Finanzkrise führte. Die große

Finanzkrise von 2008/2009 hat sich aus einem Verschwinden des Vertrauens in die Zahlungsfähigkeit von privaten und öffentlichen Schuldnern ergeben<sup>①</sup> Sie resultiert aus einer Vielzahl unterschiedlicher Faktoren, deren Gewichtung i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 stark

---

① Vgl. Brasche, U.: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Wirtschaft, Erweiterung und regionale Effekte*, 3. Auflage, 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2013, S.292.

umstritten ist.<sup>①</sup> Wegen der Schuldenkrise in der Eurozone seit 2009 wurde vereinzelt sogar die Gemeinschaftswährung, der Euro, in Frage gestellt. Viele nennen diese Schuldenkrise sogar direkt Eurokrise und schreiben die Schuldenkrise dem Euro zu, und zwar wegen der Trennung der Geldpolitik der EZB von der nationalen Fiskalpolitik nach der Einführung des Euros.<sup>②</sup>

Erst seit 2013 konnte die Krise unter Kontrolle gebracht werden und man kann rational darüber nachdenken, ob der Euro hauptsächlich für die Schuldenkrise verantwortlich war, ob er die Gesundung der europäischen Konjunktur nach der Krise verhinderte und welche Rolle der Euro während der Krise gespielt hat. Davon ausgehend untersuche ich in diesem Beitrag die Rolle des Euros in einem internationalen Kontext in der Zeitspanne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nämlich von 2009 bis 2013. Die von mir untersuchten Fragen sind Folgende:

- Mit welchen Kriterien kann man die Situation einer Währung einschätzen?
- Befand sich der Euro während der Europäischen Finanzkrise auch in der Krise? Sind die Zukunftsaussichten des Euros eher pessimistisch oder optimistisch zu beurteilen?
- Was kann man aus der Europäischen Finanzkrise lernen?

Der Beitrag gliedert sich in vier Kapitel. Nach der Einleitung, die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as Thema gibt und die Leitfragen für diese Arbeit stellt, folgen zunächst theoretische Grund-

lagen, auf denen die Analysen der folgenden Kapitel und die Beantwortung der Leitfragen im letzten Kapitel basieren. Im dritten Kapitel werden die einzelnen Kriterien zur Bewertung des Status des Euros dargestellt. Mit Hilfe statistischer Daten wird versucht, die Rolle des Euros vor und innerhalb der Krise anschaulich zu erklären. Im Anschluss daran wird die heutige Situation des Euros analysiert, um zu klären, warum sich der Euro in einem relativ schwachen Zustand befindet und ob dies überhaupt mit der Krise zu tun hat. Schließlich werden die Ergebnisse im letzten Kapitel zusammengefasst und die in der Einführung gestellten Fragen werden auf dieser Basis beantwortet.

## 1.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 1) Die Definition der Währungskrise

Zur Beantwortung der Frage, ob sich der Euro während der Schuldenkrise überhaupt im Krisenzustand befand, muss erst erklärt werden, was eine Währungskrise ausmacht. Eine bekannte Definition lautet:

„Eine Währungskrise drückt den Zusammenbruch des Vertrauens in eine Währung aus und ist durch einen kumulativen Ausstieg in ausländische Währungen gekennzeichnet. Kapitalexporte bzw. Kapitalflucht führen dann zu einer starken Ab-

① Vgl. (Verfasser und Zeit unbekannt), URL: <https://de.wikipedia.org/wiki/Eurokrise>, letzter Zugriff am 07.01.2016.

② Vgl. 张志前, 喇绍华:《欧债危机》(Europäische Schuldenkrise),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第128页。

wertung.“<sup>①</sup>

Nach der Definition ist eine Währungskrise mit dem Wechselkurs verbunden und durch die Kapitalflucht gekennzeichnet. Hierbei geht es um das Vertrauen, das durch Kapitalzyklus und Handel widergespiegelt wird. Von daher ist die Analyse des Eurostands mit der Analyse von Reserve, Handel und Finanzmarkt verbunden.

## 2) Die Ursachen der Krise

### *Die Ursachen der Finanzkrise*

Finanz- und Wirtschaftskrisen folgen oft aufeinander. Im Folgenden stelle ich zwei Modelle zur Erklärung des Phänomens des wiederholten Auftretens von Finanzkrisen dar. Zunächst die sogenannte Instabilitätshypothese von Minsky und gebe dann eine psychologisch basierte Erklärung.

Nach der Krisentheorie von Minsky sind Finanzkrisen ein „inhärentes Element kapitalistischer Ökonomien“<sup>②</sup>. Minsky hält den Finanzmarkt für inhärent instabil und er vertritt die Position, dass regelmäßig auftretende Krisen der Wirtschaft kein Ausnahmephänomen, sondern dem Finanzsystem inhärent sind. Seine Theorie umfasst zwei wichtige Faktoren, nämlich Zahlungsverpflichtung und Cashflow, sowie drei Phasen im wiederkehrenden Verlauf der Wirtschaft: „Hedge“, „Speculative“ und „Ponzi“. Hedge bezeichnet die Phase im Anschluss an die Krise, in der sich die Volkswirtschaft erholt und die Akteure sich vorsichtig verhalten. In dieser

Phase ist der Cash-Flow größer als die Zahlungsverpflichtung und die Volkswirtschaft kann sich die Verpflichtung daher gut leisten. In der zweiten Phase, „Speculative“, läuft die Wirtschaft immer heißer, weil private Akteure auf dem Markt immer spekulativere bzw. höhere Erwartungen an das Wachstum der Wirtschaft haben. Während dieser Phase übersteigt die Zahlungsverpflichtung den Cash-Flow, so dass in der Konsequenz immer mehr Schulden vorhanden sind. Bei weiter wachsender Wirtschaft geraten die Akteure in eine Art spekulative Euphorie, nehmen immer mehr Kredite auf und gehen immer höhere Risiken ein. Dieser Zustand kennzeichnet die dritte Phase, „Ponzi“. Wenn die Investoren mit Zahlungsproblemen konfrontiert sind und nicht mehr in der Lage sind, Zinsen und Tilgung zurückzuzahlen, bricht die Finanzierung der Schulden zusammen, die Wachstumsblase platzt.

Nach Klodts psychologisch basierten Erklärungen der Krise ist vor allem das irrationale Verhalten des Menschen für das wiederkehrende Auftreten von Finanzkrisen verantwortlich. Das Zusammenwirken von Selbstüberschätzung der Akteure, bestätigender Konfliktüberwindung, von Ausstattungseffekt und Verlustaversion sowie des Nachhinein-Effekts usw.

Obige Modelle versuchen den wiederkehrenden Zyklus von Finanzkrise und Wachstum zu erklären und versuchen zu zeigen, dass im heutigen Finanz- und Wirtschaftssystem Krisen schon theoretisch nicht vermeidbar sind.

---

① Heine, M./Herr H.: *Volkswirtschaftslehre: Paradigmenorientierte Einführung in die Mikro- und Makroökonomie*. Walter de Gruyter, 2013, S. 726.

② Brasche U.: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Wirtschaft, Erweiterung und regionale Effekte*, 3. Auflage, 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2013, S.287.

### Die Ursachen der Schuldenkrise

Eine Schuldenkrise kann nur im Zusammenwirken interner und externer Faktoren entstehen, d.h. eine Schuldenkrise wird oft nicht von einem einzelnen Faktor verursacht.

Zu den internen Faktoren gehören vor allem die Fehlentwicklungen in den Schuldenstaaten. Wenn das fließende Kapital überwiegend für den Konsum verwendet wird, bleibt für wachstumsfördernde Investitionen nicht mehr genügend Spielraum. Ohne diese können aber nicht die langfristig notwendigen, zusätzlichen Erträge erwirtschaftet werden, aus denen die Auslandskredite verzinst und getilgt werden können.<sup>①</sup> Dazu zählen auch die hohen Sozialleistungen in den Schuldenstaaten sowie das parallel vorhandene gravierende Problem der Bevölkerungsüberalterung.<sup>②</sup>

Die äußeren Faktoren sind im Vergleich hierzu oft vielfältiger. Da die Welt sich wirtschaftlich immer mehr integriert, kann ein Wirtschaftseignis in einem Staat auch die Wirtschaft in anderen Staaten stark beeinflussen. Zum Beispiel wurde der Ausbruch der lateinamerikanischen Schuldenkrise 1982 etwa durch den starken Anstieg des US-Zinsniveaus und eine deutliche Aufwertung des US-Dollars erklärt. Gleichzeitig fielen die Rohstoffpreise. Dies bewirkte, dass der Schuldendienst der Schwellenländer deutlich zunahm und gleichzeitig die Einnahmen aus Rohstoffverkäufen sanken. Wegen der sich so

drastisch verschlechternden Relation zwischen Einnahmen und Schuldendienst waren in dieser Situation die Kreditgeber nicht mehr bereit, fällig werdende Kredite durch Anschlusskredite zu refinanzieren. Die Folge war die Zahlungsunfähigkeit der betreffenden Staaten.<sup>③</sup>

Diese internen und externen Faktoren wirken zusammen und führen zu einer Schuldenkrise.

## 2. Die Geldfunktionen

Auch als relativ junge Währung erfüllt der Euro alle Eigenschaften und Funktionen von Geld. Um zu untersuchen, wie sich der Euro während der Schuldenkrise entwickelt hat, kann man diese Entwicklung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Geldfunktionen analysieren.

Nach Niklas Luhmanns Theorie ist Geld „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s Kommunikationsmedium der Wirtschaft“<sup>④</sup>. Das bedeutet, dass Papiergeld von allen als Tauschwert akzeptiert wird, obwohl es materiell quasi wertlos ist. Das zeigt, dass Geld ohne Vertrauen keinen Wert besitzt. Ganz im Gegensatz dazu spielen die natürlichen, wertvollen Edelmetalle wie Gold und Silber eine Rolle als eine Art natürliches Tauschmittel und werden wegen ihres eigenen Wertes auch als natürliches Geld betrachtet. Die meisten Staaten haben daher stabile Goldreserven, um die Stabilität ihrer jeweiligen Volkswirtschaft zu gewährleisten

① Vgl. Meyers: *Wie funktioniert das? Wirtschaft heute*, Lexikonverlag Mannheim, 1999, S.278.

② Vgl. 杨晓龙:《欧元区货币一体化与欧债危机》(Die Währungsintegration in der Eurozone und die Schuldenkrise),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5年, 第114页。

③ Vgl. Meyers: *Wie funktioniert das? Wirtschaft heute*, Lexikonverlag Mannheim, 1999, S.278.

④ Wildmann, L.: *Makroökonomie, Geld und Währung*, 2. Auflage, Oldenbourg, 2010, S.119.

und die Risiken der internationalen Finanzwirtschaft auszugleichen.

Beim Geld steht oft die Funktion als Tausch- und Zahlungsmittel im Vordergrund. Hinzu kommen aber noch zwei weitere Funktionen – die Recheneinheitensfunktion und die Wertaufbewahrungsfunktion.<sup>①</sup>

#### *Geld als Tausch- und Zahlungsmittel*

Die Tauschfunktion ist die wichtigste Funktion des Geldes, da diese Funktion die allgemein akzeptierte Definition des Geldes umreißt:

„Ein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Tauschwirtschaft entstandenes Medium, das den zweiseitigen Moment des Naturaltausches durch zwei einseitige Momente des Kaufs und des Verkaufs ersetzt und somit das Wirtschaften erleichtert.“<sup>②</sup>

Als allgemeines Tauschmittel ist Geld ein Ersatz für Natur- und Zwischenaustauschmittel. Durch es werden die Tauschvorgänge nicht nur in einem Binnenmarkt sondern auch auf der Globalisierungsebene stark erleichtert.

#### *Geld als Recheneinheit und Bewertungsmaßstab*

Hier dient das Geld als Wertmaßstab für Güter. Die Güter, die man mit einer gewissen Geldeinheit kaufen kann, sind gleich im Wert. Diese Funktion des Geldes erleichtert daher den Wertvergleich erheblich. Die Recheneinheitensfunktion des Geldes basiert vor allem auf der Zahlungsfunktion. Während des Handels müssen alle Waren mit einem Preis in einer gewissen Währung angegeben werden. Die bestimmte Währung dient als Recheneinheit, also als ein

Wertbemessungsgrad für die gehandelten Waren.

Daher tritt das Geld als Bewertungsmaßstab ein Schritt vor der Bezahlungsfunktion in Erscheinung. Und daran, mit welcher Währung eine Ware im Handel notiert ist, zeigt sich schon der Einfluss einer bestimmten Währung auf einem bestimmten Markt.

#### *Geld als Wertaufbewahrungsmittel*

Das Geld von heute ist im Vergleich zu den Natur- und Zwischenaustauschmitteln besser haltbar und allgemein wertbeständig. Aus diesem Grund ist Geld auch zum Wertaufbewahrungsmittel geworden. Die Voraussetzung dafür ist hauptsächlich das Vertrauen in die Stabilität des Geldwertes. Damit etwa dem Euro als gemeinsamer Währung der Länder der Europäischen Währungsunion (EWU) entsprechendes Vertrauen entgegengebracht wird, wurde auf die Erfüllung bestimmter Konvergenzkriterien durch die einzelnen Teilnehmerstaaten großer Wert gelegt. In Zeiten, in denen sich der Geldwert rasch verschlechtert, kann das Geld seine Qualität als Wertaufbewahrungsmittel einbüßen, da jeder versuchen wird, Geldbestände möglichst rasch in Sachwerte wie Waren oder Gold oder andere Währungen umzutauschen.<sup>③</sup> Ähnlich funktioniert es in der Schuldenkrise: Wenn die Aussichten des Euros gut sind, also das Vertrauen hoch ist, sollte man nach dieser Theorie mehr Euro als Aufbewahrungsmittel halten. Und anders herum, wenn sich der Euro in einer Krise befindet, würde man wegen des geringeren Vertrauens eher weniger

---

① Vgl. a.a.O., S.117.

② Ebd.

③ Meyers: *Wie funktioniert das? Wirtschaft heute*, 4., völlig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Mannheim; Leipzig; Wien; Zürich: Meyers Lexikonverlag, 1999, S.90.

bereit sein, Euros aufzubewahren.

### 3. Der Euro während der Schuldenkrise

Der Euro ist seit seiner Einführung die zweitgrößte Währung nach dem US-Dollar. Um zu untersuchen, ob sich der Euro in der Krise befand, muss man zunächst betrachten, wie der Euro seine in Kapitel 2.2 diskutierten Geldfunktionen während der Finanzkrise erfüllt hat. Dieses Kapital gliedert sich in sieben Teile deren Aufteilung auf den verschiedenen Funktionen des Geldes basiert. Die acht Maßstäbe sind eng mit den Geldfunktionen des Geldes und zwar besonders mit der Zahlungsfunktion und der Wertaufbewahrungsfunktion verbunden, weil beide die Zahlungsfähigkeit und das Vertrauen gegenüber einer bestimmten Währung anschaulich beschreiben können.

#### 1) Der Euro als eine internationale Reservewährung

Währungsreserven (auch Devisenreserven) sind ein sehr wichtiger Teil einer Volkswirtschaft. Durch die Devisenreserven wird die internationale Zahlungsfähigkeit der Volkswirtschaft gesichert. Die wichtigsten Bestandteile der Währungsreserven sind Devisenreserven, Goldreserven, die Reserveposition eines Staates im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fond (IMF) als Sonderziehungsrechte (SZR). In diesem Kapitel wird es um zwei Indikatoren gehen: der Euro als Devisenreservewährung und der Euro als Sonderziehungsrecht.

#### 2) Euro als internationale Devisenreservewährung

Der Euro ist unter den globalen Währungsreserven praktisch seit seiner Einführung die zweitgrößte Reservewährung nach dem US-Dollar. Im Jahr 2009 blieb der Anteil des Euros relativ stabil, trotz des Ausbruchs der Schuldenkrise und Ende 2009 lag der Anteil des Euros sogar einen Prozentpunkt höher als am Ende des vorherigen Jahres. Mitte 2010 hat sich der Euroanteil weiter von 26,0% (2009) auf 26,3% erhöht. Ende 2011 sank der Euroanteil auf 25% (0,4% niedriger als Ende 2010), während die Anteile des US-Dollars und des Japanischen Yen stabil geblieben sind. 2012 und 2013 hat sich der Anteil des Euros weiter verringert bei gleichzeitiger Anteilsverringern des US-Dollars und der Volumenerhöhung anderer, nicht-traditioneller Währungen.

Dass der Anteil des Euros als internationale Reservewährung während der ersten Hälfte der Schuldenkrise ständig zunahm, zeigt, dass die Schuldenkrise keinen großen Einfluss auf die Bedeutung des Euros als global zweitgrößte Reservewährung hatte. Die allmähliche Senkung des Euroanteils seit Ende 2011 ist einerseits sehr gering und andererseits eher eine Folge einer neuen Strategie der Zentralbanken, nämlich eine Diversifikation der Reservewährungen zu erzielen.

In Bezug auf den Euro-Anteil seit 1999 kann man wohl behaupten, dass die Schwankungen des Euroanteils während der Schuldenkrise keine deutlich anderen Eigenschaften als vorher zeigte.

**Abbildung 1 Währungsstruktur in der globalen Devisenreserve**



Quelle: EZB

Wenn man die in Abbildung 1 dargestellte Änderung des Anteils der wichtigen Reservewährungen aus einer langfristigen Perspektive mit einem Schwerpunkt auf der internationalen Finanzkrise und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betrachtet, dann hat sich der Anteil des US-Dollars an den internationalen Devisenreserven seit Ende 2007 um 4,1% reduziert. In der gleichen Zeitspanne sank der Anteil des Euros nur um 0,7%. Trotz der Abnahme des internationalen Devisenreserveanteils haben sich die Führungspositionen des US-Dollars und des Euros als internationale Reservewährungen fast nicht verändert. Die Abnahme hatte mit den Krisen wenig zu tun, sondern liegt eher daran, dass die Zentralbanken

die Devisenreservewährungen diversifizieren wollen. Der Anteil der anderen Währungen wie Australischer Dollar und Kanadischer Dollar wurde von den Zentralbanken mit Absicht erhöht. Das heißt, als Reservewährung blieb der Euro während der Schuldenkrise sehr stabil und befand sich daher gar nicht im Krisenzustand.

### 3) Der Euro in dem SZR-Korb

SZR (Sonderziehungsrecht) ist eine künstliche, 1969 vom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fonds (IMF) eingeführte Währung, die international als Zahlungsmittel verwendet wird.<sup>①</sup> Daneben gilt das SZR auch als Recheneinheit und Wertaufbewahrungsmittel. Unter dem Bret-

① (Zeit und Verfasser unbekannt), URL: <https://de.wikipedia.org/wiki/Sonderziehungsrecht>, letzter Zugriff am 05.03.2016.

ton-Woods-System diente das SZR als eine Alternative zum US-Dollar und zu Gold.<sup>①</sup> SZR ist eine Art Buchgeld und wird häufig auch „Papiergold“ genannt. Das SZR wurde nach dem Zusammenbruch des festen Wechselkurses des Bretton-Woods-Systems neu definiert und in einen Währungskorb umgestellt. Seitdem hängt der Wechselkurs des Sonderziehungsrechtes von einem Währungskorb ab, in dem die international wichtigsten Währungen gewichtet vertreten sind und der Internationale Währungsfonds kann von Zeit zu Zeit neue Sonderziehungsrechte schaffen.<sup>②</sup> Ursprünglich enthielt dieser Währungskorb 16 Währungen. Diese Zahl verringerte sich im Jahr 1981 auf fünf, und zwar den Französischen Franc, die Deutsche Mark, den Japanischen Yen, den US-Dollar und das britische Pfund, und im Jahr 1999 mit der Einführung des Euros weiter auf vier, da der Französische Franc und die Deutsche Mark durch den Euro ersetzt wurden. Im Jahr 2016 stieg die Zahl mit der Aufnahme des

chinesischen Yuan wieder auf fünf. Die Währungen im SZR-Korb werden als besonders wichtig betrachtet, weil sie eine große Rolle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spielen und die Austauschfreiheit von Gütern und Kapital sowie die internationale Finanzstabilität sicherstellen.

Der Euro übernahm nach seiner Einführung ungefähr den Anteil von D-Mark und Franc im SZR-Korb. Im Anschluss ist der Anteil des Euros, trotz der Schuldenkrise und der Schwankungen bis zum Jahr 2015, stetig angestiegen, während sich die Gewichte von US-Dollar und Japanischem Yen verringerten und das Gewicht des Britischen Pfunds stabil blieb.

Der zunehmende Anteil des Euros im SZR-Korb ist auch der Erhöhung des Euroanteils in Devisenreserven (Kapitel 3.1.1) und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Kapitel 3.2) zu verdanken. Und sie schaffen zusammen eine optimale Zukunft für den Euro.

**Tabelle 1 Die Gewichte der Währungen im SZR-Korb**

	USD	DEM	FRF	JPY	GBP	CNY
1981–1985	42 %	19 %	13 %	13 %	13 %	-
1986–1990	42 %	19 %	12 %	15 %	12 %	-
1991–1995	40 %	21 %	11 %	17 %	11 %	-
1996–2000	39 %	21 %	11 %	18 %	11 %	-
		EUR				
2001–2005	45 %	29 %	15 %	11 %	-	
2006–2010	44 %	34 %	11 %	11 %	-	
2011–2016 <sup>[7]</sup>	41,9 %	37,4 %	9,4 %	11,3 %	-	
ab 2016 <sup>[8]</sup>	41,7 %	30,9 %	8,3 %	8,1 %	10,9 %	

Quelle: Wikipedia - Sonderziehungsrecht

① Vgl. Altmann, J.: *Wirtschaftspolitik - eine Praxisorientierte Einführung*, 7., erweiterte und völlig überarbeitete Auflage, Lucius & Lucius, Stuttgart, 2000, S.459.

② Siebert, H.: *Außenwirtschaft*, 7., völlig überarbeitete Auflage, Lucius & Lucius, Stuttgart, 2000, S.356.

#### 4) Der Euro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funktioniert der Euro als Zahlungsmittel. Die Häufigkeit und die Menge der Verwendung des Euros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zeigt das hohe Vertrauen in den Euro, sowie den Status des Euros als einer wichtigsten, internationalen Handelswährung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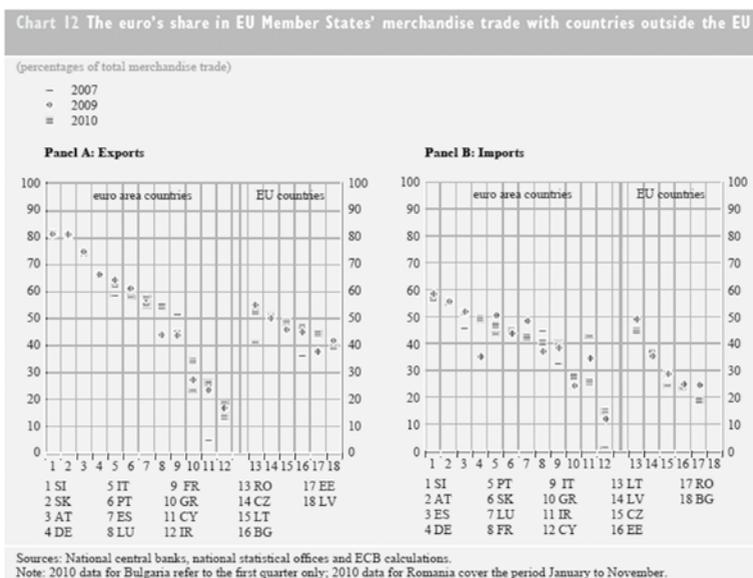
Seit der Euroeinführung im Jahr 1999 vergrößerte sich der Anteil des Euros als Zahlungs- und Rechnungsmittel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und zwar im Güterimport und -export der EU-Staaten mit einem dritten Staat außerhalb der EU mit stabiler Geschwindigkeit.

Im Jahr 2010 schwankte der Gebrauchsanteil des Euros im Warenhandel zwischen EU-Staaten und Ländern außerhalb der EU um den Zustand des vorigen Jahres (2009). Aber im Großen und Ganzen blieb der Euroanteil im Warenhandel mit Ländern außerhalb der EU trotz der Schuldenkrise ziemlich stabil. Der stabile

Anteil des Euros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spiegelt die Stabilität des Euros im internationalen Zahlungssystem wider. Die Statistiken für die Jahre 2007 und 2009 in Abbildung 2 zeigen eben den Stand des Euros vor und nach der Finanzkrise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Im Vergleich zum Niveau des Jahres 2007 hat sich der Anteil des Euros in den meisten EU-Staaten sowohl beim Ex- als auch beim Import im Jahr 2009 nach dem Ausbruch der Finanzkrise stark erhöht.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in Abbildung 2 noch die Auffälligkeit, dass der Euro einen größeren Anteil beim Güterexport als beim -import ausmacht. Das lässt sich mit der unterschiedlichen Güterstruktur von Export und Import erklären. Eine gewisse Menge der von Europa importierten Güter sind Rohstoffe, für deren Markt der US-Dollar aus historischen Gründen immer noch eine dominierende Rolle spielt. Das ist kein Zeichen der Schwäche des Euros.

**Abbildung 2 Der Euroanteil im Handelsverkehr der EU-Staaten mit Staaten außerhalb der E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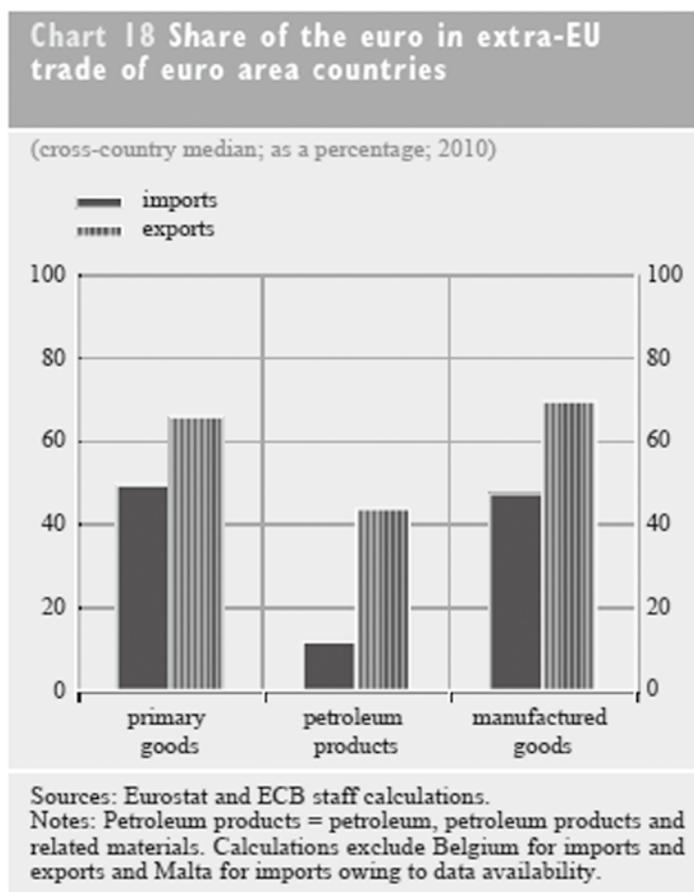


Quelle: EZB

Ferner zeigt sich in Abbildung 2, dass ein Staat nicht unbedingt seine Nationalwährung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nutzt, wie es bei Griechenland, Irland und Zypern der Fall ist. Der Euro spielt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sogar eine geringere Rolle in diesen drei Staaten der Eurozone als in einigen ander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außerhalb der Eurozone. Aber trotzdem betrug der Euroanteil im Handel der Primär- und Sekundärgüter sowohl beim Ex- als auch beim Import über 50% im Jahr 2010 (siehe Abbildung 3). Das impliziert, dass der Euro trotz der Schuldenkrise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sehr gut funktioniert.

**Abbildung 3 Anteil des Euros im Handel der EU-Staaten mit Ländern außerhalb der EU (2010)**



Quelle: EZB

### 5) Der Euro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Rentenmarkt

Der Rentenmarkt ist ein sehr wichtiger Be-

standteil des Finanzmarktes, auf dem Wertpapiere bzw. vor allem Schuldverschreibungen gehandelt werden. Die Schuldverschreibung ist eine

Art Wertpapier und eine Schuldkunde, in der sich der Schuldner gegenüber dem Gläubiger zur Zahlung der Schuld und einer laufenden Verzinsung verpflichtet. Die Ausgabe einer Schuldverschreibung ist gegenüber dem Schuldscheindarlehen mit erheblichen Emissionskosten verbunden. Schuldverschreibungen (ein sogenannter Rententitel) sind Vermögensgegenstände, für die man in der Gegenwart einen bestimmten Betrag bezahlt, um in der Zukunft eine Reihe von Zahlungen zu erhalten.<sup>①</sup> Der Euro hat seit seiner Einführung den zweitgrößten Anteil im internationalen Rentenmarkt, direkt hinter dem US-Dollar. Beim Kauf und Verkauf von Schuldverschreibungen dient der Euro hauptsächlich seiner Funktion als Tauschmittel. (Kapital 2.2.1).

Laut der Statistiken der BIS hat sich der Anteil des Euros ungefähr seit dem Jahr 2006 stetig verringert. Eine ähnliche Anteilsverringeringung haben auch der Japanische Yen und die meisten anderen Währungen erfahren. Diese Entwicklung ging einher mit einer Expansion der Bedeutung des US-Dollars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Schuldenmarkt.

Aus einer langfristigen Perspektive sank der Anteil des Euros allmählich von 30,7% im Jahr 2009 auf 25,3% im Jahr 2013, doch die Senkung begann seit 2007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weltweiten Finanzkrise. Von 2007 bis 2013 verringerten sich der Euroanteil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Schuldenmarkt um 5,7 Prozentpunkte und der Anteil des Japanischen Yens um knapp 2 Prozentpunkte. Der Anteil des US-Dollars entwickelte sich bei einer stetig steigenden Tendenz von 44,3% auf einen historischen Gip-

fel von 54,8%.

Fraglich ist, ob der sich über Jahre hinweg verringerte Rentenmarktanteil des Euros Anzeichen einer Krise ist. Sowohl der Euro, als auch der Japanische Yen folgten zwar einer allmählich sinkenden Tendenz, aber der Grund für die Schwäche des Euros in den internationalen Rentenmärkten liegt eher in der zunehmenden Abhängigkeit von globalen Kreditnehmern vom US-Dollar als Transaktionswährung in den internationalen Rentenmärkten. Das kann möglicherweise durch eine Reihe von Faktoren erklärt werden: Erstens haben die geringeren Kosten der internationalen Schuldtitelemmission des US-Dollars gegenüber den anderen Währungen viel zur Überlegenheit des US-Dollars auf den internationalen Rentenmärkten beigetragen. Besonders bis Ende 2013 ist es deutlich billiger gewesen, sich US-Dollars zu leihen und danach den Erlös in andere Währungen, wie etwa den Euro, umzutauschen. Zweitens haben sich bis Mitte 2013 die Erwartungen hinsichtlich Zins und Wechselkurs auch zugunsten des US-Dollars ausgerichtet. Die Schwellenländer, die sich in den internationalen Rentenmarkt integrieren wollten, haben die Emissionen der internationalen Schuldenverschreibungen äußerst motiviert. Die Zunahme der externen Finanzierung kam besonders aus den lateinamerikanischen Staaten, die Emissionen des US-Dollars, wegen der vorteilhaften Liquiditätsbedingungen in den vom US-Dollar dominierten Rentenmärkten, präferierten. Schließlich ist die Schuldenkrise im Euro-Raum auch eine Ursache, aber kein Hauptfaktor, weil die Schuldenkrise der Statistik in Abbildung 3 zufolge die Senku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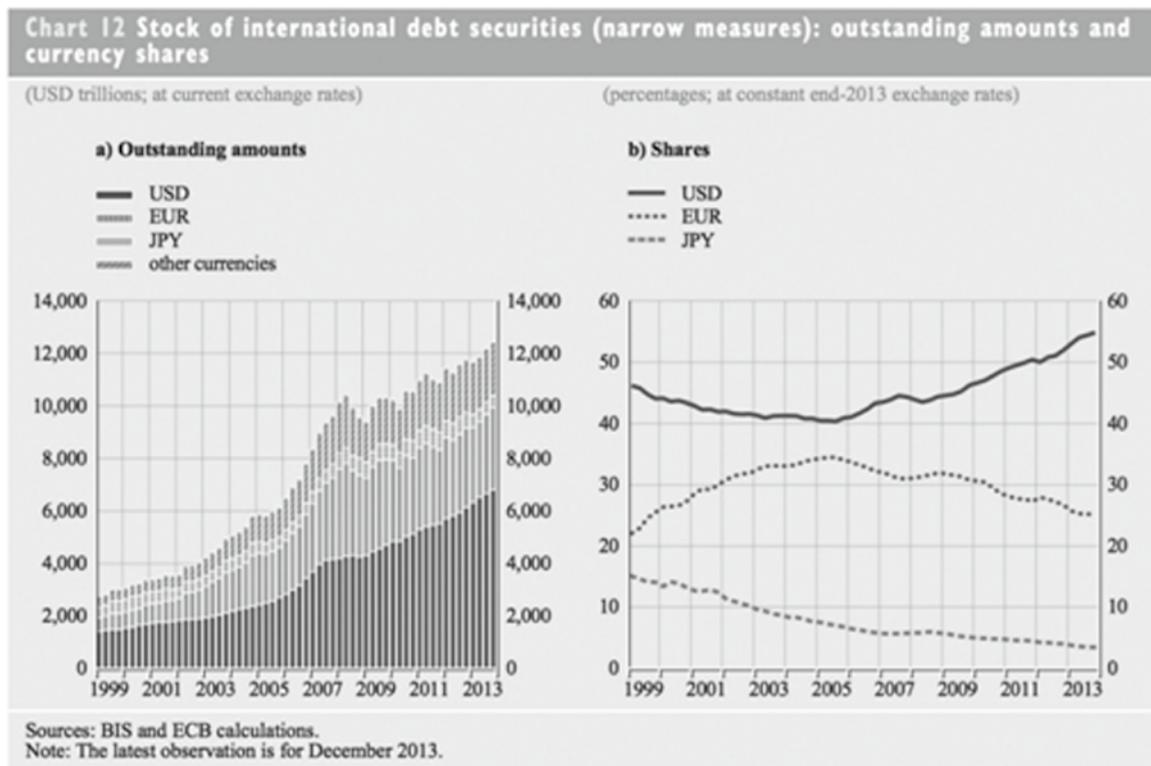
① Vgl. Flynn, S.M.: *Wirtschaft für Dummies*, (Deutsche Übersetzung von Engel, R.), 2., überarbeitete und aktualisierte Auflage, WILEY-VCH Verlag GmbH & Co. KGaA, 2012, S.329.

kaum beschleunigt hat.

Aus der obigen Analyse ergibt sich, dass die Abnahme des Anteils des Euros im Rentenmarkt keinen Hinweis auf einen Krisenzustand des Eu-

ros darstellt. Sie lässt sich hauptsächlich als eine Folge der Überlegenheit und der Vorteile des US-Dollars auf den internationalen Rentenmärkten erklären.

**Abbildung 4 Internationale (enges) und globales Maß der ausstehenden internationalen Schuldverschreibungen**



Quelle: EZB

## 6) Der Euro auf dem Devisenmarkt

Devisenmärkte sind Märkte, wo unterschiedliche Währungen gegeneinander getauscht und gehandelt werden.<sup>①</sup> Von daher sind die Währungen auf dem Devisenmarkt sowohl Tauschmittel, als auch Waren. Neben dem Rentenmarkt

ist der Devisenmarkt ein Bestandteil des Finanzmarkts. Die merkwürdigen Funktionen des Devisenmarkts sind Widerspiegelung der internationalen Zahlungsbilanz, der Finanzierung des internationalen Kapitalverkehrs und des Güter-austausches sowie des Mechanismus der Spe-

① Vgl. 李冰:《货币银行学》(Währungs- und Bankensyste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90页。

kulation und Gewinnsicherung.

Während der US-Dollar im internationalen Devisenmarkt eine Leitwirkung darstellt, liegt der Nutzungsanteil des Euros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Devisenmarkt unverändert auf dem zweiten Platz (siehe Abbildung 5). Der US-Dollar bleibt ein Pendant für 90% der Devisen aller Währungen, der Euro für 40%. Statistiken zeigen auch eine zurückgehende Tendenz des Gesamtvolumens der Devisentransaktionen zwischen 2008 und 2009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Devisenmarkt wegen der globalen Finanzkrise und der darauf folgenden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Aber

trotz der pessimistischen Aussichten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Devisenmarkt, hielt der Euro einen stabilen Anteil von 40%. In dieser Zeitspanne zeigten die anderen weltweit wichtigen Währungen vergleichsweise instabilere Kursverläufe. Am stärksten schwankte die Kurve des Japanischen Yen schon seit 2007. Ferner lag der Anteil des US-Dollars nach der globalen Finanzkrise 2008 für 2,5 Jahre ungefähr 3 bis 4 Prozent unter dem Niveau vor der Krise. Die besonders stabile Kurve des Euros im Anteil des Devisenmarkts veranschaulicht die Stabilität des Euros während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Abbildung 5 Abrechnungsumfänge nach Währungen im CLS-System**



Quelle: EZB

Neben dem Anteil der absoluten Menge des Euros ist der Anteil des Euroumsatzes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Devisenmarkt ein sehr bedeutender Maßstab, der den Stand dieser Währung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Devisenmarkt misst. Der BIZ-Bericht zeigt die Distribution der Währungen in dem globalen Devisenmarktumsatz. Die Daten aus dem Jahr 2007 und dem Jahr 2010 zei-

gen eben den Zustand der Währungen kurz vor und nach dem Ausbruch der globalen Finanzkrise und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Vor den beiden Krisen lag der Euroanteil jahrelang um 37,5%. Aber in der Schuldenkrise (im Jahr 2010) ist der Anteil des Euros nicht gesunken, sondern

von 37% 2007 auf 84,9% 2010 stark angestiegen. Im gleichen Zeitraum war der Anteil des US-Dollars jedoch durch eine Abnahme gekennzeichnet. Der stabil zunehmende Euroanteil zeigt die Stabilitätsfunktion des Euros auf dem globalen Finanzmarkt.

**Tabelle 2 Distribution des globalen Devisenmarktumsatzes nach Währung**

Currency distribution of global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turnover

Net-net basis,<sup>1</sup> percentage shares of average daily turnover in April<sup>2</sup>

Table 2

Currency	1998		2001		2004		2007		2010		2013	
	Share	Rank										
USD	86.8	1	89.9	1	88.0	1	85.6	1	84.9	1	87.0	1
EUR	...	32	37.9	2	37.4	2	37.0	2	39.1	2	33.4	2
JPY	21.7	2	23.5	3	20.8	3	17.2	3	19.0	3	23.0	3
GBP	11.0	3	13.0	4	16.5	4	14.9	4	12.9	4	11.8	4
AUD	3.0	6	4.3	7	6.0	6	6.6	6	7.6	5	8.6	5
CHF	7.1	4	6.0	5	6.0	5	6.8	5	6.3	6	5.2	6
CAD	3.5	5	4.5	6	4.2	7	4.3	7	5.3	7	4.6	7
MXN <sup>3</sup>	0.5	9	0.8	14	1.1	12	1.3	12	1.3	14	2.5	8
CNY <sup>3</sup>	0.0	30	0.0	35	0.1	29	0.5	20	0.9	17	2.2	9
NZD <sup>3</sup>	0.2	17	0.6	16	1.1	13	1.9	11	1.6	10	2.0	10

Quelle: BIZ

Nach der Zunahme des Euroanteils am Umsatz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Devisenmarkt zeigt die Tabelle 2 eine starke Senkung auf 33,4%. Aber diese Senkung basiert nicht auf einer pessimistischen Einschätzung der Europerspektiven sondern folgt einer Tendenz zur Diversifikation der Währungen auf dem Devisenmarkt parallel zu der bei den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reserven. Die Währungskomposition des Devisenmarktes hat sich zwischen 2010 und 2013 merklich verändert. Die Veränderung fand nicht nur hinsichtlich eines neuen Gleichgewichts zwischen den historisch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en statt,

d.h. ein zunehmender Anteil des Japanischen Yens bei gleichzeitig abnehmendem Anteil des Euros, sondern die Komposition der Währungen auf dem globalen Devisenmarkt wird mit dem Auftritt neuer Währungen wie RMB und MXN diversifiziert. Und der Umsatzanteil des Euros wurde gewissermaßen von den Währungen der Schwellenländer übernommen.

Aus den obigen gezeigten Daten und Analysen ergibt sich keine Begründung dafür, dass der Zustand des Euros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Devisenmarkt bzw. auf dem globalen Finanzmarkt den instabilen Zustand der Eurozone während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verursachte. Ganz im Gegenteil, die Stabilität des Euros zur Zeit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zeigte und förderte das Vertrauen des Marktes in den Euro.

### 7) Der Euro auf dem Markt für Deviseninstrumente

Deviseninstrumente sind unterschiedliche Finanzhandelsweisen auf den Devisenmärkten und kennzeichnen die Art und Weise, mit der Devisen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n Marktteilnehmern ausgetauscht werden.<sup>①</sup> Anhand der gehandelten Deviseninstrumente kann der Devisenmarkt in börslichen und außerbörslichen Handel unterteilt werden und sie beide tragen zum Risikopotenzial bei. Händler auf dem Finanzmarkt müssen immer die unvorhersehbaren Folgen der Wech-

selkursänderung tragen. Da bieten die Deviseninstrumente eben die Möglichkeiten, solche Risiken aufgrund der Schwankung des internationalen Wechselkurses beim finanzwirtschaftlichen Hedging fixieren zu lassen.<sup>②</sup>

Bekannte Deviseninstrumente sind Devisenkassageschäfte, Outstraight Forwards, Devisenfutures, Währungswaps, Devisenswaps und Devisenoptionen. Und die Tabelle 3 zeigt den täglichen Umsatz von 2 wichtigen Deviseninstrumenten, nämlich Devisenfutures und -optionen nach Währungen. Der tägliche Umsatz unterschiedlicher Währungen spiegelt ihren relativen Zustand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Finanzmarkt wider. Die Schwankung des täglichen Euro-Umsatzes auf dem Markt im Vergleich zu den anderen Währungen zeigt, ob sich der Euro in einem ungewöhnlichen Zustand befand.

**Tabelle 3 Täglicher Umsatz der Devisenfutures und -optionen nach Währungen (Mrd. US-Dollar)**

Täglicher Umsatz/ Währung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Gesamtumsatz	98	116	106	154	158	134	140	125	122
USD	95	111	102	148	152	129	133	118	114
EUR	32	45	42	63	66	48	47	41	44
BRL	24	26	21	26	21	20	20	20	20
JPY	14	17	13	19	19	16	24	20	16
GBP	11	10	10	12	12	11	13	12	11
AUD	4	4	6	10	13	14	11	9	7

Quelle: BIZ

① Vgl. Wolfgang von Heiβling: *Informationseffizienz des Devisenmarktes*, Universitätsverlag Ilmenau, 2013, S. 16.

② Vgl. a.a.O., S. 37.

Tabelle 3 zeigt die Daten zum täglichen Umsatz der beiden wichtigen Deviseninstrumente von 2007 bis 2015. Im gegebenen Zeitraum belegt der US-Dollar stets den ersten Platz mit dem höchsten täglichen Umsatz. Dahinter liegt der Euro auf dem zweiten Platz. Im Jahr 2007 betrug der tägliche Umsatz des Euros 33,7% des US-Dollars und diese Prozentzahl lag bei 40,5% im Jahr 2008, bei 39,6% im Jahr 2009, bei 42,6% im Jahr 2010, bei 43,4% im Jahr 2011, schwankt ab 2012 und endet mit 38,6% im Jahr 2015 laut letztem Bericht der BIZ. Die Umsatzerhöhung des Euros zeigt die Zuverlässigkeit des Euros auf dem Markt für Deviseninstrumente als Handels- und Risikomanagementmittel.

Ferner nahmen die Umsätze der ausgewählten 6 wichtigsten Währungen auf dem Markt für Deviseninstrumente vom Jahr 2007 bis zum Jahr 2011 ständig zu, und erreichten einen Höhepunkt im Jahr 2010 und 2011. Dieser Trend zeigt sich besonders deutlich bei dem US-Dollar und dem Euro. Danach nahm der tägliche Umsatz allmählich ab bis zum Jahr 2015. Aus dieser Sicht ähnelt die Umsatzschwankung des Euros denen der anderen Währungen auch während der Schuldenkrise.

Aus diesen 2 Perspektiven bleibt der Euro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Markt für Deviseninstrumente stabil die zweitwichtigste Währung nach dem US-Dollar und die Änderung seines täglichen Umsatzes wies seit 2007 trotz der schweren Schuldenkrise in Europa keine besondere Tendenz auf. Daher kann man nicht behaupten, dass der auf dem Finanzmarkt gut laufende Euro während der Schuldenkrise in eine Krise geriet oder dass er gar die Schuldenkrise verursachte. Ganz im Gegensatz dazu lief der Euro vor und nach der Schuldenkrise mit hoher Stabilität auf

dem Finanzmarkt (siehe Kapitel 3.4, 3.5 und 3.6) und insbesondere auf dem Markt für Deviseninstrumente

### 8) Der Euro-Anteil an Zinsderivaten

Ein Zinsderivat ist ein Termingeschäft, dessen Wert sich von einem Zinssatz oder einer anderen zinsbezogenen Größe als Basiswert ableitet. Sie können als Festgeschäfte (Futures), Optionsgeschäfte oder auch Finanzswaps vorkommen. Von daher werden die Zinsderivate immer außerbörslich gehandelt. Diese Handelsweise heißt auch OTC-Handel (OTC steht für „Over the Counter“). Die Abbildung und Tabelle zeigen die Statistik der Zinsderivate des OTC-Handels. Hier erfüllt der Euro seine Funktion als Zahlungsmittel sowie als eine Art Ware, da er auf dem Finanzmarkt gehandelt werden darf.

Zinsderivate dienen wie oben erklärt hauptsächlich der Absicherung gegen das Zinsänderungsrisiko (Kursrisiko) des Geschäfts. Von daher ist demnach für den Abschluss eines Zinsderivates eine Meinungsbildung hinsichtlich der zukünftigen Entwicklung notwendig und ein reifer Markt für Zinsderivate bietet bessere Möglichkeiten an, Flexibilität und Sicherheit des Kapitals zu garantieren sowie die Risiken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Finanzmarkt so weitgehend wie möglich zu vermeiden. Der Anteil einer Währung auf dem Markt für Zinsderivate zeigt den Wunsch der Finanzmarktteiligen, dadurch finanzielle Risiken zu vermeiden, dass sie die Zinsderivate einer anderen relativ stabilen Währung kauf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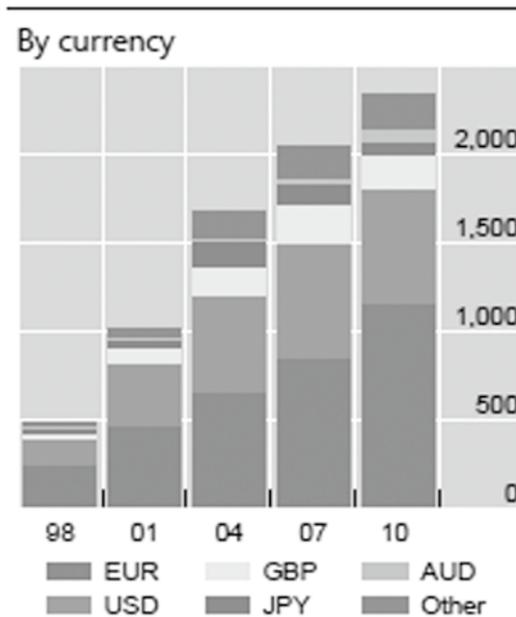
Der internationale Zinsderivateumsatz ist jahrelang mit stabiler Geschwindigkeit angestiegen und der Euromarkt ist schon seit seiner Einführung stets ein wichtiges Segment mit dem höchsten Umsatz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Markt

der Zinsderivate.

2013 erreichte der Umsatz hier ungefähr 2343 Milliarden US-Dollar, wobei der Anteil des Euros mit 1146 Milliarden US-Dollar knapp die Hälfte ausmachte, während der Umsatz des US-Dollars auf dem Markt für Zinsderivate nur 657 Milliarden US-Dollar erreichte. Tabelle 4 zeigt, dass der Euro seit seiner Einführung eine dominante Rolle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Markt für Zinsderivate spielt. Im Zuge der schnellen Entwicklung der Schwellenländer und neuer Märkte werden die Währungen der neuen Volkswirtschaften wie z.B. RMB , ZAR und BRL

immer beliebter bei der Vermeidung finanzieller Risiken, deshalb ist ab 2010 bzw. 2013 ein rascher Anstieg der Anteile dieser Währungen auf dem Markt für Zinsderivate zu sehen. Aber trotzdem kommt dem Euro noch der größte Marktanteil zu. Das zeigt eben, dass die Wirtschaft den Euro als das beliebteste Risikovermeidungsmittel gegenüber dem US-Dollar betrachtet und sich daher an der Position des Euros als der zweitgrößten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 nach dem US-Dollar bis heute trotz der Finanzkrise nichts geändert hat.

**Abbildung 6 Umsatz der OTC-Zinsderivate nach Währungen**



**Tabelle 4 Globale Marktumsatz der Zinsderivate nach Währungen**

Global OTC interest rate derivatives market turnover by instrument and currency<sup>1</sup>

Net-net basis,<sup>2</sup> daily averages in April, in billions of US dollars

Table 4

Instrument/currency	1998	2001	2004	2007	2010	2013
Total	265	489	1,025	1,686	2,054	2,343
AUD	3	8	12	19	37	76
BRL <sup>3</sup>	...	0	1	2	3	16
CAD	7	6	8	15	48	30
CNY <sup>4</sup>	...	...	...	0	2	15
EUR	...	232	461	656	834	1,146
GBP	17	37	90	172	213	187
JPY	27	27	46	137	124	70
SEK	2	5	13	33	20	36
USD	71	152	347	532	654	657
ZAR <sup>5</sup>	1	0	2	3	5	16
Other	138	22	46	116	113	95

Quelle: BIZ

### 9) Euro als Parallelwähr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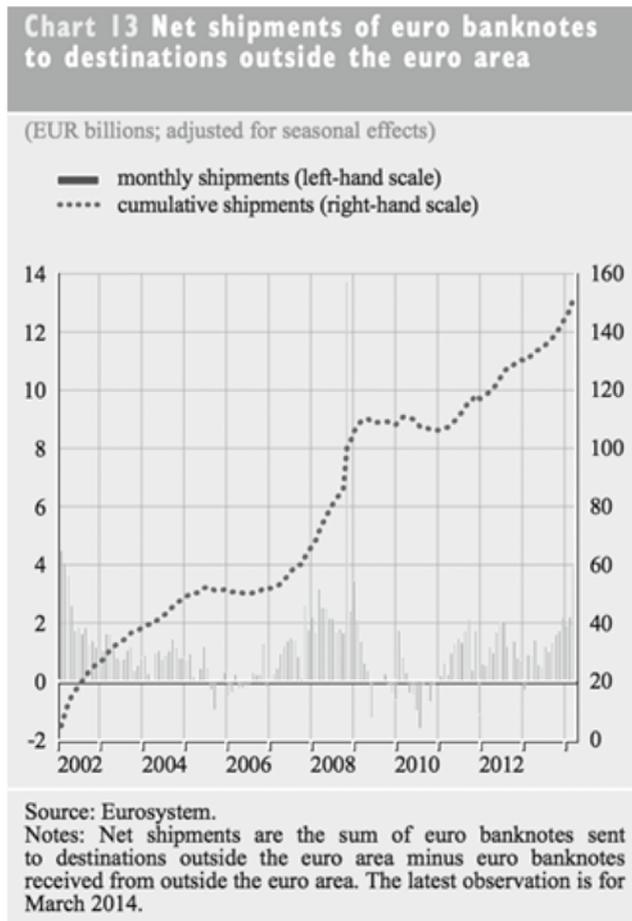
Der Euro dient außerhalb der Eurozone nicht nur als Reservewährung, sondern seine Stabilität macht ihn vielmehr auch populär als Parallelwährung in vielen Entwicklungs- und Schwellenländern, also als Zahlungsmittel. Besonders in Zeiten von Finanzkrisen, wenn das Vertrauen in eine Währung schwindet, wenden sich die Akteure lieber an stabilere Währungen als Wertaufbewahrungs- oder Zahlungsmittel. Die Nachfrage nach dem Euro außerhalb der Eurozone zeigt also auch implizit die Stabilität des Euros und das weltweite Vertrauen in den Euro.

Die Verwendung von Euro-Banknoten außerhalb der Eurozone lässt sich einem Bericht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zufolge nicht präzise bestimmen. Aber mithilfe der Akkumulation der Nettoversandmenge der Euro-Banknoten aus den MFIs (Monetar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die Zielländer außerhalb der Eurozone kann man die Menge der umlaufenden Eurobanknoten im Ausland abschätzen.

In Abbildung 2 kann man deutlich sehen, dass die Nachfrage nach dem Euro im Ausland seit seiner Einführung stetig anstieg, außer im Zeitraum zwischen 2009 und 2011. Dieser Zeitraum stellt genau den Höhepunkt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dar. Ab 2011 begann die Nachfrage wieder zuzunehmen, nachdem die Menge der im Ausland umlaufenden Banknoten sich knapp zwei Jahre nicht erhöht hatte.

Laut den Berichten der EZB sind Ende 2009 Euro-Banknoten im Wert von ungefähr 116 Mrd. Euro außerhalb der Eurozone im Umlauf gewesen. Im Jahr 2010 hat sich die Menge auf 107 Mrd. Euro reduziert. Erst Ende 2011 begann die Menge wieder zu steigen und erhöhte sich seitdem ständig und lag Ende 2012 bei 130 Mrd. Euro und Ende 2013 bei 143 Mrd. Euro. Die Menge der außerhalb der Eurozone umlaufenden Euro-Banknoten machte in den Jahren 2009 bis Jahr 2013 jeweils 14%, 13%, 14% bzw. 16% des gesamten Euro-Bargeldumlaufs im jeweiligen Jahr aus.

Abbildung 7 Netto Shipments der Eurobanknoten in die Zielländer außerhalb der Eurozone



Quelle: EZB

Die Verwendung des Euros als Parallelwährung wird nicht von der Staats- oder Bankenseite reguliert, sondern ist eine rein private Verwendung. Die Veränderung dieses Indikators zeigt am anschaulichsten die Veränderung der privaten Erwartungen, sowie des Vertrauens in den Euro. Dass die ausländische Nachfrage nach Euro-Banknoten seit 3 Jahren kontinuierlich angestiegen ist, zeigt, dass sich die Europäische Schuldenkrise nur in geringem Maße auf die Ver-

wendung des Euros außerhalb der Eurozone ausgewirkt hat. Vielmehr hat die Schuldenkrise dem Marktvertrauen gegenüber dem Euro geschadet.

## 10) Weitere Bemerkungen

### Der Euro trägt die Hauptlast für die RMB-Aufnahme in den SZR-Korb

Am 30. November 2015 beschloss der Exekutivrat des IWF im Grundsatz, mit Wirkung ab

1. Oktober 2016, erstmals zusätzlich den chinesischen Renminbi (Yuan) in den SZR-Korb aufzunehmen. Vor der Aufnahme des RMB machte der US-Dollar einen Anteil von 41,9% des SZR aus, der Euro 37,4%, das Pfund 11,3% und der Yen 9,4%. Nach der Aufnahme erhält der RMB eine Gewichtung von 10,9%, der Euro sinkt dadurch um 6,5% auf 30,9%, das Pfund um 3,2% auf 8,1%, der US-Dollar aber nur wenig um 0,2% auf 41,7% und der Yen um 1,1% auf 8,3%. Somit geht die Neugewichtung hauptsächlich zu Lasten des Euros und des Pfunds. Zeitgleich mit der Entscheidung zur Neuaufnahme des Renminbi wurde auch die Berechnungsformel für die Gewichtung der Währungen im SZR-Korb geändert.<sup>①</sup>

Manche betrachten die Tatsache, dass der Euro die Hauptlast für die Aufnahme des RMB getragen hat, als ein Zeichen für den Krisenzustand des Euros. Diese These ist aber gewissermaßen zu einseitig, denn die starke Belastung des Euros hat nicht nur mit dem Euro selbst zu tun, sondern ist auch eine Folge der Zusammenwirkung der Konjunktur anderer Währungszone und dem Zustand anderer Währungen. Die Aufnahme in den Korb und die guten Aussichten für den RMB können den relativ schwächeren Anteil des Euros zumindest teilweise erklären.

Die Wirtschaft in China is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stark gewachsen und China ist heute

die zweit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mit hoher und stetig steigender Im- und Exportmenge. Da die internationale Handelsmenge neben den Direktinvestitionen und der Wechselkursstabilität<sup>②</sup> eines der wichtigsten Kriterien für die Aufnahme und Gewichtung einer Währung im SZR-Korb darstellt, ist der Prozess d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s RMB im Zuge des sich schnell steigenden wirtschaftlichen Einflusses Chinas bereits weit vorangeschritten.

Die Abbildung 5 zeigt die Hauptwährungen im internationalen Zahlungsverkehr. Laut der Swift-Statistik benutzt der internationale Markt nur eine begrenzte Zahl von Verkehrswährungen. Aus historischen und aktuellen wirtschaftlichen Gründen behält der US-Dollar seine dominierende Position im internationalen Zahlungsverkehr. Vier Fünftel der Transaktionen werden mit dem US-Dollar als Verkehrswährung getätigt, während der RMB und der Euro mit deutlich geringeren Anteilen auf dem zweiten bzw. dritten Platz liegen. Zwischen 2013 und Jahr 2015 blieb der Anteil des Euros stabil bei 6%, während der Anteil des RMB um 2% angestiegen und der Anteil des US-Dollars um 3% gesunken ist. Der Einfluss einer Währung im internationalen Markt ist relativ. Wenn der RMB aufsteigt, während der Euro stagniert, kommt es im Ergebnis zu einer relativen Schwächung des Eur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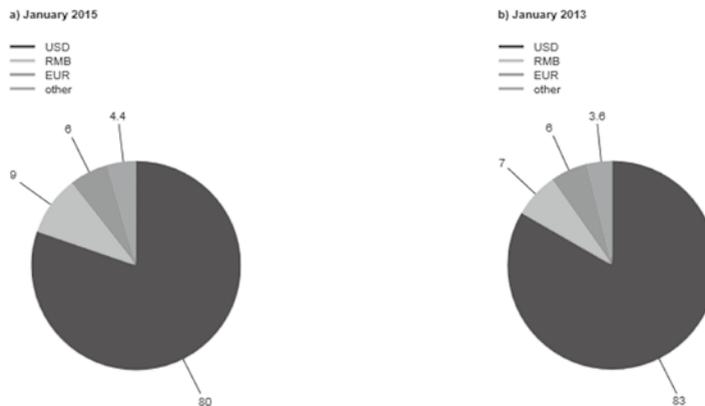
① Vgl. (Zeit und Verfasser unbekannt), URL: <https://de.wikipedia.org/wiki/Sonderziehungsrecht>, letzter Zugriff am 16.01.2016.

② Vgl. 王慧:《钉住一篮子货币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Feststellung des SZR-Korbs und die Reform der RMB-Devisenpolitik),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年, 第132页。

### Abbildung 8 Hauptwährungen im internationalen Zahlungsverkehr

Major currencies in trade finance activities

(percentages; at current exchange rates)



Source: Swift.  
Notes: Letters of credit and collections. Inbound plus outbound traffic. Based on value.

Der Zustand des Euros steht in engem Zusammenhang mit dem Zustand einer Volkswirtschaft. Seit 2010 ist China die zweit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der Welt. Mittlerweile liegt der Anteil Japans a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stabil bei 6,0%.

Kanada, Russland und Südkorea bewahrten ihren relativen Anteil a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Nach 2008 deutlich gesunken sind die Anteile der EU und der USA.

**Tabelle 5 Anteile wichtiger Länder im internationalen Handel**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EU28	19,3	19,4	19,3	18,5	17,5	17,1	16,0	15,4	15,4
EU27	19,4	19,4	19,3	18,4	17,5	17,1	16,0	15,4	15,4
Russland	1,6	2,0	2,2	1,8	2,0	2,2	2,2	2,2	#
Canada	3,9	3,7	3,4	3,4	3,4	3,2	3,2	3,2	#
USA	21,6	19,8	17,9	17,2	16,9	16,1	16,2	16,0	
Brasilien	1,0	1,2	1,4	1,4	1,6	1,6	1,5	#	
V.R. China	8,9	9,4	9,4	10,8	12,0	12,4	12,6	13,4	#
Japan	6,5	6,1	6,3	5,9	6,0	6,1	6,1	#	
Südkorea	3,5	3,5	3,6	3,5	3,7	3,7	3,6	3,5	

Quelle: Eurostat

Der Grund dafür, dass die Hauptlast für die Aufnahme des RMB durch den Euro getragen wird, liegt aufgrund der obigen Analyse nicht darin, dass der Euro in einen Krisenzustand geraten wäre. Vielmehr hängt es mit den Machtverhältnissen der Währungen zusammen und ist eine Folge der Zusammenwirkung des starken Zustandes des US-Dollars und Aufstiegs des RMB. Auch wenn der Euro die Hauptlast für die Aufnahme des RMB getragen hat, liegt der Euroanteil nach wie vor auf dem zweiten Platz im SZR-Korb und ist immer noch doppelt so hoch wie der des RMB, der auf dem dritten Platz liegt. Insofern hat sich die Position des Euros als zweitgrößte internationale Währung nicht verändert.

### **Euro: Ein politischer Wunsch**

Seit dem 1.1.1999 besteht zwischen 11 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U) eine Währungsunion, die eher eine politische Union als eine reine Fiskalunion ist. Die Gründung der EU sowie der Euro-Zone sind beide in erster Linie Ausdruck eines politischen Wunsches nach Stabilisierung und politischer Stärkung Europas. Dabei strebt Deutschland nach mehr politischer Integration, Frankreich eher nach der Rückgewinnung geldpolitischen Einflusses.<sup>①</sup> Durch den Verzicht auf eine eigene Geldpolitik sind bislang 19 Staaten zur Eurozone beigetreten (Stand 15.12.2016).

Beschlossen wurde ein Euro-Rettungsschirm, ein Maßnahmenpaket der EU zur Sicherung der Stabilität im Euro-Währungsgebiet.

Dabei werden die überschuldeten Mitgliedsstaaten der Eurozone unterstützt um ihre Zahlungsfähigkeit zu sichern<sup>②</sup>. Die Bemühung, die überschuldeten Länder zu retten, ist nicht nur eine wirtschaftliche Sicherungsmaßnahme sondern eine Rettung der politischen Union. So lautet auch Angela Merkels Diktum, „Scheitert der Euro, dann scheitert Europa“. Die Stabilität und Aussicht des Euros hängt eng mit dem Zusta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zusammen. Wenn das politische Bündnis Europas noch gewollt ist und auf Dauer weiter existieren soll, ist die Eurozone aufrechtzuerhalten.

## **4. Zusammenfassung**

Mit der obigen Analyse kann ich nun die in Kapitel 1 gestellten Fragen beantworten.

Um die Aussage, dass es keine Krise des Euros gab und gibt, zu belegen, muss man den Zustand des Euro aus unterschiedlichen Aspekten analysieren. Mit welchen Kriterien kann man die Situation einer Währung einschätzen? Zunächst mussten der Begriff Währungskrise und die Funktion des Geldes erklärt werden. In Kapitel 2.1 lautet die Definition, dass eine Währungskrise vor allem mit wenig Vertrauen und mit Massenkaptitalflucht verbunden ist. Darauf lag ein Schwerpunkt des vorliegenden Beitrages bei der Kapitalsicherheit und der Stabilität der Eurozone.

Laut der verschiedenen herangezogenen Statistiken ist der Euro in jeder Hinsicht nach wie vor die zweitgrößte internationale Währung und

① Vgl. Brasche, U.: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Wirtschaft, Erweiterung und regionale Effekte*, 3. Auflage, 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2013. S. 221.

② (Verfasser und Zeit unbekannt), URL: [https://de.wikipedia.org/wiki/Europäischer\\_Stabilitätsmechanismus](https://de.wikipedia.org/wiki/Europäischer_Stabilitätsmechanismus), letzter Zugriff am 10.05.2016.

liegt nur hinter dem US-Dollar. Und selbst in der Schuldenkrise waren keine großen Schwankungen relativ zur Kapitalflucht auf den internationalen Finanzmärkten (Kapitel 3.3, 3.4, 3.5 und 3.6), Gütermärkten (Kapitel 3.2 und 3.7) sowie Euroreserven (Kapitel 3.1) zu erkennen. Von daher darf man nicht zum Schluss kommen, dass sich der Euro während der Europäischen Finanzkrise im Krisenzustand befand. Und die Schuldenkrise hat mehr mit dem wirtschaftlichen Ungleichgewicht und Strukturproblemen in der Eurozone als mit der Einführung der gemeinsamen Währung zu tun.

Jetzt steht der RMB an der Schwelle zur Globalisierung, wobei Erfolg und Misserfolg des Euros wertvolle Lehren für den RMB geben kön-

nen. China und die EU sind bei der Währungsglobalisierung gewissermaßen mit vielen gemeinsamen Problemen konfrontiert, wie z.B. der internen Heterogenität in verschiedenen Regionen und der historischen Überlegenheit des US-Dollars. Aufgrund der Erfahrungen des Euros bei der Wahrung des Platzes als zweitwichtigster globaler Währung bzw. der Erhaltung des Vertrauens in die Währung kann gesagt werden, dass dies auf wirtschaftlicher Entwicklung, reifen und offenen Finanzmärkten, der Wechselkurs- und Preisniveaustabilität und der politische Förderung basiert.<sup>①</sup> Und diese sind eben die wichtigsten Punkte für die Globalisierung einer Währung insbesondere für den RMB.

作者简介：卫仲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2016年本科毕业生。

---

① Vgl. 蔡彤娟：《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元区：理论根源、宏观政策冲突与欧元区前景》（Die Eurozone während der Schuldenkrise: Theoretische Grundlage, Politikkonflikt und die Aussicht der Eurozone），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第127、161—163页。

# 文 教 论 坛



# 德国在华员工面对德中跨文化冲突时的回避型冲突风格

赵倩

**【摘要】**西方学者通常认为回避型冲突风格在东亚文化圈较为典型，当事人对“人”和“目标”两个维度均不关心。而本研究受访的德国驻华外派员工却一改自己在德国本文化中的行为范式，在德中冲突中采用了回避方式。在回避正面对抗的同时，有的受访者选择通过其他间接方式“曲线救国”，满足己方诉求。其冲突管理方式具体表现为：战术性回避、视而不见、拖延时间、规避性先发制人以及不了了之。这种在德国文化中少见的冲突风格，之所以在德中跨文化语境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主要是因为受访者依据对冲突双方个性化文化表征、双方在跨文化冲突中的权力势差以及受访者本身的动机与利益做出的基本判断，对自己的行为范式做出了调整。本研究采用的是质性方法。

**【关键词】**德中跨文化冲突 德国外派人员 回避型冲突管理

## 一、引言

### 1. 研究背景

本论文是一项综合性研究中的一部分。该研究旨在观察德国外派员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在德中跨文化冲突中所展示的冲突管理方式，并对其进行描述、分类和归因。其冲突管理方式与其在母文化中的惯常方式相比是否有变化；如果有，是何变化；以及文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即这种变化是德、中

文化如何互动引发的。

本论文仅聚焦于以下问题，即德国驻华外派员工是否会在德中跨文化冲突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采取回避型冲突管理方式；如果有，该方式的形式和特点是什么，以及其管理方式调整的原因是什么。本研究关注人际层面和工作环境，鉴于研究对象具有复杂、多面、多层次的特点，本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即质性访谈法和质性分析法。研究对象是总共为20名德国在华外派员工，均为中层领导人员，其中10名来自大企业，10名

来自中小企业。

## 2. 核心概念

### 1) 冲突管理风格

冲突管理风格是个体在面对冲突时采取的相对一致的应对机制。它是一套行为机制，是个体本着自己的个性特点在其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类似于某种“条件反射”。但是同时它也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个性因素、情境因素和文化因素。<sup>①</sup>因此，尽管冲突管理风格相对稳定，而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文化环境以及具体冲突情境发生变化。在本文化中个体的冲突管理风格会呈现一定的“惯性”，但当个体进入异文化环境时，它大多会随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发生转变。这一点已经为前人所证明。<sup>②</sup>

### 2) 回避型冲突管理风格

按照西方学者对各种冲突风格的定义，回避型冲突风格表示的是当事人对“关系”和“目标”两个维度都漠不关心，或者对“自己”和“他者”都不关心。“他们通常选择保留自己的意见、回避对抗。”<sup>③</sup>这种逃避实质上就是不对冲突进行管理。“[···]回避策略指的是不参与冲突”<sup>④</sup>。按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这种冲突策略或者冲突管理风格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即不作为和撤退。它是“一种

消极被动的策略，因为这一策略并未涉及任何解决冲突的努力，它的两种主要形式即不作为和撤退，都是暂停或放弃战术”<sup>⑤</sup>。如果冲突一方和另一方保持联系，但是却不设法去解决问题，就是不作为；而如果冲突一方认为不作为不足以使冲突平息，他还可以选择撤退<sup>⑥</sup>，即与另一方断绝关系。

然而这种明显打着西方文化二分法烙印的定义与中国人对回避的一般定义不尽相同。在重视和谐与面子的中国文化里，表面做出回避的目的常常是在避免正面对抗的同时，通过其他间接方式幕后解决问题，以尽可能达到自己的诉求。结合美籍华人学者 Ting-Toomey 的冲突管理风格八分法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在回避这种台前行为之后隐藏着几种可能性：如消极对抗、寻求第三方帮助和幕后操作解决问题。可见，在重视和谐与面子的中国文化里，表面回避的目的常常是在避免正面对抗的同时，通过其他间接方式尽可能达到自己的诉求。<sup>⑦</sup>有时表面上的回避很可能是对自我面子和他者面子的兼顾，对关系和目标都不放弃，或者对自己和他者都予以关心。<sup>⑧</sup>

综上所述，回避型冲突风格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可谓是一种有效的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很多西方人的理解不甚相同。

① 赵倩：《中德跨文化语境中德国在华外派员工的冲突风格》，（博士论文原稿），2013年，第161页。

② Regnet, E.: „Konflikt und Kooperation. Praxis der Personalpsychologie, Human Ressourcen Management kompakt, Band 14“, Göttingen (etc.): Hogrefe Verlag GmbH & Co. KG, 2007, S. 40.

③ 赵卓嘉：《团队内部人际冲突、面子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博士论文原稿），2009年，第58页。

④ 普鲁特，金盛熙：《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王凡妹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第46页。

⑤ 同上，第7页。

⑥ 同上，第47页。

⑦ 赵倩：《中德跨文化语境中德国在华外派员工的冲突风格》，（博士论文原稿），2013年，第161页。

⑧ Ting-Toomey, S./Oetzel, J. G.: “Managing Intercultural Conflict Effectively”, Thousand Oaks [u.a.]: Sage Publications, 2001年，第47页。

## 二、回避型冲突风格的具体管理方式

当冲突升级到一定阶段，冲突双方两败俱伤时，回避对方是一种必然和正常的反应，这一点具有普适性，与当事人处于哪种文化环境关系不大。除此之外，本研究 20 名受访者中的六位受访者还介绍了他们与此不同的回避型冲突管理方式。这六位受访者分别为：Hagen 先生、Heine 先生、Hans、Josef、Monika 和 Wolf。根据受访者自己的判断，他们在中国大环境中与中方产生冲突时比与德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更多地采取了回避。在回避型冲突管理的经历中，他们主要表现出两种管理方式：其一是战术性回避；其二是无从下手，即被（动）回避。

### 1. 战术性回避

事实上，采用回避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冲突中懦弱无能，而完全可能正相反或者仅是权宜之计，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尤为明显，因为回避很可能仅仅是回避正面对抗，是迂回作战的第一步，当事人在此之后会一步步解决冲突，满足自己的诉求。

具体的冲突管理方式有：另辟蹊径、视而不见、第三方帮助、先发制人和拖延时间。

#### 1) 另辟蹊径

受访者 Monika 就曾采用过战术性的回避方式。她曾在访谈中指责某些中方合作伙伴“阴险狡诈”。当被问道，遇上这种合作伙伴她通常会如何应对时，她回答道：

重要的是，绝不能被卷入冲突升级的“游戏”里去。[...] 因为我不掌握游戏规则。如果中方要让冲突升级的话，那我就得尽可能开辟另外一个“战场”，而这个“战场”必须是能给我带来实质性益处的。（Monika 语）

不让飙升的恶劣情绪控制自己，回避正面冲突，另外开辟“战场”，这是 Monika 的

战术性回避方式。

#### 2) 视而不见

从冲突管理角度看，“中国人往往比德国人更灵活”（Heine 先生语），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选择视而不见还是公开对抗。

在发生冲突时他大多会采用回避策略：

当然不是说要百分之百的回避。有时候，——如果涉及实质性内容，就必须解决它。但有时候则必须要灵活一些 [...]（Heine 先生语）

关于德中双方在这方面的思维和行为差异，他认为德国人习惯于把所有冲突看得很严重，都必须认真解决：

我们德国人总想正确地解决冲突，（会考虑）它为什么发生？怎么能让这种事情将来不再出现等等。于是大家就一定得把这件事拿出来谈。而在中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谈这种事；我考虑得更多的是未来，[...]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好吧，那就换个方式处理，[...] 和中国人可以比较快地、灵活地找到解决办法，无须多说。（Heine 先生语）

抱着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心态，在出现冲突时，除非涉及核心问题，Heine 先生都主张尽可能对冲突视而不见，能回避则回避。在中国，他学会了看轻某些问题。

在中国我习惯了：你不必总是努力去解决所有问题，你可以忽略某些问题。有些时候，你直接接受就行了，这里存在一些文化特点的差异 [...]（Heine 先生语）

只要一个话题没有那么严重，他就把它忽略不计。这样一来，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轻松地对待冲突，而不是遇到分歧和冲突，就“草木皆兵”地一概要弄个水落石出，这是 Heine 先生在中国表现出的一种管理冲突的态度。他适应了这样的做法：有些小问题，跟它较真只会浪费时间，还不如模棱两可，视若无睹，过一阵子时过境迁，当时的

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 3) 第三方帮助

还有几位德国受访者也表示，为了解决矛盾冲突，在中国他们会调整以前在德国所惯用的直接对话的方式，转而将问题的解决诉诸自己的领导。

比如受访者 Hans 是被德国总部派到中国公司技术部的一名技术培训师。中国公司的销售经理多次指派他干一些并非他分内的工作，都被他拒绝了，他也因此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人际冲突。在尝试自己向对方解释而毫无效果之后，他选择了回避直接交锋，转而求助于自己在上海的中国区直属领导，请他去和销售经理沟通。“我意识到直接去找他于事无补，所以就给自己远在上海的上司打了电话，希望通过上司来解决此事。很明显，他（中方销售经理）会更愿意听我上司替我做出的解释”。（Hans 语）这样做的原因是来中国之前参加的跨文化培训让他了解到中国人更看重等级。

诉诸领导，借助有权力的他者插手解决问题，这种第三方帮助的冲突管理方法一度有效地限制了 Hans 与中方销售经理之间冲突的升级。

### 4) 先发制人

作为一名职业咨询师，Monika 的工作常常得和冲突打交道。因此，她在德中跨文化冲突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访谈中她介绍了这样一种回避正面冲突的有效做法。

我们最成功的方法就是“先发制人”[···]我们预先估计好，[···]（中国）客户可能会在哪个环节找麻烦。举个具体的例子，我再回到[···]酒店话题上去[···]我们会额外向对方提建议。因为如果等对方找了麻烦，我们就很难令对方满意了，与其到时候借助对方的领导打压对方限制冲突——这在传统意义上其实意味着[···]（对方）会受到上级的训斥，这会让

他在领导面前丢脸，而事后根本问题仍旧没法解决。所以，现在我们会[···]提出其他待选建议。（Monika 语）

接下来，她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作为第三方服务公司向中方提供代表团行程规划方案时的具体做法：

我们必须预先估计（对方）可能提出哪些批评意见，[···]可能会在哪里找麻烦：诸如“那里（酒店附近）没地铁呀！”或者“这（酒店）简直贵得离谱了！”而后根据这些推测提前提出待选建议。[···]我必须写上，（我们的建议）有哪些优点和缺点，还有哪些其他的待选建议，但为什么待选建议根本不合适。——也就是说，我必须预先考虑对方会从哪些地方“攻击”我们的建议。（Monika 语）

推测到对方可能挑毛病的地方并事先想出对策，这是 Monika 自认为最有效的冲突管理手段。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按她自己的说法，是因为她其实不愿意与人起冲突，她想通过先发制人的方式规避正面冲撞，为此她宁愿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 5) 拖延时间

在没有弄清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回避是为了在不伤及彼此的情况下赢得时间，搞清楚症结再想办法解决。Josef 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刚派到北京工作时，曾在一次与德中双方合作伙伴的座谈会上成了中方领导指桑骂槐的替罪羊。那次，他作为德方代表发言之后，中方主要领导立即站起来对某些内容大加指责，言辞犀利，情绪激动，这让他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他不确定究竟是自己说错了话，是翻译环节出现了问题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他选择了回避。“我对整个[···]工作环境以及各方代表都不熟悉，[···]我一点都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在发现继续冲突话题的讨论于事无补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拖延战略，回避了对方的指责，

“尝试着谈了一些我确信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拖延了时间，为的是在茶歇的时候设法为自己解围”。(Josef 语)

Josef 所处的情境是：初来乍到，身为德方领导却对自己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所知甚少，更不知道“指桑骂槐”这种中国式的表达方式，还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才导致最重要的中方伙伴大发雷霆。所有这些因素让他选择了暂时回避。事实证明，这种回避策略是正确的。就在茶歇中间，中方领导主动来找他道歉，并解释说，那番话尽管是紧接着他的发言说的，但事实上针对的是其他德国合作伙伴。

不过 Josef 也补充说，如果是在德国面对陌生人，他同样会选择暂时回避，过一段时间，等双方都冷静下来之后，再和对方彻底地探讨这个问题。

受访者 Hagen 先生觉得有些中国人很难看透。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有些人微笑着撒谎。这时他的内心会莫名地产生一种类似“休克”般的无力感。在遇到这样一个中国合作伙伴时，他放弃了直接揭穿对方的谎言，回避了正面冲突，选择暂时离开。在考虑了一个星期后，他退出了合作。Hagen 先生表示，一旦遇到这种人，他通常会选择暂时回避，回家睡上一觉之后再作决定。这种做法可以为他赢得时间，冷静下来，理性地考虑问题的解决方式。

## 2. 被(动)回避——无从下手

几位德国受访者表示，在与中国同事或者合作伙伴发生冲突的时候，有时由于中方不主动交流或者甚至拒绝交流，他们会感到无从干预。Wolf 感觉有时中方“把交流之门关上了”。“如果一名员工来辞职之前完全没有任何表示，我何从知道他是为何而不满意呢？”(Wolf 语)类似的缺乏交流的问题，其

他受访者也深有同感，认为这是很多德国人难以理解的。

除了拒绝形式上的交流之外，有的德国受访者还表示，中方有时虽有交流之形却无交流之实。也就是表面上似乎愿意与你对话，但实际上却听不进你的解释，甚至没有反馈，以至于交流之后冲突问题不会有任何起色。受访者 Hans 在描述自己与中方领导的几次对话时，提到在对话过程中中方销售经理只是机械地点点头，面无表情，二人间没有目光接触，交流期间对方还曾一声不响地起身接电话。“我相信，目前谈什么都没用了！”(Hans 语)

## 三、解 读

除了在冲突激化后，冲突双方由于不愿正视对方而对其避而远之这种普适性做法之外，几位德国受访者采取的战术性回避以及在某些问题上对冲突视而不见的做法，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因为他们认为回避或者无视某些冲突更加行之有效，或者说对他们最为有利。这是德国受访者身处较为陌生的中国文化环境，审视相关情境影响因素后做出的调整。本研究的质性访谈资料显示，这种调整的关键影响因素有三：

受访者对德、中双方与冲突管理相关的个性化文化表征进行的对比和判断。所谓个性化文化表征，主要是指各个层面的文化与亚文化影响因素与个性特点相互融合而成的混合表征特点。

德、中双方在跨文化冲突中的权力势差。受访者本身的动机与利益。

下面就依据德国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到的关于这三个影响因素的信息，分析其为什么会改变在德国惯用的冲突方式，转而无视、战术性回避问题或者不了了之。

图 1：影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德国受访者的回避型冲突管理风格



根据研究访谈中所获得的一手信息，笔者将受访者跨文化冲突管理方式的选择过程用上图表示。图中的“与对方个性化文化表征的对比与判断”、对德中双方权力势差的判断，以及当事人的动机与利益，都对德国受访者具体采取何种方式管理冲突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下面借助质性访谈资料，依据各个情境

影响因素，为德国受访者在具体冲突情境中选择回避做出阐释。

### 1. 德国受访者对德中双方与冲突管理相关的个性化文化表征的对比和判断

笔者依据访谈转写资料，把德国受访者对德中双方与冲突行为相关的个性化文化表征做出的对比和判断进行了如下总结。

表 1：德国受访者对德、中双方与冲突行为相关的个性化文化表征的对比和判断

对比德、中个性化文化表征	中方不同于德方的冲突管理特点
就事论事 vs 注重和谐	冲突摧毁和谐和面子的同时，合作也将毁于一旦： “一旦（冲突）爆发了，事情就彻底结束了。”（Wolf 语）
面子感较弱 vs 讲究面子	一旦正面冲突爆发，“撕破脸”，往往就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了： “如果利用对方的领导打压对方，限制冲突，这必然意味着中方的那个工作人员会受到上级的训斥，这会让他（在领导面前）丢脸，而事后根本问题仍旧得不到解决。”（Monika 语）
等级观念弱 vs 等级观念强	“我意识到直接去找他于事无补，所以就给自己远在上海的上司打了电话，希望通过上司来解决此事。很明显，他（中方销售经理）会更愿意听我上司替我做出的解释。”（Hans 语）Hans 一方面回避正面对峙，另一方面求助于自己远在上海的直属领导，控制了事态的激化。

续表

<p>直接交流 / 交流多 vs 缺乏交流, 看不透“在德国, 人们通常会(在辞职之前)事先尝试彼此交流。”(Wolf 语) 而中国员工却:“非常沉默。根本不和我们交流, 一点反应都没有。”(Wolf 语) “微笑着撒谎”(Hagen 先生)</p>	<p>只有交流之形而无交流之实, 交流之后冲突依旧: “他完全游离在谈话内容之外, 只是点着头, 然后就起身走了, 事后仍旧兀自做着他那套[···]”, “完全不置可否。”(Hans 语); 在 Monika 想开除一名中国老员工, 并要与她说明原因时, “她拒绝和我讲英语, [···]只说汉语, [···]以至于我不得不总得找人来翻译。”(Monika 语) 结果交流的效果还是差强人意, 最后通过 FESCO 的专业调解师才把问题解决。 不懂得中方冲突的游戏规则, 难以有效管理 “文火慢熬一般的(summering)[···]冲突”, “阴险狡诈(大笑)”, “绝不能被卷入冲突升级的‘游戏’里去。[···]因为我不掌握游戏规则。如果中方要让冲突升级的话, 那我就得尽可能地开辟另外一个‘战场’[···]”(Monika 语) 在被问到德国人是否也会指桑骂槐时, Josef 肯定地表示“不会”。</p>
<p>直面问题 vs 灵活对待“事无大小都要解决”; “德国人总会把冲突看得很严重, 认为所有问题都很重要, 都必须认认真真地解决。”(Heine 先生)</p>	<p>灵活解决问题更高效 “中国人往往比德国人更灵活, 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选择视而不见还是公开对抗。我不需要(像在德国那样)花数小时来讨论这件事, 我可以面向未来[···]”(Heine 先生语) “[···]但有时候你也得灵活一些, [···]你可以说对方的文化跟我们不同。这里不涉及谁对谁错。继续工作吧! 就这样!”(Heine 先生语) 在遇到冲突问题时, Monika 通常要使用自己的“雷达”对其进行探测: “就像英语里说的 road rock, 是让它引发冲突, 还是默默接受它, [···]因为如果它 doesn't matter, 那就接受它。这个问题常常相当重要。”(Monika 语)</p>

德国受访者眼中的中国交际方崇尚和谐, 哪怕只是表面的和谐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这与德国人就事论事的特点大不相同。正面冲突无疑会破坏和谐氛围。如果冲突摧毁了和谐融洽的氛围, 合作也容易毁于一旦。而对回避型冲突风格的战术性应用, 类似于 Ting-Toomey/Oetzel 冲突风格八分法中的“消极对抗”<sup>①</sup>, 具有表里不一的特点, 表面回避, 并不意味着西方学者所理解的必然要放弃自身利益, 当事人更多会在台前回避, 幕后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对待面子, 德中双方也存在较大差异。“面子”观念中外都有, 本研究的多位受访者就都曾强调过, “我们德国人也要面子”(Wolf 语), “也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Hans 语)。然而, 德国受访者却认识到, 冲突对方, 即中方的“面子”更为丰富敏感、“面子”理念在中国人的内心更加根深蒂固。

正如黄光国所说, “面子”这个概念“源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sup>②</sup>。中国人的面子观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两个概念, 一个是“面子”, 另一个是“脸”。人类学家胡先缙认为,

① 作者注: 即表面不动声色, 但实际上却以消极的态度积极对抗。

② 黄光国:《华人社会中的脸面与沟通行动》, 载《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85页。

“面子”和“脸”二者既相互关联又有不同。“面子”指的是个人凭借成就和炫耀所积累起来的社会声誉；而“脸”则是指社会对有德行者的尊重，没有“脸”，个体便会感觉很难在社会上立足。<sup>①</sup>丢了脸即是丢了人。让人丢脸丢人是对人很大的伤害，往往会导致难以预想的负面效果。

多位德国受访者也意识到一旦正面冲突破坏了彼此的面子，甚至“撕破了脸”，让中方感觉没面子，甚至丢了脸，则常常会把解决问题的通道堵住，让问题的解决搁浅，裂痕也难以修复。而有时采取回避模式——无论是暂时回避还是战略性回避，或者干脆对问题视而不见，既可以保全自己的面子，同时也予人面子。面子是一种可以支配和经营的资源，<sup>②</sup>凭借着对他者“给面子”“留面子”，自己也可以获得面子。如果双方都有面子，问题的解决便有了可能。

此外，德中在等级观念上也有差别。Hans就是在意识到中方等级观念比德国更强，所以才在自己尝试解决与中方销售经理的冲突没有效果之后，转而回避与其正面交锋，同时求助于自己的上司，期待上司与上司之间能更有效地澄清问题。

德国受访者普遍认为跨文化冲突里的中方“看不透”，这与德中之间的交流结构和交流机制不同有关。德国人习惯于直接交流，就问题进行的交流也更多。工作中的问题交

际既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很多中国人则缺乏交流，尤其是问题交际，而自下而上的问题交流就更少。因此有些德国受访者在发生问题时，会由于缺乏交流而产生这样的感觉，不了解自己面对的冲突状况如何，到底处于何种冲突发展阶段；自己是否有意无意地冲撞了中方，这对中方面子构成了多大的威胁；中方有什么想法；中方会采取何种处理方式等。这导致一些德国受访者在对待德、中冲突时行为方式更为审慎。

此外，受访者 Heine 先生认识到德、中双方在对待冲突上的不同态度。德国人习惯于直面问题，采取诸如“进攻-扩张”<sup>③</sup>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中国人却会先行考量哪些冲突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无足轻重，不值得花大量时间精力解决，因此可以绕道而行，或者甚至忽略不计。就如同 Heine 先生面对中国员工加薪要求时，他便采取了这种避免正面冲撞的回避方式，因为他认为这是中国员工惯常的“游戏”，无须每次都认真对待。

## 2. 德、中在具体冲突情境中的权力势差

另外，在跨文化冲突情境中，德国受访者通常也对自己与对方之间的权力势差心中有数，这一点对其最终选择的冲突管理方式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具体信息总结如下：

- 
- ① 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载《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41页。
- ② 黄光国：《华人社会中的脸面与沟通行动》，载《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 ③ 作者注：德文为 Offensiv-expansive Problemlösung，引自德国学者 Strohschneider 对德国人和印度人解决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

表 3：德、中跨文化冲突中双方的权力势差对比

德国受访者	对德中权力势差的判断	德方权力势差（++ 为德方权力高，-- 为德方权力低，+- 为权力相当）
Hagen 先生	冲突对方是一个中方合作伙伴	+-
Heine 先生	冲突对方是中方合作伙伴 / 中方员工	+-/++
Hans	作为外派到中国的技术培训师，其冲突对方为中国销售经理，虽非直属，但确是 Hans 的上级	--
Josef	冲突对方是其最重要的中方合作伙伴；自己在中国初来乍到	--
Monika	作为一个第三方服务商，中方是其服务的买家，Monika 名下的公司要为中方合作伙伴提供令其满意的服务	-- 对中方伙伴有依赖关系
Wolf	冲突对方是自己手下的一名中国员工，但对方决意离职，不给任何交流机会，使得 Wolf 无力挽留	--

从上表可以看出，选择回避方式的德国受访者在相关冲突情境中大多处于权力对比的劣势，只有 Hagen 先生和 Heine 先生二人与冲突对方的权力较为均衡或者甚至处于优势。其中 Heine 先生无论是对合作伙伴还是对手下的员工都因为抱着一种能不大动干戈则灵活处之的态度而选择了回避某些问题，

因为这样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 3. 德国受访者的动机与利益

受访的德国人缘何最终采取了回避方式管理冲突，还取决于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他们自身的动机与利益。

表 4：德国受访者的动机与利益对其采取回避方式管理冲突的影响

德国受访者	动机与利益	对冲突管理方式的影响
Hagen 先生	寻找中方合作伙伴，案例里的中国公司只是待选公司之一；面对中方“微笑着撒谎”的做法，产生了一种类似“休克”的无力感。	对不诚信的极度反感导致不屑于正面冲突，直接全面回避。“因为我觉得，如果他能睁着眼说瞎话[...]我是没法和这样的人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进行交流的。”
Heine 先生	“有时候，如果那是核心问题的话，你必须（直面问题）”；而除此之外，“[...]有时候则必须要灵活一些 [...]”。	未触及核心利益，便灵活处置，无须事无巨细并一一认真对待。采用工作之外的方式调解，避免正面冲突更高效地解决问题。

续 表

德国受访者	动机与利益	对冲突管理方式的影响
Hans	作为外派到中国来的技术培训师，Hans 希望澄清双方立场，取得关于自己核心业务的共识。在中国公司安心完成本职工作；被自己与中方销售经理间的冲突搞得筋疲力尽，希望结束此事。	事实证明正面冲突有害无益，要选择中方经理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调解冲突，“曲线救国”。
Josef	冲突对方是其最重要的中方合作伙伴；自己在中国初来乍到。	避免出师不利；必须与中方主要领导有效沟通，不能在不明事理的情况下在中方伙伴气头上与其正面冲撞，这样得不偿失。通过回避等待事态慢慢正常化。
Monika	之所以回避正面“战场”，另辟蹊径，是因为一方面 Monika 不了解这里的“游戏规则”，她希望另外开辟的那个“战场”能给她“带来实质性的益处”。	为了能最大程度确保自己的工作顺利完成，维护自身利益，因此选择了回避。
Wolf	欲挽留愤然离职的中方员工，无奈对方已经“把交流之门关上了”	被（动）回避，被拒之门外，遗憾地不了了之。

从上表可以看出，每位受访者的具体动机与利益对其最终选择以回避方式管理冲突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Hagen 先生是由于极度反感或无法接受“微笑着撒谎”的交际方式以及背后隐藏的价值取向而选择回避问题，一走了之；Heine 先生是秉承着一种灵活面对冲突的态度，必须直面的问题直接对抗，微不足道的问题或者可以通过工作以外的其他方式灵活解决的问题，则灵活对待，这是一种对回避方式的战术式应用；Hans 的主动回避基于他之前无效的直接冲撞，在意识到自己与对方无法势均力敌后，他转而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自己回避冲突，同时求助直属上级出面调解，这也是一种回避方式的战术式应用；Josef 的经历更加戏剧化，他初来乍到，完全被中方指桑骂槐的指责弄懵了，当时的他必须竭力挽回自己出师

不利的初次登场在中方火冒三丈的时候正面冲撞显然得不偿失，于是他选择了战术性的回避，避其锋芒，等候事态正常化，再澄清误解。Monika 曾在访谈中谈及了作为第三方服务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地位问题：在德国，服务商与其客户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而中方客户对服务商的定位却大不一样，他们认为“服务商必须做他（中方客户）想做的事”（Monika 语），服务商地位明显低于客户。她总有这样的感觉：中国客户自认为可以对她指手画脚，不甚尊重。不满之余，她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通常会沿用自己在德国的做法，为自己据理力争，然而结果常常对她不利。为了能在顺利合作的前提下尽可能不违背自己的工作理念和做法，她选择了所谓“先发制人”的方式，回避与中国客户间的正面冲撞，以谋求实质性的利益。Wolf 的遭遇，

即在德、中冲突里感觉无从下手，在德中人际冲突中很常见。由于中方彻底拒绝交流，导致他失去了主动权不得不放手作罢。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受访者在德中跨文化语境中所采取的回避型冲突管理方式显现出以下特点：其一是面对非核心冲突，抱轻松的心态，视而不见；其次，“回避”常常并非西方研究者所认定的那种与主流相“分离”的选择，

而是一种战术性应用。另外，在中国，德国受访者较为普遍的一类经历是被（动）回避，或者说由于冲突对方，即中方形式或者实质上的回避，而导致他们无从下手，只能听之任之作罢。

德国受访者之所以一改他们在德国的一贯做法，在德中跨文化语境中转而采用回避方式应对冲突，是他们根据自己对具体冲突语境、对方与己方的权力势差以及自身的动机与利益所做的判断进行的调整。

作者简介：赵倩，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 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的历史、 现状与未来<sup>①</sup>

徐丽莉 张 凯

**【摘要】**18世纪以来德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与职业工作脱钩，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间泾渭分明。近年来，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缩小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鸿沟。劳动力市场越来越明显的专业化和学术化要求是促进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发展的重要原因。德国欲保持其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吸引力，其中重要一环即是提高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未来这一贯通性还会面临生源减少、竞争加剧等一些挑战，可以通过优化与扩展现有的贯通形式、发展应用技术大学、更多地引入双轨制课程等方式来改善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间的贯通性。

**【关键词】**职业教育 学术教育 贯通性

## 一、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历史 分裂

德国的教育体系中的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分属不同的门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间一直以来的泾渭分明，两者拥有截然不同的教育结构、组织形式和结业体系。小学四年级后学生要从普通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之间决定自己的继续求学之路。文理中学毕业考试一

般是通往大学的必经之路。而其他类型的学校则是为学生开启了职业教育的大门。在文理中学及大学等学术型教育中学习的学生和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学生很难在两类教育体系中实现转学。

20世纪60年代人们用“教育灾难”来警告德国的教育决策者，因为这种分裂过早地决定了孩子的命运。此后德国的教育体系才变得开放与灵活。“第二条教育道路”应运而生，即文理中学之外的毕业生也可获得参

① 本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院系自主项目支持。

加毕业考试 (Abitur) 的可能性, 得到与所学专业相关的高校入学资格。应用技术大学的兴起<sup>①</sup>使那些获得中等学历 (mittlere Reife), 如专科学校 (Fachoberschule 也译作专业高中) 毕业的学生得到进入应用技术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因此具有大学入学资格的中学毕业生人数增加, 至 2000 年后此数字保持在中学毕业生总数的 80%—85% 之间, 而 60% 的中学毕业生选择进入大学求学, 因此大学的新生人数持续增长。

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泾渭分明的原因在于就业体系对求职人的不同要求: 科学类工作需要学术性大学教授的理论及系统的知识, 而技术类工作则依赖“双轨制职业教育”传授的以行动为导向的知识和能力。而“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等值性”口号则将两者之间的分裂合法化。18 世纪以来德国的高等教育一直与职业工作脱钩, 仅招收那些通过文理中学教育并获得入学资格的学生, 这就使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平行存在。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德国进行了电子和金属职业方面的改革, 这些职业需要更多以抽象知识为基础的素质教育。因此出现了职业教育高等化的趋势。

## 二、当前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的发展

几十年来人们对于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

的贯通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尤其是最近十年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其原因在于<sup>②</sup>:

1. 未来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德国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生比例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数。虽然人们经常用职业教育和企业教育的特殊意义和质量来解释此现象, 但德国高校为在职者敞开大门将更有意义, 因为这样能够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而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进入大学学习。

2. 对劳动力需求及其素质结构的变化。经济界对高校的扩张一直持有怀疑态度, 认为这会使劳动力市场中对大学毕业生的供给远大于需求, 而职场十分需要的技术人员却供给不足。事实也是如此。尤其是在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行业中缺乏合适的劳动力, 例如, 2015 年数学、信息学、自然科学与技术行业从业人员中超过 4/5 的人没有大学文凭。<sup>③</sup>为保持德国在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地位就需要对此职业领域进行“学术化”, 聘用更多具有大学文凭的人员。因此, 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贯通性得到了间接的推动。

3. 教育政策的欧洲化。在博洛尼亚及哥本哈根进程启动以及欧洲学分体系 (EQR) 建立后, 高校改变政策战略, 为更多的目标群体敞开大门, 使大学教育更加灵活, 承认学生在校外取得的相关专业成绩, 满足更多学生的需求。

4. 其他因素。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高

① 德国各州政府于 1968 年共同决定, 在工业技术学校和专科学校的基础上, 创建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 专业技术大学 (Fachhochschule), 以弥补现有教育体系在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以及在区域发展规划分布方面的不足与缺陷。专业技术大学的规模发展迅速, 不到 10 年的时间就达到 97 所 (1975 年), 开设的专业从初期的 47 个逐步精选到 17 个。

② Beiträge zur Hochschulforschung, 36. Jahrgang, 4/2014, S10.

③ Der Arbeitsmarkt in Deutschland – MINT-Berufe, Statistik/Arbeitsmarktberichterstattung,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https://statistik.arbeitsagentur.de/Statischer-Content/Arbeitsmarktberichte/Branchen-Berufe/generische-Publikationen/Broschuere-MINT-2016.pdf>, März 2016, letzter Zugriff am 1. April 2017.

校和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必须面对高校学生结构的不均质性增强这一情况，需要调整高校的专业设置及管理来适应。

近些年来，德国高校专业的开放性成为学术教育与职业和企业教育间的竞争。长远来看将会形成日益加剧的体系竞争，从而导致职业教育的边缘化。<sup>①</sup>原因在于：一方面大学的入学率提高；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的改变，将对职业教育的未来产生根本的影响。

随着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多的选择进入大学深造，职业教育面临生源缩减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只有不到10%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1995年这一比例超过1/4，2000年达到37.2%，2012年超过50%，2013年提高至53.5%，2014年更是达到57%。整个德国2012年具有上大学资格的学生比例为53.5%，在汉堡则达到了60%。2011年大学新生人数超过50万大关，比2000年增加了64%，第一次赶上了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的新生数。而职业教育领域的情况则没有这样乐观。2013年新加入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数相较2000年下降了15%。2012年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学生总数将近150万，而大学在校生数则超过了240万。

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望，但在国内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参与双轨制的企业数量减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求学术教育涌向综合性大学，导致企业的岗位培训与年轻人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2012/2013年这些企业占有所有企业的比例为21.3%，2011/2012年为21.7%，2008/2009年度为23.5%。而在许多职业领域，不同背景的人员面临工作瓶颈的比例也有所差别。2015年大学毕业生面临瓶颈的比例为16%，职业教育毕业生达到25%。由于德国开始实施“工业4.0”等高科技战略，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导致劳动力市场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发生了改变，这对职业教育的未来将产生根本的影响。

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主席温特曼特指出<sup>②</sup>：劳动力市场越来越明显的专业化和学术化要求是促进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发展的重要原因。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要求具有大学毕业证的员工或者具有在大学获得的职业以外的附加证书。而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几年表现得更加明显。欧盟估计，到2020年将有35%的就业岗位要求高素质的员工，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29%；而欧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的就业岗位将增加1500万个。然而在德国，高校大学生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德国必须更加努力对那些具备职业教育背景和经验但不满足传统的高校入学条件的人创造高校学习和进修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学校、雇主、员工等所有参与者从根本上转变思路，打破教育领域现有的壁垒，提高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

① Euler, Dieter: Durchlässigkeit zwischen beruflicher und akademischer Bildung: Hintergründe kennen, <http://www.bertelsmann-stiftung.de/de/publikationen/publikation/did/durchlaessigkeit-zwischen-beruflicher-und-akademischer-bildung/>, Januar 2015, letzter Zugriff am 30. März 2017.

② (Verfasser unbekannt): Chancen erkennen - Vielfalt gestalten. Konzepte und gute Praxis für Diversität und Durchlässigkeit, <https://www.hrk-nexus.de/fileadmin/redaktion/hrk-nexus/07-Downloads/07-02-Publikationen/nexus-Broschuere-Durchlaessigkeit.pdf>, letzter Zugriff am 15. März 2017.

### 三、近年来德国提高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的举措

近年来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出诸多倡议来为在职者以及那些受过职业教育并有兴趣进入大学进行深造的人敞开高校的大门。主要措施如下：

2005年德国联邦教研部实施“将职业能力融入高校专业课程倡议(ANKOM)”，至2014年底项目终止，该倡议资助了20个项目，旨在通过区域内高校与职教机构的合作来提高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改善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的框架条件。从大学学习的组织、教学方法、咨询、现场培训和进修等方面入手为学生从职业教育向学术教育过渡给予支持。

2008年联邦总理与各州州长在峰会上达成一致：高校的大门应为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敞开。2009年3月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发布决议“职业教育毕业生的高校准入规定”，为那些没有经过文理中学毕业考试(Abitur)的职业教育毕业生提供进入高校学习的可能性。德国文凭框架(DQR)承认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本科与硕士学位的等值性。联邦和州的层面均出台辅助措施来执行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的决议，以便扩大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贯通性。另外的措施还包括下萨克森州实施“开放的高校”的促进措施；联邦于2008年引入“为职业教育中有天分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的项目等。

2009年9月勃兰登堡州实施了“IN-NOPUNKT计划”来提高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贯通性。将学生之前所获文凭及从职业教育、工作或企业实习中获得的能力作为进入高校学习的前提之一，同时高校要提供与职业相关的学术教育课程。

但最为重要的措施是联邦与各州共同举办的竞赛“通过教育来获得晋升——开放的

高校”。竞赛由联邦教研部主办，分两轮进行，分别为2011至2017年，2014至2020年。目的是为支持高校设计并实施促进贯通性和终生学习方面的措施。第一轮于2011年9月选出26个资助项目，促进高校开设与职业相关的专业，并授予学士或硕士学位；开展数字化或网络化学习(E-learning)等。该项目至2020年预计投入2.5亿欧元。受资助项目将起到示范作用。

### 四、未来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所面临的挑战

2014年9月，教育与研究部部长万卡在第七届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大会的发言中指出：德国必须保持其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吸引力，其中重要一环即是提高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

但在未来，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贯通性将面临挑战。一方面是年轻人对教育道路的选择行为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在源头发生水土流失的危险进一步增大。

德国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生源减少。德国高校内部实行“垂直化的差异”，即将会提供更多与职业相关的专业，这些专业与职业教育同类专业相比，从教学大纲和时间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却能够授予学生学士学位，因此更具吸引力。另外，在就业体系中许多领域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而这种能力难以从职业教育中获得，因为职业教育是以经验和行为知识为基础的。

万卡部长认为德国联邦教研部未来的任务在于：清除进入大学的障碍；赋予职业教育文凭更大的重要性；改革继续教育的规定，为职业教育毕业生铺就一条可预见的、有吸引力的、可信的职业升迁道路。德国30%的

公司领导只有职业教育文凭，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也是德国中小企业的一个强项。

## 五、改善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贯通性的可能途径

### 1. 优化与扩展现有的贯通形式

按照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BIBB)的建议,德国应该从五个方面优化与扩展现有的贯通形式。<sup>①</sup>一是:扩大具备职业教育背景和经验但尚不能满足传统的高校入学条件的人进入高校学习与进修的可能性;二是:提高高校课程体系中中对已获得的职业能力的认可度;三是:为具备职业素质的人按需提供学习机会;四是:为有职业经验的大学生提供更多的资助可能性;五是:为那些具备职业素质并有进入高校学习愿望的人提供信息与咨询服务。

### 2. 继续发展应用技术大学

学生进入具有“双轨制”教育属性的高等院校即应用技术大学学习,学业合格者同样可以获得硕士等高等教育学历。

德国联邦议会1998年6月通过了《高等教育总法》,应用技术大学获得了授予国际通行的“学士(Bachelor)”和“硕士(Master)”学位文凭的资格。但至今应用技术大学

仍没有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其硕士的毕业生只能在一所综合性大学里攻读博士学位。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最大特点是,以实践和应用为导向,通过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和研发活动,培养具有较强动手能力和自主解决问题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现在,德国产业一线的工程师中,有70%左右毕业于应用技术大学。因此,这类大学也被称为德国“工程师的摇篮”。在课程设置上,应用技术大学非常注重实用性,教学内容以企业的实际需要为导向。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必须设立实践课,让学生进入企业实习。此外,学校还会定期组织校外考察和企业参观等活动。应用技术大学的教师也都要求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除具有博士学位和高校任教资格等基本条件外,学校还对教师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硬性要求,规定他们必须有不少于5年的职业实践经验,且其中至少有3年必须在高校领域以外获得。

### 3. 继续发挥双轨制专业作为连接职业教育与学术型大学教育的桥梁作用。<sup>②</sup>

所谓双轨制专业是指那些高校与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设的专业,其内容与构架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求选择这类专业的学生必须有职业培训、职业经验或较长时间的企业实践过程才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录取的学生原则上必须满足大学的入学条件,企业参与学生的遴选并为学生提供相应补助

① ( Verfasser unbekannt ) : BIBB: Empfehlung des Hauptausschusses des BIBB zur Förderung von Durchlässigkeit zwischen beruflicher und hochschulischer Bildung, <https://www.bibb.de/dokumente/pdf/HA139.pdf>, 15.12.2010, letzter Zugriff am 20. März 2017.

② Thies, Lars: Das Beste aus zwei Welten- Duale Studiengänge als Brücke zwischen beruflicher und akademischer Bildung, <http://www.bertelsmann-stiftung.de/de/publikationen/publikation/did/das-beste-aus-zwei-welten-duale-studiengaenge-als-bruecke-zwischen-beruflicher-und-akademischer-bildu/>, Mai, 2015, letzter Zugriff am 21. März 2017.

或分担其学费；学生的学习地点是高校和企业。与其他专业相比，其具有明显的实践性。

双轨制专业早已不是教育体系中的一个边缘现象，它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在年轻人选择教育道路和企业人事需求规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受到了企业与学生的欢迎。双轨制专业更有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青年人的能力，更不会使双轨制教育体系贬值。其优势在于一是毕业生有良好的就业机会，约有89%的双轨制专业毕业生被参与设置该专业的企业录用。二是对于学生来讲风险小，因为企业一般会负担学生的学费并给予补助。三是企业出资办学资助学生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在过去的几年中双轨制专业的数量激增，从2005年的545个增加到2014年的1505个，几乎翻了三番，而同期双轨制专业的学生数也从42,467增加到94,723。<sup>①</sup>尽管学生数增长很快，但其所占高校中学生人数的比例依旧很低，仅为3.5%。<sup>②</sup>另外，双轨制专业仅局限于经济学、工程学和信息学等专业领域，这三个特定的专业占有所有双轨制专业的比例达到95%以上。59%的双轨制专业由专业技术大学提供，15%来自职业研究院，20%来自巴登符腾堡双轨制大学提供，仅有6%由综合性大学提供。因此，双轨制专业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作者简介：徐丽莉，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张 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① (Verfasser unbekannt): Datenbank AusbildungPlus des Bundesinstituts für Berufsbildung, <https://www.bibb.de/de/26725.php>, 2015, letzter Zugriff am 21. März 2017.

② (Verfasser unbekannt):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zu dual Studierenden, [https://www.destatis.de/DE/Publikationen/StatistikWissenschaft/Band17\\_DemographischeStandards1030817169004.pdf?\\_\\_blob=publicationFile](https://www.destatis.de/DE/Publikationen/StatistikWissenschaft/Band17_DemographischeStandards1030817169004.pdf?__blob=publicationFile), letzter Zugriff am 21. März 2017.



# 科研环视



# 科研新动态

邹 露

## 一、国内学术会议和报告

- 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2016年12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改革创新驱动教育发展、协调推进教育结构调整、协同营造良好育人生态、统筹推进教育开放、全面提升教育发展共享水平等战略任务。2017年上半年，教育部将正式颁布和实施各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在此关键节点，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17年4月15—16日联合举办“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共商新形势下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的改革新路径、发展新理念和教学新生态。来自全国的1800多名高校外语教育专家、学者、高校教学管理者以

及一线教师相聚成都，围绕“外语战略、国际人才、智慧教学”这一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凝聚智慧，共谋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发展大计。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徐青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副校长贾文键、孙有中，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钟美荪参加了此次论坛。

- 2017年3月29日、4月12日、5月10日和5月24日由德语系、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北外德语国家与欧洲研究高端论坛”第一、二、三、四讲在北外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和原欧洲联盟驻中国和蒙古国代表团大使赛日·安博（Serge Abou）分别做了“欧盟的挑战与未来”、“英国脱欧及其对欧盟的影响”、“法国大选与欧盟未来”以及“欧洲局势与中欧关系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并同与会师生进行研讨互动。
- 在2017年全国两会圆满闭幕之际，史明

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历任中央外办政策研究局局长、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于3月15日下午15:00在北外国际大厦1053会议室为德语系师生们做了一场以“中德关系及中德人文交流”为题的报告，并与德语系师生进行研讨互动。

-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第38期外交、经济研究生论坛于2016年12月27日当晚在北外国际大厦1053会议室举行。德语系硕士研究生赵飘、詹佩玲分别以“欧洲难民危机背景下的德国难民政策研究”和“从能源经济学角度分析德国的弃煤政策”为题做了报告，德语系教师们对报告做了点评，德语系研究生针对报告主题进行了现场互动。
- 2016年12月8日，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培高德博士（Dr. Cord Eber-spächer）在北外国际大厦539教室做报告，题为“了解中国——孔子学院在德国（China erklären. Konfuzius-Institute in Deutschland）”。培高德院长以歌德学院为例，讲述了这些年中国文化如何在德国传播，并详细介绍了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传播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邀请下，2016年11月29日下午，德国哈勒大学乌尔里希·布鲁姆博士，名誉博士，教授（Prof. Dr. Dr. h.c. Ulrich Blum），德国知名经济学家，历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德国班贝格大学教授、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创始院长、哈勒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为哈勒大学经济学教授、德国材料经济研究所所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基金会董事及学术委员会主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大会议室举行

了题为“德国经济竞争力及发展前景”的学术讲座。

- 2016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会议室举办了“德国政治形势与中德关系”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主任程卫东研究员致欢迎辞，与会德语界专家学者们做了精彩报告并就此展开讨论，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德国大选、美国总统选举等国际问题下探讨德国总体形势以及德国外交政策与中德关系。
-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成为贴近国家战略需求、为国家全球战略布局服务的需要。为推动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推动高校相关人才的培养，2016年11月12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协办的“首届区域国别研究与全球发展论坛（2016）”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四层会议厅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区域国别研究与中国对外战略”，旨在深入探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发展的未来方向以及区域国别研究视野下的国际格局演变及中国国际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需求。本届会议特设如下几个议题：（1）当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2）国际秩序演变背景下的区域国别问题；（3）中国对外战略视野下的区域国别问题。本次会议邀请国内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共聚北外，探讨研究领域内的基础问题、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共同推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进一

步发展。

- 2016年11月2日，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博士 Peter Schisler 应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邀请，在北外国际大厦 1053 会议室以“欧盟当前形势及德国的作用（Zur aktuellen Lage der EU und die deutsche Rolle in der EU）”为题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Schisler 教授是柏林国际关系学院“通信与新媒体”专业教授，退休后曾在北京大学讲学。
- 2016年10月22日下午，首届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政府密集换届前的各国政治展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对外经济合作”“命运共同体概念下的全球治理创新”“全球传播视阈下的公共外交与国际新闻”四个分论坛的 24 个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和讨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人员、中国前驻中非共和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孙海潮，前驻南斯拉夫大使龚猎夫等众多专家学者参与了论坛的讨论。此次论坛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各个领域，研究视角既有传统的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也有跨学科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既聚焦中国现状，又展示了全球化视野。首届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端论坛作为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成立日的首个活动，展现了与会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了我国在国别区域问题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同时，有助于我国区域研究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我国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水平。

## 二、科研与获奖成果

1. 《品牌思维：六个德国杰出品牌的案例分析》

析》，（德）多米尼克·穆尔特如（Dominic Multerer），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4月。

《品牌思维：六个德国杰出品牌的案例分析》描述了品牌为何要打破常规的信条，以及这个信条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书中指出，品牌与户外广告、电视广告同传单形式的轰炸等宣传行为无关，只有少数人可以用品牌的思维进行思考。书中选取了六位具有“品牌思维”的企业创办者和管理者，就他们如何进行品牌思考做了详细说明。这些说明内容包括：如何获得品牌的感觉和意识；如何确定适用于自己行业的规则，然后再去打破这些规则，在竞争中领先一步；怎样让自己与众不同，且让别人无法预测。本书还向读者传达出这样的观点：品牌这一话题不仅仅局限于营销计划；只有当人们事先对规则有所理解，才可能打破交流的规则；游击营销也不仅仅是个别行动。本书对大集团公司和中小企业的高层、经理或部门负责人同样适用，其指导意义在于，让企业永远不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窘境。

多米尼克·穆尔特如是德国学者、企业家、商人和演说家，16岁时被德国《商报》评为德国年轻的首席营销官。现同时任职于科隆商学院和位于美因茨的欧洲管理学院。英国石油欧洲公司、固特异邓禄普、欧唯特·贝塔斯曼、沃达丰集团等知名大公司都是他的客户。

2. 《不情愿的大师：德国与新欧洲》，斯蒂芬·葛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

英国脱欧，德国坐大，第四帝国魅影乍现？迭代的文明，重返的荣耀，是做主人还是做导师？欧债危机凸显了德国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但是德国在欧洲作为支配力量的形象却又与其过去的历史相映射。《不情愿的

大师》是对德国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到第二帝国、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广泛研究。书中不仅揭示了像这样一个成熟发达的文明国家如何堕落到纳粹的野蛮统治，又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重整旗鼓，成为“经济发动机”，最重要的是，斯蒂芬·葛霖研究了德国主导其欧盟邻居们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且试图告诉我们这会意味着什么？

斯蒂芬·葛霖，中文名王志浩。英国牛津大学学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1982年加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2003年任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2005年任英国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2006年成为汇丰控股集团主席。2009年3月25日，北京大学授予葛霖北京大学名誉校董铜牌。2010年，葛霖在《华尔街日报亚洲版》评选出的2009年亚洲商界风云人物排行榜中位列第九。

3. 《德国制造：员工管理路线图》，（德）托尔斯滕·博施，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3月。

（德）托尔斯滕·博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博士，专业方向为教育心理学谈话沟通技巧。大学期间就已从事咨询工作，1995年成立托尔斯滕·博施咨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转型为托尔斯滕·博施博士股份有限公司。作者是德国权威管理专家，20多年来，他和他的团队一起为所有阶层的领导者提供咨询和培训，目前已为1000家企业提供了培训，包括很多世界500强企业，如苹果、IBM、大众、宝马、拜耳、西门子、索尼、菲利普等提供了培训，他的管理理念影响了德国各行各业的发展。《德国制造：员工管理路线图》是作者20年来与来自不同公司、行业、级别的数千名管理者实际接触后写成。不同于以往激励团队的抽象信条与鼓舞，读者能在书中读到既包罗万象又切合实际的理念以及可以立刻使用的工具。

本书向管理者与经理们展示了如何通过直接、尊重的管理谈话以及有意识的责任承担来增强他们的影响力。许多知名企业已经成功运用了这些具体、精确的管理指南。这本图表精美的“使用说明”是未来充满挑战的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路标。

4. 《收集德国好时光——认识德国骨子里的气质》，（德）洪莉，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3月。

作者洪莉在德国生活了25年，在小镇生活了18年，她嫁给了当地的德国人，进入了一个完全本土化的德国家庭，因此她有机会不局限于当地的华人群体圈子，而是真正融入德国本地生活。她积极参与德国当地协会活动，在闲暇时与德国丈夫结伴巡游德国各地古镇村庄，参加各种民俗节庆，与德国邻居友好交往，与德国婆婆闲话家常……而记者的职业身份又使她在采访时有机会接触德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事、物。广博的见闻、凡事求甚解的性格、天生的好奇心和敏锐的观察力，以及热爱生活的一颗心，使得她潜移默化地收集起多年的德国美丽时光，把她的观察、她的感悟、她对德国社会及德国人的理解分类梳理成章，和大家分享。德国霍尔特市市长作德文序，200多张作者及德国先生共同拍摄的日常生活照片，十几万的文字，图文并茂，书中有你所不曾知晓的德国内里的气质。

5. 《北大德国研究（第六卷）》，黄燎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

《北大德国研究（第六卷）》所收录的文章是关于德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文学、法律等各方面的研究。作者有北京大学各相关院系的教师，以及其他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等的老师。对于读者较深入地了解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很大

帮助。本书的主题为民族与国家，收录了来自中、德、日、韩四国著名的德国研究学者关于德国和东亚各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读者较深入地了解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很大帮助。其中，《卡西尔读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所做评议》《学习瑞士的榜样》《1859年席勒百周年诞辰应景诗两首》为德文文献首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文学中的案件与政治合法性》《荷尔德林“父国”概念中的个人、政治与宗教》等文章，则从法律和政治的角度对文学文本进行了独到的解读。

6. 《德国经济通论》，殷桐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

本书是一部论述德国经济问题的学术著作，几乎涵盖了德国经济的各个重要方面，大到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小到各个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状况，均有详细论述。在详细介绍有关德国经济的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的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德国经济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历史和现实，深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本书把德国经济的发展分成三大纵向阶段：即经济奇迹阶段，“德国病”、“统一病”阶段和复苏阶段。1945年的德国满目疮痍、百业凋敝。然而曾几何时，人们就发现，它已经插上腾飞的翅膀，飞出战后的荒芜，以其雷霆之势，冲出阴暗的地窟，用奇迹之光，托住了沉沦的落日，复燃了这个善于在逆境中奋起民族的辉煌；然而再一个曾几何时，人们却日益痛感，德国的经济风光不再，高福利、高债务、高失业、高税收、高成本压得这个以往的奇迹之国喘不过气来，而低增长、低投资更是让它无力再迈上一层楼，落得被人“一览条顿小”的地步；德国经济的沉沦终于唤醒了这个自尊心极强的民族，从20世纪的90年代末开始进行结构改革。施

罗德的《2010议程》同默克尔的三和弦结合，刚柔并济、相得益彰，使德国的对内和对外经济都出现了转机，不仅迅速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羁绊，而且成了欧债危机的中流砥柱。

7. 《创新背景下的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及质量研究》，苗晓丹，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1月。

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创新也意味着技术技能密集型的产业新定位。在这种定位下，为了使“人化”技能下的劳动者素质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借鉴学习先进国家的相关经验及做法就尤为重要。德国的职业教育，尤其是“双规制”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能够与时俱进、适应就业市场要求、产业结构优化的技术工人，推动了基层企业行业创新实践。因此，在这新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对德国职业教育进行重新审视，从质量角度挖掘其作为德国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助推德国制造的外在及内在原因，为我国建设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企业、行业的创新能力，早日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借鉴。

8.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第七辑)，殷桐生、刘立群，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12月。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是介绍德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和文教的学术期刊，具体栏目包括：采访精撷、新闻鸟瞰、热词诠释、政治舞台、外交观察、经济视野、文教论坛、媒体智库天地、科研环视、大事记等栏目。宗旨是为国家的战略需要提供最新资讯，研究新问题，提供评论和对策建议。《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第七辑)》对中奥建交45周年进行回顾与展望，对难民危机、叙

利亚危机、波兰大选等背景下的德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剖析，从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方针、我国经济倡议“一带一路”对德国的影响、德国法定最低工资、德国与二十国集团、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形成与发

展、欧债危机看德国央行独立性等视角对德国经济的现状发展进行了解读和评论，此外还分析了德国智库对我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解读等。

作者简介：邹露，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 大事记



# 德国外交经济大事记（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4月1日）

李倩瑗

## 2016年

11月2日，德国国内近期围绕中国企业收购德企爱思强出现争论。对此，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当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文中对德国国内日益明显上升的保护主义倾向深表忧虑。

11月3日，德国籍的欧盟数字经济与社会委员厄廷格因日前发表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辱华言论，在德国国内受到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亦做出了回应。当日，厄廷格正式发表声明，就其辱华言论做出道歉。

11月4日，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致电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时说，英国政府对前一天的法院裁定感到失望，但“政府的重点是最高法院的上诉案，我们有信心赢得此案，并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

同日，德国前外长施泰因迈尔在柏林同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就英国“脱欧”、叙利亚和土耳其局势等举行了会谈。施泰因迈尔提醒英国政府“脱欧”进程不要半途

而废。

11月8日，德国联邦警局公布一份最新统计显示，德国2015年犯罪案件数量增长高达31.6%。联邦警方称，大量难民非法涌入德国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根据德国联邦警局的统计，2015年全年德国共通报436,387件犯罪案件。而这只是联邦层级统计数据，并不包括各地方警局通报的犯罪案件。德国当地媒体指出，联邦犯罪案件大增31.6%，其中近4成案件都与非法入境有关，总数达到171,477件，比2014年暴增151.6%。

11月10日，德国在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总领馆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4死128人伤，领事馆严重损毁，馆内所有德国职员无恙。塔利班承认对此事件负责。

11月11日，德国经合部部长穆勒透露，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计划带头推动该国出台一项“非洲版马歇尔计划”，以加大发展援助等方式从根源上应对当前的难民危机。该计划设计者认为，德国到2030年应拿出1200亿欧元用于援助非洲。

11月14日，德国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高层最终就来年联邦总统选举候选人达成一致。社民党籍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成为三方共同支持的候选人，有望在明年2月选举后成为现任总统高克的继任者。身兼基民盟主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在柏林表示，施泰因迈尔是一位处在政治核心的人物，在国内外各界广受尊敬，因此尤为适合担任总统一职。她说，在全球正处于动荡不安的这一时期，推选施泰因迈尔作为联邦总统候选人是一个“稳定的信号”。

11月15日，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执政党基民盟（CDU）的勒特根透露，第三个总理任期即将届满的默克尔“明年将会参与总理竞选”。他表示，上述目标只有在欧洲内部团结合作以及得到跨大西洋伙伴的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我们是要重新塑造西方，而不是瓦解西方”。

11月1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的总理府同到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及英、法、西、意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奥巴马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与会各国支持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默克尔表示，她将认真对待奥巴马提出的建议，即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今后必须逐步加大对北约的贡献度。

同日，德国联邦内政部决定将12,539名阿富汗人遣送回乡。理由是，阿富汗中部的广大地区已经安全。内政部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整个阿富汗的局势恶化”。

11月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正式宣布其将寻求连任基民盟主席，并将在2017年作为该党候选人竞选总理。

11月23日，第七届中欧论坛汉堡峰会在德国汉堡正式开幕。在为期两天的本届峰会上，与会者将重点聚焦“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制造2025、中欧投资合作、创新与绿色经济等议题。由德国中国商会主编、

德国权威机构参与的新版《2016投资德国指南》正式发布。

同日，针对德国政府此前政治介入中国企业在德并购的做法，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表示，德国不应该对中国在德投资采取一种“防御性的做法”。

11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德国汉堡出席第七届中欧论坛汉堡峰会闭幕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表示，欧中关系强劲有力，欧盟将中国作为在双边和全球层面的重要伙伴，期待在相互尊重和互利基础上建立更深更强的经贸关系。德国前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德方愿本着开放、坦诚精神，继续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并在更广泛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

同日，英国政府的秋季预算报告显示，英国脱欧所带来的借债将高达587亿英镑，部分原因是保守党政府承诺要将移民数量减少到几万人。

11月2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20国集团（G20）国家必须想办法解决全球钢铁产业的过剩产能问题，并称一些国家产量过剩导致其他国家失业人口增加。默克尔称，德国将推动找到共同解决办法，来解决全球过剩问题。该问题已压抑钢铁价格数年，且导致中国和其他主要出产国之间的紧张气氛。

11月28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示，北约派出海上军事力量参加土耳其在爱琴海举行的“努斯雷特”年度军演。演习从28日开始持续到12月4日。除了土耳其海军，德国、希腊等北约盟国以及伙伴国的船只也将参加演习。

11月29日，在柏林举行的首届中德智能制造及生产过程网络化大会上，中德两国官员呼吁两国企业把握历史机遇，开放互信，合作共赢。约有300名来自中德两国政、商、学界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以主旨演讲、小组对话和分论坛等形式，共商如何进

一步务实推进“中国制造 2025”和德国“工业 4.0”战略的对接合作。

同日，德法俄乌四国外长会议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各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东部冲突交换了意见，但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1月3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对其领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发言时表示，反对开始与土耳其就该国加入欧盟问题进行新的谈判。

12月1日，德国正式从中国手中接任二十国集团（G20）新一届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11月30日已向内阁陈述了G20的中心议题。定于2017年7月7日至8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把全球稳定作为最主要的议题。从12月1日至来年11月30日，德国将担任G20主席国。德国为此次担任主席国所选定的口号是“塑造一个相互连通的世界”。德国将这一年间G20的主要议题确定为三大支柱：确保经济稳定性、改善可持续性、负责任地发展。

12月3日，德国经济部发言人瓦格纳表示，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2日签署行政命令，阻止中国公司收购德国企业爱思强，但这不会对德方正在进行的审查构成影响，德方将继续对收购案进行“不预设结论”的审查。

12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以89.5%的支持率再次当选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党派大会上号召党内人士团结起来，备战明年的德国选举；她预计这次选举“难度无与伦比”。默克尔还呼吁德国禁止完全遮盖面部的服装。

12月1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到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柏林举行会晤，双方认为有必要延长欧盟就乌克兰冲突对俄罗斯的制裁。

同日，据德意志科学基金会赞助者联合会最新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2015年德国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达到了624亿欧元，比前

一年增长9.5%，创历史纪录。

12月14日，德国政府内阁通过的关于能源转型的第五份年度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该国已有31.6%的电能消耗量来自可再生能源，达到近1/3。

12月15日，由德国联邦内阁通过的报告显示，2015年共有240万移民在德国登记，虽然同时有近100万的人离开了德国，但是净移民人数也有114万人。

12月19日，德国柏林一个圣诞市场发生货车冲撞人群事件。这起事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48人受伤。12月24日，柏林卡车恐袭案嫌犯在意大利被击毙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增加遣返难民的数量，内政部长也承诺加强安全措施。12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认为，柏林恐袭事件不应切断难民进入欧洲的道路。他还强调加强欧盟内部安全的必要性。

12月3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对全国发表的新年谈话中指出，恐怖主义是德国面临的最大考验，她誓言推动立法来加强安全。她敦促德国民众拒绝民粹主义，并指出在欧盟扮演领导角色，对德国有利。她表示，欧盟成员应超越自身国家利益，聚焦共同利益。

## 2017年

1月2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16年德国平均总就业人数为4340万人，同比新增42.5万人，增幅为1%，就业人数创下德国统一26年来的历史新高。

1月10日，曾在1994年到1999年之间担任德国联邦总统的赫尔佐克在柏林逝世，享年82岁。

1月11日，德国内政部公布统计显示，去年抵达德国境内的移民人数仅约28万人，较前一年的89万人大幅减少2/3，显示德国的移民管理政策获得成效。

1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向该国企业界领袖表示她对自由贸易的承诺不变。默克尔在科隆向德国工商总会发言时力劝企业界领导人，在未来英国和欧盟举行脱欧谈判时继续支持德国政府。

1月17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评价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移民政策时认为，2015年有超过100万难民和其他非正规移民流入德国，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同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会见到访的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时表示，欧洲人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以此回应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日前对欧盟前景等问题的批评意见。

同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德国最大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已同意支付72亿美元，与美国司法部就该银行2006年至2007年不当出售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达成最终和解协议。

1月18日，德国政府决定，将于9月24日举行大选，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寻求第4个任期。

1月21日，欧洲议会党团“民族和自由欧洲”在德国科布伦茨集会，称民族主义者的时代已经到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党主席勒庞发表了演讲。

同日，德国政府宣布，在德国庇护申请遭拒的移民可以在被强行遣返或者拿钱回家之间做出选择，德国政府愿出钱资助他们重新返乡。从2017年2月份开始，正在申办庇护申请者也可以决定是否选择参与Starthilfe Plus资助项目返回家乡。德国联邦政府将为该项目投资大约4000万欧元。

1月25日，德国政府公布的新一份年度经济报告显示，德国官方预计今年经济将增长1.4%，较2016年的1.9%小幅下降。

1月2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总理府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双方呼吁欧洲加强团结，应对欧盟内外威胁。

同日，德国工商大会（DIHK）发表的最新测算结果认为，中国已于2016年首度成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贸易伙伴。

1月29日，德国社民党（SPD）正式推选马丁·舒尔茨作为该党今年秋季的联邦大选总理候选人。舒尔茨在讲话中将“公平和信任”作为2017联邦大选选战的核心主题。

同日，德国总理发言人表示，针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新签署的限制移民的行政令，德国方面表示遗憾。默克尔还与特朗普通话，解释了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提醒美国有义务接收难民。1月30日，荷兰外交部与德国外交部发布联合声明，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布的难民和移民政策。荷兰与德国坚决维护本国公民与侨民的权利，将尽快就此事与欧盟进行磋商。

1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指责德国操纵欧元汇率，导致欧元被“严重低估”，损害了美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利益。当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反驳了纳瓦罗的指责。她表示，德国并未操纵欧元汇率，欧元汇率属于欧洲央行的职权范畴，德国一直支持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且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2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率领内阁部长与德国各州州长举行了关于难民问题的会谈。默克尔在会谈后表示，联邦与地方已达成一致，当前应以出台法案的形式加快遣返德国境内避难申请被驳回的人士。

2月9日，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报告指出，2016年德国的出口额再创新高，达12,075亿欧元，进口额为9546亿欧元，出口额增长1.2%，进口额增长0.6%。高达2529亿欧元的贸易顺差，创下自二战后德国最高贸易顺差纪录。

2月12日，德国举行联邦大会总统选举，前外长施泰因迈尔当选第12任德国总统。在

联邦大会 1239 张有效票中，施泰因迈尔赢得 931 票，在第一轮投票中即当选总统。俄总统普京祝贺施泰因迈尔当选德国总统，并表示愿就双边热点问题开展对话。

2月17日至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简称慕安会）在德国慕尼黑举行。面对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全球性危机只能通过多边的方式解决。她呼吁加强联合国、北约、欧盟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

2月21日，德国国防部宣布，将在此前公布的中期规划基础上增大扩军规模，到2024年使现役军人总数达到19.8万人。

3月3日，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了德国大使埃德曼，原因是德国加格瑙市日前拒绝土耳其司法部长波茨达格参加在那里的一次集会。安卡拉方面向德国大使表达了土耳其对这一事件的“不快”。

同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突尼斯并表示，已与该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对于德方提出的身份甄别请求，突尼斯今后将在一个月内答复，以加快遣返被拒难民的进程。德国还将加大对选择自愿重返家园的突尼斯籍申请避难者的补助力度。

3月初，德国连续取消两场土耳其部长级官员参加的有关宪法公投的集会。3月5日，土耳其外交部紧急召见德国驻土大使表达抗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当日的伊斯坦布尔万人集会发表演讲时指责德国政府，称其“与纳粹德国如出一辙的做法”有违民主。

3月6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非正式峰会，支持以不同步调推进欧盟一体化的“多速欧洲”概念。

3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双方表达了促进自由贸易，推动各方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决心。

3月17日至18日，G20财长在德国巴登-巴登集会。这是首次有特朗普政府代表参加的G20财长会。

3月1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讨论了贸易、北约防务、移民、反恐、乌克兰危机等话题。特朗普向默克尔重申了自己坚定支持北约的立场，并敦促北约盟国承担应有的北约防务上的财务负担。默克尔表示，德国承诺在2024年达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特朗普表示支持自由贸易，称他倡导的“美国优先”执政理念不是孤立主义。但他同时强调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受到不公平待遇，表示贸易政策应该更强调公平性。默克尔表示，她认可公平贸易的重要性，但强调应以开放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化。德国防长冯德莱恩表示，德国希望北约改变把2%GDP用于军费的预算目标，仅用军费开支是否达到2%衡量其贡献是不准确的。除了军费多少外，还应把参与海外任务的情况列入评判范围。

3月18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德国欠北约一大笔钱，美国向德国提供了强有力的、非常昂贵的防务，也应得到支付”。

3月2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汉诺威举行会谈。双方确认了包括美日欧在内的七大工业国（G7）以及二十国集团（G20）的相互合作。两国政府为配合首脑会谈还签署了以主导制定物联网（IoT）领域国际标准为核心的《汉诺威宣言》。

3月22日，针对英国伦敦发生的恐袭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致哀声明中表示，她对此感到震惊，她强调在抗击恐怖主义的战斗中，德国将与英国紧密地并肩作战。

3月25日，欧盟庆祝《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纪念活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除英国外的欧盟27国领导人聚集在罗马，共商

欧洲未来 10 年的发展大计，并发表《罗马宣言》。

3 月 26 日，萨尔州地方选举当日率先拉开战幕，点票结果显示，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胜出萨尔州选举。

3 月 31 日，北约部长级会议举行前，德

国外交部部长加布里尔表示，让每个成员国都实现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不切实际”。同样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坚称，北约各成员国有必要提高国防开支，并且期望各方能承诺于今年年底“达标”。

作者简介：李倩瑗，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稿约

一、本刊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办，研究德语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社会 and 文教问题的刊物，但凡上述内容的稿件，一概欢迎。

二、请用电子邮件投稿。来稿一律投编辑部邮箱。

三、正文使用 Word 文档，五号宋体，注释用小五号宋体。

四、来稿请在正文之前附上 300 字以内的中文提要或 150 字以内的德文摘要和 5 个以内的关键词，并附上中文及外文标题和作者简介。资讯稿件总篇幅以 1000—5000 字为宜，研究稿件以 5000—8000 字为宜（包括注释）。

五、文中第一次出现不常见的外国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称或专业术语时，请在中文译文名称后加圆括号注出原文。

凡涉及引文或引证的观点，请注明出处，体例如下：作者（外文姓名也是姓在前，名在后，但用逗号隔开）：书刊名，期刊号，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页码等。引用外文著作的注释请用原文，无须译成中文。引用网络资源，请注明具体网址和访问日期。

每篇文章注释一律采用脚注，脚注编号通篇连续。

六、本刊编辑部可能对来稿作一定的修改或删除，作者如不同意，请在投稿时声明。

七、本刊编辑部在接稿之日起三个月内将通知作者有关处理意见，在此期间请勿一稿两投。未被采用的稿件本刊不负责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八、凡作者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一律文责自负。

九、来稿需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邮编、职务、专业等信息，写明电子邮箱及电话以便联系。凡学生来稿请务必注明学校、专业和年级。发表时可用笔名。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相应稿酬。

十、《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24 号信箱。邮政编码：100089，电话：(010) 88816516, 13641271934, E-mail: dygjzxyyj@bfsu.edu.cn





